

编号：0000536

广东革命历史文件彙集

1938—1941

中 央 档 案 馆
广 东 省 档 案 馆

广东革命历史文件彙集

(中共香港市委文件)

1938—1941

中央档案馆
广东省档案馆

1987年6月

编 辑：罗修湖、范胤敏
审 稿：林忠佳
校 对：廖运泉、许振泳、林忠佳
编出时间：1987年6月
印刷时间：1988年2月
印刷单位：广东省供销学校印刷厂
印 数：2000份
广东省非营利性出版物准印证第142号

编辑说明

一、为了满足党史、革命史和现代史研究工作的需要，我们汇编了这部文集，作馆存本，供内部使用。

二、本文集甲种本第44册编入的是中央档案馆、广东省档案馆所保存的香港市党组织在抗日战争时期（1938年—1941年）的历史文件资料，均按原件刊印。

三、编入本文集的文件，均保持原有的面貌和风格，仅对十分明显的别字、重字、掉字、倒置字作了若干订正；明显的错字、漏字，编者将正字改加于后，并加〔〕以示别；字迹模糊、无法辨认的字，以“×”代替；原件上的缺损字，以“□”代替；看不清的人名、地名以“△”代之；个别要说明的，另加注释。

四、凡由编者加拟和改过的标题、副题均加“*”号标明；但某些文件如“市委报告第一号”，则直接改为“中共香港市委报告第一号”，不再加注。

五、本文集按年月顺序排列。

六、由于缺乏经验，文集在编辑和考证方面都难免有缺点和错误，希望使用本文集的同志指正。

中共中央香港工作委员会

文件汇编

目 录

中共香港市委给中央书记处周恩来叶剑英的报告
——关于陈某谈汪精卫派居觉生向蒋介石劝和的情况
(1938年12月4日) (1)

廖承志致王明洛甫并凯丰电
——我在港报馆及其人员情况
(1939年7月10日) (3)

香港印刷业工会中文报馆工友复工后告各界人士书
(1939年7月25日) (5)

香港职运工作报告
——1936年6月至1939年11月香港
工人的生活概况、职工组织和反日斗争等情况
(1939年11月) (11)

中共香港市委致中央电
——香港出席党的七次代表大会代表名单
(1939年) (41)

廖承志致侨委并周恩来电
——关于加强华侨宣传工作之意见
(1940年9月27日) (43)

潘汉年廖承志刘晓致洛甫电
——对香港时局紧张我之布置情况
(1940年10月9日) (45)

唐克邓衍基黄一甦关于香港反汪工友
回国服务团的报告
——反汪罢工、组织服务团及回国途中斗争经过
(1940年) (47)

周小鼎关于香港中华书局分厂党总支工作的谈话记录
(1941年1月11、13日) (73)

对开展中华书局香港分厂总支工作的意见
(1941年1月20日)..... (119)

香港青年工作报告
——抗战爆发前后学生、工人思想状况及各
团体的组织和斗争经过
(1941年1月25日)..... (127)

吴有恒关于香港市委工作给中央的报告
——1936年9月至1939年11月
香港的政治环境和党的组织、群运、统战等工作
(1941年2月16日)..... (237)

中共香港市委给中央书记处 周恩来叶剑英的报告

——关于陈某谈汪精卫派居觉生向
蒋介石劝和的情况*

(1938年12月4日)

中央书记处周、叶：

甲、陈△谈，汪不久〔前〕提和平条件，曾由居觉生向蒋提出，蒋对此默然，不讲一句话，拂袖入内。再过片刻，即出。三小时后，前方将士反对和平电文如雪片集。居、汪骇然，不敢再提。但陈云由此稍断：蒋对和意仍不赞成，但说汪所为，蒋全不知道，亦不见得。

乙、孙哲生在重庆极感苦痛，盖各方对之全取漠视态度。孙电△虽称不久计划再去苏一行，依其交中苏问题各项建议，蒋对之均不置可否，持不答态度，孙极感无聊。孙对重庆参议会内国民党之小组活动方式，殊感不满。

丙、陈△对老友△表示：五中全会虽宣延期一月，但主和派活动者稍减。曾仲△亦用×陈鼓动和议，陈提议驻港中委及各主战反和国民党中老同志应有经常另有交换意见，老派均赞成。

港 十二月四日

廖承志致王明洛甫并凯丰电

——我在港报馆及其人员情况*

(1939年7月10日)

王明、洛甫同志并凯丰同志：

甲、现在与我们直接有关系报：1. 西贡《全民日报》系华侨同志投资一万元创办；2. 菲律宾有《民族〔印〕务馆》与《民族解放》小报；3. 新加坡《南洋商报》系一同情者总经理，屡次问我们编辑；4. 其他檳城、泗水尚有日报者〔若〕干。

乙、遵照你们指示先由菲着手，现已有姓许的由菲回国，华侨答应捐股了。

丙、千菲币吉〔合〕一万四千国币，创办拟先派人到菲，先出拾张印务馆进行翻印，然后扩充为日报，先派另外一福建同志冯学礼一星期内回菲。任务系报股与扩充印务馆，准备三个月内太过，出现一月内报拟调编辑到菲，但人选未确定。

丁、西贡方面准备充实《全民日报》之编辑，此方面我们可有充分把握，因报系现成，只需插入入内，现在先派韩托夫曾在联工作及拉特港土著小文化人到“全民”先帮忙。

戊、在港后补之编辑人员计有：1. 周逸群，上海译

报编辑同志；2. 郑森禹，前《上海月报》编辑新同志；3. 社报港市委宣部长；4. 梁上苑，《新华日报》驻港通讯员等。唯上述人等只宜局部编辑，全盘政治领导尚差，因此，计划倘延安有人尤妙，否则他们先到菲，由港联络，盼延方多来指示。

己、倘股率未足而先有办报可能，能否贷借存港一部捐款，《南洋商报》及其他尚无力顾及。盼示。

小廖 十日

香港印刷业工会中文报馆工 友复工后告各界人士书

(1939年7月25日)①

亲爱的各界父老兄弟姊妹们：

本月十日晚，因工友突然停工，使本港各报减少〔小〕篇幅而影响社会宣传。本会以环境关系，未便表示态度的缘故，遂使社会人士感抱怀疑，关念至切。当着今天稍告平息的时候，敝会至此不能不把始末详情，以为各界父老兄弟姊妹们告：

自抗战开展以后，我印刷业工人，深知欲使抗战胜利，建国完成，非在有组织之下团结起来，以人力、物力献给国家，不能收指臂的功效。于是在民国二十七年一月稟准华民政务司，成立《香港印刷业工会》，联合数千工友，以从事拥护祖国的抗战与建国的事业，同时并集合我们数千的劳动力，促进后方生产，加强抗战宣传，充裕抗战期间的文化食粮。另一方面在可能的范围内，拯救几千深陷于肺癆圈里和困于过长工作时间以及恶劣环境所牺牲的工友们。

在二十个月的过程中，敝会根据拥护抗战、改善工友

①年份是根据文件内容判定的。

生活的两个原则下，凡能裨益于国家民族、有利于抗战前途和社会福利者，敝会无不追随诸先进社团而尽其棉薄，以及愿任前驱而努力从事，以副社会人士督导之至意；敝会除了努力国家民族事业而外，其次即锐意于改善工友生活的工作，务求实现全体工友一致的迫切要求，故第一个步骤，即调查我们工友的痛苦和具体的情形，在报章里向社会人士呼吁，以冀望社会人士同情与援助，同时并将实际情形呈请华民政务司劳工处长，请求予以合理的解决。第二步骤，敝会即延聘律师，将我们改善生活要求条件代呈华民政务司及劳工处长，同时派出代表向当局条陈，并经数度与资方谈判。当我们开始谈判当中，给去年被敝会革除会籍的马超凡乘机煽动而施行专事破坏的工作。

当敝会和资方谈判的时候，马超凡散布谣言，竟谓敝会代表与资方秘密订立条件，出卖工人利益的谣言，以从事离间工友们拥护工会的热情。同时他又向中文报馆工友大造谣言说：“工会是反对中文报馆工友，而且不要中文报馆的工友”。以冀煽动他们脱离工会而成对立之势，因此演成四月十八日第一次接收敝会而至失败，复又六月二日第二次接收敝会而又不能实现，于是最后假借公意而擅行组织不合法之所谓《印刷业总工会》，以图淆乱社会人士的视听，而遂其捣乱民族统一的阴谋，得以完成那××所给他的任务。

六月三十日，劳工处长判决劳资双方暂行四项办法是：

1. 每日工作九小时，星期日休息半天；或每日十小时，星期日休息一天。

2. 伙食、住宿费八元。

3. 假期每年八天。

敝会根据上项原则，通告全体工友履行。但马超凡为要破坏一致行动，于是诬骗报馆工友们说：“不要履行工会九小时和十小时的协定，我和科士文（西人）已经得华民政务司批准，英京劳工部指令，不久可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和十二块钱宿食费了。”因此骗得报馆的工友把劳工处长批示四项条件搁置一起，以期待他不兑现的条件。报馆工友们一天一天期待着，马超凡遂乘机来施行捣乱社会主张，煽动工友们停工了。停工之后，他不独不替上工友谋解决之道，他从中阻挠局部解决，反对调解，而徒然用种种方式骗工友们要忍耐来等待解决，那么马超凡的用心何在？那非局外人可得而知了。

在初时停工之后，马超凡扬言四小时可以解决。四小时过了，马超凡于是演第一个欺骗工友们的方式：“不要怕，解决是不难的，那某某有力的要人，快下令报馆资方，接受我们的要求。”结果却没有这一回事。第二天，工友们怀疑了，他又演出了第二个新花样：“解决总有把握，前某省府主席出来调解。”然而画饼到底是不能充饥的，工友们忍不住了。第三天，第三套把戏又来出现：“工友们不要徬徨，某某特派员就出来斡旋了。”结果又是空中楼阁。第四天，工友们摸不着头脑，西洋镜快要拆穿了，心劳日拙，无计可施，卒之骗工友们结队到劳工处长请愿，他明知而出于最后一着，计无可施，骗无可骗，又突然来一套令人莫测高深的妙计：“工友们，不怕了，接得好消息，科士文先生（西人）刚才接到英京电：英京方

面已经派了两位劳工大臣来替我们解决，飞机正在起程中，七月二十日（星期四）会到香港来，再忍耐着五天吧！”

他的虚伪宣传，虽然花样百出，但数百的中文馆工友，决不能永远地受他欺骗而作他个人工具的，毅然决然于十八日全体复工，静候敝会和报界公社商谈。

从这次风潮看来，马超凡所说的事情，有哪一件事是真的？又有哪一件事是事实？他推动这个工潮发生之后，他完全没有替工友谋解决的诚意，而徒然以一个“骗”字驱数百工友露宿街头，抵受几天饥饿，而使劳资双方受深重的损失。为工人谋利益，敝会是绝对同情，不独只是同情，而且极愿有同情的协助。真能为工友谋得八小时工作制，十二块钱宿食费，我们完全同意，我们极希望他能达到成功。假如以一种优裕的利益为工友们的钩〔钓〕饵，以为煽动工友们而遂其私欲的工具，这就是一种罪恶！在这次工潮使劳资双方受到深重的损失，使数百工友增加其痛苦，这全部的责任，马超凡应负全部分的罪过！他应当如何向数百中文报馆工友请求处分，以平公愤？但现在马超凡不独没有反省与忏悔，反而假借排字工友发出呼吁，说这次工友行动，为某方所煽动而希图蒙骗社会人士，以图文过饰非，而冀力谋卸责。那么敝会深念我中文报馆工友在今天痛定思痛之余，因此不能不有所表示于社会明达之士，以明这次责任的所在。

敝会对于马超凡的这回工作，虽然不肯定其背景是什么，但是在抗战期间，破坏民族统一，阻滞抗战宣传，动摇社会秩序，对于社团则施行分化捣乱工作，对于民众则

尽量施其煽动的伎俩，这种行为，在抗战期间实不容许，他个人这次是非曲直，自有社会明达之士予以公正的裁判。敝会谨将此次停工的经过，谨述概略：邦人君子，幸亮察焉！

香港印刷业工会谨启

七月二十五日

持容不樂回贈結締結，次并保查，爾對諸位款其款量以
錄 由五公以于士之在明会結存自，直曲非吳大在人个辦
幸，于款人特！禮謝我新，按發端工幹火出并對会端。撰
！編纂庚

白董会工坐限明恭香
日五十二月十

香港职运工作报告

——1936年6月至1939年11月香港工人的生活概况、职工组织和反日斗争等情况*

(1939年11月)①

一、战后工人生活概况

抗战以后，从广州、上海搬来了许多工厂，特别是纺织业、日用品等轻工业的工厂，这使香港增加了一些产业工人约四、五万人，但同时也增加了香港的失业工人。目前香港失业工人的数量，我们从没有统计过，现只将我们所知道的一些企业里的数量列表于后：

香港几个主要工业部门失业工人数量估计表(1939年11月)

类别	工人总数	失业工人数
海员(只算大洋船)	30,000	16,000
纺织	60,000	5,000
汽车司机	6,000	3,000
印刷	7,000	500
烟草	5,000	2,000
造船	50,000	10,000
建筑	50,000	10,000
总计	208,000	46,500

从上面这个表看起来，工人失业的数量是很高的，在七个主要的工业部门工人总数二十万八千人中就有失业工人四万四〔六〕千七〔五〕百余人，几占总数百分之二十三。

至于产业工人的失业人数比例如上表，六个主要产业部门一十五万八千工人中就有失业工人三万四千七百人，占总数百分之二十三。

而在个别部门中，如大洋船海员工人总数三万人中，失业者一万六千人，占总数百分之五十三。又如烟草工人总数五千人中，失业者二千人，占总数百分之四十。这些事实都说明主要产业工人受到战争的影响，在产业工人中，平均五人中有一个失业工人，全港产业工人失业者当在五万人以上。

在非产业工人中，战争对他们的影响是比较少的，如洋务工人，洋务工会五千四百会员中，只有失业工人四、五十人，这是因战区高等华人迁避来港之故，一般佣人也如此。但码头苦力工人、建筑工人的失业数量则较大，一般一个月只做半月的工或者一天只赚半天的钱（如苦力工人）。全港五十五万工人中，约有失业工人十万。

抗战以后，工人的工资一般地减少了，工作时间是延长了。如烟草厂以前一个月每月都上足工，而现在则每星期只上三天工，因此每月的收入就由战前的十八元变为目前的每月八元了，缩减了百分之六十。

有一些厂是利用失业工人的众多，他就在所谓维持工人生活的名目下招了大批工人，把他们轮流上工，因此他

①原件未署作者，年、月是根据文件内容判定的。

们名义上是某厂工人，而其实每月不过在该厂上工十天二十天而已。资本家因此虽然无限地延长了每天的工作时间，但并未影响了他的工人的劳动力，因为第二天来上工的都是第二班工人了。

许多工厂平常不去生产存货，却强迫工人在厂里整天整夜的等着，只要订单一到，马上便连日连夜地赶着做，因此工人的工作时间毫无规律的，有工作时可以连续做二十个钟头，没有工作时也要在厂里等十二个钟头，这些都是按件计资的，有时候是在厂里坐了一天没有赚到一个铜板。

所谓在业工人，其实也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的半失业工人。又如造船业的太古、黄埔两大船坞，有船修理或建造新船时，工人会突增至每厂在一万五千人以上，而平时却只有四、五千人，这些临时工常常一年只找到一两个月的工作。

战争以后，香港的物价以一倍、二倍、三、四倍的指数增加着，而工人的工资却百分之二十、百分之三十，以至百分之六十、七十的比率往下降着。自抗战以后，全港的工厂都在所谓救国捐、公债捐等名义下克扣了工人的工资，而这些捐款有百分之九十落入资本家的私囊，由此可见工人的实际生活陷于如何苦楚的境地。

在广州失守之后，香港曾经有五万人在街头上露宿的，这里并不完全是外来的难民，其中最少有二、三万人是香港的工人家庭，甚至象我们，有四个女工同志就是这样每天全家在街头露宿的。

资产阶级连一点假慈悲的救济计划也没有过，当中华

书局的一千二百工人因被厂方解雇失业时，英帝国主义的代理劳工司长对工人代表说：“你们一定要离开香港！你们要知道香港的果菜不是给没有职业的游客吃的。”在这样情形下，工人的斗争情绪是不能不高涨起来了。自广州、武汉失陷以后，工人们为保障自己的利益的自卫性的经济斗争，据我们所知道〔到〕一九三九年十一月止，就有二十五件，参加斗争的人数一万二千四百五十人。这是香港四、五年来未有的景象了。

二、香港的职工组织

关于香港工人的组织状况，我们以前没有整个统计过，根据一九三七年底的调查，全港共有公开的工会（包括工商会）一百六十余个，这些工会大约有一半是劳资合办的，有百分之三十是包工头、工头等行帮组织，领导权操纵于工头的。有百分之二十虽是工人的组织，然而也很少工会的意味，大都是带行帮性的，或者是俱乐部性质的（靠抽打麻将的水来维〔持〕会组及办公费的）。然而正是由于这些（包括劳资合办与工头办的），工会大部分是有群众的。

这样的情况组织起来的香港工人，约占总数的三分之二，即约计三十五至四十万人。如香港三合会的四大帮合计就是称有三十万人。又全港建筑业工人总数五万人，参加万安总公会（劳资合办的帮口性的三合会的支部）的就约有三万五千人。

一般地说，目前香港工人的组织仍是相当原始性的、封建性的、行帮性的，这一点和香港工人的革命历史是矛

盾的，因此，在一般的工人中，不满意于这种组织的情绪很普遍，抗战以后，就有许多工人要求改组自己的黄色工会。海员工会成立不满两个月，就有三千会员，甚至到海员工会被封闭六个月后，还有从欧洲整个船几十个工人寄钱寄信回来参加的。我们在工人中的活动分子就经常碰到一些工人拉着说：“你来帮帮我们的忙，改组我们那个工会吧！现在还是这样糊涂下去，真是太丢脸了。”印刷工会就是由三个行会——景源工会（碎件行）、真相工会（石印行）、汉文排字社（报馆）合并组织成的，可惜当时我们没有抓紧更多的这些机会。

除了我们组织的与近来托派组织的一些工人团体之外，在香港工运里，党派的活动是很少的。

国民党在香港没有什么工人团体，抗战后（一九三七年底），广州开的华侨代表大会，湛小岑等亲自来港拉拢，亦只有二十个工会派代表到广州参加，其中最主要的是华人机器会、方言（客栈）工会、石行（打石）工会、酒楼茶室工会等。

国民党在香港的工运里是没有干部的。他的干部如韩文惠（机器工会主席）、高赞（叛徒，酒楼茶室工会主席，香港最大的金龙酒家、银龙酒家、英京酒家的经理）可惜都做了大资本家，欺骗不了工人，因此吴铁城就只好请杜其章绅士、马超凡托匪来帮忙，弄到托派、汪派、国民党的工运在香港是“一家出品”，并无区别。

托派能够直接控制的工人团体有二个，包括了约二千七百个群众，其中控制力量最强的是理发工会，而且也是实际上人数最多的一个团体，因为他们曾进行过“改善生

活”。(参考反托匪斗争)

有个别活动或联系的有五个团体，大概都是行会帮口，这五个团体的会员总数约五万人，但和托派的关系并不密切，都未见在里面做出什么显著的反动行为。

(职工组织名称详见全国职工组织统计)

三、香港工人的反日反汉奸斗争

自抗战以来，香港工人的反日斗争即趋尖锐化与具体化了，这首先表现于拒运日货与日本船上的海员的自动离船回国等事件上。

首先，关于海员工人的反日罢工，当时党经过自己在船上的小组与海员工会余闲乐社等团体，号召海员工人反日的斗争：1. 在日本船做工的中国海员自动离船，拒绝替敌人工作。2. 拒绝运输任何军用品赴日。3. 要求公司改航线，不走日本。在这种号召（同时也是在那种客观形势）下，所有行走日本航线的中国海员都起来斗争过了。根据我们所知道的不完全的统计，单单在“七·七”事变至一九三七年底这五个月当中，参加这种反日罢工斗争的工人就有五千四百七十九人。所有日本轮船公司的海员三千五百人全体离船回国了。任何一个载运军用品赴日的船都引起了罢工，单单英国昌兴公司四个“皇后”轮，现有八百四十五个中国海员，因反对运军用品赴日而罢工离船了。

发生这种斗争的普遍及于中国的、美国的、德国的、荷国的、挪威的、瑞典的以及日本的所有使用中国海员的各国公司。

然而当时主要的一个弱点，却是所有这些斗争都是简

单地采取离船的办法（当然在日本船就只能采取这个办法），而没有占领了轮船，坚决的抗议并进行合法的调解与国际工人之间的配合，以取得完全的胜利。在所有的斗争中能够取得这种完全的胜利（使资方服从了工人的要求，工人仍能保持了职业的）只有在澳洲罢工的铁行公司的两只船，工人二百五十九人，他们在船上坚持了斗争，和岸上的码头工人（外国人）取得联络，当公司请得意大利的轮船来转运时，码头工人罢工了。当地的纺〔织〕工会（英国人的）和他们取得很好的联系，请他们去演讲，做报告，各方面设法援助他们，当地的华侨团体致公堂（三合会）出面来调解，中国领事及中华公会也出来调解，因此两只船的斗争完全胜利了，公司无条件的答应了工人的要求，停止了载运军用品赴日。

这个胜利当然也由于这两个船都有了党的小组与海员工会、余闲乐社的群众组织。

同时在香港还发生了英国轮船茜温厘号英国海员二百五十人的反日罢工。这个斗争的原因是公司要载运汽油赴日，我们的海员工会于罢工爆发后取得了对这罢工的领导，罢工坚持了二十余天，资方不能不屈服，工人完全胜利了（英帝国主义封闭海员工会时，所指的海员工会的罪名之一就是煽动国际的海员罢工）。

在岸上首先就是关于码头工人的罢工。由一九三七年的十一月到一九三八年的二月间，由党直接领导的码头工人的罢工有四次，参加的工人共三千人，这些斗争都是取得胜利的。如九龙货仓二千码头工人拒绝起卸日货的斗争，坚持了罢工九天，结果日货终于运不上岸来；美商美

孚煤油公司五百工人拒绝载运汽油供给日寇，罢工七天，结果公司不能不取消日寇十二万加仑汽油的定货单。

此外，自发的码头工人的罢工有宏记办馆（香港最大的华资粮食行）四百码头工人反对运粮接济日舰的斗争，有运钨矿的码头工人把钨矿丢在海里等等。

其次是工厂工人反对用日本原料的斗争。在党领导下的有：三光布厂三百五十人，岭南电气厂的三百人，都采取了罢工的方式，都使资本家屈服了。又，大行二厂一千工人反对用日寇原料的斗争，也在党的领导之下用抗议的方式取得了胜利。太古船坞五千工人全体拒绝修理日本船的罢工与被骗至日本船浅间丸上做修理工作的几百人自动离船的罢工，党都是取得了间接的领导的。

至于反对资本家吞没工人救国捐款（九五扣薪）的斗争，在党领导之下的有三起，参加的工人有二千四百人，都是采取交涉的方式与实行部分的怠工、罢工，都获得了胜利。

商务印书馆五十个工人拒绝调回沪厂为汉奸印教科书的斗争，也在党的领导下获得了胜利。

最后是关于一九三九年“八·一三”、“南华”、“天演”、“自由”三汉奸报馆六十余工人的反汪罢工。这个罢工是有自性质的，罢工后党取得了领导并在里面发展了党员，组织了三报工友回国服务团，并组织了三报离城工友的救济筹募会，坚持了四个月，没有一个工人上工，虽然汉奸方面以八块钱港币一天的工资来引诱（以前一个月只有八块钱），结果还是一个也没有动摇的。

从以上这些事实看来，香港的工人在反日、反汉奸的斗争上，不但如一般人的出钱募捐，而且在自己的行动上表现了他们对日寇及汉奸的制裁。战争以后最少也有五千二百个海员工人为了反日斗争而失业了，然而他们忍受着一些痛苦，不乞怜，不呻吟，目前香港有一万六千个失业海员工人，没有哪一个向日本船去乞一碗饭吃的。汪派三报工人的罢〔工〕是首先由《南华日报》发动的，《南华日报》罢工后，汉奸们把稿件送到《天演日报》，《天演日报》的工人又罢工了，他就送到《自由日报》，《自由日报》的工人却跟他开一个玩笑，给他出了一张完全是广告没有半页新闻的报纸。报馆从西菜馆里定了几十个大菜来请工人“谈话”，工人走进会议厅一看，那里摆着大菜，便一哄走了。

香港党是关心这些斗争并且积极领导这些斗争的，无论是自发的或有计划发动的，党都用了很大的力量去注意。如关于发动码头工人的拒运煤油的斗争，并〔曾〕经发动很多个团体去援助与坚定那些散漫的码头工人，坚持了七天的罢工，取得了胜利。如在澳洲铁行公司两只船的罢工，坚持了二十多天。如“南华”、“天演”、“自由”三报的斗争，坚持了四个月。自一九三六年十一月起至一九三九年十一月止，这三年中共发生经济斗争三十件，参加人数共约一万七千六百九十人，如依年份计数，则一九三六年（其实只二个月）有二件，参加人数二百二十人；一九三七年为四件，参加人数二千零七十人；一九三八年为七件，参加人数三千五百五十人；一九三九年为二十件，参加人数一万一千八百五十人。如以广州失陷后一九三八年十一月至一九三九年的十一月为一年，则是年的斗争凡二十五件，

参加人数一万二千四百五十人。

香港党对〔这〕些工作所表现的缺点是：

1. 我们并没有更有计划、有组织的来组织这个运动（当时是以不买日货，不供给敌人等口号提出过的），使它成为长期的更普遍的行动（由工人以至于一般市民），因此这些斗争主要的还是限于抗战的初期，还限于海员工人、码头工人方面及个别的产业部门工人。一九三八年下半年至一九三九年以来，香港的日货又充斥了，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布厂都采用日本纱了。到这个时候的政治形势与群众情绪（失业及工资减低、物价高涨所给予的经济上的压迫、恐慌，与广州、武汉失陷后部分群众中的失败情绪）及资产阶级的反动倒退，英帝国主义对日寇更加采取了妥协的政策等，都使我们更不容易再掀起大规模的反日运动了，虽然当时党的基础是薄弱的，然而事实上也是我们还没有从主观上来注意组织这个运动——这个“七·七”募捐慰劳、演戏筹款、买公债等更深入群众、更实际性的斗争性的工作。

2. 没有经过这些斗争来进行群众的组织工作。海员工会被封闭后，几千失业海员就散失了，煤油仓码头工人经过党领导他们坚持了七天的斗争，可是我们以后没有在这些工人中建立任何的团体，这些都说明了当时的市委和海委都是给大变动的时代弄得眼睛有点昏了，跟着那些汹涌起来的什么慰劳运动、募捐运动转圈了，忘记了下层的组织工作（当然也不是完全忘记了）。

3. 就是没有具体地顾及到工人的生活的救济问题（如海员工人离船后几千人失业）。

这些弱点在以后领导三汉奸报的工人坚持了罢工当中是基本上克服了，然而对这点问题的了解还是很肤浅的。

四、香港工人的反托匪斗争

(一) 反托匪斗争经过：

在香港我们和托匪开始在工人运动上面的斗争，是一九三八年初在太古船坞工人的反日罢〔工〕事件中，工人们因为拒绝修理日本船浅间丸号而罢工了。托匪用第四国际、中国支部、华南区总支的名义在厂里贴了传单，这传单的内容大约是煽动工人拒绝修理日船，同时指出英帝国主义（厂方）和日本帝国主义是互相勾结的，号召工人要坚决和资本家（厂方）斗争等等。这里面的阴谋是企图把工人反日的斗争转变为反英斗争。当时，我党在太古船坞上尚未有同志，只有个别的关系，我们就通过这个关系，和托派在工人中展开斗争。我们要工人把斗争放在拒绝修理日本船，厂里其他的工作我们还是要做的。斗争的对象不是一般的厂方，而是他们修理日本船这一件事。工人们其实也没有因托派的煽动而举行了反英的总罢工（拒绝做其他的工作）。结果厂方取消了修理日本船合约，日本船拖到海中去，另从湾仔托包工头某（闻即是太古船坞托匪介绍的）代请了二百多个临时工人到船上修理。那些工人不知道修的是日本船，上了船去，托匪就在太古船坞鼓动几百工人到码头上等他们（船上工人）回来，说他们是破坏罢工，是汉奸，要打架。后来我们向工人解释，这些人是被骗的，不是真心的汉奸，我们要联络他们罢工，不应当和他们对立、打架。结果是没有开架，而船上的工

人，上了船一见是日本船，也自动不肯工作，回来了。这是我和托匪在工运上斗争的开始。

托匪马超凡在印刷工人中本来是有点历史的（他以前是全国印总的副委员长），在建立印刷工会的时候，他们和我们一个同志吕良竞争（这个同志是刚从安南回来几个月，在香港工人中没有什么历史的，马超凡在香港被恢复党籍，曾经和他编在一个支部，后来马被开除了，因此马知道他是党员），结果却是吕同志以最多票数被选为文书部（等于主席）。我们并在印刷工会的常务中发展了何子祥等七个同志，印刷工会的领导机关都给我们把持了，马没有办法活动，马就在工人里散播说，现在工会领导机关的组织不成，要设委员长制，鼓动工人要求改委员长制度，不过相信马的话的人不多。马在执监财委会把这种主张提出来，结果否决了。〔财委会〕并向工人解释：问题不在于什么制度，而在于这个领导机关是否能够工作，不站在工作现实提议改委员长制的，只是企图个人的地位，这个问题就被打下去了。马就利用工会常委的一个叫关柱的亏空公款的事来攻击工会，说工会贪污腐化，应该改组。我们就向工人解释，承认关柱事件只是他个人问题，要求工人仍然拥护工会。这时候工会做了一点救亡募捐工作，马就对工人说，工会不顾工人生活。后来我们在一九三八年六月的第二次代表大会里就通过了改善生活的方针，并跟着组织减时运动委员会进行合法的交涉、打官司。工人们就说：“工会已经在做了，我们要看结果如何。”

马见在印刷工人中不大能活动，就离开香港两、三个

月，到广州印刷工会去活动，结果又受到广州印刷工会反对。广州失守前，他又来港，就进行组织肉行工会（屠夫的行会）。他向印刷工会借会址开会，印刷工会因为他们还没有弄好合法开会的手续（呈报），不肯借给，马就煽动率领了几十个屠夫到印刷工会打架，在工会里吵闹了一顿，事后工会就以破坏会章、捣乱工会等名义把马开除了会籍。

这个开除工作做得不好，没有指出他一贯破坏工会、分裂工人的罪行，结果引起了一部分工人的不满（主要是报馆工人）。因为马以前是报馆工头，他就向报馆工人说：“印刷工会排斥我们报馆工人，现在我们报馆工友一个常委也没有了，我们要改组工会”。他就召集了一次临时代表大会，每个到会的发给五毛钱车资，这个大会大约到了一百多个报馆工人，他们就通过了否认印刷工会现任执监财委的决议，通过由马等来改组印刷工会。印刷工会动员了一百多个支部（约）发表宣言，否认他们临时代表大会的决议，号召参加临时代表大会的工人团结拥护工会，并发动被马等伪造签名参加了他们大会的支部否认，指出马的捏造，马就和印刷工会的西人顾问科士文（据说是英国工党）带了二三十人来厂印刷工会抢印信，打算强行接收，印刷工会就把法律顾问刺士律师^①（英国人）请来，拉他们到劳工司讲话。劳工司否认马的临时代表大会的合法地位，并对马说：“你要组织工会就自己另组织一个，何必要和印刷工会抢夺呢？”事后马就自己组织印刷

^①吴有恒的报告中又写“孖士律师”。

总工会，大约有三、四百个报馆工人参加了。

印刷工会合法的改善生活的官司打胜了（九小时工作及八块钱膳宿费等），印刷工会号召全港工人自动执行九小时工作制。但马却向报馆工人说：“我们要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等，英国劳工大臣来港时，我们就有办法了”。后来又说等吴铁城来调解时，我们就胜利了。他们用印刷总工会名义向报馆资方提出要求八小时工作及十二元的膳宿费，资方不答应，工人不断地迫马去交涉，印刷总工会连续向资方提出了三次最后警告，说如果不答应就罢工了，资方也不答复。到七月八日，华字日报的工人就首先罢工了，以后全港的报馆工人除了“星岛”、“大公”、“国民”及三汉奸报之外，全部罢工了，罢工的约四、五百人。

我们为了争取团结报馆工人，因此在我们自己有支部的《珠江日报》也举行了罢工，而且采用了绝食的方式，并且由印刷工会负责向厂方交涉抗议。印刷工会向全体工人发出宣言，同情与援助他们的罢工，发动各厂工人去慰问华字报绝食的工人，并且向香港政府提出抗议，要政府立刻解决这个纠纷，要厂方接纳工人的要求。印刷工会准备召集罢工工人的会议时，马超凡忽然以一个紧急通知，把二百多工人骗到九龙去，说是要开会，结果罢工延长了八天。港政府曾经拘捕过马，但立刻又释放了，以后，马就不见了踪迹，也不到印刷总工会。这个斗争完全没有人负责去交涉，除了《珠江日报》外，全部失败复工了。

马在这个斗争中发了两个匿名的传单，第一个说共产党要煽动工人总罢工了，第二个是斗争失败后说斗争是被共产党出卖了，印刷工会就是共产党把持的工会。

在《珠江日报》获得胜利时，他煽动另一些罢工工人（里面还请来了十多个流氓）来《珠江日报》打架，《珠江日报》工人设法避开了，并向他们解释，应该向资本家争取斗争的胜利，而不应该因个别的斗争胜利了，反而破坏自己的团结。结果没有打起来。

报馆工人不但八小时工作没有取得，就是连印刷工会已经取得了的九小时工作制也没有办法实行了，工人们对于马超凡就失了信仰。在斗争中也体验到印刷工会并不如马超凡所说如何破坏他们，因此对印刷工会好感起来，就有约二百人退出了印刷总工会，印刷总工会只剩下了一百多个会员了。印刷工〔会〕派出人去和他们联络，要他们参加印刷工会，这个工作在进行中。

南华、天演、自由三汉奸报工人反汪罢工后，马经过陈星源向吴铁城领到了一千多块钱救济费，他自己吞没了一半，每个工人分了半个月工钱就不管了，他自己住在大中华酒店随意地享乐，工人们却日则在街头流荡，晚上在文化中学睡地板，工人们明白了国民党及马等所谓救济援助原来是如此。马对罢工工人说：“不要怕，现在中华书局厂方准备请你们去做工了”（其时中华书局刚刚解雇了一千二百个工人）。过几天又对工人说：“中华书局被解雇工友往南华、天演、自由三报做工去了”，想煽动三报工人对中华书局工人的仇恨。可是事实上，往《南华日报》做工的不是别人，而正是他们印刷总工会的主要分子、一个常委和几个工头。《南华日报》是在他们帮助之下复版了，于是印刷总工会在工人中完全失了信仰。现在所剩下的会员，也并不是马的死党而是《华字报》、《循环报》等几个报的

工人，因为这几个报的工头是印刷总工会的支柱，工人不参加总工会就会被停生意，甚至被打，因此不能不参加的。

马在肉行上兼做书记，后来我们在肉行工会里发展了两个同志，指出马是托匪，又因为马贪污，就把〔他〕滚出去了。肉行工会里马已经不能活动。

马曾经在洋务工人里发起组织酒店工会及餐室工会，他把一个俱乐部约一百人改组为餐室工会，至于酒店工会则未组织成功。因为洋务工会在洋务工人中威信很高，马在里面又不象在印刷工人中有历史、有基础，因此他搅不出什么名堂来。

在侨工息影社（三合会支部），托匪方才曾经取得了书记的位置，现在已经被我们活动，把他撤职了，他在里面现在没有什么信仰，大概马超凡等也不大信他，因为他在一九三七年还参加过党，而现在他又没有做出什么成绩，他似乎很苦闷，找到一些党的同志要求党给他领导。

此外，如小贩工会的旺角分会，我们的一个同志做副主席，托匪商雋明做书记，这个地方是要斗争起来的，但现在还没有爆发，因为这个团体是新组织的，我们在里面还没有很牢固的地位，他还不知道我们这个同志是什么人。

至于理发工会、万安总工会（建筑行会），我们都没有人，还没有和他们斗争起来。在洋务工会我们开除了托匪邓免，在余闲乐社开除托匪何人魂。

（二）反托匪斗争的认识。在和托匪以上斗争中，使我们有这样的认识：

1. 托匪在工人运动中的主要任务是分裂工人的团

结，他们用各种方法来达到这种目的。如：（1）他们在太古船坞工人中，就煽动船坞工人去打浅间丸轮船上的修船工人，这种挑拨是在所谓打汉奸的口号下来进行的。

（2）他们在三汉奸报工人罢工的时候，就说中华书局厂方要聘请罢工工人去做工，又说中华书局被辞工人到三汉奸报作工去了。这种挑拨是在“中华书局资方如何明白大义，劳方如何无耻被解雇”等原则下进行的，虽然嘴吧〔巴〕里没有明白说出来。

（3）他们在报馆工人罢工时煽动罢工工友去殴打已经取得胜利（厂方妥协了）的珠江日报工人，说他们这种单独的解决是破坏全体工人的罢工的，这种挑拨是在“全体工人统一行动”的口号下进行的。

（4）在理发工会里，他们规定了增加价目，全体参加理发工会的商店都加价了，没有参加这个工会的女子理发室（他们根本就不要她们参加）没有同样加价，他们就煽动男工人去打女工人，捣毁理发室，结果女理发室请了打手来保护营业，这种挑拨是在所谓“破坏男工利益”等

口号下进行的。（5）他们利用行会观念组织各种对立的组织，如利用报馆工人组织印刷总工会和印刷工会对立，利用餐室工人组织餐食〔室〕工会和酒店工会及洋务工会对立等等。托匪在这些挑拨工作上有相当研究，有时进行得相当巧妙，真的能够把群众动员起来的。对于这一点的了解，我们有个别同志还是了解得不够，如我们有些同志主张聘请拳师学艺自卫（印刷工会），或者主张用警察力量来压迫他们，这些都是危险的做法，对托有利的。

2. 他们的组织工作主要的是要把资本家和工人组织在一起，消减了工人阶级组织的独立性。如他们的理发工

会、肉行工会、派报行情公会，都是劳资混合的组织，却挂起工会的招牌，摆起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面孔，资本家们在这里用一些“好心人”的手段来麻痹工人阶级的阶级警觉性，用团结合作等行会观念来麻痹工人阶级的斗争性。

3. 有时他们也进行所谓改善生活——在所谓劳资合作下的改善生活，如理发工会的增加价目；如派报行情公会规定卖剩了的报纸不贬价发卖等，实际是把工人的斗争对象向着一些顾客，使工人忘记了资本家的罪恶，而且在实际上是给予了资本家以更大的利润，如理发工人的工资是依营业所得和资本家依百分比分的，一般都是工人用三成，资本家七成，这个比率不变更，营业价格增加了，只会给资本家增加了更大的收入，资本家可以从工人方面榨取更大的利润，而工人所得的不过稍为增加一点罢了。

我们过去没有很好的研究过这些对策，没有从本质上了解托匪这些政策的实际内容，因此，自不能更切实地向工人指出他们这些欺骗，因此，在这一点上，我们和他们的斗争是没有成绩的。托匪也因这一点的成功，在理发工会拥有最多的群众（七百人），而且受骗最深的。然而，对于这一方面的活动，是要受客观限制的，在产业工人中这改善生活的办法是完全行不通的，如在报馆工人里面，结果只能掀起激烈的尖锐的劳资斗争。

4. 托匪不特是直接和日寇和国民党的反共派有密切关系，而且他们的行动还是直接受资本家的指挥节制的，如反对印刷工会的运动中，香港的最大印刷厂之一，东亚印刷厂就给了马超凡一千块钱活动费。因此，不要相信托匪会真的发动任何反对资本家的经济斗争（除了一些带

有政治作用的斗争之外)，而且他绝对不会使这些斗争胜利，也许他为了这一资产阶级和别一资产阶级的矛盾和发动一些帮闲的斗争的，但这种现象很少。

我们的一些同志不明白这一点，因此常为托匪的什么改善生活呀，下命令罢工呀等等吓昏了，以为这些真的是他们干的，弄得自己无所措手足。假使托匪真的会来干这一套，那么当然是件很麻烦的事，可是我们要清楚这是不会有的事，这些斗争还是共产党才能领导的，不要怕托匪会抢去你的领导权（如印刷工会几个同志都有这样胆怯）。

5. 然而也必须讲，他们在政治作用下也可能发动经济罢工，如报馆工人的罢工，应该是可以说有这些政治作用的。罢工时间恰恰是在“七·七”纪念后的一天，有许多重要文章还没有登完。又可能托匪（应该说是汪派）是利用这些斗争，使一些动摇的报馆更容易就范。又，这一次罢工就只有工贼、汉奸报馆和吴铁城的国民日报，国民党的大公报答应了工人的要求，工人没有罢工，然而工人斗争失败后，他们也就不履行那些答应的要求了。

我们没有了解这一点，因此事先没有很好准备，没有向工人及资方揭出托匪这一阴谋，而只是简单地以为马超凡不会发动这个斗争的，以为这个斗争是完全自发性质的（当然也有部分是自发性质的），因此，没有能够更好的解决这个斗争，使这个斗争能够全部而又迅速地胜利的结束。虽然我们直接领导的珠江日报的斗争的结束是迅速而又完全胜利的。

6. 目前托匪非常注意三合会等行帮的封建的组织的

工作，在这些组织中托匪并不怎样暴露面貌，不反抗战，也不公开反共而是企图以颂、捧、巴结等手段取得领导地位或领导的作用，这是他们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办法。我们过去在这一点上的认识不够，因此，我们在这些团体中的工作很少，在里面用各种方法（人事关系，以至封建关系，或者因为这些托匪的贪污腐化、招摇撞骗等）来和他们的斗争更少，所有各种斗争都是太政治化，为落后的群众所不能接受与了解的。

这方面的工作如不注意，托匪的努力就会坐大起来。过去我们有这种观念，以为托匪那里会在工人中能够有真正的基础，因此，非常轻敌。不知他以公开反共、反抗战的面目出现时，当然没有工人跟它走，而他用封建的行帮的落后的口号来号召工人时，工人会大批的盲目的跟它走的，而且他并不放弃他那左的口号。也许如日寇真的来进攻香港时，香港的托匪会在工人中号召组织苏维埃来无形中配合日寇的进攻，也说不定的。

然而，我们对于如何和托匪争夺落后群众的工作，是非常不注意的，在党领导的进步的团体，如印刷工会等，把托匪打退了，并不算怎么一回事，而在落后的群众中把它们打垮了才算真工夫，我们现在却没有这真工夫——主要是没有懂得这些才是真工夫。

7. 托匪也利用群〔众〕的抗战热情（左的倾向）来进行破坏我们的合法抗战工作，如托匪何人魂在余闲乐社办的救护队中，提议把救护队改组为华侨回国杀敌义勇队，因为我们没有向群众清楚地解释为什么不能用这样名义的政治意义，因此群众不了解，有六、七十个群众被何

人魂拉去组织华侨回国杀敌义勇队去了。虽然以后华侨回国杀敌义勇队里也因为我们的反对活动而解体，然而托匪却已起了他的破坏作用。

又如托匪马超凡攻击印刷工会的卖花筹款等救亡运动说：“我不见得卖一卖花就可以救国的，有本领的回国投军去。”这些也是以破坏我们工作而进行的，而我们一向不注意教育群众，从政治上来了解这些工作的意义与了解采取这种工作方法方式的必要。

8. 在香港这样的政治环境中，不能对托匪施以法律上的钳制，甚至不能公开说是反对托匪。因此，和托匪斗争，绝不是把它从我们活动的团体开除出去便了事，假如他在群众中仍有威信，仍能活动，开除出去，他还是继续他的工作，甚至更有害处。如印刷工会开除马超凡，余闲乐社开除何人魂，结果都给它带走一部分群众，以后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还争不回来，这真是大损失。因此，必须使群众在政治上或人事上都认识了这个托匪要不得时，才坚决的清洗了他，完全经过群众的同意与群众的执行。

9. 用金钱收买群众也已经成为托匪活动的主要手段之一。如参加印刷工会临时代表大会的每人发洋五角，总工会里面设鸦片烟局招待工人，参加他们活动的，每天给洋两角等等。我们过去没有抓紧这点去不断警惕工人，也是我们过去的弱点。

我们在香港几年来和托派的斗争是很频繁的。无论在文化界、学生界、职工运动等方面都有，然而都是一起一落的进行着，特别是马超凡这个败军之将，确实是不断卷土重来。这一方面是由客观的政治环境有利于托匪的活

动：托匪有较长的历史，有较重要的机关（华南区总部），在此，而且有一些确是比较有本领的活动分子（主要是党的叛徒），有日寇、汪派、国民党的反共派的直接支持，有资本家的直接支持等等。然而另一方面也由于我们不了解上述的几个特点，不能知己知彼，对党员没有深入的反托教育，这些教育不是流于纯粹的理论化，就是纯粹流于实际化，只讲如何去斗争，或只讲他们的不断革命论如何要不得，而没有很深刻的从托匪的实际活动中来了解他的策略。

“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不是采取进攻的姿态，而是采取应战的姿态，因此，不能更彻底地肃清托匪在群众中的影响。

关于和托匪斗争，在香港我们是没有“理论的”总结过的，所谓总结只是“已经把他们打垮了”或“还没有打死”之类，加以目前的同志，一般地还非常缺乏和托匪斗争的经验（和国民党公开斗争的经验要丰富一些）因此，就做不出更大的成绩。

又，托匪现在已经开始采取恐怖的手段来对付我们的工运干部了，如买凶手企图杀洋务工会的何潮同志和印刷工会的何永祥同志等，所有这些都是我们所应该注意的。

五、反日反汉奸与经济斗争的经验

这几年来，香港党逐渐在她所领导的反日、反汉奸的与经济的斗争中获得了一些经验：

（一）对于斗争的领导逐渐有组织了，在比较大的斗争，如中华书局的第二、第三两次大斗争〔中〕，如印刷工会的减时运动，如香港树胶厂的要求搬厂后的各种优待条例等，都是组成了特别的组织来领导的，这个组织相当

于斗争委员会。然而他并不采用这些名字，如印刷工会的减时运动委员会，树胶厂则以七个代表名义之下按车间分七个组，并不成立什么触目的组织等，因此斗争起来以后，就不但已经参加了群众团体的群众参加斗争，甚至无组织的工人都参加了斗争的领导工作（如树胶厂）。

又如在斗争中及斗争后对工人的组织工作——在斗争中要使每个工人都觉得他自己是在工作着，觉得他自己在参加了这个斗争，这是非常需要的。如在中华书局的斗争中，我们把工人按宿舍分了组织，经常进行讨论与教育的工作。在斗争后发展与整理群众团体也是非常必要的，对于这一点，我们可以说有初步的认识。

又如在斗争对外边的援助力量的组织，必须使各方面的工作和这个斗争配合起来，但又不露出相互间的痕迹。如绝食罢工时，我们发动外界的慰劳运动；如对三汉奸报罢工工人的募捐救济运动；又如美孚油仓的工人反日罢工时，从外界动员去的宣传鼓动与阻止其他临时工徒上工；又如保安公司男工绝食罢工后，我们就组织女工的罢工来响应等。

（二）是我们对于斗争的技术上也有一点进步了。如运用了比较复杂的斗争形式，如在中华书局采用绝食罢工；如在香港树胶厂采用静坐罢工；如在保安公司的斗争，我们反对采取绝食罢工的方式，我们跪着要那些自发斗争的工人吃东西，他们死也不肯（结果真的饿死了人）；如把保安公司死难工人的出殡行列组织起为抬棺巡行；如在印刷工人（香港三千人）的减时运动中，自动执行新的工作时间，提出“喝茶去”的口号，于星期六下午动员了

全部工人离厂到茶馆里去这种变相的罢工；又如充分的利用资产阶级法律上的矛盾进行合法的斗争，如印刷工人的减时运动，硬是打了几个月官司；如黄包车夫的反反对加租的斗争，打了四个月的官司。

(三)对于上层工作与下层工作的配合，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的配合，合法团体与非法斗争的关系等，都有了比较进步的了解与运用了。我们无论领导任何的非法斗争，都一方面积极于合法的调解，如中华书局绝食罢工时，我们推动了一些牧师、神父来讲：“这是不合于基督精神的”，推动了香港最著名的刺士大律师（英国人）警告香港总督：“如不迅速解决，真的饿死了人，我就和你到伦敦打官司去！”如中华书局第三次斗争时，我们利用了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的矛盾，要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王云五签字在我们的请愿书上，同情我们的斗争；利用浙江同乡的关系，要张一麟出来调解，要杜月笙出来调解，官司打到国民政府去。如各个斗争时，工会都是站在第二者的态度来调解，而不是自己站在非法地位。如在印刷厂工人的减时运动时，工会斯斯文文的在上面打官司，却在下面动员了一百五十多个工厂向工会提出改善生活的积极要求书，并且在下层开始了怠工，甚至打人、罢工，然而工会始终不失其合法地位。

(四)对于不脱离群众，和群众在一起的了解也是有了的。如对保安公司的斗争，当我们说服工人停止采用绝食方式时，亦只好坚决的和他们在一起。又如一九三九年七月报馆工人在托匪马超凡鼓动下罢工时，马超凡鼓动工人来打珠江报（有党领导的，属于印刷工会的）工人时，党

却领导了珠江日报的工人和一般的报馆工人一致的罢工，并且表现得最坚决（采用绝食的办法），于两天获得了完全的胜利。这一方面是教育了那些落后的工人，另一方面也团结了他们。经过这次斗争后，他们几乎完全离开了托匪的影响了。

群众的经济斗争，将往前继续发展下去的，已经是不可否认的客观事实（一方面由于资产阶级的剥削压迫的加紧，另一方面则由于很多群众已经从斗争中提高了觉醒程度）。然而，目前我们对于工人经济斗争的领导工作上，仍然存在着严重的弱点，即：

1. 在许多干部，特别是中华书局的干部中，已经形成了左倾的轻敌的“不肯妥协的”倾向。如这一次中华书局一千二百人被解雇的斗争，就因为我们的一些干部不肯及时的妥协，致把斗争拉长了。估计这种倾向会继续发展的，因为在斗争胜利时，这些同志固然会因胜而骄，而失败时也可能因败而愤（冲动起来）的。

2. 我们在许多地方的组织工作，特别是在重工业的及非产业工人里面的组织工作还是很脆弱、微少，应付不起更严重的斗争的。

3. 我们对于利用各种旧工会的工作做得非常差，因此缩小了我们在斗争中对于各种合法的利用的范围，同时也没有更大的可能去组织各方面的斗争，现在我们斗来斗去都是印刷工会、余闲乐社。再斗多几回，大概这两个团体就会“寿终正寝”、“封之大吉”了。

我们来的时候（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市委决定对于经济斗争也可以说对于工运的方针是：目前是准备力量，

长期埋伏的时期，不是决战时期，主要是沉着的组织工作而不是紧张的斗争工作，因此对于各种经济斗争可避免时尽量避免，不可避免时亦尽量采用合法方式。我们的原则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我们自己并不必去强制地组织各种斗争。我认为这个方针是正确的。

六、三年来香港职运的总结

三年来，香港党对于职工运动，基本上是建立了初步的基础了，或者说在各方面都有了一些雏形了。这表现于：

1. 它在党的组织上准备了占香港全体党员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工人成份，这些党员分布于各种重要的工业部门，使党能在各个工业部门上都有了党和群众的联系。

2. 它组织了二万以上的工人群众，这些群众基本上是党所能掌握的，和党有了相当密切的联系。

3. 它领导了反日反汉奸的、反托匪的与经济的各种斗争。在这些斗争中，巩固了党与群众的联系，锻炼了党的组织与群众的组织，获得了与积聚了一些关于斗争的经验，基本上它是继承了香港工人阶级的斗争经验与其优良的传统。

4. 它培养与提拔了一批工人干部与向内地输送了一批工人干部。这些干部在香港与内地，都是以加强党内无产阶级的骨干与其意识的。

因此，香港党能够在国际、国内的逆流的袭击中，基本上保持了党和群众的联系，能够提高全体党员的阶级警觉性与斗争性，能够具备有可能更向前发展的基础。

目前，香港党的组织与群众运动都是应该而且可能向

前发展的。

然而，这些成绩都只能说是造就初步的基础而已，香港的职运并没有跟着政治形势的需要与可能性而大大发展起来。今天的工作还是狭小得很，根基还薄弱得很，在五、六十万工人的都市里只组织了二万工人群众，这样看来，我们是还没有力量足以领导全港工人的斗争的——还差得远得很。

问题不是什么客观的困难，而主要地是我们主观上的错误：

首先是主要的由于我们在整个工人运动的三年来及各方面的工作，不但在作风上而且在认识上也还是左倾关门主义的——没有大胆的发展成千成百的工人的积极分子入党，没有大胆的去组织落后群众，没有依照统一战线原则，在各种场合去争取资产阶级与黄色工会工头协调合作（几乎完全是只有斗争，没有团结的），所有我们领导的工人组织几乎都是太政治化了的，甚至在三合会里的也自称为“革命分子”，而形成了一个“革命分子”帮。在这里不能因为香港党这几年来利用公开合法的工作方式方法上的某一种成功，便以为香港党没有这种关门主义作风了。这种作风表面上看来是没有了，然而因为在认识上有不够的地方，特别是对于既须斗争，又须团结这一点上完全没有具体的了解。因此，所有的工作就不能不实质上是关门主义的。

其次，因此，我们就完全没有具体地严重地去进行过黄色工会与落后团体的工作，企图组织香港总工会的时候的拉拢联络并不足以说明我们曾经真正地注意过这些工作

了。在我们自己领导的团体里，在整个香港的社会里是如此明显地“自成一家”，完全不去和落后团体进行统一战线的工作，有个别原老工会有了我们同志的活动（如摩托车研究总工会），马上就“红”起来了，不屑与以前朋友为伍了。这种“出类拔萃”的气概，不只表现于工人团体，而且表现于我们做工运的每个干部。

因此，我们在三合会里没有工作基础（目前的一点点工作也还只是建筑在里面的部分的进步群众上面，而不是建筑在落后群众上面的），在黄色工会里没有工作基础。因此在三十五——四十万有组织的工人里，我们只在自己两万人里面兜来兜去，而且也常常只在这两万人中〔挑〕最进步的几千人中做工夫，这种做法不改变，香港的工运的发展就饱和了。假如目前的几个团体都被封闭解散，那就苦死了。

目前，关于香港的职工运动，必须：

1. 必须在领导机关以至每个同志认识香港职工运动的重要性。目前在中国象香港这样有大量工人的都市，除了上海以外，怕就没有了，必须使在香港工作的同志了解，香港职工运动对于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工人阶级的广大群众的联系有非常严重的意义的。这种意义，并不单纯如过去我们所想象与了解的，以为我们的任务是抓着一部分左倾群众，一旦香港有什么三长两短就溜之大吉，带他们回来打游击，组织些什么海员大队（过去我们在东江组织过这样名称的游击队，码头工人大队等），如此简单得可笑，而应该把自己的任务了解为对香港五、六十万工人的全盘切实组织与领导的任务，这是长期的、艰苦的地下的

工作，哪怕日本鬼子占领了香港，我们也坚持这些工作。职工运动的主要任务是长期的，而且深入的控制着资产阶级这种生命线（大城市及其产业），以待时机，而不是离开这些据点去游击。

2. 必须进行关于职工运动的理论教育（过去我们是没有这些教育的），要从这些教育工作上使同志们克服左倾关门观点，要从这些教育里使同志们了解党的统一战线在工人运动中的具体执行，要使在香港做领导工作的同志了解这些问题，而且能够长期地对党员以至非党干部作关于这些问题的深入教育。

3. 必须严重地进行三合会、黄色工会、各种落后团体的工作，要把目前组织工作的中心放在这些工作上，从目前的赤色团体里抽调干部到落后团体去工作，譬如以前抽调干部到内地打游击那样热烈，那样有决心。

4. 必须根据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原则来领导各种斗争，要有计划地使这些斗争个别地、段落地进行，要使同志们了解现在不是向资产阶级进攻及不断进攻的时候。

5. 必须健全对职工运动的领导机关，健全职委会（在特委时间职委会只有一个很弱的干事，目前市委也只有一个职工干事，没有职委会）。职委会的同志同时兼任群众团体的主要工作的办法，现在已经不容许了，应准备了党内领导职工运动的干部与群众团体干部两种工运干部，即需要公开的干部，又要有秘密的干部。

6. 现在已经“红”了的工人团体，要逐渐使他灰色起来，多做一些慈善、救济、社会服务等工作，多和黄色

工会来往联络。“红”出了面的干部最好能够调走，如不能够调走，亦不要让他天天继续出尽风头下去，致受无谓的打击。

7. 在造船业、机器业、市政工业、纺织、烟叶、树胶等轻工业中，用各种方法与十分的注意力去开展群众工作与发展党员——积极的发展党员。

以上总的原则主要的是深入的、广泛的〔做〕落后工人群众中的长期组织工作。

中共香港市委致中央电

——香港出席党的七次代表大会代表名单

(1939年)

(一) 吴有恒，港市委书记。

(二) 钟穴，九龙区委书记。

(三) 何潮，洋务工人，特委候补委员，一九二七年党员。

(四) 周桂，海员工人，余闲乐社委员长，一九二五年党员。

(五) 周小鼎，印刷工人，中华书记〔局〕总罢工领袖，一九三八年七月党员。

中共香港市委中委名單

——香港市委中委名單

(1930年)

吳育生(一)

陳仲英(二)

陳仲英(三)

員

陳仲英(四)

員

陳仲英(五)

陳仲英(六)

廖承志致侨委并周恩来电

——关于加强华侨宣传工作之意见*

(1940年9月27日)

延侨委并渝周：

一、我党提出抗战、团结、进步三大口号，甚受海外广大侨胞热烈欢迎及拥护，同时，中央海外部逐步加紧华侨宣传工作，除吴铁城亲赴海外联络外，国民党大批关于侨运的刊物，顿呈活跃，香港出版的有《民锋》半月刊物(张孤山主编)、《祖国与侨胞》半月刊(张圣才主持，将移马尼拉出版)、《战时华侨》(黎费奔编)、《华侨生活》(昆明出版)及《时代》半月刊等。国民党的宣传机关，亦直接由海外部大加扩展，决定二百万港币经费，增加工作人员(如普华秀朱筹)，前往找寻并大批收买投机的文化人(如黄绿萍等)打进各地报馆去当编辑，以进行各种活动，以加紧反对我党的宣传。

二、现时我们在港中，直接发行一油印的《华侨通讯》寄发各地报馆，一为纽约《华侨日报》、秘鲁《华商日报》(秘党华支主办)、古巴《前进月刊》(古党华支主办)、菲岛《建国》周刊(我们办的)及很多中立报纸都站在统一战线立场，发表我们的意见(至于马来亚、暹罗、安南等地，只能用油印转载)。此外，与我配合者，尚有《国新》社及《世界知识》，但

力量仍太零星，且很限于地方性，不能成为华侨中心的東西。

三、为加强华侨宣传起见，我建议：

甲、海外宣传工作必须加强，盼侨委有着重布置，并经常指示。

乙、香港现有的办法，除在港侨工委下加设宣传组，以增强菲之《建国报》，港之《华侨通讯》(录广播)与出版华侨丛书，并与海外各兄弟报增强联系外，决加强《国新》工作，另在中国保卫大同盟内，加强其英文通讯(暂作半月刊)。

丙、即此仍感不足，仍须有专以理论上为侨运领导之周刊，以补《建国》报(立报型)之不足，此周刊应在菲出版，但目前港方不能再有力量作此工作，只有希望你们即刻派人来(或桂之张铁台或沪之梅雨)。

丁、最主要的，希望延方、渝方应有海外宣传之经常资料，与征文计划。

四、如何？统希详示。

小廖 二十七

潘汉年廖承志刘晓致洛甫电

—— 对香港时局紧张我之布置情况*

(1940年10月9日)

延洛康渝周：

甲、据各方面情报，香港在滇缅路开放前后，可能来个突然事变，英国官太太均已离港，洋人们颇慌张，日侨撤退不是虚张声势，英探搜查正金、三井两银行，在港之大汉奸纷迁广州，中国要人们孙科于前日来港的，宋美龄均决于今晚飞渝，太太得港当局正式劝告离港，这些情况还不足说明香港会成为太平洋战争的起点，但香港本身危机，似迫在眼前。

乙、我们为应付可能的紧急事变，决定：一、潘、廖立即准备秘密离港，潘赴沪，廖赴星洲转菲，刘则暂留港。二、对港各工作部门已下戒严令，但工作人员中心尚未定。从十一号到二十号止，为紧急戒严时期。三、拨给各工作部门半年经费，存款据数汇沪。四、电台联络于十八、十九两日暂停，但请延方仍须经常收听，以便接受此间急电。

丙、刘晓已安全抵港了，数日内即赴沪，内地来港人员，请暂止动身。

潘、廖、刘 九日晚

申甫帝庭御政志承襲平好番

* 必静置本之非游梨品和卷香林 —

(日 0 月 01 年 04 01)

。國愈親幸英

來遊阿，以甫效天禮融憲查藝香，排前而在各器，甲
務日，海難融印人報，藝商日似大大官國英，亦專於突个
天公藝在，并辦兩共三，全五查財對英，獲真湖遠最不匪辦
政效美宋，南藝來日甫千條條印人要國中，限九五從我及
至取難坐好，藝商告故友五國世藝釋大大，愈更舞令千來
讀良本 藝香回，點或兩幸結報平太衣海會藝香相影虽不
。甫期在既妙，肺

藝，一：宜央，交專急樂由論百付宜成印券，
留音 佩板，菲辣撒呈扶願，此快器，藝商密好奇華明立
尚心中良人非工印，令氣舞平百白暗計工各藝枝，二：藝
餘舞，三：購和氣湖憲樂成，五号十二極号一十从。宜未
十千藝輝谷由，四：此玉發器藝并，費登爭半百暗計工各
此受舞樂以，液郊常發取印衣英藝回，藝香日兩火十，人
。申意回

人藝來世內，此快唯內日幾，了藝辦全安日跑既，丙
。便按五音新，良

如日次 既 應 藝

唐克邓衍基黄一甦关于香港反 汪工友回国服务团的报告

——反汪罢工、组织服务团及回国途
中斗争经过*

(1940年)①

甲、罢工斗争的经过

一、香港印刷工友的一般生活情形

香港是英帝国主义统治下的一个殖民地，这里的印刷工友的生活一般说来是很苦的，工作时间平均都得到十二、三个钟头，工资分三级：（一）工头又分正、副，正的约三十元，副的约二十四、五元；（二）熟练的排字工友（连印字）平均每月十二元到十五元；（三）学徒只供伙食。同时工作的条件又很坏，工场中的空气是非常不好的。因此便有很多工友患肺劳〔癆〕病而死，很多都是面黄肌瘦的。至于工友患病，资方是不管你死活的。

工人所过的生活是这样苦，而放假休息的日子是很少的，只是“双十节”、“七·七”等重要的纪念日，放假一天。过旧历新年，放假一星期。虽于礼拜天休息，他们

①年份是据根文件内容判定的。

是没有这样幸福的。

工人自己本身的生活可分为两方面：一方面是比较进步的，这些人参加了香港印刷工会（党领导的），现在工会的会员除了中华书局一千四百余人全体参加工会，组织特别第三支部的不计外，约二千余人。另外一方面是比较落后的，这些落〔后〕的占着印刷业工人的大部分（据印刷工会的朋友说全港印刷业工人约九千余人，另有由广州跑来的无从统计），他们有的过着嫖赌饮吃的生活，有的还吸食鸦片、红丸等（因为英国印度的鸦片与日本的红丸在香港是很多的）。

至于南华、天演、自由三报工友也和一般的工友的生活是一样的，甚至到参加回国服务团的工友中也有好几个在港时也是吸食鸦片、红丸的（以上是据我所知道的写出来的，职工中还有很多情形，因为不熟悉写不出来）。

二、所谓“七·一”减时运动

本来在抗战期间随随便〔便〕的发动反资本家的斗争是不妥当的，但由于工友生活的痛苦，工作条件与工作时间过长，因此，相当地改善工友的生活是必需的。

在去年“七·一”曾经有过一个减时运动，要求减少二小时工作和礼拜天下午放假休息，这个斗争我们不知道究竟是谁发动的，但我们知道，这时托匪马超凡已组织起一个香港印刷总工会，他对于这个斗争曾经有过相当的活动的。

斗争的发动与结果，我都不知道，〔不〕清楚，但有个别的工厂是取得胜利的。不过我们知道在我们未离港前

很多工厂亦已因资方借口欧战影响营业而取消了礼拜天下午休息和每天减少二小时了。

广西的白崇禧办的《珠江日报》中的工友是曾经不断发动减时和增加工资的斗争，这些斗争有时是胜利的，有时是失败的。

附说：在港因工作关系，对于职工运动的情形都不大熟识，同时党方面又无报告，以上所写的只是个人所知的。

三、三报工友罢工的原因与经过

罢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国民党和汪精卫的矛盾在香港表现出来，罢工是由吴铁城一手经理的，他组织了一个所谓消灭汉奸同志会来进行这种工作，派陈星源为国民党的代表和马超凡一起去掀〔煽〕动工友们罢工，罢工的条件是国民党供给他们的食宿、零用和介绍工作。

三报里头的工友是很落后，有些在罢工前很久他加入马超凡组织的总工会了，这些人是跟老马跑的，所以吴铁城能通过陈星源而掀〔煽〕起他们的罢工。

本来三报的工友是想领了资方的工资后才罢工的，但是吴铁城对他们说：“现在，有饭给你们食，有钱给你们使，有地方给你们住，为什么还不罢工？如果现在你们还不罢工，以后在街上发生什么事情，中央可不负责。”工友们在他们那些漂亮的罢工条件与威迫之下，于是便于“八·一三”那天晚上七时连行李都不要便全体脱离了间汉奸报了（老马答应取他们的行李，但后来也无实行）。

罢工后，全体工友八十二人（南华四十七，天演二

十，自由十五)便由陈星源招待到九龙的和平旅店去住。

这样的生活一直过了二个星期(这时马超凡发给他们每日的生活费)。

本来吴铁城曾经答应分给他们每人七十五元(港币)，而且这些是曾经发下来的，但这些东〔西〕都落在陈星源、马超凡的腰包去了，工友们得到了只是经过十几次交涉和威胁陈星源才得到的半个月的工资(照工友在报馆工作时的工资计算)，有几个竟连半个月的工资还不够呢。

在罢工过程中，由于汪逆与港府有关系，有几个工友被抓去政治部谈话，问他们为什么罢工？他们回答说，并非罢工，不过我们不愿替汉奸做工。后来政治部也把他们放了，香港政府对于他们也没有甚么威胁和压迫。

罢工后，资方并不马上发觉，因为他们罢工的方式并不是绝食或其他激烈的行动，只是个别的离开，直至深夜才发觉(因为连工头一起罢工)。而“八·一四”、“八·一五”两天虽曾用二十元一天工作〔资〕去雇人回去工作，也无人去复工了。这样汉奸报便停了两天版，直至一星期后才完全恢复出版。

由于国民党陈星源、马超凡对他们的出卖，介绍职业是假的了，工友们只拿了半个月的工资，而自罢工日起半月后，工友们连住的地方、食饭都成问题了。

在工友们遇到这样困难时，他们有一部分分散了，有一部分搬到另一个地方去住。正在这个时候，党也开始给他们予以援助，虽然他们的罢工不是自动的，但他们的行动在客观上有着重大的意义，于是党便帮助他们起〔草〕

宣言分寄海内外请求援助。这时马超凡是阻止他们把宣言发出的，但终于寄到各地去了。于是，不久新华日报便寄下三千余元国币给宋庆龄转交他们，他们便在大观酒店把这笔钱平分了，约每人有港币二十元左右，这样，他们的生活得以维持下去。但有很多人却拿了这笔钱又去花天酒地，嫖婬子，糊里糊涂的花完了。

总起来说，这些工友们的生活是很苦的，但他们还很落后，有些竟连国家民族的观念都很薄弱。这次罢工虽具有其客观上的重大意义，但他 是国民党的吴铁城所一手经理的，不是他们自动罢工的，而国民党和工人是没有关系的，他们须通过托匪和工人阶级的叛徒们，如马超凡、陈星源（二人以前是共产党员）等才能在工人中起作用。从这件事中证明了我党在港一般的印刷业工友中的活动还不够，使托匪们在工人中能起着相当的作用（后来老马的香港印刷总工会也倒了台）。

乙、服务团的组织与回国的经过

一、组织的经过

（一）组织的动机是党为着更加扩大与展开反汪、反投降的运动起见，利用这个服务团的名义和他们既有的行动来作反汪、反投降的号角，影响国内各地的群众，掀起猛烈的反汪、反投降运动。

（二）组织的成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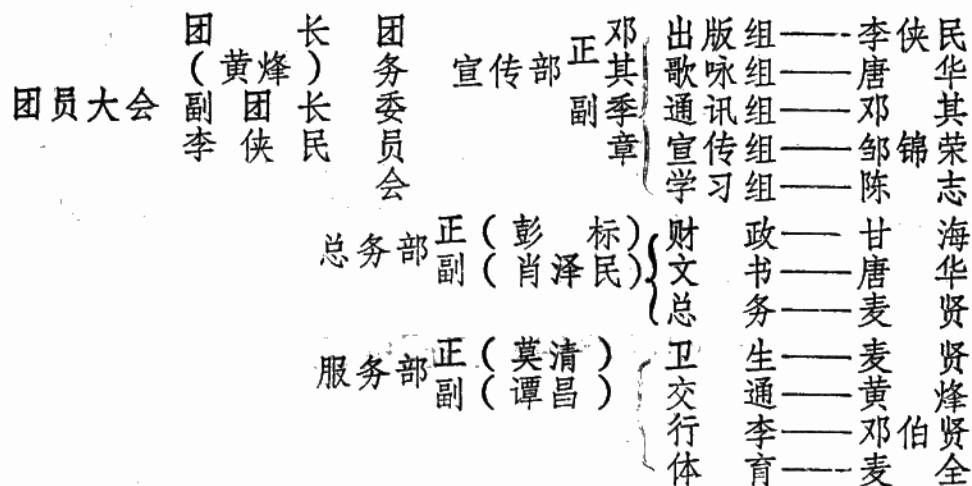
1. 真正三报工友七人：周基、麦全、张湖、容振兴（候补）、邹锦荣（党员），以上是南华的，彭标（党员）是自由的。

2. 其他报馆和印字馆拉回来的十人：谭昌、朱子章、李侠民、莫剑青（工头）、甘海、陈生、王佐庭、邓伯贤、肖泽民。

3. 党委派的五人：唐华、黄烽、邓其、陈志、麦贤（原名麦维，抗大四期毕业生）。

4. 参加服务团的工友们保存着散漫性，流氓意识，同时参加的目的和动机不正确，但也有三个是比较正确的。

（三）组织的系统



（四）组织时的情形

1. 第一次招待各界社团座谈会，地址在印刷工会，到的人不甚多，这时老马贼带了一批流氓拿着铁尺、木棍到会会场阻挠开会，结果流产。

2. 第二次招待各界社团扩大会议，地址在摩托车工会，到有各界社团，如洋务工会、妇委慰会、余闲乐社、

手车互助社等等及新闻记者多人。会议通过发出《为援助反汪工友组织服务团告同胞书》、服务团证明信及捐册。

3. 教育工作。自各界会议通过和援助组织后，各界同胞捐款（本港及菲律宾等地）陆续交来后，动员人参加的已差不多了，便〔开〕始了内部的教育训练工作，请文协的一个会员来主持，训练时间约一星期，内容有：（1）国际国内政治形势，（2）宪政问题，（3）反汪理论，（4）群众工作，（5）歌咏（另一个人主持）。

4. 动员群众参加的方法不好。我们未参加服务团时是司徒维同志负责组织的，他用欺骗的手段叫群众参加，并说服务团是中央政府组织，每月每人有二十元的津贴等等。

5. 回国的准备。首先是经济问题，这时已有了着落；其次便是服装的准备已妥；第三，就是回国服务团的证明文件问题。服务团本来在十月已开始组织，至十二月才完成（因动员困难）。这时国内政治形势已开始是严重化了，因此便急于动身，但经过胡坤去向吴铁城办理的证明文件被有意拖延（他们还说有经济帮忙，其实是阻碍我们回国），办了一个个〔多〕月还办不妥，而我们也因为已有了各界社团的证明信和自己街头太大，所以就经过东江等地回国，一直去重庆了。

二、回国的经过

（一）由东江至韶关

1. 路线的决定。由于我们没有香港当地国民党的证明文件，而当时广东的政治环境又相当坏和复杂，我们估计

到可能受到顽固分子的破坏与阻碍，因此，乃决定不经过平山游击队的驻地而应迅速的到达韶关去工作。

2. 香翰屏的招待。到惠州后，向香翰屏（游击指挥所主任，第九集团军副总司令）接洽，报告我们罢工的经过并要求经济援助。老香的答复是，要求我们在他那里居住一个星期，以便替我们办理介绍信，见张发奎、李汉魂（因为老香一见之后便马上问我们有无国民党的证明文件，我们说因为不知有这样的条例，所以没有），同时又可以调查一下我们的来历。

当时，我们觉得可以利用他的介绍信来作护符，以便直接达第一个目的地。在我们住的地方刚〔好〕有一个政工人员训练班将近毕业，老香以前是一个反共的健将，现在他在训练班也公开的反起来了。在一个纪念日子里，老香特别再三的通知我们参加，当时老香竟作激烈的反共训话，他说：“你们问究竟中央有无命令反共？我的答复是这样，无论坐也好，行也好都应该‘防’你们，晚上睡觉时是不是要防流氓呢？”同时〔有〕人制止学员同情苏联和讨论国际形势。训练班中的学员极大多数是同情党的，而且党员都有，〔对〕他们中间发生思想问题，老香也来了一个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解释，极力污蔑共产党怎样杀人放火，而且是亲眼看见过的。后来毕业后，有很多学员（优秀的）都〔得〕不到工作的安置而遣散回家。

我们又决定向老香献旗以便拉拢。受〔授〕旗那一天，他派一个参谋长出来受旗，并训话，他说：“你们现在有些激烈分子企图引导你们走向激烈的思想，希望你们小心，现在抗战只有一条路可走，就是三民主义……”

献旗后，老香又给我们五十元国币，这时各〔种〕文件亦因为我们不断推〔催〕促而办妥了。同时战事又紧张，所以便马上起程经河源等地向韶关出发。

附：我们走后不〔到〕二月，老香扣留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博罗队在指挥所。

3. 司徒维的死。自惠州步行出发至河源途中，司徒维旧病复发，无法医治而死。因此，我们不得〔不〕在河源办理他的丧事而停留了一些时候。

河源县当时的政治环境对我们是有利的，因为那时县府与党部有矛盾，这矛盾可以给我们利用进行工作。

首先，我们向县党部接洽，他们把责任推往县府方面去，县府又企图推回来，后来县府在我们的面前大骂党部不好，于是自己答应帮助国币四千元^①和帮忙埋葬死者。党部那时恐丢面子又帮助三十元并帮忙召开追悼大会（我们要求的）。

开会时（在中山纪念堂）到有各界社团、党政军各种机关，民众社团如妇女会、抗先、东团、工抗（县党部辖下的）、河源日报（党部的）、新源日报。同时新源日报并停版一天允许工友休息，并允许我们在副刊上出版特刊——追悼特刊，以表哀悼。

河源的工人团体除工人抗敌后援会（党部包办）外无其他组织，但新源日报及河源日报的工人（约数十人）捐给我们的钱约十元左右，妇女会、抗先、东团等团体捐有数十元，以上都表示河源当地的群众都是同情的。

（二）我们在曲江（韶关）

^①原文如此

司徒维同志的丧事办妥后便经灯塔等地搭车过江西省龙南而到南雄抵达第一个目的地——曲江。

1. 工作计划：（1）是统一战线工作须做得好，特别是上层工作，同时准备应付顽固分子方面可能到来的困难。（2）是加强反汪反投降的宣传。（3）注意利用一切机会教育当地的工友同志。

2. 我们的工作：

（1）宣传工作：a. 文字与口头宣传。这方面我们在各报馆（阵中日报——四战区政治部，中山日报——国民党报）出版宣传刊物，而各报于我们到达后，而撰文欢迎。其次，我们还出了街头壁报（但出了两天就给人家撕去了）。同时，还写街头标语，但当我们离开曲江到桂林时，据说竟被顽固分子使人洗刷干净。

b. 粤北祝捷大〔会〕进行。我在惠州时，粤北战事异常紧张，翁源失陷。但我到了曲江时，粤北战事却好转起来，中国方面获了一个胜利。一九四〇〔年〕一月尾的广东各界粤北祝捷大会出现了反汪工友服务团这个队伍，在大会上及大巡行中很多人民都以异样的眼光来注视高举着“反汪”两个大字的队伍。同时这个大会与火炬大巡行还有很多的工人参加，如粤汉铁路工会、曲江印刷业工会、酒楼茶室工会、土木工会（泥水匠等）、理发工会和生活书店及电报工友等等参加。

（2）统一战〔线〕工作与顽固分子对我们的态度。首先我们向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余汉谋及李汉魂等献旗致敬并请求经济帮助，结果和湖南各界为粤北大胜祝捷慰劳团一道在扩大纪念周（到有千余人）上献了旗之

后，参加茶会与晚上的欢宴。同时他们还提〔题〕了字，老张捐助五百元，李、余共六百元。这是一。

其次是顽固分子对我们的态度。当我们初到曲江时，由于陈志（同志）的错误，竟先与县党部（国民党）接洽，这样竟造成以后很多麻烦与阻碍，如县党部书记长江子航查问我们的团体有无大学生、中学生或其他非反汪工友？检查壁报与标语的口号，不许用民族解放，用复兴，少说反对投降妥协的话，阻止我们开招待各界座谈会及招待工友联欢会，这点后来因为和张发奎的关系打得好而开成功了。同时他还派他辖下的妇女会里的一个女子来引诱团长容振兴，但这点由于我在群众中分析了顽固分子破坏的阴谋及应有的警惕而使他失败了。

如果说这时由于我们刚离开惠州时，吴铁城在港（我们走时他不知，后来才发觉）打了电报给香翰屏，说我们这个服务团是共产党领导而转停往曲江，开始了对我们的进功〔攻〕，那么以后在桂林等地就是顽固分子加紧对我们的进功〔攻〕，直把我们打败为止。

（3）招待各界座谈会与招待工友的联欢会。随着各界开始了欢迎我们以后，为着回答和加强和各界社团的联络起见，便在广东省立民教育馆开始招待各界的座谈会，这时顽固分子曾经跑出来阻止过，但是我们胜利了，他们又失败了。当时到有党政军机关（四战区长官部、政治部、省党部、省政府、县党部）及文化界（中央社、民华社、国讯社、文协、中苏文化、新华、新华南、反侵略大会江西分会）各社团，还有印刷工会、抗先、三青团、妇女会等。会上发表了激烈的反汪反投降的演讲，同时各团

体亦发表演讲，经过情形不大好。

结果：

①因个别同志无经验，会场冷淡，且国民党派有人员很多，其他社团及文化人不大敢说话，所〔以〕无多大收获。

②开会时已经开过很多欢迎会，内容大同小异，所以也不大好。

③开会后曾受到国民党暗中的恶意指评，说我们不能干大事。

招待曲江印刷工友联欢会。会址设青年会。到有国民党代表一人（后来先走）及其他各报各印刷厂的工友代表约一百数十人。经过情形异常热烈，各工友代表且来表现游艺，发表演讲，有些说“我们应该学习反汪工友的精神，同时要更加拥护工会、巩固工会”（工会是党领导的），结果是相当好的。

3. 各界的欢迎与援助：

（1）曲江各界欢迎会。本来是一个被群众推动而以国民党领导开的一个会，但是后来县党部书记长江子航拖延了，结果流产（江子航的理由是因为开祝捷大会大〔太〕忙，所以不开）。

（2）各团体欢迎与援助，计有：大光报、印刷工会发起的印刷工友欢宴反汪工友、文化界、基督教育年会及其属下的训练班、中山日报、新华南杂志社、三会联合欢送会。

①大光报欢迎会的情形。工厂有工友百余人，由社长至全体工友都参加，社长及工友都发表演讲，当时党方面

有人参加（因为工友中有党员），同时还有广东省政府印刷所工友参加。

结果：经过情形热烈，演讲中心是反汪、反投降妥协，要团结与抗战到底，但这次欢迎会是各界欢迎会流产后的第一次举行的工友们自己欢迎的一个会，表示了工友们在这一方面起着先锋的作用。同时在翌日的大光报上发表《致反汪工友书》，号召反汪。

②印刷工会发起的印工欢宴。这个工会名义上是国民党领导的，但实际上是党自己领导，工会的组织不满一百人，全曲江的印刷工友约三百人，多数是从广州撤退的。当时参加的工友有百余人，并到县党部书记长及酒楼茶室的代表一人（是一个工贼，这个工会也不大）。欢宴中又发起席上募捐，结果有百余元，工友们出了钱来欢宴又还捐钱，表示了他们对我们工人自己的同情与援助。在会场上又一次号召工友们积极参加工会。翌日报纸上又发表《欢迎反汪工友书》及欢宴消息。

③中山日报。由社长、总编辑到全体工友约四十余人参加。翌日总编辑发表欢迎会的特写。还有一个阵中日报，但工友并不多，没有举行欢迎，但有捐钱。

④文化界的欢迎会。各工友举行欢迎后，中国文艺界协会、中苏文化反侵略大会分会、新军、新华南、持久战、新闻记者学会、民革社、国新社、中央社等文化团体联合来一个文化界欢迎反汪工友大会。

会中每个〔人〕都热烈发言，并即席通过成立援助反汪工友长期募捐委员会，帮助我们。本来还打算出欢迎特刊，但后来报纸无编〔篇〕幅出让而停止了，只在文协会编的壁

报上登着关于我们的消息。

⑤基督教青年会。这是曲江的最后一个欢迎会，到有青年军人及其属下的训练班员，会中主席为我们祈祷，祝福我们康健，并愿给予我们一切可能的帮忙。

⑥新华南及三合会的工友和编辑举行的欢送会。在曲江经过半个月的时间，各种工作已差不多了，乃决定入桂林去。临行的一天，他们举行了这个欢〔送〕会。

(3)各种捐款的成份：①地区上有东江各地、曲江及衡阳的×刚报。②成份有最高的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青年军人、工人及各界社团。

4.工作的简单总结：(1)从东江至韶关的工作过程中，我们获得了教训，就是统一战线工作做得好和适当地应付顽固分子时，工作一定比较开展和容易些。(2)证明群众特别是工友群众是同情我们和党的，他们能为反汪反投降妥协而奋斗。(3)影响了印刷工友群众，如后来有些工友参加了印刷工会。(4)内部问题。由于组织成份的复杂和陈志不执行党自己的决定，同时进行挑拨党员与群众、党员与党的关系，增加了内部的困难，因此我们在工作上的缺点主要的是主观赶不上客观方面的各种帮助，工作不能有更大的收获(陈志甚至在火炬大巡行时高呼中国国民党万岁的口号，制造假的上级的决议)。

(三)在桂林的工作与遭遇

1.未到桂林前的听闻。这时中央宣传部(国民党)曾打电话到中央社问我们的行踪如何?同时桂林方面各界已筹备好了一个盛大的欢迎会准备在车站欢迎，这时我们公布了以后的目的和行期，以免人家怀疑，后来赴火车经衡

阳到桂林去了。虽然我们曾经打电话给救亡日报，但我们到了以后，桂林各界才知道并无在车站欢迎。

2. 在桂林举行过的欢迎会有：（1）桂林各界欢迎会，（2）桂林印刷业书业联合欢迎会，（3）工会训练班，（4）救亡日报，（5）厦门儿童、抗先二队新安旅行团、广州儿童与××儿童救亡剧团联合欢迎会。

其中最热烈的要算是书业、印刷业联合欢迎会，到有书店老板，职员工友都热烈参加，共二百余人，这是回国后的最好的一次集会。集会中不但在精神上援助我们，拥护党提出的抗战团结进步，反投降、反分裂、反倒退的口号，而且还即席募捐五十三元，积极帮忙旅费。会后，科学印刷厂的工友回去后还大家讨论争取看书自由及减时，向老板开始过年斗争。

其它除各界的欢迎会另讲外，一般的都非常热烈同情于党，且为党所领导。

桂林各界欢迎会。发起人：（1）广西省党部，（2）西南行营，（3）行营政治部，（4）广西省府，（5）警察局，（6）广西绥靖公署。参加的各大社团：

（1）国民党为什么会发起欢迎和招待（当时招待我们到湘江旅店去住）？他的目的是想我们不要到重庆去宣传，留我们在桂林做工，瓦解服务团。所以他欢迎和招待我们。但当我们在会场上公开宣布拒绝了他们的恶意要求之后，他们的尾巴便露出来了，立刻停止招待食宿，同时在筹备欢迎会中捐得的招待费五百元也没有了下文。会场中，因主席袁石之（国民党省党部代表）不宣布自由演

讲，所以经过情形十分冷静，没有多大影响（同〔当〕时很多人曾准备演讲，但见了这个情形也不敢讲话了）。

（2）这样的国民党的统〔治〕下，桂林的团体是很少的，有的只是空头的，如印刷工会是无印工参加的，比较活跃的只是外来的如新安旅行团等，工人运动的情形不详（附：我们送给各报工友的信和宣传品除《救亡日报》外均为老板所没收，如广西日报、扫荡）。

3. 统一战线工作：

（1）献旗。因为我们到桂林的时候，刚过旧历新年，各机关放假，所以接洽了很长的时间还不能献旗，结果先献了给白崇禧的旗，他派了一个邓秘书长（老托）来受旗，没有什么仪式，只讲了几句敷衍的话。至于献给黄旭初主席的旗，直至我们要起程时还无办法，只得写了一封道歉的信连同旗一道包了派人送去（我们曾和省府的秘书长接洽过，但他曾说认为不必要，我们要求见黄主席也被拒绝）。总之，在桂林，各机关由行营到省党部，他们都被托匪、顽固分子所把握，他们一致行动起来，所以无法见到比较进步一些的人物，如白崇禧等，结果工作遭遇了很大的阻碍。

（2）省党部对我们的态度：

①省党部在当时曾答应我们可以自由出壁报、街头宣传，但后来我们的壁报、标语也遭到和曲江同样的境遇。但当我们拒绝了他们的要求后，态度便立即改变了，招待停止了，交涉工作受了很大的阻碍，同时还叫我们完全停止活动。

②他们停止我们活动的理由：主要的他说：“根据情

报，你们是共产党领导的，共产党利用了这个团体来活动，另有企图。同时，你们团体里并不是完全为反汪工友，现在我们根据中央宣传部的电报，请你们不要到重庆去，而且我们国民党现在是限制共产党活动的，既然你们不服从我们的领导，不能不停止你们的活动……”同时这位国民党的袁科长还说：“我们根本不承认你们的团体合法存在……你们的反汪和我们的反汪是不同的，你们另有企图，同时欢迎你们的人也和我们不同的”。当我们临离开桂林的时候，曾经向省党部提出三个要求和驳斥他的胡说时，他们也始终坚持我们是共产党领导，应停止活动。

〔我们的〕三个要求：①准予开招待各界工友联欢会。②写介绍信到中央宣传部去（因为我们曾有过广东省党部写给广西省党部的介绍信）。③请求经济援助和介绍减免车费。结果答复如下：①招待会不要开，否则不客气和不负责任。②介绍信因为团体不合法，写介绍信无异承认合法。③既不服从领导，无可能。

（3）停止我们活动的原因大概是：①他得到张发奎打来的电报。②中央宣传部的指令——这些都从他们自己的口中得来。

（4）招待工友的联欢会。因为我们觉得开联欢会是应有的最低的限度的自由。所以虽然国民党曾经恐吓和阻止，但我们坚持了开会。虽然他们就到当时曾允许借会场给我们的青年会去，命令不要借会场给我们，青年会为了避免和省党部的矛盾，所以不得不拒绝了。我们只得把国民党的通知信当众宣读，并抗议省党部这样违反抗战利益的行动，引起群众对国民党极大的恶感（当时曾到有行营

政治部代表，他也莫明其妙）。

4. 内部的工作：

(1) 这时因为干部少，内部组织不健全，同时我们一方面要应付外来的工作困难，另一方面又要应付内部的陈志的捣蛋破坏——客观上是破坏的。内部的教育工作非常不够。这是内部工作的一个大缺点。

(2) 由于客观上的困难，国民党顽固分子的恐吓与阻碍（在遇到困难时，虽然我们的代表要求面见白崇禧主持公道，曾经哭了起来，也得不到同情，终于见不到白崇禧），而服务团并无每月每人津贴二十元，有很多群众动摇起来了，有的要求退出回港，悲观失望，同时又因为陈志曾有意告诉一个团员陈生说服务团是到延安去的，于是他们有些更加恐慌起来。因此，在内部要克服这种悲观失望的情绪和陈志斗争（这时陈志甚至恐吓唐华，后至柳州又恐吓邓其），终于经过大家的努力而克服了这种顶危险的情绪——因为外来的还怕，最怕的是内部。

(四) 由柳州至重庆

1. 团长的失踪。由于省党部曾警〔告〕过和威吓过我们，所以我们离开桂林的方式是秘密的，不敢张旗击鼓。但为对付他们又不能〔不〕把行程日期及目的地更鲜明的公开的在报纸上揭露出来，以便途中〔有〕问题时能争得广大的群众。到了柳州，首先去拜访县党部书记长，询问柳州各方面及搭车赴渝的情形（后来书记长调往重庆受训）。后来便住在一个旅店里，这时团长容振兴竟失了踪（三月初）。

失踪时的情形：到了柳州四月〔日〕后的一个晚上九

时许，容振兴称外出拿衣服去给人家洗（身穿工人装及外套），并〔约〕一个群众名朱锦才的一道去，因为他刚从外边回来，所以拒绝了他的请求。于是容个人外出，当时我们以为是吃东西去，便轻看了。谁知直至翌日早晨还不回来，搜其行李才知道失了踪（重要物件都已拿走）。

（1）失踪后内部的形势，第一是悲观失望，动摇恐慌的情绪重新笼罩着整个〔团〕，有一个姓陈的团员竟不敢独自外出。第二是陈志利用了这个形势煽动团内最落后的一部人，如张潮、周基等人来反对党的工作人员，企图动员他们回港，离开团的组织，使团陷于瓦解，同时又重新引起党内的纠纷，恐吓邓其同志（团的宣传部长），对群众说团长容振兴的失踪是我们三人所迫走的，企图再引起我们和群众的分裂。

（2）对于团长失踪后形势的对策及我们的看法。团内部这种形势是非常危险的，有极大的可能使外面的敌人不打而自败。当时我们对团长失踪的估计有两个可能：①给顽固分子抓去（因为广西省党部曾这样恐吓过：“以后你们在途中的困难，才使你们吃不消。”当时我们说：“怕困难就不回国，无论任何困难一定能克服……”来答复他们。②自己开小差。

后者的可能是很大的，为什么呢？①他个人很落后，生活很散漫，在港时生活也很散漫。②他只是候补同志（党因为他自己散漫要他候补期），受党的教育不及三月。③由于环境的困难和这个团体的特殊性，使他个人动摇，因为他曾经三番五次的谈到和估计到渝后的困难，且说不如回家耕田还比较好（他家里有妻子、父母）。

但直至现在都没有听过他的消息，还不敢证实他是开小差或被捕的，因为国民党逮捕救亡分子，共产党员是平常的（我们的对策见下页第五补充）。

2. 伤兵之友社联合青年军人服务部、春季劳军团、县党部欢迎会。

（1）参加开会的人数有百余人。

（2）成份，青年占极大多数，工人简直没有。

（3）成绩，当时情形极为热烈——虽然这是临时筹备的（我们没有准备在柳工作，但仍进行应有的宣传工作），发表演讲的青年都拥护党当前决定的策略路线，同情我们，当时即募捐有百余元。

3. 在柳州的统一战线工作

如果在桂林的统一战线工作做得不好，那么，在柳州却好点，这显示了即使在同一省份内统一战线的工作也是不平衡的。

我们因为当时经济很困难，又要搭车的费用，因此向县政府请求援助，结果，由动员委员会拨出一百元捐给我们，帮助我们住的地方，直至临离开柳州赴渝时还和县长握手道别，这表示了站在抗战的利益上他们还愿意帮助我们。

还有一件就是军事委员会西南运输处答允我们免费全体乘车赴渝。这给我们很大的帮助。

4. 在贵阳的见闻

（1）贵阳的工友们在报纸上见到我们反汪工友离桂经贵阳赴渝的消息后，乃由邮务工会的工友们发起推动贵阳工界联合新华日报分销处暨读者欢迎会来准备欢迎我

们，但这个会因为省党部不愿号召和阻止而不能举行。

(2) 贵阳当局在三月十二日说×诞×那天晚上禁止已坐在街头宣传的学生和邮务工人进行宣传工作，理由阻碍交通秩序，结果宣传工作停止。

(3) 贵阳的邮务工会，人数不详，但它是拥护党的一个群众团体。贵阳还有印刷工友，无组织，很落后，生活散漫（因为他们利用技术工人来抬高工资，所以有钱）。我们为着影响他们，曾向〔他们〕作友谊的拜访，参观工厂，送些自己印的宣传品给他们。

5. 补充：团长容振兴失踪后，我们的对策，首先是向当地的警察局报案。其次就稳定内部，集中火力打击陈志——不能不这样做，说我们不应该这样，引起分裂，使团体瓦解，而应该团结以应付外来的困难。再其次，就是要尽可能少和陈志争辩，减少矛盾。结果我们胜利了，继续保持团体，举起反汪大旗向重庆进发。

柳州工人的点滴：(1) 柳江县理发业工会。理发工人数目很少，入会的也很少，工作不大开展，尤其是教育工作。工人的生活也很苦，工资是六、四对分，受国民党统制，他们对我们很同情，但经费非常困难，无法帮助。(2) 工人抗敌后援会。工会单位在名目上有七、八个，但有很多单位是没有人参加的，因此“工抗”也是空头的机关，受国民党统制。(3) 机器工会柳州分会。参加者多为在柳兵工厂四十二厂的工友们，人数不详，后来飞机炸坏了兵工厂，只有一部分现在复工。

(五) 我们在重庆

1. 工作计划：(1) 向国民党中央要求立案；(2)

如能立案则调整内部，设法赴前方；（3）向蒋委员长等献旗；（4）准备作广泛的宣传工作及分头拜访各团体。

2. 新华日报的招待会。我们到了重庆后，首先向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接洽，关于接洽一项下面再说。首先欢迎我们便是新华日报——工人阶级的报纸，吴光坚同志发表演讲。

3. 重庆各报工友联合欢迎会。五月初，由中央日报工友发起重庆各报工友联合欢迎会决定在复旦中学举行，许多新闻记者、文化界都准备参加集会，而中央社也发出电讯到各地去，可是开会的前一天晚上，中央宣传部、中央社会部、市党部三个机关发了三道命令给筹备会停止举行。同时社会部又派社会科长陆京士去向中央日报工友说：“反汪工友是共产党，欢迎他们就是欢迎共产党，同时开会的方式也是共产党的，所以会是万万开不得！”开会的那一天，国民党又派了很多警察、宪兵到复旦中学站岗弹压开会。这个会结果流产了。

4. 和国民党交涉的经过：（1）我们向国民党提出的问题：①献旗给蒋委员长。②请求立案。③经济帮助。④设法帮助我们到前方去工作。

（2）国民党的答复：①关于第一条，认为不必，因为蒋委员长是全国的领袖，忙不过了〔来〕，而结果也献不成。②要详细考虑，认为你们工作岗位不适合，最好回到工厂去，如果愿意的话，可以介绍，同时在立案问题未答复前不准做任何工作。③经济帮助无可能。④如愿到前方去也可以，但服务团的名义万万要不得。而我们认为如果失了团的名义和独立性，就毫无意义，因此，无结果。

(3) 在交涉的过程中,他们有意拖延,从中央宣传部推到社会部,社会部再推到市党部去。这样经过一个长的时期直至团解散后要求帮助旅费时又推到市府的社会局去,但都无结果。

(六) 解散后的结束工作

1. 解散的理由: (1) 在国民党拖延了几个月后,无法再拖我们的请求,而我们又没有在他的拖延下瓦解,于是便答复了我们,这个答复便决定了服务团的命运。

(2) 解散的理由是“……于法无授,毋庸组织。”同时他们还说我们和《新华日报》的关系太密切

2. 结束工作: (1) 首先是结束在香港的服务团的后方办事处、曲江文化界长期募捐委员会,把各种捐款(余下的)在延安的捐给八路军,曲江的捐给新四军,香港捐给中华书局的工友们。(2) 在最后的交涉工作中,国民党中央社会部派人到《新华日报》去禁止号召捐款,同时立即结束和停止接收各界的捐款,所以《新华日报》也结束了捐款,我们便各人照分来当作回粤的路费。(3) 结束工作正在进行中,社会部还警告我们说:“你们以后的行动要小心,不然的话,我们也不客气了”。(4) 重庆各界工友对我们的反响是很好的,如各报印刷工友的准备热烈欢迎(后来开不成),重庆印刷工会弹子石分会成立欢迎我们——后来因为通知不到,无参加。重庆五金工友在我们解散后捐了五百余元给我们(五金工友有数百捐钱,单位很多)。

3. 工友们的动向: (1) 有五个到(其中一个 是党员)广东平山游击队去工作。(2) 大部分回粤港等地。

丙、总结

一、对外方面

(一)五、六个月来的工作，由于坚持了党的立场和坚持统一战线的策略，适当的对付了顽固分子，在客观方面终于能完成党交给的任务，而同时又证明了党的路线与策略的正确性。

(二)五、六个月来的工作收获是很大的，在政治的意义上来说，它影响各阶层的群众，如文化界、青年，特别是工人群众、军人、基督教青年，使他们拥护党当前决定的策略路线，同时也证明了党的策略路线的正确。

(三)把反汪反投降妥协的运动提高了一步，而更加向前猛烈发展。

二、在对内方面来说：

(一)教育了参加服务的工友自己本身，提高了党在他们中的威信。

(二)虽然在国民党和顽固分子等外来的压迫下，及和内部的陈志的斗争下面坚持了团结，反对分裂，克服困难，保证党所交给予任务的实现而把服务团坚持到重庆。

(三)最后一点便是，我们如果组织服〔务〕团之类的单独工作团体，必须注意质量的完善的选择，有健全的党支部的领导，这样工作才能取得更大的预期的效果。

报告人：唐克（华）

邓衍基（其） 黄一甦（烽）

附：唐克关于个人所知的香港职工运动的大概情形的报告

一、党领导下的工人团体

(一)最大的要算洋务工会(五千)，(二)印刷工会(四千)，(三)余闲乐社(二千)，(四)摩托车工会，(五)革履工会，(六)洋务群研工会，(七)手车工人互助社，(八)海员工会(被封。国民党另建)，(九)煤炭工会，(十)戏院职工总会，(十一)小贩工会等等。

二、香港的工人对祖国做了些什么工作？

义卖、献金、捐助祖国抗战军队的棉衣及短衫裤、回国服务、参加游击队等工作。

三、个别工会的内部情况

(一)香港洋务工会。参加的人数有五千余人(现在九龙的油麻地设有分会一所及妇女部，参加妇女部的妇女工人有五百人以上。香港的洋务工人相当多，加入工会的只是少数，工会的工作因干部缺乏，一部分救亡工作者怠工，所以发展很困难，而且巩固的工作做得还不够，以至有很多会友加入后不〔很〕久不交月费，对工会又不闻不问。那里的党部正在努力推动这个工会的巩固工作(因此只是抗战才成立的一个团体)。

(二)其它的工会大都有自己的分会，参加的人也相

当多。

(三) 戏院职工总会。这是一个组织已一年余的年青工会，人数不到一千人，在九龙油麻地有了自己的分会，是以各戏院为单位的，现在香港九龙各戏院的工友已差不多都加入了总工会。工作上都有了很大的成绩，但在增进工友的利益方面的工作还很差。

(四) 这只是个人所知的写出来，其它的不详细。

(五) 在交通部门方面，由于资方的压制，职工运动还很差，如长途汽车职工还始终不能建立起自己的工会来。电车工人虽有了自己的工会，但党在那里的工作还很差。

唐 克

周小鼎关于香港中华书局分厂党 总支工作的谈话记录

(1941年1月11、13日)

香港中华书局分厂总支部工作(周小鼎同志谈话)
周小鼎(在厂内名周钟庠),二十七岁,江苏高淳人,一九三八年七月在厂内入党,印刷工人(印过钞票)。入党后担任过小组长,(总支未成立前)支部宣传干事、总支宣传干事、工会党团干事(兼的)。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离开支部,一九四〇年十二月到延安,现住在马列学院(在中华书局一共做了四、五年工)。

第一部分 一般环境

I、厂方

1. 工厂组织。为着加强管理机构,“八·一三”以后如下组织: 总经理一人: 陆奎——政员, 以前是国家社会党, 后来因为印钞票的关系和孔祥熙、杜月笙、吴铁〔城〕等有密切关系。经理以下监督一人: 王瑾士——以前上海总厂印刷所长, 政治面目不清, 压迫罢工的手段厉害。监督以下司理一人: 周开甲——以前是南洋烟草公司经理及交际, 政治面目不清。司理以下是厂长一人: 杨

丙吉——政治面目不清，听说已入英国籍，信教的。厂长以下工务长一人：白纯华——总大工头，管分配工人工作，无政〔治〕活动。与工务长平行的印钞部主任一人：汪宝祥——印钞部总工头，政治面〔目〕不清，无政治活动。

在总经理或监督、司理、厂长领导之下有：收支处（管发工资、收钱）处长一人：王益昌，助理一人，两人是同情工人的；庶务科（管请假）科长一人，以前很坏，在工人斗争中变好了（中立起来）；材料科（管机器、油墨等）科长一人，不问事，中立分子，出版科（管出版发行）科长一人，中立分子；营业部科长一人，未见过面。以上是管理机构。

生产机构分二大部门：（1）印书部。（2）印钞部。每部门有十几种工人（生产单位），每个生产单位，较大的正副工头二人，范围较小的工头一人，工头一共五十一——六十人。内中只有一、二人是同情工人的，其余均是忠实于资本家的。同情工人的工头是吴林梅、姜小春、黄步秋。较大的单位：小电机又分专印油〔邮〕票或钞票二个单位；检查科又分初检、复检、审查三个小单位；装订科又分中装、洋装二单位；电镀又分化学、技术二小单位。每个小单位有一个小工头，有时小工头有二个，一男一女，男管男工，女管女工，小工头没有一个好的。

——总厂在上海，已改美国永宁印刷公司。上海的印钞部已全部搬到香港。香港印书部不健全，是以上海寄来的纸版印书。

2. 厂方与帝国主义的关系：和英、美最密切，和德国有

些关系（油墨、机器、工程师，部分是德国，又表现在德波战争发生以后，德侨撤退，厂方接受〔收〕了德国的一个在港洋行）。

3. 厂方和国民党的关系：和孔祥熙等有关系。

4. 印钞部搬到香港以后，聘大律师——曹善允（英走狗，华人代表，太平绅士）为常年法律顾问。曹可以直接出席香港英政府最高法院，厂方和劳工司——毕达氏接头，许多罢工是劳工师〔司〕来解决的，和杜月笙的关系很好，杜住在香港。

5. 和工人工会对抗的华商联合会，即是中华厂在内部支持的。

6. 和国民党海外支部主任吴铁城关系很密切，支部办事处即在香港。

7. 一九三七以后，我党支部建立以前，厂方对工人的态度与手段：“一·二八”事变以前经过二次已把工人中活动分子肃清（用解雇等方法），“一·二八”以后，为着防止革命分子混入，建立严格介绍制度：介绍工人时，一定经厂长一直到可靠的小工头的关系，介绍进来的只是他们的亲戚，工人进厂时要铺保（要法人资本，股份资本不能作铺保）签订合同，在合同上说明确定是月工或短工还是长工等等。被介绍的工人，每逢过年过节或讨老婆生儿子都要送礼，工资被工头扣（工头剥削制度）。长工、月工、件工、短工受不同的剥削，有不同的地位（有很深的分化作用）。为着防止工人的不合法的活动，组织了中华体育会（有排球、蓝球……），更进一步又组织了中华书局小球协进会（每星期六与星期日都赛球），组织无锡

同乡会、武进同乡会、江湾同乡会、宁波同乡会，都是厂长等领导的，常常引起乡会之间的矛盾，较下层的又引诱工人拜老头子或结拜兄弟。

8. 总资本不知若干，每年剩余价〔值〕总在一百万以上（罗费奎、孔祥熙等的资本）。

II 工人方面

1. 工人数目，一共一千八百左右。因工作性质不同，有不同技术的工人。又因待遇的不同，分长工（即月工）、短工、件工、临时短工——四种工人。长工可以享受国民党十八年颁布的工厂法所规定的权利：各种假期（如结婚放假等）照给工资；每月有二天赏工；做到二年的另有每年十天特别假期（即特别赏工），五年以上半个月，十年以上的一个月。每年分红利（每年百分之几），如果不分就集下几年一次分的名供俗金；其他如伤病都有津贴，死亡有抚恤（约三百元）及办理伤费；死亡以后看家庭情形还有一定时期的津贴；每二年可回家一次，给假一月，工资照给并津贴川资。长工大概占工人百分之二十（？）。短工有定期短工及不定期短工（即临时短工），短工有的论月或论天给工资。所享〔受〕的权利：假（请或放）无工资，伤病死亡可以得到比长工的较低津贴而外，政府例假日有津贴，其他无什么权利。这种工人（定期短工）大概有〔占〕工人百分之十以上；不定期短工是论日给工资，不得享受任何权利——约占工人百分之七十。件工（也是临时短工的一种），没有什么权利可言，只有伤病时给一点医药费——约占工人总数六分之一（包括在临时短工

〔在〕内)。

2.除工头外，没有什么小职员。学徒不过二十——三十人，学徒待遇第一年十元，每增一年增加二元（但要有成绩），三年满师给工资（第一年十六元）。

3.工人成份，刚由农村出来约占百分之四十，多半在印钞部、小电机科（是中农、贫农破产的，有少数雇农），城市小资级（小学教员、小商人、小店员……），破产的约占不到百分之十，熟练的技术工人约占工人百分之二十九，女工共占百分之二十一（熟练的有百分之八，其余是不熟练的）。熟练工人有二种：一小部分是长久住在城市，腐化堕落和流氓接近的，大部〔分〕是好的。

4.工人籍贯，江苏人约有百分之七十，内分江湾、无锡、武进三大帮（江湾帮最小，武进、无锡帮是势均力敌）。女工百分之二十是广东本地人，女工百分之一是江苏工人的家属。宁波人与山东人约有百分之三——四。广东人（男工）约占百分之六。

5.工人生活。工人工资（正常工资，以港币计算）：长工每月最低二十六元，最高三十六元；定期短工与长工差不多，临时短工每天最高零点八元，最低零点四元；件工印钞票一千张零点一四元，高的每天可印二万三千张（印钞票的件工，无工作时津贴零点八元，是特殊的）。件工——装订，工资每月最高可得十七——十八元，无工时无津贴。

最苦的工人是广东男工（百分之六）及部分女工，痛〔苦〕到带病上工，停一天被扣一天工资，饿一天的肚〔子〕。件工中的一部分也最苦，苦到家庭不能维持。

只自己有饭吃。长工生活上无问题。定期短工只是无工资以外的权利，生活也无什么问题，无什么要求。

工人刚从上海到香港时不久，工作时间延长半小时（从上海的八时半——九时），增加生产量只是印钞部每人增加一百张（平均的），检查科也一样增加。第二次，一九三七时九月增加工作。生产量（百分之二十，夜工由六小时增加九小时），取消赏工（每月二天）与奖金（每半年一次奖金），最吃亏的是长工和临时短工。百分之六的广东工人及一部分女工生活最苦的原因：男工多半是出店工人，妇女是件工，并且家庭负担重，每月工资不过十七——十八元。

加印课工人，因工人体力不同，要求不同，有的身体弱的，因为是件工制，因生产量日渐减少，所以所得工资又减少了，又因家庭负担重，所以加印课工人中一部分生活也很苦，一般的生活能够过得去（可参看工人斗争之部）。

大体上，长工（百分之十是随印钞部从上海刚调来的，除原定工资外，每人增加十元），定期短工在生活上是比较优裕的，生活较痛苦的是临时短工和杂役工人（即出店工人）。

物质生活上，长工及定期短工无要求。临时短工的要求是改长工，部分女工（件工）较觉悟的也要求改长工及假日或什么怀孕日或无工时要发工资；加印课小部分体力最弱的要求是，废除包工制并改长工，最低限度要求例假日、特别假期（每二年回家一次〔以〕及来回川资的津贴，这些要求是每次斗争的基本原因。加印课的工人是技

术工人，大部分体力是可以支持的，所以和其他临时短工不同，生活上也过得去，同时无工时每日有零点八元的津贴及解雇金（二个月的工资），但无保障，同时随时有解雇的危险（即临时短工包工制，不成文的）。

工人精神生活。高级职员一人一个茶杯，一把茶壶，工人几十人一个茶杯，热天是感到痛苦的。罚金制度是累进的，例如一千〔张〕中的第一张印糊了，罚零点一四元，第二张加罚零点二八元，第三张罚零点五六元，最后罚停工一天。侧〔厕〕所缩小，免得工人借故大便休息或看报。每天工人除工作时间外，看书报的时间是有的，但时间很紧，厂方规定工作时间内不得看书报。打骂制度是没有的，个别发生时，即遭受工人的猛烈反抗。

宿舍制度。除女工，大部分广东工人及一部分有家眷的工人外，工人分住在四个工人寄宿舍（由资方供给，住在外面的不津贴）。杂役工人本无权利住宿舍，但因无法，一部分已要求得厂方允许住宿舍（宿舍有工头看管）。

宿舍共有两个，分布在工厂围围，一里多路以内有公共汽车通工厂的。每个房间住得人多，床多数是双层的，臭虫多，空气不干净。每夜九时以后不准出寄宿舍，如要出去，一定要请假，接着三夜不在宿舍睡觉而又防〔妨〕碍工作者开除，不妨〔妨〕碍工作者作为放弃权利论（不准住宿）；〔还有〕不准留客等条例。工人宿舍是工人活动一个便利的场所。

6. 工人文化程度，文盲约〔占〕有工人总数百分之二十六，都是脱离农村不久的中年以上农民（脱离农村已三、四年）；小学程度（初小多于高小）的约占百分之六十

——七十；初中程度的约占百分之十；高中程度的约有一、二人。工人中绝大多数能看书报（这是有利条件之一），报纸看立报顶多，国民日报次之，珠江日报又次之，新华日报因为太贵（航空寄去的，每张零点二元，有时还买不到）更次之。书籍是很杂的，比较接近我党的工人，多半看通俗社会科学二十讲、论青年的修养、青年的修与训、怎样做救亡工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教材、社会主义讲话、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论待人接物等。

7.工人嗜好，打牌是消遣的，是普遍的（赌得很小），旅行、游泳、锡球、看抗战电影及话剧是普遍的，抽香烟也很普遍，吃酒是很少数（因为酒太贵），吃加菲〔咖啡〕及零食是很少的，广东工人爱看广东戏、广东电影。〔看〕广东报纸的多

8.工人的活动及组织。活动除以上资方所领导及工人自己的活动外，没有什么活动。工人的组织（在我们领导下的）：

（1）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工友社正式成立。在“七·七”事变以后有读书会的组织，是工友社的基础。读书会最初只有五、六人（这五、六人后来都入党了，只有一个落伍了），到工友社成立时，读书会有十一人（只有三人落伍，一人较坏，其余都加入党了）。读书会是非常秘密的，当时每个星期日二——四小时开会讨〔论〕问题，即是剩余价值、新文字等问题，有时研究一下各通讯社的立场，也研究过洛甫同志的民运原则，介绍书报及杂志给接近的少数人看。读书会成立是在袁心德（文化人，曾参加过广西的民族革命大同盟，当时是否共产党员不知道，有

三个读书会会员到广西做过工而参加过民族革命大同盟，袁即是以大同盟的关系来找这几个读书会会员的)领导下的(和资方极端对立)。

(2)工友社十二月正式成立，起初十一人，也是极秘密的团体，加入的条件很严格：是否坚定，经过考验，和资方及工头的关系。成立以后即筹备出版《工友》半月刊(现在大约还继续出版)。在工友社的领导下仍有读书会的组织，到工会成立时(一九三八年八月)，该会已不经常活动，会员顶多时只发展到二十余人。工友社是党发展的基础，也是工会的基础。后来读书会讨论工人斗争、斗争艺术，发动工人参加香港市委领导下的香港印刷业工会(读书会会员二十几人中大部分已参加党了)。

(3)香港印刷业工会第三特别支部(即中华书局港厂职工同人会)一九三八年八月一日正式成立。成立时工人内部有二种不同主张，第一种是狭义的，主张成立与香港印刷业工会没有关系的独立组织，强调工人的籍贯，轻视印刷业工会；第二种主张，是在印刷业工会领导下的，主张工人统一的组织，不分籍贯，工人没有利益冲突，结果后一种主张胜利了。成立时约有五百多人(由秘密的工厂委员会转化为公开的工会)，是公开的(在公开工会以前有为领导工人斗争的秘密的在印刷业工会领导下的工厂委员会)。光在委员[会]领导下的工人约有五百多人，内中已有三百多人秘密参加印刷工会(印刷业工会已是立案的，秘密是对资方而言)，发展到一九三九年八月时已有会员一千一百多人。工会的经常工作：

工人教育方面：识字座谈会(一百多人)、读书会

(六十——七十人)、哲学小组(四——六人)、列宁主义小组(五——六人)、家庭妇女读书会(二十——三十人)。工人子弟学校未成功，个别帮助文盲识字。

宣传方面：工厂壁报、中华旬刊、纪念节特刊及临时刊物(四开报纸)、各纪念节宣言、斗争中的各种宣传品(由公文、公函到宣言、通讯文艺)。这些刊物都是向厂内外送，至少五百——六百份，至多二千份。

组织工作方面：每个生产单位下正副组长各一人。大组下分小组，以人数划分，每五人一组，以机器划分的每架机器一组(有九人)。平常有交通队四队，共四十人，纠察队二个大队(有时四个大队)，至少八十人，至多一百二十——二百人。会议经常有小组长联席会，讨论教育问题与工作问题，有组织部部务会(各大组长、交通、纠察队长、部长、副部长等参加)，讨论学习与工作问题(部务会议是临时的)。

交际方面：正式工人代表六人，交际团一个，共十二人(必要时增加，经常与各工人团体联络，帮助斗争，并与厂方、政府联络)。

文化娱乐方面：戏剧公演过三次，一次为儿童保[育院]筹款，得七百——八百元；经常研究话剧、京剧；中华书局歌咏团共六十几人，分为二队，在香港很有名，得过奖的；小足球队共五十六——十人；不定期的旅行队、海泳(是无组织的)、乒乓球队等。

经济工作：收会费(每人每月零点三元)、预算、公布收支表、收基金(大概规定每人交一天工资，自愿多拿的也有)交银行保管，曾计划过办消费合作社、小书店(

都未实现)。

临时工作：献金运动好几次——纪念节献金运动，由〔有〕纪念大会、演讲会（请名人演讲）；反汪运动——主要是签名反汪及打电报；反托运动——发动工厂内部及其他工会支部（商务印书馆等）联名发表宣言反对托派的分裂工人运动；反工贼（工贼的组织——有中华书局劳资互助协会）的运动。

工会组织形式：最高机关是香港印刷业工会——中华书局港厂同人大会——同人代表会议——执行、监察两委员会。执行委员会下设常务委员会，分七部（总务、组织、宣传、文书、经济、娱乐、教育），每部以下分股（总务分交际、庶务、慈善三股，组织分交通、纠察、调查三股，宣传以下设编辑委员会、油印股、出版股，时事座谈会，文书部不设股，经济分出纳、保管二股，教育是妇女识字班、读书小组等读书会，娱乐分歌咏团、话剧团、平剧团、足球队等。教育部长、娱乐部长是复兴分子，其余共产党员占绝大多数，非党干部也有）。

（4）加印课的互助储蓄会，包括全部加印课的工人，规定每月每人交钱二元作为基金，在生产、结婚、疾病、死亡问题上互相帮助。基本目的在储蓄斗争基金（加印课斗争较多），无其他工作。四十——五十人的青帮组织（实际已不存在了）是我们领导的。

在资方领导下的组织如同乡会等，因为工人的斗争都已垮了，只有些小工头在里面，长工及定期短工大部分是在他掌握下中立的。

在工人中仅仅有一人（在他影响下的有二人）因厌烦

斗争，与三合会有密切关系，企图暗杀资方要人。

9. 各个党派在工人中的影响及活动。复兴社一共只有三人，二人已参加工会领导机关，一人参加歌咏团，这三人是从小上海总厂去的，一个是小教员，一个是小商人，一个是女小学教师，起初是失掉关系的，一九三八——一九三九〔年〕蔡劲军到香港后他们才接上关系（蔡是三青团香港负责人）。他们的活动是执行工会决议，有无秘密活动不清楚。他们已加入三青团（？），其中一个在少数保守的农民、工人中利用封建关系建立了威信，另一个因找到爱人，不活动了。“女复兴”曾以恋爱手段来拉我们同志，但因失败已走到悲观失望。在歌咏团有一个在我们的领导下的青工，较和她接近，曾以歌咏团名誉在厂外出风头。

国民党在厂内无党员，只是在斗争中，商务馆印刷工人领袖胡坤（即吴金山，是大革命以后的叛徒，现是国民党员，又是朱学范的徒弟），以积极帮助斗争的办法（经济的较少，介绍找朱学范、许世英、吴铁城、杜月笙等的关系帮助调解斗争）来拉我们同志加入国民党、三青团，做朱的徒弟。朱学范自己在出国时也曾打电话给张总经理，责备不应压迫工人，但他们的活动没有什么收获。

托派，在厂内也无托匪，最初在斗争中帮助英国人佛氏温（印刷业工会顾问，美西报职员）、马超凡（叛徒，印刷业工会交际部主任，后被开除会籍）二人，曾一面找政府调解关系，另一面代表印刷业工会向资方进行调解。其次是拉拢马、佛二人来找我们同志，以帮助有功自居，企图拉拢我们加入反印刷业工会的运动。德国人（不知名）坐在大洋房内，以大政治家自居，大概是托

匪领袖，曾通过一被解雇工友以同乡关系，来找我们同志到他家去谈话，打听工人斗争消息，表现〔示〕能有帮助。帮助、拉拢的手段不成功，最后采取敌对态度，公开在其机关报《战斗》上大事〔肆〕攻击我们把持工会，并秘密破坏——以工人名誉〔义〕自居，秘密写信大骂杜月笙是流氓，并说工人的请愿运动是纪念十月革命节的示威。大约在印刷业工会下的报馆工友有七百——八百人在托派的影响下，中华书局的工会无托匪影响。

朱学范及杜月笙在工人中的影响小得可怜，大多数工人认为“朱是卑鄙的，在上海出卖邮务工人爬上去的，拜他做老头子是梦想”，认为“杜是出卖工人的流氓头”。

10. 工人的认识及情绪。绝大多数工人对抗战是积极坚决的，而且是赞成共产党的主张。在苏联进兵波兰、德苏协定的问题上，大多数的工人（可以看报纸的）不同意苏联和德国一样。在捐款问题上也有大多数工人拥护分一半给八路、新四两军（特别是新四军活动地区的工人）。在“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问题上，有的工人骂“说毛的口号是防〔妨〕碍统一”的那一个人是逆流。在工人中的活动分子约一百多人，在这一百多人当中，大部分以为自己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了，看苏联影片《今日之苏联》，〔看〕《社会主义讲话》。极喜欢听苏联故事的有五百——六百人（我们党能完全掌握无问题的有五百——六百人，包括活动分子在内），痛恨国民党、反对汪派，痛恨资〔产阶〕级，喜欢苏联的有大多数工人。

一般环境的补充：

1. 印钞票的工作，本来大业公司占第一位，商务占第

二，中华第三位，大东第四位，但从宋子文下台，孔祥熙上台及法币政策宣布以后，中行钞票即在中华印，交通在大东印，中国银行的给申江印（中华印钞票是全部印，其他是在外国印一部分），商务、大业只印邮票。这样，中华居第一位，商务变成第二位，大业第三位。这是表明他们之间是有竞争的，有矛盾的，但他们对工人是一致的。

2. 监督王瑾士是杜月笙的徒弟，这也可说明他们关系的密切。

3. 从上海来的工人，是长工的除有房子住而外，另加工资十元。除这一部分长工外，其余的工人（约一千人），每天除工资补津贴两顿饭，有时也有房子住。在上海时，不论那种工人均不供膳宿，只有印钞部的检查科工人有一顿午饭吃（也是为着回家去吃，怕时间赶不上，因中午只有半小时休息），其原因是因为工人对于香港气候的恐怖，资本家如没有这部工人是难得去找工人（已经有技术、有训练的、可靠的——通过封建关系找来的、训练过二、三年的），所以就优待一下。

4. 罗费奎日愈反动化，其原因是上海厂的损失、教科书的销路成问题以及因为大城市的沦陷、各发行所受的损失等等。

5. 出店工人（多是广东人）因为不是技术工人，散漫，工作不规律化，和外地工人的语言又不通，同时他们自己又认为不是工人，在生产上不占重要地位，工会的斗争和他们的关系又少，所以他们在斗争中是中立的。这部分的工人多半是因为失业，一时无办法而将此作为渡过难关的场所，其中成分复杂：退伍的兵、高小毕业的、小店员

职员，高中毕业的也有。对这部分人因和其他部门的工人接近的机会少，较难进行工作。

6. 学徒多半与工头等有浓厚的封建关系，他们多依此关系吃饭，所以封建观点浓厚，即是〔使〕满师以后，也是如此。不过在满师以后也有觉悟的。学徒的生活是不正轨〔规〕的，有时只赌钱，看踢球，看电影，他们在斗争中是无作用的，无所谓参加不参加，他们只看看热闹，有时也讲句把反对资方的话。

7. 九小时工作制，英政府虽无明文规定，但认为是合法的。英政府还有明文规定，女工工作不得延长工作时间过下午七点钟以后。但实际上，各厂工作时间的无限制的延长，只有中书和商务是九小时制（多半是较小的工厂无限制的延长）。

中华书局香港分厂工人统计表

抗战后的中华书局香港分厂（一九三九年八月份以前的统计）

职别	工 资		人 数		工作性质	备 注
	高	低	男	女		
铸版	36	26	5		月工	
铅印	36	28	40		月工	
浇胶	34	0.5(日)	3		月工一人	
零件	34	28	5		月工	
彩印	36	26	40		月工	包括落石及橡皮轮转机
切纸	34	28	2		月工	
装订	(?)	(?)	40	120	男月工， 女件工	

纸栈	42		1		月工	
书栈	(?)	(?)	10	30	男月工。 女日工。	二青工系沪姚公记
铁工	65	10(生活 费)	3		月工	学徒
电工	36		1		月工	工作忙时雇临时工
木工	38	0.8(日)	15		月工	日工均系长期临时工
出店	0.5(日计)		80?		日工(即 临时工)	即杂务工, 分配于 各部门
学徒	16元	10	20		三年满期	分配于各部门学习
加印	0.14元 (每千)		87		临时件工	附设于加印课
检查	34	28	12		月工	
照相	60	(?)	6		月工	
制版		(?)	5		月工	
雕刻	300	0.8(日)	66		月工	内有日工13人
电镀	40	0.5(日)	50		月工	均系足球大王. 小 部分系日工
印 书 部 大电 机	40	0.4(日)	540		日工	
小电 机	0.8(日)					
轧纸	0.6(日)	0.4(日)	180		日工	
湿纸						
烘纸						
材料	0.7(日)	0.6(日)	15		日工	
检查	0.6(日)	0.4(日)	120	200	日工	
号码	32	1.0(日)	30		月工	小部分日工
补票	32	1.0(日)	17		月工	极小部分日工
凸版	34	26(日)	40		月工	
衬纸				30	日工	
水汀		0.4元(日)	2		日工	
总计		男1435 女380		共1815人		(1941年忆记)

一九三六年十月份以前的香港分厂工人统计表

职别	工资		人数		工作性质	备注
	高	低	男	女		
铸版	34	26	3		月工	
铅印	34	28	25		月工	
浇胶	32	0.5 (日)	2		月工一人	
零件	34	28	2		月工	
彩印	34	26	20		月工	包刮(括)落石及橡皮 轮转
切纸	32	28	2		月工	
装订	(?)	(?)	30	80 粵	男月工 女件工	
纸栈	40		1		月工	
书栈	(?)	(?)	6		月工	
铁工	60		1		月工	工作忙时雇临时工
电工	34		1		月工	工作忙时雇临时工
木工	34	28	2		月工	工作忙时雇临时工
出店	0.5		10	粵	临时短工	即杂务工人, 分配于 各部门
学徒	16	10	15?		三年满期	亦分配于各部门学习
总计	男120		女80		共计200人 (1941年忆记)	

第二部分 支部工作

I、支部的建立、发展、巩固、现状

1. 建立。(1) 支部开辟前的环境：资方对加印课（共六十——七十人）几种压迫——开除工人，机器油减少，擦机器的布减少，喝茶的茶杯、茶壶不够，激起加印课工人的自发斗争。在斗争中，部分工人了解到有组织的必要（当时大部分的上海工友到香港不久——在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日前已全部搬到香港）。(2) 组织上的准备：起初是在袁心德的领导下组织读书会（一九三七年八月），当时最活动的是周小鼎、夏国钧、浦润泉、张泉龙、吴秀远、蒯长发（都是加印课的），除此而外还找到其他部门的工友：朱复、沈彬森、庄茂荪（他们三人是和以上六人较熟悉的），张泉龙在广西中华分厂做工时参加民族革命大同盟认识了袁心德，这时即是经过张去找到袁的，找到袁以后组织读书会，当时只有蒯靠不住，他一人没有参加。到年底成立工友社，计划出版《工友》，同时读书会也发展到十一人（也即工友社的社员）。(3) 开始入党的人：朱复（初中生，从前是学徒，已满师，补票股长工，经常看进步的书籍、杂志，武进人，表面跳[调]皮，实际上有秘密的工友社的活动，能力强，现在是总支的组织部长，当时朱、浦、夏三人除工友社的活动外并有印刷业工会的活动），大约于一九三七年底、一九三八年春最早入党。第二个大概是夏国钧（加印课工人，高小生，经常看书，并有丰富的社会经验，表面沉静，耐性好，南京人，

三十岁，现总支书记)。第三个是浦润泉(苏州人，当时只有二十岁，很纯洁，忠实，喜看进步的书，和张泉龙到广西作[做]工时一起入过大同盟，当时领导人即袁心德)。第四个是沈彬森(无锡人，当时二十三岁，高小生，刚满师的学徒，补票科的工人，喜看进步书报，很镇静)。第五个是周小鼎(加印课工人，经过夏介绍入党的，正式的是袁心德介绍的，一九三八年七月二十一日入党，总支宣传)。和周同时入党的有缪俊成(无锡人，凹版科工人，初小生，喜看书报，曾参加工友社，经朱复介绍入党)。(4)支部正式建立大概是在一九三八年七月以前，周小鼎同志加入时，与浦、缪三人共编为临时小组，起初与袁发生关系，组长是浦，这三人正式于十二月在朱复的通知下过小组生活，选小组长浦。(5)当时的问题：本来袁心德(上海复旦或者暨南大学学生，在广西从事大同盟的工作，一九三七年夏天到香港。老婆朱兆真即姚天珠，原在上海参加CP，后来也在广西参加大同盟，表现投机，和国民党、社会民主党海外政治关系都有来往。朱在一九三九年离他到上海做工厂工作，比他进步。袁表现不满意党，抑郁不得志，在横的关系中散布怀疑党(路线、政策、停止发展党的决定……)的空气，表现英雄主义，和廖承志同志有直接关系，又和陈铭枢等有关系，是开辟中华支部的。于一九三八年七月调了区委周△△来领导支部。民族革命大同盟是社会民主党领导的组织，袁的问题可问吴有恒同志。(6)支部建立时的负责人：朱复大概是书记，夏国钧及沈彬森大概是干事，浦润泉是交通干事(与区委联络)。广州失守前没有区委。

2. 支部的发展：(1) 发展到顶多时，在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一共三十二人，内中有四人是上海总厂转来的关系，另有一人是本市文化支部转来的，连输送出去二人及开除的一人，共三十五人。起初无党的组织时的活动分子，只有蒯（落伍，腐化了）、吴秀远（与张泉龙在广西参加过民族革〔命〕大同盟，落伍了）、庄茂荪（消极了）三人未入党，其余都入党了。(2) 发展的方式、发展步骤：第一，看对象在斗争中是否坚决积极以及和资方的关系。第二，作个别谈话，谈斗争的实际问题及对阶级的认识，在谈话中看他的了解如何，同时启发他。另一面给工作让他做，工作是在群众中推销《工友》、《待人接物》，帮助募捐，做执行工会决议的模范，同时介绍书报给他看。第三，继续谈话。不过更明显的谈到政党及阶级的问题，确定他可靠以后，他又有要求加入组织时，即要他写申请书（内容与他在谈话中的了解一样，对民族战争问题也谈到，但没有阶级问题那样的深入）。要写申请书时，有的对他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有的说可以找廖承志等说法。第四，先在支部研究申请书，通过后区委批准时即正式吸收入党。手续：填表，有的举行仪式——宣誓，均无候补期。(3) 吸收入党以后，有时就进短期训练班，否则进行个别新同志的教育，不一定马上编小组，个别教育者是介绍人或支干，这种教育只是有意识的注意去做，没有什么计划。(4) 发展党员的偏向：①过于重视文化水平，认为要可以看书看报的有文化程度的才能入党，忽视文盲及识字较少的。②所谓群众中积极坚决的分子是指工人中最优秀的最高度的少数可靠的群众领袖——条件很

苛刻，忽视了多数能入党的分子（关门的严重倾向）。第一种偏向后来已渐克服，第二个偏向注意着的时候，巩固党的决定已下来，一九三九年八月以前，当时只注意进行深入的普遍的教育，可以入党的很多，但决定不大量吸收，只个别吸收（个别吸收的是在巩固党决定以前，已要求入党并申请书早已送上的三人）。③发展慢的原因：以上偏向，只在斗争中注意去发展。

一九三九年七月成立总支以前有五个小组，这时共有三十个同志，加印课、检查课、粤语各一个小组，凹版课二个小组。七月成立总支，每个小组变成分支，每个分支只有支书一人，下面无小组，只有检查课分支除支书直接领导数个同志外，另有一小组。

3. 巩固党（从一九三九年八月）：在八月得到区委巩固党的决定以后，总支委决定在将发动的斗争中来考验每个同志。

巩固的结果：开除冯胥平（黄埔生，因反蒋被捕入狱过，本来是照像画图的技术人员，在中书港厂是凹版课日工，原来困难于领导，只与区委发生个别关系，原是国民党员，当八月斗争时，因他英雄主义，怀疑香港党是托派，无能，只相信毛泽东，对加入了香港党表示惋惜，只信北方党，没有保留余地，于一九三九年十月开除。同时他早已脱离组织。开除前，已尽量说服解释，区委三次有命令叫他去谈话，他均不去，也不提意见，最后只得开除了）。开除以后，冯没有什么活动，对党没有什么妨碍，他准备离开香港。支部曾以此问题去教育同志，克服王嘉生（检查课分支书记，初中生）、张秉儒（是三分支内党

员)受冯影响的英雄主义。

在巩固工作中,除以上所说的以外,无其他问题,只在组织上巩固,并主观上认为本支部是无问题的。

4. 组织现状

(1)总支委共五人(都是群众领袖):

书记:夏国钧 组织部长:朱复

宣传:周小鼎 副书记:沈彬森

总支干:钦家俊(上海附近的人,上海组织转来的,凹版课工人,高小生,较冷静,在一部分工人中有威信,理论基础相当好,但讲不好)

夏是工会组织部长,党团书记,出席香港政府及资方谈判的正式代表之一;朱是工会组织部副部长,群众大会的经常主席;周是党团干事,工会宣传部长,加印课的代表,印刷业工会宣传部副主任(朱、夏、周均是印刷业工会的执行委员);沈是印刷业工会的执行委员,中书工会中的检查课代表之一,工人中的理论家;钦是凹版课的代表之一,参加工厂斗争委员会委员。

支部一九三九[年]三月为加强领导,支干改组:浦调做小组长,周小鼎(原是小组长)、郭子瑛二同志提拔参加支干会,与原有朱、夏、沈三人,共五人。支书:夏,组织:朱复,宣传:周,沈、郭帮助工作。

同月成立党团,书记:夏兼,干事是周兼,另提拔朱申臣参加,一共三人。

一九三九年七月因成立总支(为加强领导,而组织又已扩大)。总支书仍是夏,组织仍是朱复,宣传仍是周,副支书:沈,干事:钦家俊(郭调任粤语分支书)。

总支一直到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周离开时未变更。

(2) 分支书：(1) 检查课分支书：王嘉生(无锡人，性急躁[燥]，有工作能力，一九三九年春入党，本课代表之一，在群众中的威信相当高，斗争委员会委员之一，出席政府正式代表之一)

(2) 凹版课分支书：赵锦昌(绍兴人，上海组织转来的，有点傲慢，乏耐性，和钦家俊一样在一部分群众中有威信，参加斗争委员会)

(3) 凹版课分支书(第二分支)：余东明(上海组织转来的，很和气，在部分群众中也有威信)

(4) 加印课分支书：浦润泉(是小孩子，死看书，爱好钻研，和群众关系不多，但也不错)

(5) 粤语支书(在出店工人及广东女工中的)：郭子瑛(九龙文化支部转来的，是工会的文书，不是工人，很和气，和群众的关系做得好，有十二分勇敢，是高中生，小学教师)

分支实际等于小组，只有检查课除分支书外，有一小组长胡廷良(铸版工人，刚满师的学徒，高小生，勇敢，后来和气，和群众的关系好，工作积极，一九三九年八月以前入党)

(3) 党员统计：加印课分支党员四人(支书除外)都是技术工人，高小程度二人，初小程度二人，都很积极，其中一人是纠察小队长，一人是交通队队长，一人是交际团团员，余一人有时参加交通队，和群众关系好，斗争时是加印课工人宿舍负责人，参加过工友社的工人。

非党干部约有一百多人——二百人。

检查课分支党员二人（除了支书及小组长），都是技术工人（二人是电镀课的），都是高小的，其中一人是电镀课工人代表，一人是在群众中关系是好的，隐蔽的，是加印课工头的亲弟弟，最反对其兄的。

四一分支党员三人，都是技术工人，高小的二人，（略识字的一人，其中一人是纠察大队长，一人是出席政府正式代表之一，又是印刷业工会执行委〔员〕兼组织部长，一人是中书工会宣传部副部长。

四二分支党员三人，都是技术工人，高小二人，初小一人，一人是纠察副大队长，一人是歌咏团员兼交际团团员，一人是在部分群众中有威信的，是隐蔽的，是上海组织转来的。

粤语分支党员男女各一人，一是出店，一是装订工人，高小二人，其中一人能画，女党员是工会妇女代表，男的是隐蔽的，和群众关系很好。

以上所举是编好的，以外尚有五人在受训，还未编入支部，其中的二人，一是工友社社员、歌咏团团员、交际团员，另一是纠察队队员，和群众关系都很好，其余的情况不明。

只有张泉龙、浦润泉参加过民主革命大同盟，其余都是工会会员，多数是参加过工友社的。

大多数党员能写文章，在壁报、《工友》及工会刊物上投稿。

（4）党员的认识：①认为党是工人自己的，但不了解其它阶层的人也可入党；②认为统一战线是相互利用，

磨擦的原因是二个阶级；③服从纪律，执行决议，守秘密是做的，了解的；④大多数的同志看民主文艺、中华现代革命运动史，看《联共党史简明教程》的不少，有六人看到《列宁选集》，有几个翻过《资本论》，只有二〔个〕同志识字少，但也看书，女同志看《中国的女工与农妇》……《社会主义讲话》，一般党员都看过了，看张仲实政经书的有八人，有六人参加过中华业余学校的政经研究会。

II、支部的生活

1.会议：（1）总支会议每星期一次，临时会议必要时召集，但未正式召集过，而是找着谈一谈。每次都能开会，人都到齐，有时个别同志迟到，但要在会议上报告迟到的理由，多半是遇着非党员，为着掩护，不便马上到开会地点。开会地点：多半是山上（隔工厂远，是乘汽车去）、茶馆（是广东人吃〔喝〕茶的茶馆，普通话广东人不懂）或有老婆的同志家里。开会时多数在假期，间或也特别向资方请假（到山上开会伪装旅行，因为星期日旅行的人是很多的）。讨论最多最有趣最热烈的是群众斗争问题，不大重视讨论发展党员的问题。讨论时发言都很多，较少的只有总支干。副书记在会议上作过好几次政治报告，总支书也作过一次报告，（多数是区委作，作结论多数是总支书做，关于群众工作的结论多数是周小鼎做。

（2）分支会议：也是一星期一次，在总支委开过后的第二天开，临时会议的决议要得到总支批准才执行。每次开会都有总支委去参加。地点：多半在附近山上或海边，时间多半是在晚上。讨论问题的内容与总支差不多。

(3) 小组会议情形也差不多。

2. 教育。

(1) 总支委本身无学习制度，只自己看书，看不懂的问题，二、三人一起随便谈谈。周小鼎临走时规定每星期开一次会，讨论中国革命运动，刚刚开始这样做，开过二次会，先一人作报告，再讨论，讨论地点在后来总支布置的机关里。

(2) 分支也无学习制度，但自动的二、三人共看一本书，有问题即提出互相问并随便谈，有的党员把自己所看懂的像讲故事一样讲给群众听，听的人很多。后来分支大概也随总支建立起学习制度了(情况不明)。

(3) 训练班，区委办的，地点总支找。每星期二、五讲课，内容是组织问题及统战问题，计划二个月讲完(工厂停工时期，工人可以随便出去)。受过训的十人，五人是新党员，五人是在早入党的(训练只此一次)。从前受过训的，总支委四人，分支书一人，党员一人(这六人受训时也是刚入党的时候，受训时间约共二十小时，《论政党》前一部分)。

(4) 个别教育：党员入党以后，介绍人给他讲怎样做共产党员的问题，怎样做党的工作。

(5) 教育无检查(有计划的)，中央决议案只有看，只有执行，无讨论。

3. 自我批评：

(1) 主要是在开会的尾巴进行，有时也个别的谈。(2) 分支同志有一次批评总支干不大接近群众。(3) 主要在批评与群众关系(如群众散漫问题)、要注意的问题或生活上问题(只批评过一个同志受训、开

会时打喝岁〔瞌睡〕，做新衣服出风头）。张泉龙同志偏重在学习，也受过同志间的批评。耐性不够的二个同志，也受过批评。（4）多数大概接受了，少数的要经二次解释才有效——他们强调自己的个性不易改。（5）每次会议的尾巴都互相找批评的材料。

4. 党费：不论收入多少，每人每月都是交零点五元，有时需要特别费，同志们自动捐（如办训班）。

Ⅲ、支部的经常工作

1. 工会群众工作，发展党，推销介绍书报，无形的教育工作及宣传工作，收党费。

2. 工作上的问题，随时遇着即随时讨论随时解决，即随时实行，预先是无计划的。

Ⅳ、秘密工作

1. 缺点：（1）袁心德调了以后，副支书沈把党的一些问题（如巩固党的决定）和袁商量。（2）同志们口头上经常讲术语，但群众也是讲术语。（3）当局虽确定工会里有共产党，但不能确定谁是共产党员，因为进步的工人太多，连复兴社员也可能被当局怀疑为共产党。（4）党团和总支是混淆的。

2. 当时提起的注意：（1）不做笔记，不用文件；（2）路上不互称同志，不讲党，而讲学校；（3）出去开会，身上先检查干净；（4）到开会地点的途中遇着熟人，还能应付（绕道、支唔）；（5）〔开〕会议时有人来则胡乱谈或唱歌……；（6）知道总支办事处的，无党的命令

不准去；（7）不准不括〔刮〕胡子，不剃〔剃〕头，不洗衣服。（夏国钧在上海时亲眼见过清党的，对这些问题是了解的）

3. 暴露程度：（1）二个侦探经常追过周小鼎。（2）夏、朱复、朱申臣（党员、工人正式代表），香港政府注意的。（3）沈彬森，厂方最注意，香港政府还调他去问过他和袁心德的关系（因为收〔搜〕查袁的书店时，发现沈的名字。袁被收〔搜〕查并被捕时，张秉儒同志因去买书也同时被捕，因是小孩已放出，缪俊成因也有名字在袁处，也与沈一起传去问过话，但均未说是共产党员）。

第三部分 党团

I、历史

1. 一九三九年三月，为着巩固一九三八年十二月斗争的胜利，同时为着今后加强对群众斗争的领导而建立党团（当时党已扩大了，支部工作也加多了）。党团第一次负责人，书记夏国钧（兼），干事周小鼎（兼），和朱申臣（工会总务部部长）。当时，虽然有支部又有党团，但实际上只是二个不同的会议：一个讨论群众工作，一个讨论党的工作。第一次党团只开了几次会就停顿（约只存在五个星期），其主要原因是当时没有斗争，虽有发展群众组织及群众宣传教育以及和外界的联系的工作，但支部又讨论起这些问题来了，等于党团与支部合一。并且朱申臣在党团会议上打喝岁〔瞌睡〕，工作不积极，政治不开展。

2. 第二次党团。一九三九年八月为着应付新的斗争及

公开与秘密的划分，又成立党团，负责人：书记夏仍兼，宣干周仍兼，干事冯胥平（在群众中是政治家的风格，已开除了。在群众中有信仰，有能力）。当时决定夏、周不参加支部生活，但夏经常向支部作报告，支部工作实际由沈负责并兼负宣传工作。一九三九年十月，当斗争尚未完成时，因冯被开除，党团又垮了，实际又与总支合并，当时总支的中心工作又是群众斗争问题了。

II、党团的成绩

第一次党团——工会从九百多人发展到一千一百多人，计划过工人子弟学校，成立图书馆，布置了精神总动员大会，未成功，布置主持了三月斗争纪念会；给保育院举行了义演（是在纪念“五·一”），出版了四月三十〔日〕的纪念特刊，向资方捐钱办学校，并捐书……。第二次党团——布置领导了八月的斗争（当时党团分出，周又去领导保安公司的斗争）。

III、党团和支部的配合

党团的意见经过支部的审查，同意以后，即通过群众团体去公布，如支部不同意，党团放弃意见。支部对群众工作有决定，即通知党团执行。配合上未发生冲突。第二次党团较第一次党团在公开与秘密工作的分开上已进步得多了。但区委有关于群众工作的决定，即直接通知党团实行，另一方面也通知支部配合。党团实际只是支部的一部分。

第四部分 群众工作（包括统战工作）

I、群众组织，见前。

II、群众斗争

1. 自发斗争：第一次是一九三五年八、九月，因为反对工头克扣工钱，加印课一百五十五人用偷钞票的方式实行反对，结果工头被开除，但工人也被解雇十七人，同时停工时未拿着津贴，以后的工资每千张零点一六元了（加印课是印钞部重要的部门）——在上海总厂。第二次是一九三七年春，仍是加印课因失去一张钞票（资方阴谋），资方要开除蒯长发，资方停工，六十——七十人反对开除，并如果厂方停工要求发工资，结果由工人培〔赔〕赏〔偿〕，厂方保证不在〔再〕发生同样事件——这时已移到香港了。第三次是一九三七年九月，因厂方宣布四个条件：（1）延长夜工时间六小时为九小时，（2）增加生产量百分之二十，（3）取消每月申工（两天），（4）取消奖金。临时短工、检查课及凹版课的上海工人约七百多人罢工反对，结果坚持了十天，厂方将〔让〕上海总厂工头汪宝祥乘飞机来港调解。工人方面因凹版课工人与工头的封建关系，部分先行复工，内部分裂。最后资方让步一小时而复工（王嘉生在这次斗争中因怨愤而图自杀，未果。王后来入党了）。第四次是一九三八年一月，因为资方强迫工人签定新的契约。其主要内容：（1）取消供给膳食住宿；（2）承认永久临时短工；（3）不得享受一切权利（假期津贴，特别假期川资及解雇金等）。工人七百多，

最初实行和平交涉，到三月十一日实行罢工，包围厂方主管机关，封锁前后厂门，截断电话、警钟，威胁工厂。司理周开甲亲笔签字承认长工为先决条件，其余条件继续谈判。三月十四日资方宣布关厂，向政府控告工人代表四人领导罢工、威胁司理，并公告限期三天将契约签订，否则作为自动解雇论。工人坚不复工，在香港印刷业工会帮助下，向政府申诉请愿，继派代表往广东省政府省党部请代表出面调停，后因省政府代表卑鄙，只得接受香港政府劳工司毕达氏的调解，结果胜利了：（1）承认为长工；（2）例假日给津贴；（3）永久供给膳宿；（4）每二年得回家一次，给津贴并有川资；（5）契约定期两年，劳资双方同意才能续订，解雇时给解雇金两个月；（6）长工权利限于契约范围以内。斗争一直坚持到五月十日复工。

这次斗争的特点：（1）全体性，主要的是七百多临时短工，实际上有一千多人；（2）组织性、自动性、计划性，当时朱复已是共产党员；（3）奠定了工会的基础；（4）奠定党发展的基础；（5）促成了工人的团结（没有上次的分裂）；（6）斗争是由自卫而进攻（从三月十二日到五月十日的工资是发的）。

这次是自发斗争的第四次，同时也可说是自觉斗争的第一次。

在这次斗争以前，已有工友社的秘密组织及活动，（在这次斗争之后，开始进行公开合法的工会组织，并于八月成立。

2. 自觉斗争：第一次（也可说是第二次）是一九三八

年十二月二日开始到二十二日结束。(1)斗争的起因：加印课玻璃窗坏了一块，大风吹进来，印钞票时，钞票给风吹起，所以易于印坏。工人继[连]续印坏了三张，资方要照累进罚金制罚金。另一方面，在此以前，加印课工人满了二年的期限，要求发川资回家，资方不允，这是当时客观原因。(2)斗争的开始：十二月二日下午，因工人通过公务长交涉印坏钞票不能负责而无效之后，本课工人实行罢工，资方即把材料等收起来，工人便正式罢工。理由是：资方封锁原料。至五号，凹版科因工友二人自己吵架，资方借故开除(七号正式宣布解雇)，凹版科工人派代表及纠察队向监督交涉(当时是快下工的时候)，威胁监督签字解雇理由不充分，须详细调查后再行决定。监督一方面向工人讲话，一方面打电话要英政府来援助，到当天的晚上，劳工司帮办张华及翻译一人进来调查经过情形，并进行调解。工友及资方向帮办申诉，帮办当时批评了资方，要加印课第二日复工，玻璃窗要补好，累进制罚金不对，并同意凹版课工友关于被解雇二工友的要求是对的。当时支书及宣干的估计：今夜问题虽好像暂时的胜利，但问题还未解决，帮办是无全权这样处理这个问题的，因为帮办及翻译是很会借这类事向资方敲竹杠的，确定前途资方可能继续控告，[以]关厂威胁。根据这个估计的布置：决定一小队纠察夜间巡察变化(巡察工厂范围)。在深夜巡察中即发现资方秘密出了布告，其主要内容：(1)由常年法律顾问大律师曹善允向香港政府控告工人代表威胁王监督：在解雇信上名字承认解雇理由不充分；(2)而在问题未解决前实行全厂休业，在休业期内

除凹版、加印两课外，其他各部工友工资照给；（3）何时复工，另行布告。并设临时办事处于香港雪厂街大律师事务所（日本领事馆内）。当夜根据这个布告，支部的估计：事态扩大有了新的变化，并临时决定通知各工友在宿舍静候工会决议，不得自由行动，仍应于八日晨上工看布告后回宿舍讨论。当夜即召集群众领袖会议（约六人：二个复兴社员，一个非党干部，周、夏、朱申臣），决定如下布置：〔第〕一，斗争口号：要求厂方复工。在这个要求下，以向香港政府申诉对付资方的控告，争取英方同情至少中立。第二办法：向各界（包括新闻界、职工社团如商务、各工会、黄色工会、各工厂以及各救亡团体：中国妇女慰劳会、妇女兵灾筹赈会（一共四妇社团），香港青年学生界，基督教青年会、香港学生赈济会、青年筹赈会……、各学校，上层名人（包括香港政府华人代表四人，委员长住港代表）：陈其尤、吴涵真（黄克强女婿，中华学校校长）、吴铁城、许世英、陈君葆等）指出事实的经过，并争取其同情与援助。第三办法：即电国民政府，呼吁命令资方复工（以有害抗战为理由），并即呈文各部院及参政院，申诉事实经过并要求命令或劝告资方马上举行复工，以利抗战。对内办法：防备资方分化，加强纠察，并决定各宿舍工友仍镇静应付，静候调动（当夜会议直继续到第二天上午七时前，会议中作政治形势的分析，对这次资方的行动，确定是“三·一四”斗争的反攻与继续，并有改革工资币制为法币的极大可能，估计资方可能在先肃清群众中活动分子并有暗杀可能）。第二天（即八号），根据以上决定，交际（四代表向政府申诉）、宣传（写电

报、拟呈文、告各界宣言……)、纠察、交际团各部分头进行工作，并决定对非劳工团体呼吁，《救国时报》帮助在海外宣传，要求国内报界主持正义。

3. 斗争的过程：八号真正实行关厂，下午香港政府派人来传四代表于九日十时到政府谈话，政府研究了资方申诉以后，表示无办法。国民政府无反映，各报界代登驳斥资方造谣关厂的启事(用中华书局同人名誉〔义〕)，并代发表新闻消息。各工厂(商务，许多小工厂)，洋务工会，珠江日报馆工友，业余联谊社——银行界小职员及华人文员、店员等组织的，晨钟社纺织女工、树缪工人等组织的体育会……来访问，并写信、打电话给厂方劝复工(有一千多封〔信〕)，另一方面自己加强活动。

在七日夜的会议上，强调与资方直接谈判，但资方避免与工人直接谈判，经理、监督都住到六国饭店去了，并散布暗杀朱申臣、黄勤初(非党员)、周小鼎、徐洪俊(复兴社员)、夏国钧的空气，但我们已布置纠察队保护干部。

十五日以前的情形如上。同时在此以前的群众情绪：胜利信心很强，自动派人在宿舍轮流放哨，帮助纠察队监视不良分子的活动(不良分子只是较和资方接近的少数几人)。

至十四号深夜，巡察的纠察队发现资方又张贴新布告，其主要内容：(1)解雇六十九个工友(凹版、加印两课的群众活动分子，复兴社二人也在内)；(2)通告全体工友于十二月十九日复工。当时支书及宣干立刻讨论对策，估计资方斗争的企图更明显更具体：〔第一〕两课工

人先解雇，再继续开刀其他部门的工友领袖；第二，资方必然已得到孔祥熙等的默许及香港政府的同意；第三，必然仍是避免直接谈判，同时进行秘密阴谋活动，分化工人团结，暗杀可能很大。估计群众方面：群众愤怒情绪高涨不可避免，可能会发生意外事件（如杀经理、监督等），长工方面，对复工问题一定是盼望不要，但同情工友斗争行动，而四、加两课以外工友一定会一致行动。布置：〔第一〕，临时通知各宿舍工友看了新布告回去讨论，无工会命令前不得任何行动；第二，加强上次所布置的工作（多了对长工的解释与警告他们的前途的工作）。同时开了群众大会作深入的解释鼓动宣传，给国民政府急电（×①质问性质），加强与外界的联系。十五号下午研究（朱复、沈彬森、夏国钧、朱申臣、周小鼎六人②）应付资方复工问题（最初决定采取厂门外静坐和平罢工方式），一方面继续研究，一方面向区委报告（另一意见是占厂罢工并准备暴动，第三意见是全体罢工——群众的意见）。直到十七号上午四时，最后决定采取占据工厂罢工绝食的方式。区委同意后，支部如下布置：为慎重起见，决定于十八日召集活动分子会议，启发他们讨论应付的办法。以上决定向群众提出，群众拥护，建立工厂内部领导斗争的机关（秘密的，朱复、钦家俊、吴金荣——非党员等负责，他们是未被解雇的），给他们全权，适时提出斗争口号。厂外被解雇的六十九人准备配合厂内的斗争，负责厂外的一切活动，即时帮助厂内解决困难（如衣服、被子、吃的

①此处有二十六字不清。

②原文如此，应是五人。

……)。对厂外建立严密的交通二人，准备传递厂内外的消息。斗争的口号是十四日夜间准备的：“要求厂方收回解雇六十九工友的成命”，这个口号到十九日斗争发动后才改变。

(工作的进行，群众内部多了一个深入的解释工作，对厂外则加强联系，主要的对象放在工人团体上，其他工作与上次布置一样，同时力争厂方正面谈判——十九日以前)。

到十九日上午工人上工，在厂方武装保护下复工(怕六十九人中有人混进去)。当时情形：被解〔雇〕六十九人列队送他们上工，外面看的人不少，形势紧张。厂内发展：第一〔次〕交涉，凹版、加印两课的新代表(旧代表已被解雇)向厂方要求谈判，当时厂方只有公务长一人，回答自己无权利解决，叫工人等王监督来谈。当时两课已处于罢工状态，其余各部也处于怠工状态，提出新的口号：王监督不来不吃饭(等王监督来才吃饭)。于下午二时，王不来，便在大会上宣布绝食，这时厂内各种标语已贴出了，形势壮烈，厂外代发宣言，向各方报道，并要求援助(慰问队)。晚上，洋务工会工人家属老太太队送东西，六十九人晚上秘密送东西去吃，外面的代表仍向政府报道，要求调解(实际上慰问的有香港学赈、洋务工会、商务等。吴涵真代写信给宋子文帮助工人交涉。慰问信、慰问品很多。二十一日，何香凝准备慰问，被宋蔼龄的活动所阻。香港印刷业工会三次受英政府警告不准援助)。

二十日急电国府（以八百绝食工人名誉〔义〕），要求援助，呈文等已呈寄各部院等。

（经济部曾有复电：“厂方如是合法解雇，工人不得借故反对。”斗争后才看见的）。

报界发表文艺文章（因不能明显的宣〔传〕了，《大众日报》曾受政府警告，因登载工人启事）援助，宣传。

工人绝食一直坚持到二十二日下午四时，由劳工司毕达氏及资方经理、司理和工人代表四人在厂内谈判（原来资方拒绝谈判，否认被解雇的工人是合法的代表，但受毕氏的劝解才和工人谈判）。

结果，劳工司宣布：（1）接受劳工司的建议，资方收回解雇六十九人的成命；（2）承认前被解雇二人是合法的；（3）资方要注意加印课玻璃窗的修理；（4）取消罚金的累进制；（5）绝食工友休假二日。最后，劳工司今后经常到厂内巡视，调整劳资双方关系，并劝告双方今后有什么行动，先与劳工司商量。

（停工期间工资已照发，工友也让步——承认二人被解雇是合法的）。

4. 斗争结束。二十日下午六时，全体绝食工友在大会上呼了：“尊重劳工司的调解”、“拥护总经理和工友亲密合作”、“拥护总经理收回解雇成命”、“拥护劳资合作”、“中华民族解放万岁”〔等〕口号，有秩序的整队离开工厂。二十六日便正式复工了，劳工司也有正式布告来（总经理本企图推诿，但正式布告下来了）。在斗争结束时，工人开各界茶话会向各界道谢，发宣言表明自己态度与斗争经过，把慰问品送给香港的广州难民（附有宣传

品)。

5. 这次斗争中和群众的关系：长工（共二百——三百）基本是同情的中立，在斗争中并有送慰问品与怠工的表现。检查科的工友在先已有决定不参加绝食，但他们要求参加，经解释后他们只是怠工、慰问，最主要担任起厂内外的配合工作。出店工人不要参加绝食行动，只要帮忙，他们是帮忙了。女工当时还无组织，是住在自己家里，只经常买东西、派代表来慰问并回家去宣传。

6. 这次斗争的特点：（1）党的领导较以前强，（2）这次斗争是上次斗争的继续，（3）工人这次对斗争的认识比以前强。

7. 这次斗争中的统一战线工作：（1）厂外做得很好；（2）厂内司理朱开甲给我们捧，他表示调解态度；各工头在工人力量下中立；保护工厂的武装（十六个红头阿山，由忠实于资方被宣传争取到中立，晚上工人送东西、贴标语他们已不阻碍）；对公务长进行一些解释工作，公务长曾表示上了资方的当（因留他一人在厂内）；集中力量打击王监督（总经理是不进厂的，当时是争取他谈判并暴露他的罪恶）。

8. 这次斗争的收获（特殊的）：（1）香港工运受了这次斗争影响大大开展；（2）推动了罗费奎客观上由顽固到稍微让步；（3）发展了工会的组织（由九百多人到一千一百多人，长工一部分也加入工会，女工也有一部分加入了），也推动了党的发展（由□□人到□□人）；（4）加印课拿到了打折的回家川资，每人二十元；（5）每个工人发日历一本。

第二次（也可说是第三次）：一九三九年八月七日，因厂方借口印钞工作完毕，宣布解雇印钞部工友一千二百人而宣布休业，全体一千二百工友要求复工，资方动员了六百武装保护关厂，工人表示镇静，不受资方挑拨而进行了和平的斗争，一直坚持到十一月二十三日周离开港时尚无结果，正谈判中。

在这次斗〔争〕前有印钞部电镀科长、短工联合的罢工（短工只十三人（其中党员一人），长工五十四人，并且工头都参加了）胜利，推动了八月七日的罢工。

除以上所有斗争而外，一九三九年九月还领导援助过华艺织造厂及保安防毒面具制造公司的斗争（七月二十四日），两次都失败，是派周小鼎去领导的。

Ⅲ、统一战线工作

1. 争取了司理朱开甲的密切地和工人联系；2. 对经理的经常的争取交际工作不够；3. 对高级职员及小工头是忽视的，只是见了面点点头；4. 在长工中的争取工作是不深入、不切实的；5. 对女工工作没有当成重要工作，只有一个女党员和三十九个工会会员。

第五部分 区委的领导

领导人：第一次是周△△（一九三九年七月前——一九三八年十二月）

第二次是杜△△（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很短时期）

第三次是钟明（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一九三九年十一月）

- I、区委重视这个支部，与支部保持了密切的关系；
1. 每次支干会以及后来的总支干会和党团会议等均参加；
 2. 支部扩大会在区委领导及参加下召集过两次。

II、区委解决一般问题是迅速的（解决斗争的重要问题有特委来参加领导），无不正确的地方，是深刻的（决定问题先经支部讨论，然后区委批准与指示）。

III、区委态度是诚恳耐心的。

IV、处理斗争问题，可以说是让支部独立负责处理（能培养干部独立工作能力）。

V、区委过于信任这个支部的能力（如在调人受训问题上，被调同志说不能分身去受训，区委即不坚决调，认为不训也是可以行的）。

VI、区委能了解这个支部的弱点（如组织观念不强，有计划的经常工作建立不起来，学习制度、教育制度未建立，学习的不深入，教育不深入等弱点），但不下最大决心来帮助克服这些弱点，只注意到并经常来克服。

VII、对支部具体工作的检查不深入（布置工作时只给了原则的指示，但具体布置到下层去的时候，注意检查不够，也曾经有过要检查分支工作的决定，但未实现）。

第六部分 当时的支部工作方针

I、方针的根据

II、方针：

1. 教育：着重加强组织观念的教育并建立学习制度（区特曾提斗争要妥协，但因总支迟疑，重视自己力量而失去宝贵的妥协机会）。

2.群众工作：当时斗争已失去妥协的机会，必须寻求一切适当机会与资方进行妥协（当时罗经理和工人见面并已直接谈判好几次，周司理和工友是保持着密切关系的）。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换了新的区委杨△△，他已注意到深入具体的布置与检查支部的工作，同时在杨督促下建立了学习制度。

第七部分 周小鼎同志对该支〔部〕的意见

I、周小鼎同志对十二月斗争及支部〔工作〕的补充意见^①

关于十二月二日——二十二日的斗争问题的补充：

1.加印课反对累进罚金制有充分理由，当时群众的罢工自由行动虽然是非法的斗争方式，但我们抓住了资方的弱点——封锁原料（钞票），而将非法罢工的斗争方式，一而成为资方封锁原料，这样变成为工人的行动是合法的，是被迫而无工才做的（加印课工友的第一次宣言）。

2.至十二月七日，凹版课工友〔发动〕反对厂方因细故（工人的小错误）宣布开除工友周浩锡、王龙二人〔的斗争〕。很明显的可以看出，它是试探的，而且是有准备的，整个计划要从此后逐步实施的，即逐步肃清工人领袖及活动分子二百余人，改工资币制，取消膳宿的优待条例，瓦解工会……阴谋的初步行动（根据当时的各方面情

^①第一部分至第六部分是1月11日周小鼎谈话记录，第七部分是1月13日周小鼎谈话记录。

报及资方在加印课工友要求回沪川资，特别假期中的津贴的交涉过程中的谈话)。因此，十二月七日晚，劳工司所派的西人帮办及华人翻译(唐)调解结果责成资方于八日恢复加印课的工作，并同意凹版课工友的要求“资方借细故解雇两工友的理由不充分，须详细调查后再行确定”的此一表示。当时很明显的可以看出：(1)西人帮办和翻译没有全权处理这一问题；(2)准备敲资方的竹杠。果然，资方于八日晨三时前后宣布关厂，并公布已由大律师曹善允向华民政务司控告工人代表率工人威胁监督在被解雇工友的解雇信上签字，及分化工人的团结力量，停工期内除加印、凹版两课外，其余各部门工友的工资照给，静候复工通告。

斗争爆发了，资方在抗战严重期中，以关厂威胁工人的手段来进行斗争是危害抗战力量的，这是它的大弱点，然而斗争仍不明显。至十五日晨三时左右，巡逻的纠察队发现厂方又继续宣布“无理解雇工人代表及活动分子六十九人并通告于十九日实行复工”的通告，斗争才明朗化。

根据十五日资方的通告，我们有了如下的估计和决定：

(1)继续宣布解雇工人代表及活动分子六十九人是资方阴谋的更明显、更具体的暴露。它的无理都增加了我之有理，而且在群众面前更证明了我们的估计是完全正确的，社会人士将更多的给与〔予〕我之同情。

(2)困难的方面，厂方的这一行动，是孔祥熙和香港政府事前同意的(国民政府、财部等至十五日仍无复电，

斗争后经济部复电云：如果厂方依照工厂法解雇工人，工人不得借故反对。港政府在交涉过程中表示厂方解雇工人是合乎香港法律的，并且已超出法律的优待）。因此，当时必须尽一切可能的力量，力争资方和我们直接谈判，是解决斗争的关键。然而当时的资方不〔承〕认工人代表是合法，已经避不见面，如果没有强大的力量威胁它，是收不到什么效果的（当时和平交涉已无可能）。因此，斗争的非法性，有理而且又必须避免损失自己的力量，这样一个问题，是厂外罢工和平交涉和厂内罢工或被迫而自卫暴动所不能完成的。

3. 关于十二月十九日厂方正式复工问题的研究。至十八日（星期日）上午，已有如下的几种斗争方式：（1）厂外罢工，进而劝阻全体罢工，进行和平交涉；（2）被解雇者与复工者同时进厂上工，被阻时厂内即宣布罢工，进行和平交涉，被迫暴动自卫；（3）罢工的新方式：加印、凹版两课工友全体总辞职；（4）厂内罢工、绝食，力避群众暴动这一方式是十八日上午×时，支书、组织、宣传（沈、钦、周等）的最后决定采取。

十二月十九日占领工厂，罢工绝食的斗争方式是十八日（星期日）上午钟区委、林特委审查同意后的决定，并决定如下的布置：（1）厂内设立领导机关，由朱复、沈彬森、钦家俊等组织之，并授以全权，适时的提出口号，发动绝食斗争。厂内代表主要由钦家俊（凹版）、吴俊荣（加印）负责。（2）厂外由六十九工友负责一切活动（〔发〕表宣言，联络，动员外力援助慰问、调解……）并及时的解决厂内可能发生的困难，如衣、被、报纸、书籍

……等物质精神上所需要的，以及夜间输送食品；（3）在厂方武装保护复工的情况下，建立与厂内的交通联络。

以上是关于十二月十九日的要求一致复工，要求厂方收回解雇成命的绝食罢工斗争的决定，参加斗争的加印、凹版两课工友七百八十余人，坚持四天绝食，获得胜利的决定。

4.关于这次斗争中争取同盟军的问题，事前亦有较慎密的研究。如（1）长工。当时对长工的估计是可能参加斗争（因为斗争的前途是决定保障权利，反对改革工资币制……于他们的利益是基本上一致的），然而由于长工与资方的关系很密切，动摇的可能性很大。（2）女工。也可能参加斗争，但作用不大（非技术工人。而且地位也不重要），在较强的威胁下的动摇可能性很大。（3）出店。非技术工人，作用与地位都和女工相同。因此，我们的要求是要他（她）们在厂内做经济（物质）上、精神上的援助，他（她）们都答应了而且在斗争中也做到了，如全体趋入怠工状态，派代表买东西慰问，帮助联络厂内外的消息等。

II、我对于工厂总支部党的意见

1.先谈它的优点。中书党在质量上，如：（1）成份纯洁，（2）政治上坚定，（3）阶级意识强，（4）文化水平相当高，（5）以及与群众保持着血与肉不可分离的密切联系，（6）大多数党员在自卫性的斗争中学会了领导群众斗争的艺术等。这些在整个支部工作报告中已经可以看出，我在这里不赘述了（如扩大党在群众中的政治

影响，提高了党的政治威信，提高了群众的政治、理论、文化水平等等）。

2. 这里我只谈它的弱点。在整个支部党的工作看来，总支干还有很大的弱点：第一是组织观念不强，其原因是对党的组织原理了解得不够，以及上级对这一大弱点，虽然已经知道和经常注意这方面的教育，但没有下最大的决心加强它。这一弱点已经使一九三九年八月七日的斗争失去了可宝贵的妥协时机。第二是有严重的左的倾向。其原因是一贯的斗争胜利鼓舞，轻敌和干部的政治生活尚幼稚，加之自己（指支干）对政治问题亦不深入的研究。这表现在斗争中重视主观力量，轻视敌人，以至在一九三八年十二月斗争严重时拟采取厂内罢工，被迫暴动，和一九三九年八月七日斗争至十一月七日厂方宣布印书部复工拟采取破坏其全部生产手段（炸毁机器及工厂），这种严重的左的倾向虽经上级（区委和特委）及时的迅速纠正了，而没有使党受到危害，但这一倾向将经过一个长期的教育过程才能够把它消灭。由于这一倾向的严重性，在支部党的一年多工作中，在四、五次领导群众自卫性的斗争中，已经在香港党的职工运动线上形成了突出，使敌人严重地注视着这股力量的发展，终于最后采取了一举扑灭的一九三九年八月七日宣布解雇全部印钞工友一千二百人的毒辣手段。虽然客观上这些斗争都是被迫应战不可避免的自卫性的斗争（注：这是一个矛盾的问题，希望党能作一详细研究）。此外，如支部党的统战工作以及党的发展和教育问题，没有经常工作的计划性，没有学习制度，教育和学习的不深入等诸问题（上级党部不仅注意而且已经实施了

克服这些弱点的步骤，如学习制度和经常工作制度的建立等），这些都说明了支干的工作经验还幼稚。

至于纠正上述的倾向和弱点，上级党部已经有计划的做了，而且我也深信中书党支部在其阶级觉悟程度的提高和上级党的帮助下，这些弱点和不良的倾向是一定能克服的。

周小鼎于1941年1月13日午

对开展中华书局香港分厂 总支工作的意见^①

(1941年1月20日)

一、对于支部的估计

(一)支部的建立是有思想上、组织上的准备基础的。支部建立时及建立之先，是有群众的有组织的与无组织的斗争的，群众在斗争中，感觉有组织的必要，并且在工人中有优秀分子的组织的活动，例如读书会、工友社及工厂委员会的秘密活动，而工友社在有党员之先，在斗争中取得了领导作用，俨然党的组织一样。

(二)党员的质量：1. 成份纯洁；2. 政治上坚定、开展，阶级意识强；3. 文化水平高（党员都能看书，大部分还能写文章）；4. 党员与群众都是有密切联系的，在群众中都是有威信的，并且有几人还是出色的群众的领袖。

(三)支部是有力量的。支部领导过几次斗争，影响推动了香港的职运，斗争发挥了支部的力量，锻炼了支部。

^①原件未署作者。

二、支部的问题

(一) 关于发展党

1. 支部犯了关门主义的错误。这个错误表现在：
(1) 在发展时，过于重视文化水平的条件，轻视、放弃文化水平低的对象；(2) 发展积极分子的“积极”水准提得过高，而以群众领袖作为发展对象的尺度。因为犯了这个错误，结果从一九三八〔年〕支部开辟时到一九三九年十月，一共只有三十个党员。若不犯这个错误，要吸收一百左右的好对象入党是颇有把握的。另一方面，全厂有二百多女工，但只有一个女党员（女党员周围有几十个活动分子）。

2. 机械的执行了巩固党的决定。以这个支部的质量、环境来说，巩固党的工作固然要做，但是可以继续发展的，但支部机械的停止了发展党；另一方面，这个支部主要应从政治上、思想上来巩固，但支部不从这方面着手，而是以斗争考验同志作为唯一的巩固的方法。

(二) 干部、组织的暴露

1. 因为斗争的突出，工会的一切活动、党的组织已经暴露了，因而资方已采取改雇整批工人的手段来击碎我们组织的方针。

2. 因为群众大多数是左倾的，便迷惑了资本家，摸不着究竟谁是共产党员，但虽只有少数同志被资本家特别注意一点，而并不减轻暴露的危险，因为资方已采取上述的方针。

3. 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是不分开的，这是使干

部、组织暴露的原因之一，例如：总支书记兼党团书记，〔又〕是本厂工会组织部长，又是香港印刷业总工会的执行委员。总支的组织部长〔同时〕是工会的副组织部长，出席香港政府与资方谈判的正式代表之一，及群众大会的经常主席，又是印刷业总工会的执委。而总支的宣传部长，则兼党团的主要干事，又是工会的宣传部〔长〕，加印课工人代表及印刷业总工会宣传部的副主任。另一方面，党团与支部分而又合，合而又分。

（三）教育工作

党员的自修精神是好的，但支部没有认识自修应是这个支部主要的教育方法，支部对于同志们的自修缺乏帮助、计划，更缺乏检查。除此而外，在党的原则的教育方面也是不够的。

（四）支部的群众工作与统一战线工作

1. 客观上支部是把群众工作与群众斗争作为支部的中心工作，因而支部的大部分时间与精力都是放在这上面，结果对于发展党员及教育工作放松，这不能不是一个大原因。

2. 群众工作是很好的：（1）支部完全团结了、领导了工人的主要部分：短工七百——八百人；（2）在工人中有一百——二百活动分子，自己以为是共产党领导的了；（3）在斗争中吸引了生活上较优越的长工（约三百人）及在生产上不占重要地位的、非技术的杂役工人和女工善意的中立（工人罢工时实行怠工），并在精神上、物质上的援助；（4）因支部工作的结果，群众大多数是赞助共产党及八路军的抗日主张的。并且工人的献金，工人

自己主张分一半给新四、八路两军（举例）。

3. 群众斗争问题，约每半年有一次全厂性的斗争，因此是突出了，突出到“全厂赤化了”。固然斗争在客观上是不可避免的，但主观上是要负责的，支部似不善于“妥协”，而只善于“斗争”（在一九三九年八〔月〕七〔日〕的斗争，已延持了几个月，因为支部过高估计主观力量而放去妥协的机会）。

4. 一般的说，支部的统一战线工作是好的，但也有其〔优〕、缺点。（1）优点：由上面可以看出，下层统战工作是好的，其次厂外统战工作也不错，例如在斗争中能得各界及各团体（主要的是工人团体，其次是学生的、文化的团体及报馆等）在精神上、物质上的援助。（2）缺点：第一，对于统战没有正确的认识，认为统战不过是“相互利用”；第二，对厂方也有点联络，但“斗争”多而“统一”少；第三，对于长工的工作做得不够，在斗争中长工的表现虽不坏，并且在斗争后一部分长工已加入工会，但支部没有深入的去进行长工的工作。

（五）党员的左倾

1. 几次斗争的胜利，鼓舞了同志们轻敌的心理。
2.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斗争严重时，支部拟采取“被迫暴动”的方式。一九三九年“八·七”斗争至十一月七日厂方宣布印书部复工时，又拟采取破坏其全部生产手段的方式（炸毁机器及工厂），这是左倾的充分表现。

（六）工作上的缺点

1. 工作无计划，遇着什么问题即解决什么问题。
2. 对中央决议案无讨论、无研究，只有看看，只有

执行。

(七) 区委领导上的缺点

1. 区委过于信任这个支部(在工作上),因而可能忽略了支部的某些弱点(过于信任表现在:区委调支部同志去受训,被调的同志以不能分身为理由不去受训,区委即不坚决要调,认为不训练也是可行的)。

2. 对支部工作缺乏具体深入的检查(布置工作时只说明原则的指示,只对具体的布置,到分支去的情形则注意检查不够,只有过要检查分支工作的决定,但未实现)。

3. 区委能认识到支部的一些弱点,并能注意去克服(例如学习制度未建立),但区委没有克服支部这些弱点的最大决心。

三、今后如何办

(一) 党的组织工作方面:

1. 以这个支部的质量看来,巩固党主要的应从教育上(政治上、思想上)着手。

2. 除巩固工作外,可以继续发展党,但不是大量的。

3. 应将不引人注意的同志组织成平行支部,准备某些同志被资方赶走而长期埋伏,而保存党的力量在该厂内。

4. 党团应健全起来,不应时有时无,并且党团应与支部在工作上、组织上分开,党团与支部只需个别负责人的联系。

5. 照支部的目前状况看来，总支实际上只是一个支部，因为总支以下的每个分支不过等于一个小组，不过为着准备党的继续发展——党员人数的增加。总支是需要的，但总支顶多只要三人负责，以下每个分支人数不得超过六、七人，并且分支只设书记一人。

(二) 教育工作方面：

1. 应把教育工作作为支部的中心工作；2. 在教育中必须纠正党员的倾向；3. 有计划、有步骤的帮助每个同志深入的看书，有问题时可以二、三三人在一起谈谈，更重要的支部对同志们的看书要经常有检查，同志间须要互相督促；4. 除必要外，训练班可不必多办；5. 尤应注意党的原则的、秘密工作的及策略的教育（区委已注意到建立支部的学习制度，但规定每星期开一次讨论会是不适宜的）。

(三) 群众工作与统战工作：

1. 保持过去和群众的联系，加强长工及女工的工作；2. 全厂性的工会的组织可以尽可能的保持着，但应预防环境的逆转，而应在工友中作分散的各种小团体的活动；3. 应尽可能和资方联络、周旋。

(四) 工作要有计划，每时期要有每时期的工作中心。

(五) 群众斗争问题：

1. 过去斗争已经得到一些胜利，今后固然仍是采取防守的方针，但不单与资方斗争，也要与资方妥协；2. 一九三九年八月七日发动的斗争，不应再顽持，要适时的与资方妥协，否则工人定会吃亏。

(六) 区委在领导应上注意的：

1. 不能在每个问题或每个工作上都过于信任支部，因为支部不是绝对健全的；2. 不但要有原则的指示，也要深入的、具体的检查；3. 区委要有克服支部弱点的最大决心；4. 对支部要指示每个时期的工作中心，使支部在工作上走上正轨。

1941 · 1 · 20

1. 不強個個工非上端于前支時。
2. 因支時不與放全由：不與時。
3. 區委前支時為最。
4. 大來必：扶支時要。
5. 工非上表五。

1941. 1. 30

香港青年工作报告

——抗战爆发前后学生、工人思想状况及各团体的组织和斗争经过*

(1941年1月25日)

一、抗战以前的香港青年

在中国抗战以前，香港政府的统治非常严厉，十人以上的集会便认为非法，可以有权予以逮捕，群众完全没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自由，只要你的文字上有团结、组织或什么运动的句语，就会被检去，不能发表。因此，被目为最爱活动的青年都非常沉寂。

由于当地政府年来的提倡和社会上的实际需要，一般青年读英文的风气极盛，英文学校开设相当普遍，假如是英文中学的毕业生，不论在政府机关、外国洋行、百货公司都比较容易找到职业。就算想入工厂（重工业的，如火车站、汽车、电车、船坞等）当学徒，也要你读过几个月英文夜校，才容易入去。因此，中国文的学习，在英文学校里是不被重视的。一般的英文学校也有附设一点中文课程，就是秋水轩尺牍、左传、古文、四书和一些香港汉文、新撰国文等。很多青年从十三、四岁就入英文学校，

①原件未署作者，从内容看，疑是香港市委青年部的报告。

所以一般英文中学生除了能看一些“之乎者也”的中文信件以外，普通的语体文报纸、杂志是看不惯的，实在他们也“不屑”去读，他们读书的唯一目的就是希望能够在政府机关找个职员或翻译的职业（月薪有一百多块钱）或在外国洋行里找个书记或会计的位置（月薪五十元以上）。有的买办阶级的儿子毕业以后，就继承父志，过其舒适生活。所以他们的读书生活非常单调的，除了死读书以外，报章杂志一概不读，国家大事好象与他一点关系都〔没〕有一样，课余时间经常也去看看外国电影，作为学习英语或模仿外国人生活的帮助，一般的课外读物是一些恋爱的小说、电影杂志或其他一些低级趣味的文章或图画。另外，还有一部分名为比较活动的青年，就是一些体育青年，他们参加了各种体育团体，打球、游泳、旅行是他们唯一工余或课余的娱乐。因此，香港青年很受国内特别是广州青年的歧视，而称他们是“番薯仔”，这是从“番书仔”（读外国书之意）的音得来的，是没有思想的意思。

但是，“番薯仔”并不能代表香港的青年，“番薯仔”还是香港青年的少数，因为英文学校在香港虽然是普遍，但是英文中学只能占全体中学的三分之一，要是在小学里面的比例那就更差得远了，广大的中文学校的青年学生，由于亲身看到受帝国主义的压迫，内心里是蕴藏着“无可告诉”的民族仇恨，他们热望着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可是在帝国主义高度的压力下，没有活动的可能和机会罢了。特别是那些失学、失业的青年，想继续升学都不能偿付起这样昂贵的学费，想找职业维持生活，但是到处都是“红须绿眼”的势力范围，只要你偶有一点“冒犯”，就要你没有立锥之地，

因此，民族解放的种子，早已在他们的心坎中种下深厚的根基，只要稍为有点雨露的润泽，立刻就可以发芽生长的呵！

自从“一二·九”学生运动以后，香港学生的思想受了很大的影响，韬奋主编的《大众生活》的销数突破以前一切杂志的记录（数字不详），普通的卖报摊都有代售。进步的书店扩大了，而且也增加两间，巴金的小说也得了一些青年的欢迎，一些学生也开始看报了，民族觉悟的种子开始在少数青年的心坎中发芽生长，十个人以下的研究性质的小集团不断的开始在产生。党的八·一宣言的传播，团结了一部〔分〕左倾青年，香港青年的政治活动开始了：在香港抗日救国会的五百会员中，就大部分是青年工人，学生成份就占五分之一以上；课余社、凡声社（约有二百以上会员）这样带有政治性的半公开团体，大部分也是青年，领导成分都是学生（主要是失学的青年学生，刚刚离了学校的）。在宣传抗战，在宣传统一战线的主张中，他们是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香港青年是前进了一步了，但是与国内、广州学生比较起来还是远远的落在后面。当全国性的学生运动风起云涌的时候，全国青年掀起了无比的救亡情绪，但是香港青年参加救亡活动的还是寥寥可数，全港约有五万以上的学生，参加救亡团体的只是三五百人，大部分青年还是过着麻木不仁，醉生梦死的安乐窝的生活，这个比较告诉我们一些什么呢？（一）它说明了殖民地与半殖民地的区别。香港是帝国主义直接统治的，中国是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而且帝国主义间还存在着深刻的矛盾与斗争，统治阶级统治力量是有不同的。（二）香港青年思想的落后，

说明了英帝国主义愚民政策与奴化教育政策的成功，愚昧的封建文化与封建力量被利用，深深阻碍了青年思想的发展，虽然这个落后是暂时的。（三）香港只是华南一个政治与经济占很重要地位的都市，而不是一个文化的中心，全港只有一间大学，而且人数也不多，一般文化运动是很落后，与广州、上海是有鲜明的区别。

二、党的青年工作的建立

抗日救国会的活动，准备了青年工作开展的初步基础。香港抗日救国会（简称抗救）组织于一九三七年四五月间，主要负责人为一失了关系的老同志洪标（现在是广东高雷特委书记欧阳同志）。抗救的组织完全采取了第二党的形式，是一个群众性的秘密组织，每一个参加的会员，都要通过非常严格的小组生活，会员成份五分之三是工人，其他是知识分子，领导成份可说完全是失学、失业的知识分子，会员总数约有四五百人，有二个外围的半公开的组织：课余社（约有八十多人）、凡声社（约有八、九十人）、大众读书会（约有五、六十人），成分包括青工、女工、学生、教员等，领导成份皆为青年学生。抗救的主要工作就是宣传抗战，拥护中共等。每逢任何的纪念日，工作就特别紧张：印传单，发宣言，在通衢大巷的墙壁上，经常都会发现“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八·一’宣言”、“实行对日作战”，有时个别的还有反英标语与传单的散发，因此，引起香港政府严重的注意与搜捕。但是，与其说是抗救的主要工作是放在宣传鼓动的上面，还不如说把最大部分的精神放于“反对中华民族革命同盟”的斗争上

面，不论在何时何地，只要和革盟分子碰了头，大家就必然勾心斗角的论战起来，因此，小组的工作不是讨论开展组织及群众工作为中心，而以研究与革盟斗争方法方式为主要内容，所以在实际工作上，并没有很大的开展。由于抗救这种严重的关门与盲动路线错误的严重存在，虽然在宣传抗战、扩大党的影响是发挥了一定程度的作用，可是很快的招致严重的打击和破坏。在当年“九·一八”纪念的秘密群众大会，全体参加纪念会的八十六人就全部被捕，主要负责人都受残酷的拷打与驱逐，抗救领导机关就无形解散，救亡运动中的悲观消极情绪弥漫一时，各种群众组织，除了个别的缩小组织，减少活动而仍然继续存在外，其他的皆自动解散，停止活动，香港最初掀起的救亡运动就告一段落。香港抗救整个活动过程，虽然只有四个月，但是它却给今后青年工作的开展准备了初步的基础：

(一)“八·一”宣言和其他抗日救国主张的传播，团结了部分左倾青年，推动了他们参加了实际的救国活动。(二)在工作中锻炼了它的干部，这些干部部分的成为今后转向公开工作中的主要骨干。(三)扩大了一些半公开的群众组织的活动——如课余社、凡声社，这些组织直到现在也是成为青年工作中的主要团体。

抗救的破坏，一方面产生了群众的悲观消极的情绪，做〔造〕成了香港的救亡运动中的劫后萧条的现象；另一方面却又更加激起了群众的反英活动走向更加严重的关门主义、盲动的道路。第三党人张梅生就利用这个机会自称为中共两广特派员，收拾了抗救剩下来的一些干部，如抗救组织干事曾眉、青年部干事应子真等，成立中共香港临时

市委，并组织了香港抗救临时指挥部，拼命反对华南区总部，拒绝了与中华民族革命同盟合作，于是救亡工作者间就形成了两个系统尖锐的对立。

在全国救国会华南区总部（当时主要负责人是何思敬）名义的推动与活动下，进行了所谓香港救亡运动的统一运动（其实不过是救亡分子的统一运动），成立了香港各界救国联合会的筹备会，学生救国会亦于一九三六年十一月间成立了筹备会。南总遣派代表吴有恒（当时是党员）参加指导，成立时约有会员七、八十人，正式推选朱能、钟明、林剑鸿为常委负责人。会员皆要过着严格的组织生活，并须参加群众活动。当时的在学救领导下的群众组织有课余社（其后改为新生社）、民生书院学生会、××二号院的读书会、青年学习社等。每个外围组织的学生都建立了自己的小组，成为领导的核心，同时为着争取群众，扩大组织，开拓自己的活动范围起见，组织动员了二十个会员参加了基督教青年会主办的援绥运动大会，组织采访队，出发各校宣传，在结束会当中推动了青年会成立三百多人的歌咏班，这是学救会采取公开合法活动形式的初步尝试，并获得了相当大的成绩。这些运动引起了张梅生等的嫉视和激烈的反对，并且企图打入学救会，夺取学救会的群众。为着拒绝他们的企图，于是学救会通过了会员资格的一章外（在校学生才能参加学救会，保持学救会成分的纯洁），去争取广大群众的了解与信任，因此就引起了以应子真为首的张梅生冒牌共产党员与学救会分子的斗争，这个斗争延长至一个月之久，由学救会转到各界救联筹备会，阻碍了学救会群众工作的开展与内部组织生活停

顿的现象。结果以学救会分子的让步而告暂时终结。应子真等参加了学救会后，因一系列的斗争或明或暗，无时不已，我们于是由会章问题的退让而采取另一方向的攻势，在群众面前揭破张梅生的冒牌实质去教育群众和争取应子真等的觉悟，企图彻底的打倒张梅生，使他在香港救亡运动中无卖弄伎俩的转圜余地。可是当时学救会的发展已达饱和程度，群众因为惧怕这个秘密的组织形式而不敢接近我们，从此以后工作便没有多大的开展，而渐陷于停顿。总结起来说，学救会的组织是继承了以前抗日救国会的关门主义与宗派主义的传统，重发〔犯〕了群众运动的秘密路线的错误。但是另一方面，它显示了群众运动由秘密转向公开的前途，并采取初步的尝试而教育了自己的干部，准备了与训练了一些干部，成为以后转向公开工作的基础，并在学救会的活动中给了党建立的可能。

党的第一个学生支部的成立：一九三六年暑假期间，香港救亡分子中也有中国共产党党员的活动，主要的以华南区救国会总部的名义出现，十月间发展了第一个学生党员（香港华侨中学赖石昂同志）。不久，吴有恒同志以南总名义参加学生救国会，十一月间继续吸收了钟明、林剑鸿入党，正式成立香港党的第一个总支支部，以石昂同志为支书，以整个支部的同志参加了学救会的活动。在支部中，一开始就非常注意思想意识的锻炼与自我批评精神的提高，讨论与研究过方志敏遗书与举行过方同志的追悼会，在观念的提高与气节的教育上收了相当大的收获，经常讨论研究群众工作与反对张梅生的问题，并注意进行吸收党员的教育，所以一般来说当时的支部生活还可以说是

健全的，这就使这个支部成为今后开展青年工作的核心，并且很快的扩大起来。

三、青年工作由秘密到公开、非法到合法的转变

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以后，巩固和平、实行抗战的口号团结了广大群众，抗战形势日渐形成，同时在工作中深深觉得没法开展的苦闷，为打破当时的死寂现象，争取公开利用合法就成为我们群众运动的新方向，提出党关于解散救国会的决定后，支部就决定实行解散学生救国会，把所有的干部分配至公开的团体工作，除了原有的学校组织与青年团体外，还决定〔成立〕另外一个学生团体——学生生活社，并在大众日报出版《学生生活》周刊，作为教育广大学生的园地。

解散学生救国会，组织公开的学生生活社，这种由秘密到公开、由非法到合法的面向广大群众的工作路线，将必然会遭受严重的关门主义者应子真等激烈的反对，认为我们是动摇、逃避。经过了一个月的说服过程，才克服了群众的这种过右情绪，以至最后的争取了应子真等脱离了张梅生的圈套而重归与我们合作。

自此以后，党坚决执行了公开合法的群众运动的路线，在香港青年群众中活动的除原有各校外，校外的学生团体有：学生生活社、青工团体、课余社（改为新生社，抗战后最〔近〕改为晨钟体育社）、凡声社（改为青年同乐社）、船坞青工的自强体育社，均进行正式的备案成立，而成为香港政府正式承认的合法团体，青年活动便从

狭隘的圈子里进而取得了广大的园地。

四、学生工作与青工工作的分开

抗战以前，由于工作范围的狭隘，青工群众还占少数，所以青工与学生经常混合组织，而以学生为领导。抗战以后，香港学生赈济会成立，学生工作得到空前发展，而形成一个独立系统，因此与青工团体明显的分别起来，由成份的区别、组织的区别以致工作方式方法的区别，所以青工与学生的工作也就分别起来作报告。

五、香港学生运动

(一) 香港学生的一般概况 (抗战以后)

1. 学生统计与学校统计

学生统计表

学生总数	英文	中文	性 别		程 度		
			男	女	大学	中学	小学
110,000	20,000	90,000	70,000	40,000	1,200	20,000	88,800

学校统计表

学校总数	英文	中文	性 别		程 度		
			男	女	大学	中学	小学
1,200	300	900	800	400	6	130	1,064

说明：①这个统计除学校总数、学生总数比较准确外，其他都是一个估计。

②这个统计是按一九三九年年底的实际情形而做的，到今天已是一年多，学生数目可能比较减少。

③抗战以前英文中学是会比中文中学已经是少一些的，抗战后特别是广州失陷后，这个比例大大发展了，中文中学就比英文的多了两倍。至于大学，香港原有只是一间官办的香港大学（英文的），其他五间都是中文，广州失陷后才增加的。小学则中文的占大多数，英文的占不足十分之一。

④香港最大的学校约有差不多一千学生，至于十人八人的学校也很多，私塾也占相当数量，在一百以上。

2. 学校的种类、〔课〕程与制度

香港一千多间学校中，依其性质的不同大约可以分为官立的、宗教的、各党各派的、汪派托派的、营业性质的五种。

香港的官立学堂，是香港政府教育司直接领导的，一切行政都依靠英国条例，是本港最有地位的学校。除了香港大学外，有两个中学：英皇中学、皇仁中学，共有一千六百多学生（都附设有小学的）。有二间师范：汉文师范、女子师范，一千多人。二间专门学校：工程、机器的，此外还有六间附设初中的小学堂，有二千多学生，分布于全香港各区域。这些学校制度非常严格，超过十三岁的学童则不准入小学，而且学费也相当的昂贵，小学至初中一律每月五元，高中的一律每月十元，还有花十多块钱的体育费、图书费等（每年一次）。所〔以〕贫苦的家

庭，是不容易负担的。香港政府又为着欺骗群众，束缚学生的活动起见，每年又特别招考各校（特别是义学的）贫苦学生，只要有学校保荐就可以予考，及格的可以免费打入官立学堂五年，每年的成绩优异学生（大概每班六十人有两个学额）可以免费一年，初中会考与高中会考成绩好的，可以免费升入中学或大学，这些免费学额的多少，又由其本校本班的全学生平均分数而定，这样就可使其互相监督，自然而然的就非死读书不可了。至于学校的课程，除英文本科外，还有中文一科，四书（所谓经学）是其主要科课，小学的还有读香港汉文——是教育司直接审定的，是宣传帝国文明，鼓励尽忠皇上的工具，师范当然更有五经等古典文的东西。教师呢？大部分为英国人，教中文的都是什么太史、举人之流，或者是官立师范毕业成绩优异的学生，薪水每月由八十元至五百元逐年增加，满二十五年的还有所谓吃长粮（退职后照原有薪水百分之几发薪），所以这些教员都是腐化堕落的帝国主义的帮凶，个别的也会有些民族观念，但是为着吃长粮，所以也只得有口难言，敷衍了事，见了外国校长则恭维不暇，站在学生面前则威风凛凛，师生关系从〔来〕也是很少好的。至于那些外国校长呢？一般的都会说几句中国话，在学生面前总是摇头摆脑的哼着“礼义廉耻，国之四维”的那一套的四书的句语，在训话中经常“劝勉”学生要保存国粹，发扬中国古代礼让的“美德”等，俨然好象中国最好最亲切的友人，可是假如学生有什么不服从，不尽忠的事情，如反对教员，不同意“长者”的意见而提出反驳时，则必然的以大逆不道、流氓捣乱的罪名而被开除，一点也没有情

面通融的，英国绅士的殖民地文化教育的系统从此也就可以得了个梗概了。

宗教学校，在香港是占着相当大的势力，全部私立的英文中学，特别是女子英文中学，差不多是基督教和天主教包办的，虽然也有个别的例外，可是也会与教会取得非常密切的关系的。这些学校经费非常充足，而且得着香港政府津贴与支持，学校制度与官立学堂的一样，不过入校年龄没有严格的限制，课程就以圣经为必修课科，圣经考试不及格，就得留级一年了。这些学校的学生多为资产阶级与买办阶级的儿女，因此在生活上是洋化与奢侈的，它与官立学生不同的地方是前者以四书为麻醉学生的工具，而后者则以圣经罢了。除了中学外，宗教在小学校里也有深厚的基础，其中天主教是比较薄弱一些，基督教的圣公会义学总共约有三十间，学生有二千人，大多是贫苦家庭的子弟。他们一面办学，一面传教，通过学生关系，和他们家庭取得联系，这种办法是相当能够深入下层群众的。此外还有孔圣会的义学，数目与圣公会的差不多，课程就是以四书为本，教员都是那些腐化了的圣贤之徒，经费比较差，不过是每年都会得到香港政府很大的帮助的。在广州失陷以前，官办的与宗教的学校是占着绝对的支配地位，不过后来由于广州学校大批的迁港，内地化的学校和香港地道的比例起了变化，因此，宗教学校的地位稍为有点降落罢了。

各党派和学校，是以国民党的为最多，都是参加了香港华侨教育委员会，有的还在国民政府教育部或广东省教育厅备案了，当然的一切学校，首先必经香港政府教育司

注册才能设立。因此，这些学校的课程与制度除了规定香港汉文是必修课程和一切教职员均须经过本港教育司注册外，一般的都是按照中国内地的规定，所有的中学生皆要参加广东教育厅主持的全省会考的。国民党中又以CC系的力量为最大，差不多的包办了侨教会，以黄淑陶为主要负责人，黄是华侨中学的校长，其他主要的学校还有华南中学，校长是郭肇华。郭与黄同为CC系中人，并且他们每人都有相当的势力，不过为着争学生的关系，两人间的利益矛盾素来是很大的。其次是蓝衣社，以文化中学为根据地，负责人为罗伟疆，与广州教育厅最接近，与民范中学的何础非常密切，形成一个广东教〔育〕厅的系统（CC是国民政府教育部的），蓝衣社与CC系又从来未见得接近。此外，西南派也还有点力量，以区芳蒲为中心，有德明中学、导群中学等，他们都是各行其政，与CC、蓝衣社都没有什么联系。除了国民党〔的〕外，还有国家主义派的梅芳男女中学、西南女子中学，以陈铁一、张澜州为负责人，不过没有什么很大的活动。广州失陷以后，却和汪派接近起来，进行和平妥协的宣传活动。以上这些学校在香港都有相当历史和地位，是香港本地的和最大的中学（中文中学）。至于广州失陷以后，由内地搬来的学校数目虽然相当多，里面当然也有各党各系的力量，不过由于人地的生疏，一时也难发挥任何的作用，与香港原有的系统隔膜还是相当的大的。

汪派托派在香港除了以南华、天演、自由三报为主要宣传工具外，还直接的控制了两个学校：仿林中学、华夏学院，还有三间小学。樊仲云、胡兰成等托派都是这些学

校的教员，公开宣传拥护汪逆的主张和诬蔑中国共产党，不过对于学生还没有进行组织活动，课程与制度一般的与其他学校没有两样。

最后是营业性质的学校，以小学为最多，也有一个部分的中学，大部分只是在香港政府教育司立案，一切都按照香港条例开办。这些学校的学阀，一般的没有什么政治头脑，对学生不负任何的责任，只要能够弄钱，什么事情都可以干的，这些中间力量的态度如何，完全要看我们的策略争取是否正确为转移，而且目前顽固分子和汉奸托派已开〔始〕注意这个工作，这是非常值得我们注意的。

3. 学生群众的×生活与出路

在香港学生群众中按照出身不同、生活不同和要求也就不同，大概可以分为这样的五种人：死读书的、享乐主义的、信仰宗教的、爱好体育的和救亡分子，其中是以爱好体育的为数最多，是学生群众中最基本的部分。

死读书的学生数目并不很大，他们大多数是出身于中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家庭，用尽了九牛二虎的力量才能把子弟送进这些学堂，抱着最大的希望要他们毕业后好找个比较舒适的职业维持家庭的生活的。另一很小部分一些封建的资产阶级家庭的儿女，家教非常严格，要他们努力长进，将来好继承父业，光耀门楣。由于这个原故，所以他们都是一辈子过着读书的生活，除了有时看看外国电影外，就简直没有任何的课外活动，他们的健康是非常值得注意的，在一个初中一年级里面，三十二个人中，就有十四个不戴眼镜不能看书的学生，每年考试以后都有学生死亡的事实。一九三八年中会考完毕后就死有两个成绩

优异的免费中学生和一个大学生（因积劳而死）。这种现象还得到学校当局的奖励与表扬！他们之所以要这样拼命的干，简单的目的就是希望毕业后能够生活，能够找到政府里面的职员、洋行的书记或中国海关的职员这一类的职业。事实给他们的答复却常常毕业就是失业，因此部分的在毕业以后有着怀疑学校教育和不满意社会现状的情绪而容易倾向革命。虽然这些分子有着各种的弱点，特别是死板的公式主义与容易冲动，不过一般的是学生运动中全部产生的来源。

享乐主义的以一般英文中学及大学的为最多，他们差不多都是买办阶级和资产阶级家庭的儿女，一切的生活与职业都是早已由家庭安排妥当，毕业后就是继承父业，过其“二世祖”的生活，因此他们除了必要的上课外，就是研究怎样享乐，生活方式是完全洋化的，外国电影院就是他们第二学校，从那里模仿着外国的风俗与习惯，跳舞会与野餐会是他们休假日的生活内容，对于中国前途从来没有任何的关心，因而对于中国文与中国人也就从来没有任何的兴趣。但是由于年来的抗战，本港救亡运动的推动，国内学生迁港后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提高了他们的民族意识，而且部分的动员参加了救亡募捐的救国工作，比较接近了广大的群众，有些人生活上也起了一点变化了。这些人的特点在于有着很好的上层社会关系，特别是香港政府的关系，懂得外国文，便于作上层工作与国际宣传工作，好出风头，容易接受大家的推动，因此，只要能够好好的注意争取，在工作上影响他们进步，对于争取学生工作的能够继续公开合法存在是有着很大作用的。

信仰宗教的，主要是信仰基督教与天主教的学生群众，当然的以教会开办的中学学生为基础，特别是英文女子中学，他们的出身一般的是中产阶级以及部分的大资产阶级，他们的特点是站在人道主义的观点上，比较多的参加社会服务的工作，因此他们的生活，是比较其他同学活跃而集体，主要的活动园地是基督教男女青年会，在教会学校中大约有六分之一的学生参加了青年会或青年会在各校校内的小组织，如中青团、华光团、友光团，在这些小组织领导之下，也开办一些平民义校，星期休假的时候喜欢野外活动，如旅行、野餐、游泳，而且都举行各种的集体游戏：唱诗、音乐等。但是不论任何的形式都带着浓厚的宗教意味，所以很少的非宗教的同学和他们玩在一块儿的。假如是天主教的就稍有点不同，比较没有这样活泼，过着比较恬静的多少有点虫类似的生活，虽然这并不是青年人所喜欢的，不过由于受着天主教的习惯所影响而至这样，他们爱好音乐和比较花多一点时间在研究圣经的上面，换句话说，他们比基督教的学生更顽固、更落后。基督教与天主教的同学大家又是不合作的，在宗教问题上可是互不两立的，一般的日常生活，是接受享乐主义者的一群，不过，又有点不同，是比较他们更会虚伪、更会讲形式——什么道德、什么规矩、什么对得起上帝等，总比他们讲漂亮一些。由于宗教在香港的地位和他们的出身家庭的各种关系，找职业是会比其他的容易一些，宗教宣传也容纳了一部分青年，抗战以后进行了一些募捐服务等工作，他们都表示得相当热情，与我们在工作上在一个时期相当接近，而且有着相当社会地位，活动比较容易，是我

们统一战线工作中不可缺少的力量。

体育青年除了个别的女子学校外，一般的散布于任何一个中文或英文的宗教或非宗教的中学，占着全体中学生的半数，多数出身于中产阶级，特别是小资产阶级的家庭，日常生活是活泼而集体的。除了上课外，体育会就是他们的家庭，休假日〔就〕旅行、球赛、服务等，总是忙个不停的。他们大部分都已参加了各种各样的体育团体或小组、救伤队或童子军等，与上层青年比较没有联系而与部分的宗教青年和广大的中下层群众接近，换句话说，就是比较接近社会。他们的出路，除了一些洋行或一些商店的职员外，大部分的都是转入工厂学习机械、无线电等工程技术，还有小部分转入国内军事学校、航空学校等。这些人的特点在于爱好体育，爱交朋友，尊重友情，互相帮助，同时他们一般的还比较看报，有着较高度的民族情绪与国家观念，不满学校教育，还肯做事，喜欢社会活动，所以他们是学生群众中最基本的部分，是工作中争取群众、团结群众最主要的对象。

救亡分子：香港学生里面的救亡分子包括了三方面的人，宗教的、国民党的和在我们党领导下的。关于宗教的，前面已经说过。国民党的为数并不多，实际上也没有怎么很多的工作，因此这里说的救亡分子主要的是指在我党领导下的学生救亡活动分子，这些分子全部是在抗战浪潮中涌现出来的。抗战以前的分子，差不多都全部动员到国内去了，他们都是出身中下层家庭。学校里积极分子，大多数是从死读书的圈子里转变过来的，主要的是散布于中文中学，在初期的时候，英文中学也有不少，他们

非常不满意于这种学校教育，因此，一般的来说是非常轻视学校功课与学校当局的，当到必须的上课时间内，教员一面授课，他就一面起草和考虑各种工作计划，考试就是他们最大的苦头，假如是在课外时间，差不多全部时间是放在团体里面，很多时间，几天几夜都不回家，街边的下等饭馆就是他们最好的最适当的临时食堂，这种现象已形成一种风气。所以总的来说，他们的特点是：（1）积极、热情。这个作风不特是一些比较认识清楚的中文中学的分子所具有，而且影响了所有的参加工作的公子哥儿，有时为了工作，两天两夜没有睡觉都不以为苦。（2）虚浮幼稚。因为不满意学校教育与封建家庭，于是就逃避校内的下层工作，脱离校内基本群众，甚至脱离家庭，而个别的出来参加课外的各种一般活动，追逐各种数目字的成绩而夸耀于人。由于自己是比较进步了，就不惯家庭的封建落后，而经常不愿意回去，这种倾向常常使他们的工作脱离群众，脱离社会，工作空洞而不切实。（3）瞧不起理论的实际主义。因为香港的救亡运动主要地是跟着抗战形势转变而突然扩大起来的，简直是没有理论上的准备，因此养成了这些干部满足于为抗战形势所形成的一些实际工作的成绩，不肯力求长进，不注意理论上来提高自己。

整个香港青年学生的出路问题，抗战以后，特别是广州失陷以后，更形严重的一方面由于广州一带内地的失学失业青年都涌集于香港，另一方面由于政府当局的压迫青年、限制青年和工商业，因战争影响，而低层青年的出路更少，这种转变形的发展做〔造〕成香港青年的失学失业的日趋严重现象，经常的在任何的报纸、通讯里面都可发现救国

无门、或经济压迫的呻吟与呼声，有些希望到新四军、八路军或陕北来，又以路途遥远，困难重重，只得望洋兴叹。因此青年的出路问题，特别是香港青年学生工作中的一个最严重的问题。

4. 殖民地文化教育与香港学生思想

殖民地文化教育的实质，主要是依靠于封建势力的利用，在尊重中国文化、保存国粹精华这样的名义下，去散播孝君敬长的思想以达到他的奴化全港青年而为其使用的目的，因此，什么太史、举人等的仁义道德之徒在香港是被尊为无上学者，堂堂的香港大学——香港的最高学府的中文学院院长就是赖际熙太史，后来又因为学生的消极抵制，只得一个学生上课，才不得不换上许地山。女子师范校长的罗仁伯，汉文师范校长的李景康（香港只有两间师范），都是满口仁义道德的老朽腐儒，香港教育司以下的整个系统，如视学官等从来是找不出一个懂得语体文的分子，教育注册首先便要讲解四书、古文，因四书、古文早已列为一般学校的必修科。不特是官立学堂是这样，半数以上的中文中学和小学也是这样。因此香港教育就是这一贯的处于这样睁不开眼的乌天黑地的状态中。利用封建还表现于对封建组织的支持上，孔圣会就在香港政府的帮助下而发展起来的，建立了不少吸引青年的东西，什么孔圣会体育部、孔圣会球场、孔圣会救伤队等，居然堂哉皇哉，几千年前的孔老夫子也披上现在的外衣来了。为了更进一步的毒害青年起见，在政府的直接的津贴下建立了几十间的孔圣义学，组织了他们的讲经队，经常到各地的孔圣堂去讲经说文，无恶不作了。至于洋封建基督教与天主教的提

倡，那更不遗余力了，全港的天主堂与耶稣堂全港约在一百五十间以上，大部分都是附设了义学和青年部。所以，孔子、耶稣、圣马利就成为香港政府欺骗与愚昧香港青年学生的三个帮凶，在几千年后的今日，居然行尸走肉的散播其毒素了。

其次，殖民地的文化政策还表现于夸大宣扬帝国文明以模糊青年学生的国家观念，这个精神贯彻于任何的教育内容上面。学习世界史地，首先就要熟悉英国的统治地的广大，英皇的英明能干和对各殖民地人民的“仁慈爱护”。总之，英帝国的强盛与文明就是一切教材的中心内容，香港汉文就是里面的标本教科书而列为各小学必读的课程。特别是利用电影，成为一个主要的辅助方法，什么《英官六十年》，什么《威多利亞皇后》等都是半价优待学生。什么《火烧芝加哥》，什么“古庙笳声”等宣扬殖民地人民拥护帝国和帝国官吏的廉洁爱民，为民众而牺牲，都成为学校教员的教育材料，在日常生活中，在电影娱乐中，天天的、点点滴滴的在贯〔灌〕输青年学生的奴化思想，好成为帝国的顺民。

再其次，殖民地的文化麻木还表现于：一方面严厉的压迫与统制，另一方面则假仁假义、欺骗与引诱的手段上。在香港，除宗教的御用以外，青年都绝对没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自由，任何的号召团结，或青年组织的文章，皆列为非法，出版一个很小型的报纸，也要二千元与“敦实商店”的担保，组织什么学联会等，那实说不上。至于学校训练和课程内容的各种限制，前面也已经说过了，可是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因为他懂得香港学生

的幼稚，用这办法可以使他们无法站得起来，但是这只是会使对立形势天天的尖锐，并不能真的安心的统治下去，所以又想出种种的象是爱护青年、关心青年学生的办法，比如设立各种免费学额，使贫苦青年有升学的机会，设立各种义学收容失学儿童，介绍毕业生〔到〕政府、警署、洋行各地任职等。这样一方面好象摆出关心青年的假仁假义的面孔去欺骗、去引诱学生；另一方面，在这一圈套里面又装上了封建迷信的内容去麻木青年，为自己培养干部，这种两个面孔的办法，都是香港政府一贯来认为得意成功的绝妙作品。

因此，香港政府的殖民地文化教育的内容，是封建与奴化的结合，而以封建为主，手段则以压迫与利诱两者的兼施而以利诱为主。由于这种政策实施的结果，确实的收了相当的效果，而统治了差不多一百年，从来没有听过香港学生有任何大规模的反抗行动。当广州学生运动蓬蓬勃勃的进行着，香港学生还是如痴如醉的在甜睡着；当到香港海员大罢工的时候，香港学生大部分如大祸临头的回乡避难。而这成绩的中心特点就是做成香港学生思想上非常的落后，从没有自己单独的出版过学生的刊物，每天看报的学生就会被认为怪人而得到企图升官发财的讥讽，吟诗作对之声遍地皆是，个别话剧团体的组织尤其是一九三八年以后的新事情。但是，假如根据这种现象就认为香港学生真正的没有国家观念，真正的已成为英国的顺民，那就是莫大的错误。抗战以后学生运动的空前蓬勃的兴起，就可以完全证明了这个观点：任何的一次动员组织采访队，各校同学自动的参加的就在五百人以上；史良在香港对学

生发表演说，只是一般的就登报，听众就超出一千五百人，来自香港的任何角落；学赈会的组织不到一年，参加学校单位就有六百间，分布及新界最偏僻的地方，这都可以说明了香港殖民地文化政策的破产。几十年来香港学生的民族观念并没有因此而息失，相反的广大的学生群众更会因此而进一步认识了帝国主义的面目，汇成一道民族解放运动而伏流在那里，埋藏着对统治者的仇恨，这种现象不只是一般的一些中文中学上面，而且是很快的影响到香港政府直接领导的学堂和宗教学堂的资产阶级儿女，香港学赈的〔组〕织单位就包括了大部分的英文中学校，执委学校单位在一个时期内这类学校就占三分之一以上。基督教会开办的圣士提反女校素来是被人称为小姐学校，在一九三八年就发生了〔因〕反对外国教员的无理打骂〔而〕全班罢课，要求撤换这个教员。素有名望的拔粹书院也是有名的公子学堂，在一九三九年就发生了反对校长委任一个敌视中国学生的反动青年人为学生领袖，高中毕业学班全班放弃香港毕业会考而罢课，坚持了一个多月。这样带有自发性质的行动，完全更进一步的证明了香港殖民地文化教育政策的破产，自己所信任的、直接领导下的学校学生也成为自己的叛徒，因此香港学生“五·四”运动的警钟已响亮的敲起来了。学生群众的觉悟不止停留于一般的中文中学学生的圈子里面，而且很快的得到官办学堂的大资产阶级的儿女的响应。在不久的将来，坚持抗战到底、反对封建教育的口号等会成为香港学生群众行动的光辉旗帜。

5. 一般的学生团体活动

香港纯粹的学生团体的组织，在香港学生赈济会产生以前是从没有过的，因此，在这里所提到的团体都是一般的青年团体，或大部分是青年的以青年学生为主要的这样的社会上的团体。

(1) 香港义勇军(军事的)救伤队与童子军(半军事的)这些组织，都是香港政府直接组织的战时的后备队伍，或平时用以帮助行政和维持社会秩序的组织，一切组织形式与具体管理完全依由英国系统和英国人直接负责。香港义勇军约有两千多人，一切武器装备完全依照正规军，平时一般的不脱离生产，每月大约有一次至二次的大演习，每年检阅一次，参加有各种国籍的人，中国青年约占三分之一，里面学生约占十分之一，大部分职员，参加以后要订立三年服务契约，在这时期内不准擅离队伍，假如是发生战事，要完全听任香港政府的命令与调动。香港救伤队与救护班是属于万国红十字会系统的，队长为莫理逊，英国人，全体队员(临时性的训练班不算)约有一千人，都是中国青年，学生约占三分之一以上，在好一些学校设了支队，是完全服务性质，新参加的要经过二个月的训练才发给制服、证章，成为正式队员，退出是没有很大限制的。每星期上操二次，如发生事故时，如火警或其他各种集会等，指定出发服务，也有〔到〕各地体育会、游泳棚等值日出勤。童子军的组织分为海上与陆上两种，就中国人与外国人来说，中国人的约有五百人，主要的是学生，在各校也设立好一些的单位，女学生参加的也有很多，一百人左右。参加了以后要受训练，有各种各样的行军、露营，因此，很受到一般学生的欢迎(男女是分开组织的)。

以上的组织，只有童子军是纯粹青年的组织，其他都是一般的组织，都是受到香港政府正式合法的保障与奖励的。参加的学生青年，大部分差不多全部是英文中学的学生，这部分学生与广大体育青年有最密切的联系，他们参加这些组织的动机与童子军救护队的一部分，主要的因为喜欢这种形式的集体生活，爱笑爱闹的。其次，也有一些是为着社会服务的心理。至于参加义勇军的人，那就最大多数都是洋奴，为了保障已在政府机关或洋行的职业（未毕业的青年是为了取得这些职业），为了取得英帝国主义的青睐，这些人就不惜舍身冒险效忠皇家，这些人是甘心在英帝国主义的卵翼下生活，没有什么民族意识了，也许里面有个别的比较好的分子，然而那是很少很少见的事。

（2）基督教青年会是香港历史最久的一个青年组织，一九三九年的会员总数约有四千人，大部分为青年人，学生约在一千人以上，在香港、九龙都建筑了很宏大的会址，有自己的各种球场，都设立了青年宿舍和义学。由于它的社会地位与工作方式的活泼，虽然在香港的这样囚境中也团结了部分的青年，进行过好一些的青年救国工作，也曾组织过一队回国服务团随军服务。

在青年会中有很多各种各样的小组的，临时的有歌咏班、口琴会、盆栽会、司机训练班、论文比赛、书〔法〕比赛、灯谜比赛、演讲比赛和各种球类、游泳比赛等。每一个小组都有好几十个人参加，不过结束以后，参加的群众就这样星散了，只能使群众对青年会留下一点印象罢了。除此以外，他们也建立了些长期性的组织，男青年会是基本的，有一个中青团，大约有三、四百人，以

××人为单位，分为很多个中队，成为男青年会进行各种工作主要的资本。参加的非常严格，要经过二人以上的介绍，还要经过四个星期的考查才能正式加入。纪律也非常严格，每星期都有集会，并进行各种经常的训练，如时事报告、问题讨论、常识测验（内容不详），找着了群众参战的要求，进行了各种野战游戏和一般童子军的技术训练。还进行过什么锄奸演习，办法就是派出好几个人，要每个人在街上跟踪一个街上的人，由上午几点到下午几点全体回来后每个人报告自己侦查的结果，并作出〔对〕那个被盯人的了解的一定结论。这样就俨然好象国内服务团的一个组织，只是名义不同而实际内容完全一样的，主要的是以基督教会学校特别是英文中学为基本单位。这个组织在校内是自由参加的，它与中青团不同的地方就是前者政治化，而后者却是宗教化。全体团员约有二千多人，不信仰基督教的一般是不允许参加的，活动也是比较一般化，不象中青团那样干部训练的形式，举办义务夜校是它的经常工作，什么冬令会、夕阳会等也不时的举行，至于各式各样的球队，那就不用详细的说了。

在一九三八年中，基督教青年会看到香港学联会的发展，为着和我们争夺全港学生运动的领导权起见，又特别组织了基督教学联会，共有十多个单位，主要的是基督教男女中学，中文的和英文的中学都参加。这个组织的发动并没有经过很好的准备，参加的代表一般的不明白组织学联的意义的，不过只是利用宗教的关系和群众的风头心理而鼓动起来的（是在一个冬令会中提议通过的），他们除了提出团结基督教的学生的目的以外，并没有什么明确的

纲领，其实这个所谓团结就是为了对付学联会，争夺全港学运的领导权，因此，好一些参加的学校都采取了观望的态度，主要的活动是依靠了中青团或华光团等的干部。他们也曾在学联会中闹财政问题时，发出了主要搜集学联会所有的“秽史”，公开起来打倒学联会。可是，其实学联会并没有什么真的秽史材料可以给他们当为口实，另一方面半数以上的学联单位仍然是学联会的会员，并不同情这个行动，因此，这个事情不久便属于过去了，学联便变成了一个空头的组织，没有什么经常的工作，只是一般的举行一些旅〔游〕行或募捐工作吧〔罢〕了。

青年会虽然处于香港的环境，有着种种客观条件的限制，而对于宣传抗战的工作也进行了一些，在工作方式上有许多地方是比我们高明得多，他能通过各种各样的曲折的方式来进行这些工作。当一九三六年底，抗战形势尚未形成，绥远战争正在发生，他就第一个的发动了援助绥远被难同胞的募捐工作，这个工作的实际意义就是援助祖国抗战，激发青年的爱国观念。但是，以宗教的慈善工作的名义下而去进行而得到合法公开，同时为着深入校内进行对广大学生宣传是会引起香港政府的严厉干涉，因此，却又提出组织各校募捐探访队，由各校学生自动参加，或派出代表参加，以出发各校收集×金的名义来实行召集学生，公开宣传抗战的工作，这些工作都取得了很大的效果。为着团结参加探访队的各校积极分子而召集会议是不会得到政府允许的，因此，又用探访队慰劳会的方式来担起这个任务。在会议中公开发表演说是不可能的，他们又用别一办法来代替——加上祖国被难同胞忏悔的节目，一

开幕以后，把全部灯光熄灭，幕徐徐拉开，布上祖〔国〕原野的景象，上面挂着一个小小的红色灯光，然后以一个同学擅〔颤〕动的语气讲话，大意谓祖国同胞是怎样的在受难在痛苦，而我们香港的学生还是这样处于这样快乐环境里面，我们对不起祖国，对不起这些被难的同胞，我们今天特向祖国忏悔，在忏悔中要怎样去弥补自己的罪恶，而提出好一些学生的任务，这样就结束的一篇号召全港同学起来抗战的演说辞。虽然在坐的有好多个密探，也无可如何，在座群众在这样的情况中，是受了很大的感动，全场情绪是相当高涨的，这就可以看出青年会在工作方式方法上，是相当有办法的，这不过是其中之一的例子。很多的宣传工作也是在各种各样的××的宗教花样掩护下进行的，由此可以看出青年会之所以能够团结好一部分青年，不是完全没有理由的。

香港青年会的青年部负责干事是卢秉良和何德安——都是香港以前香港抗日救国会会员之一，因此在一九三七年以前这个时期，一般的表现还是很好的，在他们领导下，青年会是进行了不少的宣传鼓动抗战的工作，在整个香港学运上是有着它一定的作用，不过很多方式上还严重的保留着关门主义的传统，如中青团等。卢秉良这个人基本上算得一个进步分子，不过有点投机，英雄主义的观念非常浓厚，想把自己真的做成为全港青年的领袖。一九三八年年底，国民党开始在香港组织三青团时，黄淑陶第一个就拉拢了他，因为黄与卢前一两年是师生关系，而作为国民党进攻我们的可靠阵地，但事实上，卢秉良并不会死心塌地的成为黄的干部，他仍然坚持了青年会的工作的独立领导。

正因为卢有着英雄主义和领袖欲的缺点，所以青年会的工作保持着几个不很好的作风：第一个就是领袖化，民主精神非常薄弱，在任何一个集会上都是推举领袖，一切事情都要由领袖决定——当然的，卢就是青年会中的青年最高领，群众只有提议权而不应当有决定权，因为，不然组织就没法统一的。在一期歌咏班里面，受着一些进步青年的激烈反对，他就曾经把歌咏队解散了事，公开向群众宣布里面有不少的危险分子。但是，青年会这种不民主与国民党的比较起来，还算是进步一点的，其次就是宗派化，工作表现得非常关门，一切都以基督教为范围，非基督教的他就有理由拒绝，因为以宗教基督教的宗教关系容易掌握群众，另一方面他们又晓得我们在基督教中不容易也实在没有什么基础（指我们党），他可高枕无忧，为了拒绝我们起见，也可利用这个理由；再其次就是保守，工作发展是有着一定的限度，香港政府一有任何表示，他就望风转舵，来保持青年会的地位，这点也是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假如不是这样就根本没法在青年会工作的。在工作上他是相当的有办法，青年会一贯的是有着很好的青年工作的传统而值得我们学习的：①青年化，能够根据青年的特性和兴趣而提出适当的宣传与组织的各种办法。②多样化，不拘形式，能在各种各样的情况中运用各种各样的情况的办法。③服务化，了解群众心理与实际要求，而建立各种服务青年的工作。④有创造精神，能根据各种不同情况了解这种特点而创造新的工作方式。

（3）一般的校内组织。香港学校校内成立各种组织的是占着少数中的少数，小学学生那更谈不上什么东西

了，英文中学与中文中学的组织内容又各有不同，现在稍为略略的谈一谈。

香港大学一般来说，学生会是有成立的，而且成立的方式又比较民主，由各系推举，每一系又有它自己的研究会，如中华医学会等。但是除了中华医学会做过一些救国医药募捐工作以外，其他不过有存在组织的形式而没有什么实际的工作。至于英文中学，根本就不允许有什么学生会的组织，直接由校长指定十一或十三人为该校学生领袖，里面指定一人为总领袖，有时也许答应该校最高年级，如高中毕业年即高中三，直接选出由校长批准这些学生“领袖”，实际上没有许多个是校内三分之一同学所认识的。他们的工作更可怜，除了执行学校校长一些命令外，就没有什么权力，事实上他只能说是校长的一个秘书，与同学是没有任何的关系的。除此以外，个别学校还有组织一些救伤队、童子军、摄影室、圣经班或各种球队，图书馆也是由学生管理，但是购买书则完全由学校统制的。华光团、友光团、青年会（差不多就是青年俱乐部的性质）也有在个别学校存在与发展；虽然全校性的组织不易在香港英文学校中建立起来，但是各式各样的娱乐性的组织，假如是好好的争取活动的话，英文学校的校内工作，不会很难建立起来的。

中文中学的校内组织，当然会比英文中学的高明了一些，一般的说都可能有学生会的组织。这些学生会都是校长以为帮助校内行政的助手，除了各种球队以外，并没有很大的工作。研究会之类的组织是非常少，抗战以后由于整个香港救亡运动的影响，多数都进行过贮捐的工作，这种工作就成为学生会的主要内容。有些英文学校也成立了类

似学生贮捐会的，响应学赈会的各种口号。一九三八年底，在国民党的策动下，有差不多十间的学校成立了童子军，不属于香港的系统，而直接由学校当局负责管理。广州迁港的学校都是保持了过去的现状，不过没有作校外的任何活动，因此说，现在的香港学生的生活是比以前活跃一点了的。

6. 香港学生群众的特点与开展学运

(1) 思想是落后的，但是民族情绪很高，热情与积极。这一方面由于殖民地文化政策的影响，而另一方面又由于是处于殖民地的环境，亲身受到帝国主义的压迫，因此香港学生容易动员，容易组织，只要环境允许，领导正确，偶一号召，几天工夫就可成立，但这并不是说真正的已经成立组织起来，而不过是刚刚开始。由于客观环境和这个特点规定了当时的学生工作是首先可能组织起来，而慢慢的一点一滴的进行教育工作，这样提高政治上、思想上的水平的工作，特别是香港学生工作中长期的而艰苦的最中心的工作。

(2) 没有任何的组织经验，没有经过任何的斗争的锻炼，没有产生过自己的领袖，因此香港学生群众表现得容易组织又容易瓦解，干部容易产生，只是在三几次会场上的发言就很容易为群众所拥护，但是在质的上面很差，英雄主义很严重，政治上的坚定性不够，工作作风上虚浮而不深入，不习惯做埋头苦干的工作，容易暴露，容易受打击，一切工作不得不从头的一点一滴的重新做起。

(3) 群众成份与党派活动的复杂性。这个特点又规定了学生运动的统一战线任务的执行，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斗争过程，刚刚发动的学生运动，很快的会走上党派斗争

的途程。在斗争过程中群众会怀疑，会怕被人利用而脱离组织，同学与同学间容易产生误会与宗派成见，这种现象只有在群众的政治上、思想上大大的提高才能容易被克服。

（二）香港学生赈济会发展的几个阶段

1. 香港学赈会的成立

“七·七”抗战的号声传到香港以后，鼓舞了沉寂的香港群众，掀起了无比的民族解放的热潮，香港政府由于英国对华政策的关系，也开始稍有转变了态度，同情中国抗战，在不妨碍香港治安和英日帮交的条件下允许了群众运动某种限度的活动，于是香港侨胞各种各样的赈济祖国难民的组织到处成立。

香港党针对着当时的政治条件认为香港学生运动只有公开合法的赈济运动的形式，才能更大的接近与团结更广大的学生群众。要彻底的克服过去秘密路线与严重的关门主义的残余，大胆的要从狭小的圈子里解放出来，诚心诚意的与各党各派、一切政治宗教的、各种阶层的青年学生合作，同时估计到有十足的条件与可能，推动学生群众组织自己的赈济会或类似这样组织，这种组织形式与内容将会受到广大群众的同意与拥护，但又估计到在党领导下的团体没有一个有威望有条件出来担任组织赈济会的任务，于是选择了三个对象：侨教会、青年会与香港大学，通过一切的可能去推动他们出来负责这项工作。

在本年九月初旬，就知道香港大学已自动的准备召集香港中学校代表会议，党就决定通过私人的关系，由钟明、林剑鸿两同志，认识了李政耀并以个人名义参加了这

个会议，并用书面向李政耀——当时他是负责人，提出了一些意见。在会议召开的那一天，到会的有二十个单位，中文中学、英文中学各占一半。虽然这个会议开得很沉闷而幼稚，但是毕竟全体通过了成立香港学生赈济会，成立那一天是在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一日。

第二次会议的结果，通过成立香港、九龙二区，每区设抗委二十二，常委十一，分为十一部门，而又以两区的常〔抗〕委共四十四个共同组织最高的执委会，以香港大学为主席，以学校为组织单位，聘请香港大学副监、基督教何明华会督、罗文锦大律师等为顾问。执委会中包含了香港最大的中、英文学校，宗教的与非宗教的，官立学校与私立学校，而且决定了第一次举行全港学生援助祖国战区被难同胞三天节食节用运动（后来很快的组织，有执委四十多个，常委十五个，分为五部，其下则成立各段的段委会，共十段）。

2. 香港学生赈济会的发展（一九三八〔年〕一月至六月）

党在学赈会活动基点的找得。香港学赈会虽然成立了，在三天节食、节用运动中募得了五千多块钱，很得各校同学与社会人士的同情与赞助，但是党只能派出个别干部参加下层推动，而没有办法参加常委执委的组织，于是通过以前抗救会的关系接近了九龙区常委华法商学会的代表林家耀，两个月以后就发展成为候补党员。通过了他在执委会的推动，通过了他在先后组织宣传部干事会与组织部干事会，在这些干事会，推动了以前学救会的一些干部和其他一些个别前进分子参加工作，于是这两个干事会成为比较进步的救亡分子活动的园地，党的决议便有了可能在

干事会中推动执行。干事会完全站在推动与辅助执行委员会的态度而进行工作，因为执委会中都是公子小姐型的分子，没有经验与能力，不过上层关系却非常好，工作便在这样的上下层合作的状态下进行着。首先出版了会报《学生呼声》，作为号召教育全港学生群众的工具，还组织歌咏班与座谈会团结与训练每个干事会的干部，并经过了新的补充的组织系统，分全港为十段，每段设立委员会执行大会工作，进行各校长期节食节用运动，以便有机会深入校内接近广大群众，组织起来成为学赈会的下层组织基础。

党对开展学赈会工作的估计与决定。由于学生工作已在一个新的形势下得到一个新的发展，由于学赈会已经正式成立，而党已经在里面取得相当的活动园地，事实要求党对于整个学赈会的工作给予全盘的估计和决定：

(1) 赈济运动是香港学生工作争取公开合法、大量发展的方式，这个方式基本上是适合于香港政治环境和学生群众觉悟的程度的。学赈会是一赈济的组织，因此，必须抓紧赈济为中心，努力做出一点成绩，以取得社会人士同情和树立起全港学生对这组织的信任，而且估计到必有可能得到当前顺利的发展，因此，必须注意将会发生因胜利冲昏头脑，企图组织全港学联合会来代替这个组织的过左情绪，因当时的客观政治环境与主观的力量都不容许组织学联，就是现在也正是这样。

(2) 在赈济工作的进行中，要大刀阔斧的从上而下的大量发展学赈会的组织，推动各校参加学赈会，集中力量健全中心地区的段委会——旺角、中环的工作，用各种各样方式去团结学生群众，而渐渐深入校内建立校内工作。

(3) 在赈济会的工作的名义下，扩大宣传鼓动，说明学生青年在抗战中的岗位与任务，抓紧《学生呼声》，充实其内容，使之成为鼓动团结全港学生的中心刊物，扩大发行，征求基本订户等。

(4) 两个干事会工作同志要尊重执委会和各顾问的领导，坚持上下层的统一战线，争取与社会上层分子的联系，以取得学赈会的继续公开合法的存在。

(5) 与国内学生特别是广州的学生取得联系，传播国内学生运动的消息，以鼓励、教育群众。

香港学赈会是怎样发展起来的(方式与方法、从一九三七年底到一九三八年暑假)：

(1) 抓紧学赈会运动的中心工作——募捐工作。在半个年头中没有间断的进行了不少的募捐工作，大概募捐总数约有三、四万元，大都是真正从学生群众的口袋里捐出来的，在这许多工作中，接近了广大群众，募捐的方式方法是：

①游艺会。通过学赈会的上层社会关系，要求各剧团，不论粤剧或话剧，各明星、各艺人、各专家义务演戏或演技，假座各大戏院——大多数也是义务借出，不收租费，定期演出，动员所有群众推销戏票和义务代管理演出等。

②音乐会。办法和游艺会差不多，请求本港名音乐家，如马思聪、尹自重等头等音乐家义务演出。

③卖物会。把会场分为十多二十个摊子，每一个摊子选定一间学校负责，由该校自己选定一种游艺，如弹子盘、飞镖场、抽签会、话剧等，并自己准备各种奖品，定出各式各样有意思的宣传办法(如飞镖的飞镖靶画出各个敌首、汉奸的像而不加上名字，因为怕干涉)去吸引群

众，并设有扩音机，不时的向群众说话，而且定出各校比赛办法，在结束会奖励公布之。

④卖花会。动员各校女生制出各种襟头纸花，定组织卖花队，多数由女生担任，出发分布通衢大道、车站、码头等地，向来往学生及社会人士劝捐。

⑤三天节食节用运动。这是从青年会中学习过来的。组织探访队出发各校宣传演说，在出发前要有初步的训练，取座谈会的方式，结束时又有联欢会，说服他们参加学赈会各部门工作。

⑥长期贮捐运动。这个工作主要的是依靠各段去完成，成为一种经常的工作，发出捐箱到各个学校，每月收集一次，并向该校报告学赈会各种工作，要是该校没有组织的，就帮助他们成立筹捐会或其他组织。

这种工作基本上是适合于香港学生群众的兴趣的，参加这样工作的包括了最大的中英文中学：男的、女的，宗教的、非宗教的，公立的、私立的，国民党的、国社党的和我们的，都在这工作中非常合作，表现得非常热情。动员的办法主要的是依靠已在学赈会工作着的同学回到校内去鼓动，依靠段委会对于该段学校的联系，依靠学赈会对于各校师生的联系，一般的方式是由学赈会发出通告，两天工夫动员，工作便可完成。而每次参加工作的同志总在三百以上，最多的大概有七百人，每次工作结束后大概可以鼓动部分同学参加学赈会或各段委会的日常工作。

(2)怎样进行宣传鼓动：为着学赈会是没有经过相当时间的准备过程而突击组织起来的，所以，在初期是相当重视宣传工作，但是这个宣传工作是偏重于鼓动的内

容，基本的思想教育工作是很少的，后来更产生重视组织、轻视宣传的偏向，而当时是宣传鼓动的内容又是有点流于一般化，大意是：

①赈济工作是从物力、财力去援助祖国的工作，就是救国的工作。

②民族解放与青年工作有不可分离的统一关系，因此救国工作也就是救己的工作。

③介绍国内学生运动情形，指出香港学生与国内学生同是中华民族儿女，同样应该站在民族解放的最前哨，但是我们比国内同学落后得多，我们要大踏步的赶上去。

④全港学生目前最紧要的事情就是要积极的参加救国募捐的工作，为了担负起这个任务，就应该团结起来，组织才能产生力量。

⑤经常的在自己刊物上鼓励同学看报和指导时事。
宣传鼓动的方式：

①经常的定期的招待报界，发表工作报告，并要求舆论界指示与批评。这样就使到学赈会与报界关系弄得相当好，每次报告或发表消息都得到各大报的例外通融。学赈会影响能够很快的扩大，这个争取报界的工作是有着很大的决定作用。

②每遇到发动工作不能发表什么宣言，就用告同学书的办法来代表，用油印或铅印散发到每一间校内去。

③出版刊物，一个会刊《学生呼声》。本来出刊物不经过政府检查是不容许的，经过检查就什么也不能发表，因此，就利用罗文锦的答话“赈济性质的团体和刊物不立案也是可以的”（这也可以看出香港政府对当时的民众运

动一只眼开一只眼闭的态度)，因此就定为会刊而不送去检查，半月一次，一共出版了十期，每期三千至五千份，有长期订户八百，形式与《中国青年》差不多。有四十份寄到南洋、广州、武汉等地。内容主要是研究学赈会的工作及报导香港学生的消息。在香港大众日报出版《学生堡垒》周刊，在珠江日报出版《青年呼声》周刊，在宣传部干事会中成立编辑委员会，吸收一些进步的在港的潮汕学生负责。

④名流演说。如史良先生和陶行知先生到港，就聘请或推动青年会聘请他们对学生发表演说和开座谈会。

⑤探访队出发各校演讲。出发前并有座谈会，由我们同志主持，讨论讲话内容，这样可以教育了采访队员，并通过他们去影响群众。

⑥经常在学赈会下面各小组做工作报告和时事报告。

(3)怎样进行组织群众：学赈会的组织是突击的建立起来的，而且是以学校为单位，学校代表大多数是由学校当局派出，就算是由学生会选出的也有并不是真正的群众领袖，因为那些学生会多数是得个形式的，因此，假如不加紧做下层工作，学赈会随时一受打击就会瓦解。自提出建立各段委员会的意见被通过后，便集中力量去建立段委员会的工作，全港一共成立了十段，由于干部问题的限制，只得集中做中心地区——两个段的工作，在段的下面组织各种小组织，要通过这些活动过渡到建立校内工作。

一个中心段工作的举例——旺角段。参加这个段的一百个差不多的单位，包括了所有的最大的中英文学校，段委员会也是由最主要的学校组织起来的，由学赈会组织部干事会负责指导（这个干事会是同志），有校内组织的学

校大约有八间，里面有两间有我们个别同志在活动而且又是代表，段委会是完全掌握在党的领导下。它的经常工作是响应与执行大会的号召与决定，团结各校积极分子，帮助其他段的工作，建立了一些小组织团结群众，有：一个歌咏班六十多人，儿童团二百多人，座谈会——青年问津的约有二十人，多数是干部，一个国语班，三十人，帮助各校建立校内组织，有二间学校在我们帮助下建立了全校学生筹赈会——英华、华仁，都是英文中学，有三间学校学生会出版壁报——东方、华南（中文中学）、华仁（英文）。党在华南、华仁两校都发展了党员，华南中学建立了支部。这个段每次动员左倾同学参加募捐工作的平均约有二百人，独立进行组织过一个义募会，两天募捐得了一千多元。

各个小组织的活动与发展：

①歌咏班最先在宣传部干事会中成立一个干部训练班，有二十多人，聘请歌咏界中人负责指导，毕业后分发他们到各段或各校组织歌咏班，至一九三八年暑期中共有一千八百多人。但是，由于干部的缺乏，不能很好的在这些群众中进行活动，结果后来因为这些歌咏干部的职业关系（有些毕业同学）就不得不抱着自己的职业问题，或动员回国服务，所以这些群众大部分都星散了，只能够成立一个合唱团和个别的吸收了一些积极分子参加段的工作，个别的歌咏班还继续存在。

②儿童团。这个组织的建立特别是为着团结小学同学的，在组织部干事会中组织了总团部，各段设一分团部，在一九三八年暑假期中发展到二千多团员，成立了很多学校单位的分队，干部有五十多人，团长是一个十六岁的党

员，在群众与干部间都有很高的威信。总团部直接主持了一个干部训练班，自己编有训练课程，成为团结干部的中心。它的经常工作是配合学賑会的决定进行各种募捐工作，组织儿童募捐队，收了很大的效果。每周有集会，举行时事讲话、讲故事、知识测验、唱歌子及各种有国防意义的游戏，不断的举行各种各样的比赛会、旅行会等，内容也相当活泼。正因为工作上有点成就，国民党就想尽千方百计来拉拢团长和夺取这个部分的群众，华侨中学校长黄淑陶就派了十多个所谓干部来参加并介绍一个童军教员（就是活动组织各校童军的负责人）负责训练班的童军技术课程，企图在那里争取干部。但是我们团长仍然坚持了工作上、组织上的独立，所以他们就开始了攻击团长、挑拨团结、分裂组织的活动，可是依靠于我们同志与群众的关系，团长的威信和工作上光明磊落的态度，结果他们只能拉了五十多个的群众，另外成立一个组织与我们对抗，不久就瓦解了。后来自从政治形势转变后国民党更展开了对学賑会的全面进攻。儿童团的工作更加困难，动员工作时，团长和部分的干部回到国内去，所以组织就大为减少，余下的只有八百多人吧〔罢〕了。

③此外在宣传部干事会直接主持下的有一个新文学班，三十多人；一个世界语班，二十多人；一个活剧团，四十多人。

④临时性的组织：一九三八年的暑假夏令营，内容有体育旅行、座谈会、歌咏、戏剧等，在宣传部直接领导下有五百多人，以各段为单位。一九三七年的寒假下乡工作队共组成两队，到西江附近宣传，约有三十多人。休假日举行

的旅行会、夕阳会、联谊会及各种比赛会等。

校内工作。由于组织的开展是取着自上而下的方式，过去又完全没有组织的基础与干部的准备，因此在半年时间中直到一九三八年四、五月时，校内工作才开始注意与建立。开始只是参加学赈会的，只有二个党员，后来其中的一个又在二个月后离开了香港，因此，直到一九三八年暑假有一间学校建立了三个人以上的支部的。当时有个别党员活动的学校有香港的华侨中学、丽泽女中学、英皇英文中学、圣士提反英文女中学、梅芳女中学，九龙区的华南中学、陶秀女中学。八〔七〕间里面六间有学生会活动的，而且我们同志又是群众领袖，同时是出席学赈会的学校代表。比较好的学校是九龙的华南中学，里面有个同志是学生会的主席（学生会××是×立的），各班有班会，团结在同志的周围，有八、九个比较有能力的干部，出版一个壁报，每周有一次座谈会，经常有演讲、球赛等活动，在们我同志的本班内三十四个同学中，有二十六个是××××××××的，××中有一个是进步的，与我们联系很密切。另外还有一个托派△△，因公开是一个图画教员，企图分裂学生，但经我们打击后，进步很大，×××其他五间的情形大体不相上下，这些学校直到现在也是成为支持学赈会工作的主体。

学赈会组织工作空前的顺利的发展，客观事实的需要，使得我们不得不相当注意干部的培养与训练的问题。由于环境不允许我们办什么训练班（学生时间和工作需要，事实上也不能抽调一批干部来安心的训练），因此就利用两个干事会，有时也召开联席会议，作为培养干部的园

地，在每一个工作的布置与总结，都是在这干事会中详细的研究与讨论。为着提高他们的政治文化水平起见，又组织了一个读书座谈会，每周有时事报告或问题讨论等。在暑假期间的夏令营中更特别建立了一个补习班（名义是校课补习或升学补习），聘请文化界中同志负责讲课，课程有统一战线、群众工作、社会常识等，参加的有二、三十名，由我们同志负责主持，毕业后就分发回校或各段工作。

（4）统一战线工作。香港统一战线的环境与国内基本不同的特点，在于统〔治〕者一个是英帝国主义，一个是国民党。在香港，国民党和我们同样是处于在野的被统治地位，在抗战的初期，友党也同样想在香港进行一点群众工作，但他们没有干部，没有群众基础，而不得和我们接近，和我们合作，同样的是有着开放群众运动的要求。香港政府因为英国与日本在远东的矛盾，在某一时期上不反对甚至同情中国的抗日战争，和日本企图争夺华南及香港市场的关系，所以也乐得利用一下中国人的反日情绪来打击日本，所以在某一程度上对民众运动取着一只眼开一只眼闭的态度，因此利用这些矛盾和条件去争取群众运动的公开合法，大量发展是完全有可能的。在整个时期中，我们是根据于以后几个原则而进行工作的：

①利用一切的公开合法的工作方式抓紧赈济工作为中心，反对卖羊头挂狗肉的想法，反对企图组织香港学联来代替学赈会的过左情形。

②尊重香港政府的统治地位，一切集会行动依法报告，尊重地方治安法令，装成似模似样的香港公民。

③争取一切上层关系，聘请社会名流为顾问，尊重他们，定期的向他们作工作报告，请他们演讲、主持典礼，拥护执委会及香港大学为主席，在尊重他们而从中推动之。

④对于一切非法斗争，如罢工、罢课，虽然在下层发动群众同情，慰问援助之，但并不用学赈会名义进行活动，或只是站在第三者的同情地位进行调解，如拔粹书院学潮保存学赈会的公开阵地，掩护非法活动，这样，上下层统一，使合法的工作非法化，又得合法的掩护。

⑤利用香港政府的态度与上层掩护进行了一些必要的非法活动，如出版《学生呼声》，内容不违反基本的争取香港政府的原则，使非法的工作合法化，

对基督教青年会的争取。青年会是香港历史最老的青年团体，有着很好的社会地位与经济条件，名字在学生群众中比较学赈会熟悉，因此争取青年会的工作是香港开展学生工作的主要条件之一。这个问题也曾好几次的在学赈会中被提出，也曾进行过好几次的联合行动，如募捐运动、联合游艺会、演讲会等，但始终没有把关系弄好，而且在学赈会的发展中，还招至他们的嫉妒，另外组织学联来打倒学赈会。做成这不合作的原因，一方面是存在着一些客观上的困难，由于过去一贯来没有学习过比较长久的合作历史，而且基本上是没有合作过，在一九三六年时，只是利用过它一下，又因为当时口号过“左”，使它害怕起来，以后双方的成见都非常的深。但是，这些客观条件的限制，只能使工作困难，或工作方法方式上的变换而却没有丢失合作的可能，因为大家都是站在救国阵线上进行

着群众工作，群众都是同样的纯洁与热情，学联会也在群众中保持着很好的威信，而且有相当社会地位，所以这个问题的中心还在于学联会本身有着缺点：①由于学联会空前的顺利的条件下发展，养成了一种轻视别人的骄傲心理，基本上没有深刻的了解到争取青年会工作的意义，没有下决心去研究进行这个工作。（此处缺页——编者）干部关系，海外部办事处的工作并没怎样进行过，主要的是估计香港环境的关系，这一工作不一定能够做得好，而且必然会影响学联会公开合法的地位，所以也就把它放下了。

国际青年来华代表团的到港。当学联会接到这个消息以后，即做出以下的估计：

①这个事情表示了中国的抗战多助而非孤立，这会坚定了群众对抗战的信心。

②这个行动指出了青年运动的国际性，全世界的青年正在如何的与中国青年一样进行着反法西斯的斗争，把这件事情扩大地宣传是教育群众一个很好材料。

③估计到香港政府是不会怎样的严厉干涉这件事情，抓紧这工作是进行国际宣传绝好机会，因此就进行各种准备，决定举行盛大的欢迎会，并且各方面的搜集材料、翻译报告等。在欢迎会中动员了一千多群众，来华代表皆分别发表演说，广州学联、学抗，澳门的学生代表皆到港参加。自己的刊物皆出版了特刊，各大报都大字标出这个消息，并由林家耀陪同代表团到广州各大团体演说和担任翻译。代表团离港回国时又组织了一个盛大的欢送会，并供给一些抗战的材料及香港学运的实况，以后就建

立了与国际青年大会的经常联系，在这个送行会的机会中举行过一个省、港、澳的代表座谈会，交换过一些工作经验及建立了经常联系。

(6) 党是怎样领导的

最初参加学赈会活动的是两个同志，到一九三八年暑假发展到十八人，分布于四个英文中学和六间中文中学，分为四个支部，都是以工作的地区（段）为单位，因为没有一间学校有三个以上的党员。支部的经常工作主要的群众工作，每个党员都是学赈会的活动分子，有三个是常委，其中林家耀是副主席，扬昇礼是儿童团的总团长，其他都是参加两部干事会或是段委会的负责人。因此支部里的群众工作是相当紧张的，每个会议都差不多化了三分之二以上的时间放在布置群众工作上。因为大家忙于群众工作，甚至以群众工作的开展而有了某种满足或过分紧张的心理，因此，对于党的组织发展工作是不很注意的。教育工作，除了经常的政治讨论和工作总结外，有系统的研究是从从来没有执行过。一般的会议生活是经常的，党费是按期交纳，自我批评的精神也很好，思想斗争也在经常或大或小的进行着。

自一九三八年春季香港市委成立后，跟着就成立市委青年部，部长是钟明同志。他一向是参加了学赈会的工作，是组织部干事会中的计划组组长，各段工作的公开分配也是他全部负责的，同时党内的支部又是他个人去领导。所以当时的青年部、学生支部和学赈会的公开工作都是集中于一个人的身上，后来因为他又是组织部干事会（学赈会）的干事，公开工作是相当忙的；一方面作

〔做〕公开工作，另一方面又负责领导一个支部，其他三个支部也是钟同志负责，林家耀、杨昇礼是和他个别接头，当时的学生工作就在这样的“三位一体”的领导下进行了将近半年，因此，当时正确的领导关系是没有建立起来的。

学联会发展工作中的总结

优点：

①党对开展学联会工作的估计与决定基本上是正确的，抓紧有利的政治形势，提出与坚持了正确的工作方式，大刀阔斧、从上而下的得了工作广泛的开展，使学联会基本上已成为全港学生性的公开合法的学生组织，开辟了今后学生工作广泛发展的园地——会员有六百多间学校，经常工作的干部差不多有一百人，当时有组织的群众有三、四千人，有党的活动的学校八间。

②在财力、物力上援助祖国抗战尽了很大的努力，给予社会人士和国内同学很好的印象与鼓动。

③提高了全港学生的民族觉悟与热情，提高了青年学生的民族觉悟〔和〕在社会上的地位，引导了他们接近现实的社会。

缺点：

①满足于上层的空头统一，满足于表面的工作，没有抓紧在一些可能建立工作的大学里开展校内组织，使之成为学生工作的根据地，在那里锻炼〔炼〕培养一批新干部，领导开展其他工作，比方华侨中学、华南中学、英皇中学、梅芳女子中学都有党员在群众中，都有威信，但是都把抽到段委会来工作，离开了校内群众。

②在工作中大踏步的顺利发展中没有抓紧干部问题，没有注意从开展校内工作中去培养提拔干部，没有抓紧现有干部的教育训练工作，比方在夏令营中的补习班，没有集中力量派出其得力的干部主持这工作等。因此，主观力量跟不上客观形势的发展，使我们的领导掉在客观形势的后面，比方很多工作掉在一边无法去负责。

③忽视了香港学生国际宣传的任务，没有在国际青年来华代表团到港的时机中，动员组织香港大学和各大英文中学的学生，利用他们的特点——是英文学生，来负起国际宣传的工作。

④工作太突出、太政治化，骄傲看不起别人，没有与朋友共同工作的精神，不注意争取其他学生团体——青年会与广大落后群众共同进步，使青年会因嫉〔妒〕而与学赈会对立，并且进行破坏。

⑤经常的组织与教育工作配合不起突击工作，使团结群众工作成为浪潮式的时起时落。

⑥支部工作与公开工作没有很好的分工，党的发展跟不上政治形势的发展，没有专门负责支部工作的干部，使支部工作特别是教育工作没有达到必要的健全，它〔而〕更有力的领导公开工作。

3. 与国民党的斗争（一九三八年一月到广州失陷）
当时的政治形势与国民党企图抢夺学赈会

徐州会战以后，国民党四中全会颁布了组织三民主义青年团，各地国民党拉拢青年的活动就大为积极，香港国民党——华侨中学校长黄淑陶活动最力，他一方面依靠华侨中学为基本阵地，另一方面企图夺取青年会和香港学赈

会做发展三青团的基础，首先通过师生的关系拉拢了基督教青年会的负责人卢秉良，在互相利用的关系中，卢是接受了黄的领导了，进一步的他就开始进行学联会的工作。本来华侨中学出席学联会的代表何敏柏，就是黄最信任的干部，而且又是学联会常委组织部长，所以一贯以来黄在主观上就以为学联在他的领导下了。自从出席中国学联回来以后，根据何敏柏的报告（何是出席代表之一），黄于是开始怀疑起来，详细的搜集了《学生呼声》和学联会向来的工作大纲，又四面八方的调查钟明的履历和行动，事实上已经给他找出了一些蛛丝马迹的材料来。经过了分别与林家耀与李政耀的个别谈话以后，虽然在谈话中没有得到很多新的材料，但是，根据何敏柏口中和行动中，早可以隐隐的看出，他一方面仍然不改变拉拢林家耀的活动，另一方面假如没有希望时，就决定依靠李政耀去打倒林家耀，和设法清洗钟明以下一系两个干事会的分子，企图达到完全掌握着学联会的领导，依靠这样的基础，完全包办香港青年工作。

斗争的发生及其经过。

国际青年来华代表团到港时，曾正式要求香港学生以一个单位的名义派出代表参加世界青年大会，并要于一月后回国时与之偕行。学联会执委会接受了这个要求，并从事准备召集全港学生会议，选出一个代表参加大会，这样林家耀与李政耀竞逐就开始。干事会部分的执委与广大的群众都拥护林家耀，但没有很多是学校正式代表，执委会的大部分代表却表示拥护李政耀，因为李是大学生，而林只是一中学生的缘故。这个过程中，学联会就分为两系，

国民党就决定采取拥李倒林的政策，在选举大会的那天，林家耀发表演说后，群众大部分表示好感，何敏柏就布置另一个学校的代表——实际上只是一个流氓，包娼包赌无所不为的——提出质问学赈会的财政为何一年多不正式公布——当时林是财政的管理人，并做出种种乱人耳目的无耻造谣，何敏柏等就做出关心学赈前途的样子，要林不要出席世青联，要把财政弄清底〔楚〕公布，以安社会观〔视〕听而巩固学赈会的信任理由下煽动群众，虽然经过我们作种种的反攻，指出这些诡计的实质和提出种种保证，但结果是失败了，以三、四票之差而落选。这次失败的原因：首先就是由于我们太轻敌，未有作完密的布置；其次就是由于社会地位，一个是大学生而且是基督教徒，一个只是平常的中学生吧〔罢〕了。一般的没有什么认识的学校代表就不能不是以此为选举的标准，事前又没有由本校同学正式通过的；再其次，何敏柏不正面出场而装出假模假样的关心学赈会的态度，不又是相当能够模糊群众。选举结束后，何等更乘胜追击，决计把财政问题强调起来，实际上他们事前已有布置，要求即席成立核数团，限日公布数目。两个方面的斗争就明显的暴发起来了。

——财政问题扩大以后，根据林家耀的保证——对党的政治保证，财政上是完全不会有亏空的事情，大部分的群众仍然相信林家耀，三分之二的执委是取着傍〔旁观〕的态度，而且基本上是同情林的，因此，虽然何在核数委员会中是占着半数（我们的只有四分之一），财政数目都是握在他们核数团手中，但以形势悬殊，仍然没有很大的作用，当然的，绝对优势是属于我们的。后来因为石白恒的

动摇叛变加入何等活动（当时石是候补党员，学赈宣传部长），同时林出席学联回来以后，风头主义相当严重，画[划]地自封，目无余子的态度引起了一些干部的不满，虽经党的批评以后，仍不能很好的克服，在这个情势之下更助长了他的气焰，于是更引起一些同情他的执委转取中立，更后的采取攻击他的态度。由于这些中间力量的丧失，引起何等更进一步的进攻，在每一个会议上都“客观的”提出财政的问题以乱人耳目，因此在那个时期中，每一个会议都引起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很多工作陷于停顿，中间分子因而也对学赈悲观失望起来了。看到这种情势，在几次会议中我们就采取强烈的攻势揭发这种造谣中伤的行动以[及]危害学赈会、危害救国工作的实质，提出种种的工作建议，用最大的努力把工作整顿起来，紧张起来，去争取中间分子团结在我们的周围，结果使何在好一些会议中被击败了，群众基本上还是拥护我们。何等见到这种情势，估到我们在群众中的威信与力量，（就决计牺牲学赈会，整个的要打倒学赈会而以侨教会代替之。于是素来不做工作的侨教会居然也发动全港学生的募捐工作起来，而且发出消息要组织学生团体，另一方面又把财政问题更扩大起来向社会人士散布空气，以图彻底完[全]打击学赈会在社会的威信以至无法活动。

本来这个新的情势更会便利于我们争取中间力量的，可是很快的发现了林家耀真的亏空了几百块钱，事实上他只是糊涂，中途才发现真的弄错了。既然已向党提出了政治保证，所以就不敢向党报告，而暗地里偷卖自己家产以图偿还这笔数目，但是，却又被家庭晓得了（他的家庭是

大家庭)，甚至要发〔登〕报声明与林断绝亲属关系，后来学校又晓得了，要开除他的学籍。何等就利用这些材料，更展开了打倒学赈会的新攻势。林当时出尽千方百计，筹款偿还，又没有办法，何等便利用哪〔那〕流氓威胁他，要他拿出一千块钱便可大家合作，挽回他的地位，同时又放出提交法院控告林家耀的空气，青年会又进行打倒学赈会活动。当时学赈会在社会上的威信受了很大的打击，很多学校不肯把款项交来学赈会，党内党外的干部悲观失望的情绪很快的生长起来，学赈会便在这危危欲坠的情况中喘息着。

党审度当时情势，认为林的地位没法挽回，就放弃林家耀而集中保存与巩固学赈会，粉碎何等企图打倒学赈会的阴谋的方针，并且决定以下办法：

(1) 坚定林家耀，帮助他设法偿还公款，提高政治警惕，反对国民党一切威迫利诱，公开向群众承认错误。

(2) 向群众解释学赈会是我们全港学生的团体，财政问题的错误是林个人的事情，只要他能设法偿还就得了，学赈会是我们的，我们一定要坚持学赈会的工作。

(3) 彻底揭发何等的阴谋，在政〔治〕上打击他，使他们完全〔失去〕在学赈会活动的园地。

(4) 迅速的召集全体工作干部会议，公布财政问题和解决办法，向社会人士及全港同学解释，以重新建立学赈会在广大群众中的信任。

在这个方针的指导下，工作上换上了一副新的气象，群众重新活跃起来而团结在我们的周围了，结果是林家耀退出了学赈会。在第二次的改选大会中，何等除了个别的

被选为常委外，其他都落选了，常委三分之一是我们同志，华夏学院的代表谢裕德（是党员）更被选为学联会的副主席，学联会是完全的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工作。

党的领导

在这个时期中，支部的工作，大部分完全集中于布置这个斗争上面，没有多大的发展，共有二十多个党员，仍然是处于青年部的“三位一体”的领导下，钟明同志是公开主持了这个斗争的。

在斗争刚刚开始，首先就发现了石百恒的动摇，不去执行党对于竞选大会的决定，在斗争时表示“中立”，及时的向他提出检查、批评与说服，发现他与何等保持着密切的关系，而是〔且〕提出要求退出党，党就决定断绝了和他的组织关系，而且深克〔刻〕的估计到在这斗争中必然会产生种种张惶失措的悲观失望、消极现象，因此：

（1）把石百恒的问题传达了，去提高同志执行决议、服从决定的精神，进行在斗争中党员气节的教育。

（2）指出这个不是单纯的个人纠纷，而是政治斗争，指出这个斗争迟早必然发生的政治根源。

（3）指出这个斗争的胜利与失败和整个香港学生工作的休戚关系。

在斗争中一般的说起来，同志执行决议的精神是相当好，而且相当坚定的，虽然在许多重要的环节中，在事情起了突然变化中，表示着张惶失措和悲观失望的现象，但是依靠于同志对党的组织观念与纪律精神，依靠党在同志间的威信与正确的决定，依靠党与同志间的密切联系——时时在两三个钟头内完成一个会议的布置工作，这种幼稚的

情绪很快的就会被克服，比方在何等提出法律控告时，有些同志和财政问题有关的就怕起来，要离港避难，一经提出后就马上去执行新的工作。但是在领导关系上，是弄得相当紊乱的，横的关系非常之多，每个党员都和钟明同志发生过关系，而且差不多全部同志都暴露了，假如是在于另一个比较严重的环境，我们的力量必然会很快的遭受严重的损坏的。

经过了这次教训后，党深深的感觉得要把党内工作重新整理与加强的必要，因此决定：

(1) 把秘密工作与公开工作分工起来，钟明同志退出学联会，成立市青委会——钟明、刘宜、叶炎生三人构成之，不参加公开活动，只负责党的青运工作和领导青年和学生支部，以加强支部工作。

(2) 支部要尽可能以学校为单位，注意开展校内工作，准备在学联会改选时可以重新掌握常委会的领导。

(3) 加强支部的教育与发展工作，克服过去支部会只是讨论群众工作的现象。

(4) 尽可能减少横的关系，注意秘密工作。自此以后，支部工作才慢慢的比较健全起来。

斗争的经验教训：

(1) 这个斗争反映了香港环境的复杂性，学生运动刚刚开始兴起，很快的走上政治斗争，而又由于香港学生的幼稚性，在斗争前会麻木不仁——很多干部只是认为是私人纠纷，斗争发生后又不免发生张惶失措、悲观失望的现象，如党内领导关系的紊乱，严重时的×难等，而且斗争的进行只限于上层的圈子，没有深入动员广大群众的力量，

(2) 它指出了任何斗争的进行必须得到党的正确领导与支部的保证才能得到胜利，党的纪律就是胜利的条件，比方石百恒问题的传达，强调执行决议的纪律，提高了纪律教育才能在重要的关头克服了悲观失望与开小差的情绪。

(3) 它说明了在斗争当中只有坚决的进攻才能取得胜利，任何的单纯防御、保守的挨打办法必然会招至损害。比方在斗争的初期我们只是采取了解释的被动办法，人家更是怀疑起来，后来严励〔厉〕的指出了造谣中伤的危害学贻会、危害民族的实质，群众就同情了我们。

(4) 它说明了在统一战线的环境中，群众工作的干部生活容易腐化，必然的会产生种种问题，予破坏者一个进攻的机会，而且在斗争中容易动摇，而使党的工作遭受不必要的损失（林家耀的失败，主要是从生活腐化开始）。因此严格的经常的政治上、组织上，特别是生活上的检查是领导这些干部的重要工作之一。

(5) 它说明了英雄主义、风头主义是团结干部最危险的敌人，只有使自己孤立与脱离群众。因此，坚决的与自己的英雄主义作斗争是一些群众领袖和我们同志一种重要修养。

(6) 它说明了群众团体的财政问题，必须慎重处理，要选择忠实可靠最好是非党干部来负责，经常审核与检查，党的干部最好自己不要来管理财政。

4. 动员工作（广州失陷——一九三九〔年〕三〔月〕）

日寇南侵与动员工作的被提出

一九三八年十月间，敌寇发动南侵，从海亚大鹏湾登陆，几日间就逼近广州、惠阳、博罗、宝安、东莞等县，迅即变为沦陷区，广州危在旦夕，大批沦陷区青年和学生集中香港，人心惶惶，不可终日。另一方面，因为家乡沦陷（大部分香港侨民的家乡都是在广东），却又掀起了香港群众保卫家乡的热潮，群情汹涌，敌汽同仇，党在这种情况下认为：

（1）发动广大群众参战，组织敌后游击战，保卫大广东是目前群众工作的当前任务，广大的青年群众更应该做这工作的先锋。

（2）香港是处于国外英帝国主义统治下，它有着广大的物力与财力特别是人力的蕴藏，因此，它的任务应该是动员与训练大批群众和干部供给内地，组织内地游击战，保卫大广东。

（3）目前群众情绪已相当的高涨，完全有充分的可能条件来进行这个工作，因此，动员群众回国服务就成为这个时期中的中心任务。

动员的方式与方法：

（1）宣传鼓动提出了几个基本口号：①起来！全港青年回国服务，保卫家乡！②青年的岗位在前线上！等。那〔时〕《学生呼声》已因经费问题而停刊，只在《珠江日报》自然出版《青年呼声》。于是经过了很大的努力，得在《星岛日报》等三大报纸出版回国运动特刊，并发出告全港同胞者，呼吁在校内同学以财力帮助这个工作。

（2）怎样动员：在这里我们首先要解决动员哪一些人的问题，我们估计到在校同学一方面因为学业的关系，另一方面又要顾虑到家庭问题，因此，动员在校同学回国

的可能性并不太大，所以我们动员的方向是面对着广大的失学、失业青年和一些沦陷区里流落在港的知识青年，而决定在校同学的主要任务是在财力上帮助这个工作，所用的名义是学赈会回国服务团。一般的动员方式是：一方面登报招收回国团员，发出告青年书和服务团简章；另一方面，是鼓动学赈会的干部，并通过他们的关系去动员他们的朋友亲属参加。但是重要的是依靠党的支部，规定动员工作是当时支部重要工作之一，报名参加的还要填写详细的履力〔历〕表，经过学赈会动员委员会的详细审查，同时还要经过测验，如果是适合于以下条件的：①意识正确、行动正当的，②有一般救亡认识的，③年岁在十八岁以上三十岁以下的，便可合格，承认为候补团员。当时报名的非常涌〔拥〕挤，几日间就有二百多人。

(3) 怎样组织：候补团员还要经过一个月的训练，由文化界同志担任讲课，每一期训班约有十人至六十人，毕业后就成为青年服务团。课程分为政治常识和技术训练两部分，政治常识又分为统一战线、近代历史、团体生活等，技术的分为歌咏、戏剧等。在训练期中，上午上课或讨论，下午技术训练，过着严格的集团生活，把我们参加的同志编成临时支部，负责整个训练班的领导与审查工作，毕业后成立服务团，设正副团长各一人，并成立干事会，以下团员就分为若干小组，每组八个至十个人。团长应对学赈会负责，回国后并须定期的向学赈会作工作报告，经济由学赈会负责供给，经费来源是依靠于学赈会长期贮捐运动的款项和临时的游艺会筹款。

(4) 到那〔哪〕里去？人有了，经费有了，但是到

那〔哪〕里去倒是成问题。当此“救国无路”的今天，这个问题一时是不容易解决的，因此，主要的是通过个人的活动去找寻关系，如有头绪即由学赈会派出代表与他协商，大约有几个去处：a. 随军服务；b. 回乡工作，参加训练班，如余汉谋的战时训练班；c. 个别的参加游击队；d. 个别的报考军校。

党的领导

敌人南侵以后，广东党组织了东南特委，取消香港市委，学赈会中成立党团，由东南特委青年部负责领导，青年部设部长一人：钟明同志；设干事一人：徐静如同志。支部交由九龙、香港两区区委负责，党内工作的分工比较以前更为严密了。

为了执行动员工作的任务，首先就必须克服了同志间的没有信心的现象，他们认为动员工作是对的，但是，以香港学生思想认识的落后，参加回国服务是没有可能的，提出了这个工作，不仅不会有成绩，而且必然会吓了学赈会的群众，他们没有看出当时政治形势的特点和群众的情绪与要求，他们更不了解组织工作是应该服从于政治任务，任务是正确的，那么问题就在于如何根据客观真实情况而定出计划与步骤去执行这个任务，而不是讲价还价的执行这个工作。因此，首先就要在支部中进行耐心的说服工作，其次在工作执行中，必须克服同志间不安心于自己应有的岗位的现象。动员回国一成为风气，每个同志都要求回到自己国内去，不愿意安心于学赈会的工作，使得工作上暂时相当紊乱，他们不懂得党员的一切工作与行动都应该毫无条件的以党的利益为依归，一切干部都回到国内

去了，学赈会就会很快的倒台，动员工作便不能执行到底，这个同样的在支部间普遍的进行教育。

支部当时主要的中心工作，就是动员工作，一方面是动员一些党员回国，另一方面就是依靠这些党员，动员团结群众一同回国。动员工作同时是被当为一种经常工作，每个同志都要经常团结着一些有回国决心的群众，并进行各种教育工作，如有机会就和他一块儿参加服务团。为着执行动员党员回国，也曾进行了和他们的家庭观念、小集团情绪——好象两个要好的同志其中一个不去其他也不肯了，和一些动摇逃避的分子作过斗争，动员工作的成绩就是在这些斗争中一天天的提高起来的。

动员工作总结

成绩：（1）动员回国人数统计表

（名义都是学赈会回国服务团，共分为四团，另一个女的）

名义	人数	党员	性别		成份		教育		到哪儿去
			男	女	学	工	中	小	
第一团	34	14	30	4	31	3	32	2	到南路张炎处
第二团	26	0	22	4	26	0	25	1	到西江工作
第三团	30	4	30	0	30	0	30	0	参加战时训练班
第四团	25	0	20	5	25	0	24	1	到汕头随军工作
女工作团	7	4	0	7	7	0	4	3	到惠阳工作
个别的	20	8	/	/	/	/	/	/	到惠阳游击队
一批的	100	5	/	/	/	/	/	/	到南路学生军
总数	292 ①	35	/	/	/	/	/	/	

①原数字如此，应为242。

表(2)党的干部统计表

总数	级 别			性 别		成 份		教 育	
	×	×	×	男	女	学	工	中	小
16	2	6	8	13	3	14	2	13	3

统计说明:

- a. 这个只是以现在所能记忆起来的最低的数目字。
- b. 人数总数、党员总数和干部总数比较可靠, 其他只是一个估计。

(3) 动员的优点与影响:

[优点]:

①基本上是执行了党所给予的任务, 吸收了二百多个中学生, 大部分是失学、失业的知识青年, 输送到内地参加保卫大广东的抗战工作。

②提高了群众的参战热情, 使他们认识了青年在抗战中应有的岗位。

③扩大了对内地青年的影响, 给予他们一个刺激与推动。

④由于干部的限制, 因此集中力量建立一个服务团, 党员占百分之四十一, 建立起南路一个基点的工作。

缺点:

①动员太大, 损伤了香港的组织元气, 很久都不能恢复起来。比方学赈会除了几个常委会的干部以外, 下层工作者差不多全部动员走了, 香港区的党只剩下了四、五个

党员，很多已经在一些大学校内活动干部都走了，不论群众组织和党内支部都有点零星落索的现象。

②没有精密的计划，干部配备不很适当，比方儿童团的总团长在港是二千人的领袖，回到内地只是负责一个服务团有三十多人的副团长。

③经常工作配合不上动员工作，天天的动员，干部动员走了，就长不出来，动员工作忙起来了，日常工作就掉下来。

④动员工作没有与毕业生问题联系起来，那时刚好是寒假，虽然进行过毕业生座谈会与国民党商讨过军校招生问题，但并没有执行。

(三) 政治形势转变后的学生工作

1. 当时政治形势与香港环境

武汉失陷以后，汪逆随即出走，和平妥协空气弥漫一时，英帝国主义策动下的东方慕尼黑阴谋活动日益暴露，这不能不影响到香港环境发生重大的转变，一天一天向着更加严重、更加恶劣的进程发展，一方面看到香港政府督察总监在一个年会上的报告，宣称最近一年来香港共产党甚为活动，但是他们主要的不是反英而是进行一般的募捐救国工作，而且是完全尊重香港法律，绝无一些非法行为，所以香港政府并不加以任何的干涉。但是，并不能根据这个报告，就以为环境转好的征兆，相反的正因为这样，可以看出香港政府以这种阴谋来麻木共产党的警觉性，企图乘机布置把共产党一网打尽的诡计。另一方面，我们又可以看见这样的几个事实：

(1) 香港政治部要李政耀到他那里问话(那时李已从世界青年大会回来,仍是学赈会主席),调查好几个活动分子的履历与行动,并正式向李警告说学赈会有共产党活动,要他好好注意,发生事情要他负责(当时李表现还好,正式否认他的估计)。

(2) 学赈会顾问香港大学副监和罗文锦大律师非正式表示日间有辞掉学赈会顾问的名义的可能。

(3) 学赈会所有发表的演说、文学、戏剧、集会等都要受到香港政府的严格检查和干涉,所有刊物经常的〔因〕很普通的名辞都被检查去,这些事情都是很明显的预告了更黑暗的环境快要来临。

2. 顽固分子的反共行为、投降派的活动

(1) 国民党吴铁城到香港后,国民党的活动更为猖狂,宣布了要发展六十万党员的计划,办了一个干部训练班,里面也有一小部分学生分子参加,对于学生活动方面仍以“CC”黄淑陶为主。他进行着两项工作——组织三青团和组织童子军,把参加学赈会的干部大部分的调回去,华侨中学不久又不派代表参加,而把活动方向放在校内,首先组织了三青团,以青年会、华侨中学为基础,进行宣传“一个政府、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的主张,反对共产党,说共产党是苏联灭亡中国的工具,孙中山才是中国革命的正统等。组织的方式首先以宣布式的发展党员。在华侨中学一个纪念会中,在学生面前说一大套要服从领袖、信仰主义的话以后,才正式宣布从今天以后在座的学生就是三青团的团员,这样引起大多数学生暗地里的诅骂与反对,后来才改变为个别发展,主要的是从事拉拢各个群众领袖,重

质不重量，没有经常的健全的内部组织生活，没有任何比较有能力的学生干部，因此，发展非常慢的（组织发展具体情形不清楚，只是从他们的活动去估计）。一些三青团的团员的工作只是根据黄淑陶的吩咐去进行，根本一点也说不上民主，除了可以看出的华侨中学和学赈会、儿童团的外，其他并没有什么活动。其他是组织童子军的活动，以一个华侨中学的童子军教练为领导，在华侨、领〔岭〕东中学等六、七间学校都有发展，约有四百多人。以学校为单位的，内容主要的是宣传领袖等，与三青团的宣传内容差不多，其他就是一般的童军生活。至于华南中学就看不见有什么活动，只是进行监视学生的活动，华侨中学和华南中学两间最主要的国民党派的学校，学生会主席都是共产党员。蓝衣社、罗伟疆的文化中学里面也在进行组织三青团，进行的方式首先举行全校学生的思想测验，然后才个别的进行谈话，从要不要信仰三民主义、服从政府、服从领袖问题，要是信仰的就应该加入三青团，在三青团工作就会得到政府的保护，做得好还有津贴，不然的话就进行监视与打击，文化中学的学生会是在三青团包办下的。西南派区芳蒲的德明中学已是进行组织童子军（这是不属于黄淑陶的一系，而是独立的），用教员包办学生组织，在暑假的时候，把进步学生的组织都取消而由教员统一包办。导群中学、民范中学也有这个情形，这些学校我们党都没有活动，只是德明也曾有过民先小组的建立。

（2）国家主义派比较有活动的是梅芳中学，因为群众领袖（学生会主席）是我们党员，因此校长陈铁一并没有组织过什么团体，而是采取监视与打击的态度，在图书

馆中购置很多马列主义的书籍，每日在借书册中去检查学生的思想，曾经警告过我们同志，并声明要开除她，但是，因为群众都拥护她而没有执行。后来请汪派到校内演讲，经我们提出很多问题他没法解答而抱头鼠窜的跑了。

(3) 汪派托派在香港并不很注意学生工作，主要的是做教员工作。在学校是公开宣传和平反共的教育，也布置些个别学生去监视群众行动、挑拨离间等。校×最主要的是托派学校，华夏学院、仿林中学和有活动的华南中学，(用公社)群众领袖都是共产党员，后来仿林中学的同志毕业了才离开了该校。

3. 党对当时学生工作的估计和决定

党根据以上一些情况，对于当时环境的学生运动做了以下的估计：

(1) 香港的工作环境是一天天的向坏转，在一个时期没有好转的希望，太红了的团体有被解散的可能，学赆会就是其中之一，因此必要〔须〕及早的准备，就算学赆会在任何时候被解散了，学生运动又受到打击而仍能进行工作。

(2) 各党各派今天工作的方向已经不是和我争夺学赆会的领导而是转向校内工作。因此，香港学生是否跟我们跑，学赆会的领导是否能保持，决胜的焦点不在学赆而在校内工作。

(3) 环境虽然天天变坏，但是争取公开合法的地位活动的可能并未降最低限度，目前仍未完全没有，因此，只要它仍有半分的可能，我们仍不应放弃。要克服过去政治化的工作作风，转向更加青年化、多样化、社会化，而

且就是为着更加深入的开展青年工作，也应该这样（这点在省委的青年工作决议中传达后才更为明确）。

根据以上估计与方向决定了以下的工作方针：

（1）抓紧校内工作为方针，中心把主要干部都隐蔽在校中群众中，为着准备学赈会被解散而仍能进行工作，为着恢复学赈会的元气和保持党在学赈会中的领导，为着战胜顽固分子，都需要集中一切力量开展校内工作。

（2）大批的培养新干部，利用一切可能和一切机会，用最大的力量去进行这个工作，只有使这个工作做好，开展校内工作，整理学赈会才成为有可能。

（3）学赈会这个公开合法的组织要尽可能的保持，而现在学赈会正处于零星落索的半身不遂的状态中，因此，对学赈会的任务是把它整理起来，恢复元气，培养一些干部，保持它与群众最低限度的联系。

（4）在学赈会中组织女学团（女学生的独立组织）。根据当时学赈会中女学生积极分子很多（男干部都动员去了，余下的都是女的），而且又是男女分校，封建思想相当深，组织女学生的独立组织是必要的，它的任务是团结教育女学生中的进步分子。

（5）注意开展青年会中的工作，主要的是派遣干部深入里面，团结群众，而不是单纯的进行上层联系。

4. 工作是怎样进行的

（1）校内工作的开展

以前原来有个别党员或民先队员活动的学校，有些是因为毕业离了学校，更有一些因为动员工作回国去了，所以余下来的，有活动的校内组织并没有多少个。仍然有组

织活动而我们同志是群众领袖的学校有梅芳女中、丽泽女中、陶秀女中、华南中学（九龙分校），有个别党员活动的有华仁英文中学、华夏学院。

为了要集中力量开辟校内工作，所以除留下了学赈会副主席谢裕德同志专门负责学赈会工作外，其余所有干部都分配到校内去开展工作。暑假以后，香港区的正风女校、华侨中学，九龙区的广州大学、中华职业学校，因为流动性太大没有什么大的工作。其他九间学校都有着一般的组织活动，我们同志都成为群众领袖了。在梅芳、正风、华南、华仁四校建立了党支部。

在这些学校中，群众质量最好的，政治水平、文化水平最高的要算华侨中学（还有华侨学院、华侨女中也是一块的），而且学生也最活跃，工作基础也最老，自抗救以来都有我们的工作，不过或断或续的没有集中很大的力量去耕耘这块肥沃的园地吧〔罢〕了。所以这一次派了雷超同志入去之后（雷是一九三八年华侨学生，而且是当时学生会的副主席），很快的就被选为学生会的主席，工作又很快的活跃起来。以前，黄淑陶虽然想开除他，但是很多群众都拥护他，所以他没办法，只得想法子拉拢他了。这个学校也曾组织过文艺研究组、读书会（社会科学）的，组织过歌咏班、话剧社，出版过壁报（每班都有），供给过学赈会一批干部。反对学校当局的包办学生组织，反对过黄的宣布加入三青团，这次工作重新开展，这些组织必然很快恢复起来，重新恢复和学赈会的关系，〔很〕快会成为今后学生工作的重要力量，因此这个学校的工作必须给以重大注意。

在校内工作的开展中，一方面仍然保持与学赈会的密切联系，拥护与执行学赈会的一切号召和工作，当然，不一定所有组织活动的学校都加入学赈会，要看实际需要而定，如中华职业学校并没有加入学赈会而独立进行工作，以避免我们力量的暴露；另一方面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组织群众，积蓄力量，开展各种改善教育制度和日常生活的斗争，展开香港学生在思想上的新启蒙运动，在这些斗争中间去团结与锻炼广大学生群众。这样才能深入的开展校内工作，要干部回到校内上课，克服过去离开学校的作风，这个工作在一九三九年底才开始。

(2) 学赈会和女学团的工作

要从事整顿与恢复学赈会的工作，首先就要正确的解决工作干部的问题才有可能。因为动员工作的缘故，差不多所有的主要干部都回国去了，使学赈会好象一个只有骨脊的人体，行三步就要摔两跤，而又为着开始校内工作，余下一些中级干部，又差不多转入校内去，所以当时的干部问题比学赈会初期干部荒是闹到最严重的地步。但是，当时解决干部问题比学赈会初期又大有不同，增加了许多困难，因为：

①政治形势比以前更加恶劣得多，很多认识不坚定的份子都会裹足不前，不肯参加工作。

②以前有一批学救、抗救所准备下来的基础而且又有些内地流浪到香港来的救亡分子，所以形势一有利，一声号召就可招揽到一批干部，而现在这些分子回国去了，那就不得不从事「头」一点一滴的培养一些本地干部。

③当时学赈会领导干部比以前是在质量上弱了很多，

经验与能力都比不上，因此培养干部的工作是当时一个最中心、长期的、艰苦的工作。一方面依靠校内工作的开展，从那里源源的输送一些干部到学赈会；另一方面本身又要集中一切力量抓紧这个中心环节，从事于一点一滴的从下面培养与提拔。由于香港学生的热情，只要领导正确，问题仍然有可能解决的。

首先，首先在学赈会宣传部干事会中组织了一个社会科学研究会，有系统的阅读社会科学书籍，规定了读书计划，每周集会、时事报告、读书报告、问题讨论等，从这里去提高干部的认识与政治水平，由学赈会主要干部负责领导，参加的有三十人左右，他们都是群众中的活动分子，一面工作一面研究。其次就是利用暑假的机会，组织暑期补习班，吸收了一些比较进步的要求教育的青年学生参加在里面，动员他们参加实际工作，由学赈会主持邀请文化界先进分子负责讲课，参加的也有二、三十人，在这样努力的结果，干部问题才慢慢的得到初步解决。

在干部培养工作开展的结果，学赈会的工作才慢慢的整顿起来，首先就是《学生呼声》的发行，每月一期，每期出版一千份。其次就是香港学生报《三月刊》的复刊，这个刊物在一九三八年中就开始筹备，直到一九三八年底才出版，后因经费停刊至一九三九年四月才复刊，是由一些以前的学赈会干部如林家耀、郑之焕等负责，是一个小型低格作为一般的学生教育刊物，三月出版一次，每期出版五千份，有几百长期定户，共出了三期，因经费关系和郑之焕等经国民党的拉拢而动摇才暂时停刊。

至于群众活动小组也渐〔渐〕的活跃起来了，作风也开

始转向青年化、多样化。儿童团的工作继续有点发展，约有三百人，恢复了歌咏班，差不多有一百人。组织剧团约有三十人，球队如乒乓等也开始组织了。同时，休假日也常发动什么海浴会、旅行会等。在女学生方面，更组织了女学生团（简称女学团），团结在学赈会下面的约有八百多群众。

女学团的组织。女学团发动组织的原因一方面因为想独立发展女学生工作，另一方面根据学赈会的实际情况，动员工作的缘故，留下在学赈会的都是些女学生干部，男的很少，同时香港又是男女分校，封建思想很深，好一些女同学到学赈会见男女混杂而不高兴，不肯参加工作，因此就感觉有组织女学生的独立团体的必要，使它成为一个团结与训练一些女学生的组织。以当时学赈会的女干部为基础发动组织女学团，利用暑假的机会计划发展到一千团员，成立之日发表过告全港女同学书（全港空前第一次发出），在两个报纸出过成立特刊，暑假后约有二百多团员。一千团员计划的不能实现，因为一方面估计有点太高，另一方面由于学赈会的男干部反对组织女学团，整天拉着那些女干部负责学赈其他工作，如女学团团长梁欢笑同志，大部分的时间化〔花〕在学赈会而不是在女学团等，经过说服后，暑假已差不多完了。在女学团中有一个妇运研究会，有四十多人，有歌咏班、乒乓球队等，经常举行的有海浴会、夕阳会，每次约有七、八十人，大多数都是非团员。也曾组织过一个妇女工作团，有七个人（动员工作中已说过），到惠阳县工作去了。也曾推动过〔个〕别团员以个别名义去帮助开展女工工作，成立了展

钟社的、冯强胶厂、圣芝高糖果厂三个女工夜学，约有二百多人。

对青年会的工作并没有什么开展，只是派了一个同志参加青年会，但并没有很大的作用。

5. 党的领导

一九三九年春，钟明同志调动工作，特委青年部由余化同志负责，仍然是直接领导学赈会党团。当时党团书记是谢裕德同志，后来调由梁瑞昆同志负责，并于四、五月间成立了香港、九龙两区青委会。特委青年部仍一人，没有成立青委会，支部仍由区委领导。

在工作进行中，首先就发生了学赈会党团与各学生支部的不配合的现象：学赈会党团决定的工作，学生支部的同志不晓得，而另有自己的活动，因此，党团与支部间的纠纷时有发生。后来决定了党团的工作决定应该由党团的同志，在学赈会提出，说服群众而由会议正式通过，成为决议，通告各段委会、各校，假如在会议中发生辩论，就应该用正确的民主的办法由群众自己选择决定之，克服过去的从原则问题直到琐碎的办法都先由党决定通知全体党员举手赞成的，用党来包办群众组织的作风。支部任务除了原则上的问题提出研究讨论使到统一，但是仍然保持它的独立活动，详细的办法，可以作种种的建议由群众表决之。但是，一经学赈会会议决定后，支部工作即应该成为决议执行的保证，并动员党员及群众起模范作用，党团与支部间的纠纷才渐渐的被克服。

要顺利地开展校内工作和培养干部，必须加强对支部的领导和支部教育工作，特委青年部定期的要求区委做学

生支部工作报告，并提出意见作为区委的参考，用最大力量建立校内支部，并经过对同志关于这问题的说服工作。暑假以后，党员发展到差不多三十余人，建立了四个学校的校内支部，估计到校内工作开展的结果，必然会更大的产生与友党友派的磨擦和对顽固分子、投降派的政治斗争，因此，特别注意加强党的纪律教育和阶级立场的教育（虽然当时顽固分子的工作并不好，和我们还没有发生过很多斗争）。首先表扬梅芳女中支部的领导群众打击汪派的例子，其次就进行过严格批评华南中学支部伍庆林执行决议中动摇的错误——在华南中学周公礼利用流氓（该校学生）威胁伍庆林要他选举华南正校代表为学赈会执委（该代表是这个流氓的哥哥），不然就武力对付。在选举会中伍中途妥协举手赞成。再其次，反对过华仁中学支部书记的英雄主义，在群众中用个人领导代替组织领导，执行决议是阳奉阴违，用个人意见去代替党的决定。在这些说服与斗争中提高了该支部的党性与阶级性，而且把这些例子作为各支部教育材料，而收了一些效果，并随时随地的把握各种材料，如街头现象、电影等，用阶级立场批判的态度作出分析与结论，去养成同志的阶级仇恨和阶级观点，这种办法最容易为同志所了解和高兴的接受。

巩固党的决定传达到香港以后，对学生支部是有计划的进行着检查工作，检查的结果一般的没有发现什么严重的问题。但是，有这样一种值得注意的现象，民族觉悟相当好，阶级觉悟比较差，他们参加党的动机就是求得民族解放，信服党政治领导的正确，觉得只有共产党才能保证民族解放的最后胜利，以至改革目前社会，建立共产主义

社会。当然，象这样的了解本来已经不错，不过要是当为一个共产党员，那就还嫌认识上太幼稚。象这样幼稚的党员，约占学生党员全数三分之一，这不能不唤起党很大的注意。但是，当时党对这些分子还存在着一种不正确轻视的观点，对于他们估计得太坏了，觉得没有什么希望，而把他们搁在一边，甚至竟然在统计中不把他们当作党员，没有采取更多的说服与斗争的教育办法。这个不正确的偏向充满着当时整个时期的领导，区委会也从来很少讨论过学生支部的工作，所以学生支部工作的整顿最多只能得到一般的水平，虽然不会怎样的坏，但是从来也不会产生过什么模范支部的例子。这当然一方面由于香港学生质量上的先天不足，但另一方面这种偏见的存在也不能不是做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

党内轻视知识分子的偏向，当时实在成为一种作风，直到一九三九年底还是严重地存在着。

6. 工作总结

党对政治形势转变后的香港学生运动的估计与决定基本上是正确的，这已得到事实所证明，工作执行的结果，是做出一点成绩的：建立了初步的校内工作基础，保持着党对学联会的领导，恢复了学联会的活动与保持着与群众的联系，建立了女学生独立的组织，开辟了今后女学生工作大踏步向前发展的道路。

但是，这些成绩还是大大的不能令人满意，党所给予的任务还没有胜利的完成，特别是表现于校内工作与干部训练作〔做〕得不够，这个一方面是因为政治形势已经和以前不同，工作已由烘烘〔轰轰〕烈烈的大规模发展的形势

转入一点一滴的埋头苦干的形式，干部对这个工作的不熟悉和没有经验，而且，干部在那时候实在太空了，但是，主要的还是由于主观上领导有缺点，首先就是不只是一般干部不了解和不熟悉这个工作，实在青年部本身还不了解和不熟悉这种工作的，所以不能很好的转变过来。其次，因为青年部本身是这样，所以没有很好的说服与教育党的干部，使他们能够了解与胜任的执行这个工作。再其次就是党内轻视学生工作的倾向，使支部组织没有得到必要的发展与健全，党员的质量与能力没有达到必要的提高，使群众中干部的训练与提拔不能不受到一定的限制。

(四) 一九三九年底香港学生组织现状

1. 校外学生组织 (1) 香港学生赈济会组织现状

名 义	一般会员	实际会员 执行工作	宣传出版		组 织 活 动		
			名称	份数	名 称	性 质	群 众
香港学赈 会	620学校 800个群 众	100校 650人	《学 生呼 声》 (一 周刊)	1000	社会学校 研究会	干部训练	30
					歌咏班	一般的	100
					话剧团	一般的	30
					乒乓球队	一般的	25
					儿童团	小学生	380
					女学团	女学生	240
儿 童 团 (附学 赈会)	380人	300人	儿 童 团、青 年×× ××	50 400	训练班	干部的	30
					歌咏班	干部的	20
女学团 (附学 赈会)	240人	200人	在筹 备中		组织研究 会	干部的	45
					歌咏班	一般的	60
					乒乓队	一般的	20

说明：①这个统计是不完全的，只能就记忆所及的填上去。

②这个统计除总数外，一般的都是一个估计。

③实际会员指一般的经常到会或经常的执行工作，响应号召而言。

④临时性的组织没有包括在内。

(2) 香港基督教青年会组织现状

名称	男青年会	女青年会	中青团(附学联)	华光团友光团	基督教学联会
会员	40000	2000	100	1000	19校
百分比	30%	40%	80%	95%	100%
建设	[××2所]、青年宿舍2座，大礼堂2间、篮球场4所、乒乓球桌6张、网球场2、小足球场2、羽毛球场2、图书馆2	×××× ×××× ××××	男青年会	女青年会	男青年会
宣传出版	××××份数 香港青年会热情买进了一次××品(10多页)	××每月一次 ××××	×××× ××××	没有	没有
	5000	5000	不详		
组织活动	名称 中青团、基督教学联会、歌咏班、乒乓球队、篮球队、羽毛球队、足球队	华光团友光团	×××× ××××	×××× ××××	没有
	性质 干部的、联合会的、一般的、一般的、一般的、一般的	一般的	×××× ××××	×××× ××××	
	群众 200人15校300人50人，40人40人 不详	2000	223 157	60 50	

说明：①这个统计只根据当时所知材料，②临时组织并没有填上，③华光团、友光团是以学校为单位，指各小

2. 校内组织

(1) 在它直接领导的校内组织(共八间、学生总数3000)

校名	性质	学生	×××	出版	组 织 活 动			党 员
	学校× ×				名称	性质	群众	
梅芳中 学(学 会 员)	国家主 义派 没有组 织活动	400	学生会 (班会)	壁报(报 周)刊(全 学期一 次)	①座谈会 ②歌咏班 ③篮球队 ④××球 队	①干部 ②一般 的 ③一 般 ④一 般	①20 ②40 ③30 ④40	支部(4) 学生会 主席
正风女 校 (同上)	进步分 子	250	学生会 (班会)	壁报 (组)	(不详)			支部(4) 学生会 主席
陶秀女 中(同 上)	比较开 明	300	同上	壁报 报刊	(不详)			党员(2) 学生会 主席
丽泽女 中(同 上)	同上	400	××× ×××	壁报组 校刊会	歌咏班 (其他不 详)	一般	(不详)	党员(2) 筹 赈会主
华南中 学(九 分校) (同上)	国民党 系 ××× ×××	500	学生会 (班会)	壁报组 ××× 特刊	①歌咏班 ②座谈会 ③篮球队 (其他不 详)	①一般 ②干部 ③一般	①80 ②20 ③30	支 部 (3)学 生会主 席
华桥中 学(同 上)	国民党 系	600	学生会 (班)	(壁报通 讯)不定 期副刊	1、歌咏班 2、座谈会 3、话剧团 4、文艺研究会	一般的 干部的	不详	党员 (1)学生 会主席 有威信
广州大 学(同 上)	国民党 系	150	学生会 (班)	壁报 ×××	(不详)			党员(2) 学生会 主席
华仁英 文中学	比较开 明	400	学生会	两班有 壁报	歌咏班 (不详)			支部 3学 筹会主 席

(2) 有个别党员活动的学校 (2间, 学生总数390)

校名	学校当局	学生	出版	组织活动	党员
华夏学院 (学 赈会员)	托派的	140	壁报	(不详)	党员出 席学 赈 会 员
中华职业学校	进步分子 (教务主任与吴先生是党员)	250	壁报	妇女座谈会 (义务, 工厂办) 歌咏班、话剧团等	党员2

(3) 顽固派、投降派、托派主持下的学校

校名	学校当局	学生	出版	组织活动	领导方式
德明中学 (学赈 会员)	西南派 (区芳蒲) (当时还是中间分子)	300	壁报	话剧团、歌咏班、体育活动、童子军 (60人)	主要是依靠童子军为基础, 其他组织则企图由教职员包办统一之
文化中学 正分二校 还有一女校	蓝衣社 (罗伟疆)	700	同上	体育活动, 全校学生会, 三青团 (10人)	依靠三青团包办学生会, 三团组织内容不详,
导群中学	蓝衣社	300	同上	体育活动, 全校学生会、(其他不详)	教职员包办学生组织
民范中学	蓝衣社 (何础)	180	同上	体育活动、全校学生会、童子军 (60)	主要是把握童子军, 但不见得有什么大活动。
岭东中学 男女二校	CC系	250 + 150	同	体育活动、全校学生会、歌咏班、童子军 (80)	由黄淑陶派出童子军教课组织童子军, 其他没有活动。
仿林中学	托派	250	同	全校学生会 (其他不详)	并没有很大的组织活动。
长沙书院 (小学)	托派	190	没有	不 详	欺骗收买个别学生

- 说明： a. 这统计并不完全，只包括主要的学校。
 b. 关于黄淑陶的童子军组织还有三、两间学校未有列入。
 c. 这些学校全部会都没有我们的工作。
3. 党的干部统计（党员总数38人）
 （1）群众干部统计表（非党的）

类别	工作地区	学 员 会		校 内 工 作		女学团	儿童团
		男	女	男	女	完全是女的	十八岁以下
群众干部		15	5	30	20	10	20
右倾群众		40	10	80	40	20	30

- 说明： a. 所谓群众干部是倾向我党而肯做工作的。
 b. 所谓右倾群众是同情我党，赞成党对抗战的主张的。
 c. 总数：群众干部约共100人，右倾群众共约220人。

（2）党的群众工作干部统计：

类别	总数	性 别		党 龄			教 育		工 作	
		男	女	37	38	39	中	大	校内	校外
甲类	5	4	1	1	3	1	2	3	3	2
乙类	18	8	10	0	12	6	18	0	10	8

说明：①甲类是能够根据党的决议计划领导一个学校或一个团体的工作的。

②乙类是根据党的决议能够积极执行或领导30人左右的班或小组织的。

(3) 党内组织工作干部统计:

级别	总数	性别		党 龄			家庭			教育	
		男	女	37	38	39	商	学	工	中	大
区委	2	1	1	1	1	0	1	1	0	1	1
支干	7	2	5	0	5	2	4	3	0	7	0

(五) 香港学生工作总结(一九三七年初至一九三九年底)

1. 整个时期的香港学生运动基本是完成了党给予的任务, 虽然国际宣传的工作并没有作好, 但是在组织行动上提高了学生群众的民族觉醒; 在动员工作上, 输送了大批的财力、物力与人力, 特别是大批的知识分子到国内去支持与开展着保卫大广东的斗争; 在日常工作中教育了群众, 锻炼了干部, 加深了青年学生的左倾情绪, 而团结在我党的周围。

2. 三年来的香港学生工作是一个启蒙运动的过程。今启蒙运动的主要内容是唤起民众抗战, 提高群众的民族觉悟, 在这一点上, 三年来的工作是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但在另一方面, 并没有注意到改善学生群众的日常生活, 改善教育制度和教育内容, 实行国难教育等的斗争, 去提高群众的政治水平与文化水平, 使香港学生的思想更提高一步, 克服目前的愚昧无知的状态。虽然这个工作没有做

好，客观上是受着历史行程的限制，在抗战初期，特别是在香港学生工作的初期，群众还没有这个觉悟的水平，不能强调这个问题。在政治形势转变后，这个工作应该开始从这里去展开校内工作，去团结广大学生群众，虽然方式上不能做成大规模的运动，而是个别的一点一滴的进行。因此，香港学生启蒙运动只是完成了一面，另一面的任务不得不留在今日去完成。

这个工作之未提出注意，由于：

(1) 把学生运动之了解得太简单化，以为学生救亡运动就是等于整个学生运动的内容，而没有看到学生工作的另一方面——改善学生日常生活和教育待遇的一面。

(2) 只是看到学赈会不应该把它做成好象学联合会，学赈会依然应该做学赈会的名符其实的工作，但是没有明确地看到学赈会只是香港学生工作的一种方式，学联合会的工作——改善教育待遇等的实现日常要求的工作依然是学生工作的一个重要部分，不放在学赈会去做，那就应该放在党的青年部的肩上领导起来。

(3) 由于重组织轻宣传的倾向的存在，好象《学生呼声》的出版已有八百长期定户的基础，出版了十期，但是，还要中途停刊而没有设法使它继续出版下去；《学生报》出版了几十期，青年部从来也没有写过文章或提出整个意见，让其自生自灭；很多学校的校刊没有注意把握，作为批评课程内容和教育制度的讲台，和文化运动又没有很好联系。

3. 三年来工作的结果，仍然停留于很狭隘的范围，直

到一九三九年底，只有不过十间的校内工作和学赈会的一千群众，学赈会有六百多会员学校的广泛活动园地，在全港学生中有着相当不错的威信，而工作上仍然没有更大的发展，客观上虽然有着种种困难原因：工作刚刚建立起，友党就来抢而引起斗争；在斗争刚一结束，工作正在重新整顿，又来一个动员工作，在动员工作中，伤了元气，不得不花了最大力量整顿恢复，在这种情况下，完全没有生息休养的机会，没有比较长一点时间的整顿、训练。但是主要原因还是由于：

(1) 对校内工作抓不紧，并没有把校内工作当作开展学生运动的最基本的组织工作。在与友党的财政问题斗争未发生以前，就已经提出校内工作的任务，但是直到政治形势转变后才真正的开始，而并未见得做得好，这反映了香港学生的幼稚虚浮、不实际的特点。但是，主要的由于没有真正的开展为实现群众的日常要求而斗争，没有办法真正的动员、团结校内的基本群众，校内工作仍然是停留于做些一般的救亡工作，没有注意到群众日常注意的问题，这个任务未被提出，因为一般的学生干部都离了校，没有上课，没有去接触学生群众，而变成了脱离学校的救亡专家，因此，只是满足于一般救亡工作的成绩，而不会感觉到是开展为实现群众的日常要求而斗争的必要。

(2) 对于干部问题抓不紧，从来也没有真正的研究与讨论过培养干部问题。这点由于根本就不注意培养干部的工作，因为在学赈会工作的初期，环境相当好，工作又容易开展，而且在抗教会、学教会时期已准备好了一些干部，所以只一号召就能团结好一些干部参加工作，根本就

不会真正的感觉到干部缺乏的困难。其次就是由于在工作中养成的军师作风，这个意思并不是什么个人领导，什么不集体不民主，而是另一种情形，因为在学赈会中，党的青年领导同志自己参加了公开工作，虽然不是什么执委常委，而是一个组织部的计划干事，但是威信非常高，不论上层下层及干部都信仰他，提出工作意见虽然经过会议的讨论与民主表决，虽然分配工作时是经过对方的同意，但是，毫无问题的一定不会有人反对或不同意，而就这样地执行了，一般的干部自己从来也很少准备意见，而只是去听“军师”的灵机妙算的指示，所以干部的进步是很慢，严格的说来，根本就很难培养与教育干部，这种不良的作风就这样的传了下来。再其次就是干部的调动太多，使他们没法安心于自己岗位积累经验，好象动员工作时期，好一些负责方面的工作干部补充了一些校内干部，因为学赈会无人主持，又不得不出来兼顾学赈工作。

(3) 狭隘的工作作风。没有大政党的宽大为怀的统一战线的风度，关门保守，拒人于千里之外，没有与朋友共同工作的精神，所以就不得不引起友党以及他要来抢。工作太政治化，太突出、孤立，没有与落后群众一同进步的耐心教育的精神，所以大部分的英文中学的群众都永远掉队在我们很远很远的后面，使青年会因嫉妒而破坏我们。对统线领导存在着宗派主义的观点，×领导权的取得了××对党的包办，所以群众都是党的这部分群众带动下一部分群众的统一，而没有真正的与各党各派共同工作中掌握群众，率领群众向着党的统一战线纲领走。这个作风之所以形成，主要是：

①工作开始时并没有其他党派的工作，而是党的独立发展在工作有相当基础时而党才来参加工作，就形成朋友党向我抢群众的现象，所以就造成我们对他们成见而把门关起来。

②友党在香港并非统治者，工作又比不上我们，所以就引起了我们的轻视，对他取着无足轻重的不理态度。

③学救、抗救时期的宗派关门主义的影响。

六、香港青工工作

(一)香港青工的一般概况

1.青工数目估计表

总数	学徒	产业的	非产业的	青年职员
150000	37500	50000	60000	2500

2.青工生活待遇估计表

类别生活	每月工资			每日工作时间			食宿	
	最高	一般	最低	最长	一般	最短		
产业的	9	10	4	18	12	9	自己	自己
非产业的		7	2	8	15	11	资方	资方
青年职员	60	15	9	18	12	8	自己	自己
学徒	18	2	0	18	12	10	资方	资方

说明：

①产业的主要是纺织、机器、海员等。

②非产业的是店员、佣人、洋务、酒楼、茶室等。

③学徒主要是店员、机器等。

3. 抗战后青工的生活状况

根据上面的估计，青工约占全港工人总数四分之一，占全港人口总数百分之八，主要的以店员、纺织工人、佣人为最多，学徒约占青工总数百分之二十五，以店员、机器为最多。

抗战以后，特别是广州失陷后，大批失学青年集中在香港，很多是从内地或附近沦陷区跑出来的，不特饱尝着中途失学的痛苦，而且流离失所，有家归不得，即敌人铁蹄尚未踏到的地方亦在战争影响下，农村破产的程度更一发不可收拾，如广东顺德等地以前丝业还可以免〔勉〕强维持，挨〔涯〕过日子，但在今天，即最低限度的生活亦无法维持，因此不得不跑到香港这块“干净地”找立足之地，由于生活的驱使，不少的中学生失学青年，跑到工厂或店铺里面，做一天十五、六小时的工，拿十块八块钱维持生活，因此抗战后原有的青工失业的并不多，但由于这个影响，青工失业的指数就大大的增高了。

失业工人的增加，必然会引起工人生活的痛苦，在青工里面，减少工资的现象并不见得怎样明显，聪明狠心的资本家，却更有着种种杀人不见血的办法，在这里可以看到两种这样的现象：第一就是裁减成年工人与技术工人，大量招收学徒代替他们的工作，或者延长学徒年限，以学徒的工资做着技术工人的工作，如香港生活书店分店就是正在忙个不了的登广告招收大批的练习生，而店里的旧店员正在人人自危，一朝一夕就会有失业的危险；纺织厂里面也整〔正〕闹着这个把戏；至于一般的机器工人，学徒的年限已从三年到五年；在汽车厂里面简直分不清学徒与

技术工人的工作，拿着十四块钱的汽车厂学徒却是每天忙着三、四十块钱的成年工人的工作，正因如此，汽车交通发生危险的事一天天增多，不少由港运往重庆的车辆，行不到两天而掉了一个轮而全车覆没，这就是香港汽车厂老板们的杰作。人们的血正是这样增长着资本家的财富，这个办法就是香港资本家利用来代替减少工资，剥削青工的新花样，这不是个别的现象，而是抗战后普遍的公式。第二种现象就是提高技术，增加新机器，加重成年工人或技术工人的工作，而大批的裁减学徒，当然，成年工人的工资也不会因此增加，这种事实大都发生于比较大规模的工厂，或抗战后新设立的工厂里，如象一些罐头厂、大印刷厂（如中华书局）等，不过，在香港大规模的工厂并不多，一千人以上的不上二十个，资本没有上海那样集中，所以这个还不能成为剥削的主要方式，因而影响于青年学徒的失业也并不大。因此，抗战后香港对青工的影响，并不在于原有青工失业之增加，并不在于一般工资的怎样减少，而在于工作的加重、工作时间一般的延长而引起健康的损害。

工作的加重，时间无比的延长，香港青工的生活更加痛苦了，而因物价的高涨，生活程度日高，使青工更陷于无法应付的地步。一般的物价比以前增高了两倍到四倍，特别是房租增高了四倍，一个小小的房间非十块钱租不下来，虽然米和土布只增高了百分之六十至八十，但普通的生活负担是提高了百分之三百八十五，因此战后的今天一般的每人每月的生活费，只伙食最低亦须五元以上，加上其他杂项、房租，这个数目就吃不消了。特别是产业工

人，每月拿到十块八块，而且还有什么九五支薪，什么救国特捐，其实这些都在资本家袋子里，工人实际的工资并没有这么多的。所以很多的一家四口，三个儿女都出来做工，生活也非常困难维持，个中痛苦，也就不难想象了。而香港政府不特不注意平定物价、改良待遇或救济等，而且在工人斗争中还赤裸裸的对工人说：“香港的米菜，不是给没有职业的游民吃的。”唯一的办法就是驱逐出境，睡在街头就是有碍市容，就会受到拘捕。还有什么自卫团啦、后备警察，就是送给工人们的最高礼物，因此，不能不引起青工不满情绪的高涨，他们正在热望着中国抗战的胜利与民族的真正自由解放，他们诚挚的信仰八路军、新四军，懂得只有他们才是青年工人以至全民族的救星，香港青工思想一天天的左倾，已成为无法否认的事实。

4. 香港青工的特点与开展青工工作

(1) 抗战热情非常高涨。由于生活的痛苦，由于直接受到帝国主义的压迫，香港青工的抗战情绪是非常高涨的，每次的救国募捐都有很好的成绩，而且相当普遍，他们宁愿把自己的生活费省下一部分献给国家，自己忍受着更痛苦刻苦的生活。在义卖运动的时候，每个工厂的工人都举行着献金竞赛，大批的青年工人和青年妇女放下他们的工作，参加万余人空前未有的游行。在动员工作刚发起时，在一个大工厂里就有四十多个工人回国参加游击队，里面就有一半青工，因此在每一个救国工作中，他们都是站在最前列的。

(2) 爱好活动是香港青工的第二个特点，他们参加什么组织的虽较少，但爱好活动却是普遍现象。特别是爱

好体育，其他的歌咏、口技都来一套，小足球队的组织是很普遍的，好些的店员每天作十六至十八小时工作，但每天早上店门还未开的时候，他们都已在运动场玩起来了，很多团体的组织，如果是体育会、俱乐部的形式，就能很快的组织起来。

(3) 抗战后一向在党的领导下，从来没有其他党派做过工作。就是到了今天，除了我党领导下的团体，其他党派组织的简直没有一个，因此他们都是很纯洁的，没有受过其他改良主义或其他欺骗宣传的影响，一般的都倾向我们，对八路军、新四军有着很好的信仰的。

根据上面的特点，香港青工是很容易组织起来的，只要能懂得他们的抗战情绪与个性，但一般的较其他工人组织难以巩固。巩固青工团体是一个长期的工作过程，因为他们虽然有热情，但是缺乏组织的经验和经济、政治斗争的经验，一般没有参加组织的占绝大多数，从来没有产生过×××有威信为群众领袖，故组织青工是一个长期艰苦的教育过程。

(二) 三年来的青工工作历史 (一九三七年 初至一九三九年十一月)

1. 抗战以前

经过了鲁迅纪念大会、援绥运动大会等工作转向公开合法的尝试，基本上打破了当时群众运动秘密路线的传统，所以解散救国会以后，争取公开，利用合法就成为群众运动的新方向，日益为群众所了解，党就决定了所有的群众团体都要做公开工作，尽可能的在政府立案，取得完

全合法的地位，于是改组凡声社为青年同乐社，课余社为新生社，用旅行、歌咏、乒乓等，办好义务夜学、识字班等，公开做群众工作，并参加了华商总会主持的庆祝蒋委员长五十大寿的大会、献机运动等，跟着不久，又参加了欢迎广东省主席吴铁城大会。从此以后，这些团体的活动事实已经公开起来，成为不承认的承认，不合法的合法团体了，而且都有着比较好的发展，群众约有二百人。

2. 抗战以后

“七·七”事变后，抗战的浪潮很快的就反映到香港，群众的情绪很高涨，筹赈会、救济祖国难民会的组织产生，如雨后春笋，赈济工作马上成为一种群众运动，在党的推动下成立的九龙各社团赈兵灾联合会，争取了香港一个绅士做主席（杜其章），包括了前进的与落后的，合法的与非法的一百五十多个团体，青年同乐社、新生社都参加了活动，更公开的、以合法的面目发动各种筹赈的救亡工作了。

在香港惠阳商会里面，原有党员在那里活动，团结着一部分青年，一九三七年十月间，群众情绪甚为高涨，在反对商会秘书吞没公款及包办会务的斗争中，想以那一部分群众为基础成立惠阳青年会，虽然受到商会的反对，然而他终于另行注册合法了。当时群众有二、三百人，自己独立的找到了会址，进行着各种歌咏、话剧、座谈会等活动，并且举行种种募捐救乡的工作，群众就天天的发展起来，在我党领导下，这种公开合法团体的出现，在香港还是第一个。

香港群众运动在空前蓬勃的下面，国民党也想争取群

众运动的领导，广州的余汉谋、谌小岑等都派人来与各团体接洽，企图组织香港总工会，当时党是犯了“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也想利用他们的力量筹备组织总工会的工作，当然这种过左的企图很快就会受到打击，总工会筹备会附设的地方，香港海员工会就被港政府下令解散。在这种事实的教训下，党就决定把工作转向下层，巩固群众基础，健全现有组织，在一点一滴的工作方式中，抓紧机会建立新团体，因此新生社就改为晨钟体育社，并设法在港政府备了案，不久更成立了妇女部，针对着布厂、纺织厂的女工、各种体育青年进行了发展工作，在通过这样的工作中过渡到建立工厂青工的厂的组织。惠阳青年会组织了一个回乡工作团，回乡开展工作，为今天惠阳游击队的前身。

在一些重工业工厂里面，党的工作继有发展，以支部活动为中心，团结着一些青工群众，在九龙汽车公司建立了学德励志社分社，有四、五十人，一半是汽车公司青工，其他则为失学失业青年。在香港太古船坞建立了致基体育社，也有好几十人，全是船坞爱好体育的青工。在长洲（在香港不远的的一个岛上，渔民区），因为有三两个学德励志社负责人到那边回乡并成立了长洲学德励志社分社，用读书会的形式团结着二、三十个青年渔民和工人。在九龙黄埔船坞中原来就有一个自强体育社的组织，在一九三六年即已成立，有二、三百会员，百八十是船坞青工，因为那边党发展了一个支部，便取得了自强体育社的领导权。新声社本是九龙码头青工的一个落后组织，俱乐部性质的团体，那边我们也发展了党，取得了新声社的

领导权，逐步的加一〔以〕改造而成为今天的进步组织。一九三八年的大半年间，党就取得了这五个团体的领导，他们都进行着各式各样的募捐工作和日常的文化娱乐活动，基本上是把党的青工工作范围扩大了，与广大的青年群众取得了更进一步的联系，在工作中提高了群众的抗战情绪而更加活跃起来。

一九三八年七、八月间，深水涉一带有一小贩，因为受到当时救亡运动的影响，但自己没有钱捐，就把一挑东西拿到街中义卖，卖得的钱就拿来捐给国家。当时党的纺织厂支部女同志就抓紧了这个群众创造的新方式扩大起来，组织了自己工厂一部分工友募捐了几十块钱举行义买，这也就把义卖推动成为哄动一时的群众运动，由开始一个区域扩大到全港。各个工厂的工人，特别是青工，举行着热烈的义买竞赛，由工人与工人间发展到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竞赛，如棉艺制造厂的工人捐出三百元就要资本家独捐三百元，商店与商店间发展到商店与工厂间的竞赛，在群众压迫之下资本家平日以救国捐或救国公债的名义克扣工人工资以自肥的款项也不得不从肚里呕出来还给工人去义买。平日专用日本原料的纱厂资本家，那时也不得不偷偷的把它收起来，摆出热情救国的面孔，苦痛的从腰包里拿出几百块钱参加义买，不到三星期全港捐到七十万以上的数字。在义卖运动中我们动员了各个青年团体参加了宣传工作（如帮助写标语等），帮助了这个运动的发展（如帮助计划、布置，推动群众义买等），特别是深水涉的晨钟体育社，在工作中取得了小贩无比的信任。

在义卖运动发展到最热烈的时期，深水涉小贩把义卖

所得款项结清以后，再把款项由九龙区送到香港华商总会（由他汇转）的一天中组织了空前未有的将近两万人送款的游行，群众由各工厂、街道汇合起来，包括了各式各样各个阶层的群众，工人手中拿着各种标语，举着各工厂、商店义卖竞赛的数字，唱着救亡歌曲，更有广州留港童子军为前导，国术馆、体育会的群众耀武扬威，在群众之前呼后拥中出现着贴满标语的汽车，脚踏车，纠察队横立于其旁，故意在那些采用日货原料的、用救国名义克扣工人工资的资本家工厂面前游来游去，吓得他心寒胆战，面面相觑，这样伟大的群众游行在香港还是第一次。

当这个游行正在筹备的时候，晨钟体育社就成为当时小贩的无形顾问，但是考虑到这种游行在港是过火的行动，必然会受到打击，但群众情绪已不可遏止，因此晨钟社的同志想要退出这个行动，以免遭受到封闭，党及时的纠正了这种脱离群众的逃避观点，而只改变了方式：通知各社团、各工厂群众不要用组织的名义参加，而依然领导了游行。在游行中纠正了群众的过火行动和个别坏分子的捣乱，保持了队伍的合法的、静默严肃的秩序，但结果还是避免不了预料中的打击，队伍虽然胜利的冲破了几次警察的干涉而达到目的地，但几个小贩领袖却被捕了。于是各团体特别是几个主要的青年团体发动了营救运动，推动了一个律师为之义务辩护，发动了几十个商店签名保释，港政府无可如何，只得处罚了几十块钱放了出来，各团体还在群众中募捐，偿还了罚金。整个行动的结果是全港小贩工会的成立。

我们发动了这些青年团体参加了这个工作发生了一些

什么意义呢？

(1) 推动并实际上帮助了这个运动的发展，在运动中显示了中下层群众的伟大力量与抗战热情，揭穿了资产阶级以救国为名的发国难财的无耻勾当，使广大劳动群众认识了资产阶级的本来面目，而更加团结着自己的力量。正在这时又发现了几件资本家吞没救国公款，李星衢（华商总会主席）捐簿里只捐了二元四角等事实。

(2) 在工作中各青工团体进一步的接近了广大的群众，提高了他们在群众中的威信，准备了今后更广泛活动的园地。

(3) 在工作中活跃了自己的群众，提高了工作的积极性。

一般说来，做了这个工作之后，大部分青工团体的工作都活跃起来，而且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如晨钟社就发展了一倍的会员。

3. 广州失陷以后

广州失陷以后，动员工作就成为青工团体工作的中心，主要的依同乡会为基础，惠阳青年会就与余闲乐社等团体成立了救乡的联合组织，后与南洋东江华侨取得联系，又组织了东江华侨救乡总会驻港办事处，通过这个关系，各社团特别主要的是惠阳青年会，其次是晨钟体育社，用个别动员的方式输送了大批青工及其他群众到内地去，数目约在三百人以上（广州失陷到一九三九年五、六月）。去的地方最多的是惠阳游击队、东江服务团，其他小部分就送到学赈会、服务团、学生军等，当时各青工团体送去的主要是人而不是钱（钱也有），利用大团体，如

救乡总会、学赈会等的财力，就把群众送到国内去，因此做了这个工作以后，很多重要的干部都回国去了，各社团特别是惠阳青年会、晨钟体育社的元气大为损伤，直到年底才慢慢的喘过气来。

利用救乡运动的开展，在党领导下成立了西江青年会，有一百多人，积极的救乡工作进行中团结了西江青年群众，主要的还是青工群众。

由于广州的失陷，铁路（广九路）的群众情绪重加高涨起来，有好一部分群众，准备于必要时组织铁路游击队，回国服务。在党支部的推动下，组织了青年生活社，是以读书会的行〔形〕式团结着五、六十个铁路和船坞的青工。

这个时期虽然建立了两个新组织，但由于动员工作与学生方面犯着同样的缺点，各团体本身工作都受了影响而转入整理组织、培养干部的工作中。

4. 政治形势转变以后

国内政治逆流很快的反映到香港。

香港资本家更展开了向工人的进攻，于是工人方面自卫的经济斗争蓬勃起来，如中华书局的斗争，保安公司的斗争等，一天天的激烈。各青工团体就发动了不是用团体名义而是个别的发动广大群众进行经济援助（同情募捐）、慰问工人，主张正义的社会人士呼吁，抗战的工作收了相当的效果，而且在这工作中教育了群众，提高了他们的阶级觉悟。自吴铁城到港以后，很快的开始了对我们团体的夺取工作，晨钟体育社、青年同乐社都有了个别国民党员的活动，但并没有什么作用。在惠阳青年会中，他吸收了

会长李庆祥入党后，更展开了大规模的发展工作，也利用一个投机捣乱分子江日澄（他回到东江与李庆祥一道想利用惠阳游击队和惠青会为资本活动升官发财，在我们拒绝下他们才失望的回来。江日澄以前因为落选，在外间进行破坏惠阳青年会的工作而被开除会籍的）鼓动群众破坏惠青会，结果在我们揭穿后失败了。于是就由李庆祥出来做发展党员的工作，〔对〕发展对象是这样说：“我们都是做救亡工作，而且都是这样积极，假如不参加国民党不仅不会受到国民政府的保护，抗战成功以后论功行赏，而且一定的被人怀疑是共产党，而受人家严重的打击。”他们则以这样的方法来发展党员，但没有很大的成功，整个惠青只不过发展了五、六个人吧〔罢〕了。

三、四月间，省青委青年工作决议传达到港以后，我们也研究过在职工会成立青年部的问题，我们党及在党领导下的工会成立青年部是不适合的，这样只有使这些工会工作突出中又突出，暴露中又暴露，因此青工工作的发展不是在我党领导下的工会与群众，而是向没有组织的群众发展。首先的任务在于整理与巩固现有的团体；其次应该在工厂里建立青工组织，向黄色的工会或同乡会去建立青年部；再其次才使〔是〕在我党领导下的工会建立青年部的工作。因此想巩固那些因动员工作而伤了元气的团体，成为当时的中心工作。青年同乐社、惠阳青年会跟着成立了妇女部。

说到党内青工支部的工作，从来没有明显的分开而成为青工支部的，一般的青工都是以厂为单位和其他工人混合组织的，后来才把一些失学失业青年党员以工作地区

(如团体)为单位的组成三个混合支部,领导该团体的工作。在广州失陷以后,晨钟社、青年社、惠青社、学德社成立党团,由区委青年部领导,其他团体依然是由支部领导。

(三)香港青工组织目前状况(1939年底的统计)

青年团体状况

(1)党直接领导下的青工团体

名称	人数	性质	群众	出版	组织活动		历史	党的领导
					名称	人数		
晨钟体育社(九龙区)	290 实际 180	体育会	青工 女工	未定期壁报	乒乓球队	8	1938建立 名课余社 1939年初 改名晨钟 体育社	上下层都能把握,一向在党领导下,有二国民族活动,但无大作用
					小足球队	12		
					话剧团、	12		
					音乐班、	10		
					歌咏班(妇女部)	30		
					座谈会	140		
	20—30							
惠青会(有三个分会)(九龙区)	一般 1200 实际 900	同乡会	青工 90%	《惠阳青年》月刊一月刊	乒乓球队	25	1937年建立	整个团体都能掌握,一向在党领导下有三民党活动,××,有二党员。
					小足球队	40		
					2歌咏班	140		
					3话剧组	30		
					2座谈会(妇女部)	15		
						85		

名称	人数	性质	群众	出版	组织活动		历史	党的领导
					名称	人数		
青年同乐社 (九龙区)	180 实际160	读书会	青工、失年 少数青年	不定期的 油印特刊	座谈会 班话组(其 妇女部)其 他不详	30 45 25 约35	1936年 建立,名 同声社	有五六个同志,全都能掌 握,妇女部长是国民党CC 系的妇女(?)
自强体育社 (九龙区)	350 实际280	体育会	黄埔船 坞青少离生 工,分校学生	不定期油 印特刊	座谈会 足球队歌咏(其他 青年)不详	40 30 25 60—80 30	36年 38年 建立取 得领导	有三四个同志活动,能掌 握,有国民党党员三人,是 执委,其一是非常委
学德励志社 (九龙区)	100 实际80	读书会	九龙汽 车公司占 青工60%,是青 其他校 离年	没有	座谈会(其 歌咏班(其 他不详)	20 30	1938 年建立	有四五同志活动,上下都 能掌握
新声社 (九龙区)	100 实际70	俱乐部	九龙货 仓码头 青工	没有	话剧组(其 歌咏班(其 余不详)	不详 20	旧团 1938年 建立取 得领导	有三四个同志活动,全部 能掌握

青年生活社 (九龙区)	70 实际60	读书会	大部为青 铁路青 工,其船 工,为青 埠青工	没有	座谈会 文艺班 歌咏班 国语班 小足球队	20 8 30 20 15	1939 年建立	有二个同志负责,一般的 能掌握
西江青年会 (九龙区)	130 实际100	同乡会	青工 90%	不定期壁 报	不 详		1939在党建 领导下建 立的	有三四个同志活动,能掌 握
致安体育社 (香港区)	100 实际90	体育会	太沽船 坞造船 青工	不 详	不 详		1938年立 建	有五个同志活动,能掌握
长洲学德励志 社(长洲)	60 实际50	读书会	长洲青 工,青民 年渔民	不 知	不 知		1938年立 建	有两三个同志去活动,全 部能领导
总 数 团体10个	一般2490 实际1970	读书会 3同乡 4会俱 2部1	百分之五 八以上为 青工。				36年3 37年1 38年4 39年2	一般的全部能在党领导下 进行工作。

(2) 非党的青年团体:

名称	人数	性质	群众	出版	活动	领导人	历史
南华体育会	3500	纯粹体育会	青年50%	出版会刊 (月刊)	各种球类、游泳与其他娱乐	资产阶级上层分子	十余年
中年体育会	1500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钟声慈善社	1200	体育及慈善事业	青年35%	不定期会刊	体育活动及各种慈善事业	同上	同上
深水步体育会	400	纯体育会	全部是青年，青工占70%	无	足球队最活跃，其他一般的	一些非产业部门青工，与晨钟体育社有联系	1936年建立
青年学社	30	读书会	失业青年左倾青年	不定期油印刊物	话剧组、读书会等	一些左倾青年与学德励志社有联系	1937年建立
总数五个团体	6630	体育会4个 读书会1个	青年50%				

2. 青工干部统计

(1) 非党的群众、干部统计表(女的在内)

团体 名称	晨钟社	惠青社	青同社	自强社	学德社	新声社	青年社	西江社	致基社	长洲体育社	结数
群众干部	8	12	10	8	5	4	4	6	5	4	66
左倾群众	15	20	30	20	10	8	6	10	15	5	139

(2) 党的群众工作干部统计表

类别	总数	性 别		党 龄			成 份		教 育	
		男	女	37	38	39	工	农	小	中
甲类	11	10	1	3	4	4	4	7	4	7
乙类	22	19	3	6	4	12	15	7	17	5

说明:

- ①甲类是根据党的决定能计划领导百人以上的干部(团体的)。
- ②乙类是根据党的决定能计划领导二十人至三十人的小组的干部。

(3) 党内组织工作干部统计表

职务	总数	性 别		党 龄			成 份		教 育	
		男	女	37	38	39	工	农	小	中
区委	无									
支书	7	6	1							

说明：

①纯粹作党内青工工作的干部非常少，很多青委支书都是兼任群众工作的。

②这里说的是指那些以党内工作为主的干部。

附：青妇团体目前状况统计表（党直接领导下的）

名称	人数	性质	群众	出版	组织活动		历史	党的领导
					名称	人数		
七姐会	890	姐妹团体（封建性的）	未嫁的青年女工	无	分为小团厂	以工单周为位每开会	1937年初至39年才大发展	约为二三十个同志活动，能掌握
九龙教育服务团	100	教育团体	女工	无	歌咏班 国语班 女工夜校 其他不详	30 20 另写	1938年建立	整个团体都能掌握
九龙城夜校同学会	30	读书会	女工	无			1939年建立	有同志领导
女工夜校	500	学校	女工					同上
大同读书会	60	读书会	大同罐厂工人		歌咏班 国语班 其他不详	35 20	1938年建立	有十二个同志在活导人全厂工
总数	1490		全是女工	无				

（四）青工工作的简单总结

1. 三年来的青工工作，党在政治上的领导基本上是正确的，依靠于学救会时所准备下一点旧基础，把握每个形

势的特点，针对着大产业部门的青工，一点一滴的建立了好几个重要工厂的初步组织，吸收了一些青年帮助了这个工作的开展，团结着一些青工在我党的周围，输送了大批人力物力到国内去，特别是到我党领导下的游击队去，而成为惠阳游击队的主要基础。在工作中推动了中下层的群众运动的开展，提高了他们的民族情绪与抗战的积极性，所以说基本上是完成了党所给的任务。

2. 一贯来青工工作的特点，同时就是最大的缺点，太一般化，与青年工作千篇一律，不能真正的深入的去注意青工的切身问题，改善青工的生活，更广泛地去团结青工群众。这点由于：

(1) 和学生工作一样，把青工工作单纯化，救亡工作就是青工工作的唯一任务与内容。

(2) 一贯的对青工工作没经验，不懂得如何做，不比学生工作有着明确的系统，青工工作不是与一般的职工运动，就是与一般的青年运动混在一起，分不清楚。就是今天来估计青工数量等，还弄不清在什么条件下才算是青工，工人支部里也没有成立青工小组的，因此青工工作必然的走向一般化了。

七、党对青工工作的领导

(一) 青委领导机构

香港青委领导机构从来没有明显的确定，是从摸索中碰了钉子才一步步的健全起来的。自香港市委青年部成立以后（一九三七年底），青年部的工作、组织制度究竟怎

样，完全弄不清，在“见一步做一步”的情况下就工作起来。青年部、支部公开工作都是一人，经过学赈会的财政问题斗争以后，才觉得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不分开会发生危险，于是青年部长不做公开工作，仍然领导支部（给市委代管），学赈会党团也正式建立起来。一九三八年十月间，东南特委青年部正式成立了，不管支部工作，直接领导学赈会党团。不久，香港区、九龙区的区委青年部也成立了，领导着该区的青年团体、党团，那时党内青年工作的规模才建立起来，但仍不健全，特委青年部只有〔一〕个人负责区委的青委，因为动员工作的关系，屡次调动，每每是一个同志刚刚负责，了解了情况，就忽然调来一个新同志来代替工作，结果青委会天天在了解环境，而总了解不清，实际工作问题特委青委或区委负责人不出席就搁置无法解决。一九三九年十月香港重新成立市委，东南特委解散了，因为干部缺乏，市委青年部就无法建立，学赈会党团仍然保持由市委书记直接领导，其他团体的党团都解散了而由支部去领导，党内青年工作系统就暂时没有了。

青委领导机构虽然在某一时期内也曾健全过，但青委的同志对整个青年工作的系统弄不清的，虽然规模建立起来，但仍在“见一步做一步”。除了学生工作系统比较明确的了解以外，其他青工，青妇工作就没有讨论或研究过，学生工作是这样做，青工、青妇的工作也这样做，反正今天青年工作的任务就是参加抗战，这就是青年工作的唯一任务了。

由此可见：1. 香港党内的青年工作领导机构从来就不健全，而且也没有健全过。2. 香港党对于青年干部的调动

太多，使他们没有安心工作，积蓄经验，使青年工作的领导机构健全起来。3.香港党从来没有计划研究过培养青年干部的问题，使香港党青年干部自始至终都闹恐慌，今天该市委青年部因为干部缺乏而无法建立。

这个现象的来源虽然有着客观条件的困难，但主要的却是香港党一贯的轻视知识分子，轻视青年工作，没有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到党内来，没有在青年支部进行耐心的说服教育工作，没有注意加强青年工作的领导，如青委会的无法成立，长期的只一个人单独负责，如九龙区的区委书记就是以前特委的青年部长，自己并不出席区委青年会而交另一个区委不大懂青年工作的去领导。这种轻视知识分子，轻视青年工作的现象估计起来，今天香港党自然会存在，如果这个倾向不克服、整理与健全，香港的青年工作是没有可能的。

（二）上下级的关系

香港青委领导机构的上下级关系一向是较好的，密切的，青委与党员每周开会一次，接头一次，区委与青委也如此，最低限度也有接头一次。特委青委与区青委保持着必要的联系，两星期中特委青委出席区青委会议一次，至少也有接头一次，必要时特青委可要区青委报告该区青年支部的状况而提出意见，因一些工作××关系极少间断过，隔膜也很少，在动员工作或援助工人斗争时区委决议可以在二、三小时内传达到所有的党团，而在五、六小时内全体青年团体均可动作起来。

上下级关系之所以这样密切，就是因为区青委与各党

团都不健全，不这样就无法解决问题，正因如此，故领导上犯着零碎、事务主义的毛病，妨碍了干部的进步、培养与提拔。后来也曾反对过这种手工业的领导方式，但由于青委的领导不健全与干部的薄弱，毛病始终无法克服。

（三）集中领导与分工领导

香港党青委领导上的集体与分工，特别是东南特委成立，市委解散后，是有缺点的。从特青委、区青委到党团都是犯着这个毛病，集体讨论研究的习惯很少，这个青委负责了甲乙党团，他就不管丙丁党团的工作，形成了一种封建割据的领导方式，全盘工作的估计筹划很不够，因此，集体与分工的领导就形成对立起来。

集体与分工领导的不配合还表现于青委与妇委的工作上的冲突与隔膜。如青委从来没有讨论过青工、青妇的工作，妇委也从来不理青工或女生工作，后来妇委才开始做女生工作，妇委决定在学赈会组织女学团，就受到青委或学赈会党团激烈的反对。

集体与分工的不配合又表现于香港与九龙区青委的隔膜。九龙区的青委从来不知道香港区的青年工作怎样，如特青委回到内地检查工作或开会，那么香港区的青年工作就形成半身不遂的状态，香港区由香港区做，九龙区有九龙区的一套。

最后又表现于党团与支部工作的不配合，互相冲突。如特青委领导下的学赈会党团决定了一些工作，未及通知区委时，支部有自己的一套，而在会议上互相争执得面红

耳赤。这种领导上的毛病首先就是因为香港党从来没有建立过健全的青委领导机构，都是个人负责，这个作风影响一〔直〕到后来区青委建立了，仍然是做成手艺主义的封建割据的传统了。其次，各方面不配合就是因为市委取消后，香港党的工作没有统一的领导，要依靠特委来代替市委的工作，但特委的工作重心又放在内地，时时要到内地巡视开会，青委又只一人而且直接领导学赈会党团，学赈会的学生支部又在两区，所以只得弄成封建割据、各自为政，工作并在一起又因为两个区的决定不同而自家人同自家人开火了。

这个缺点的形成是与香港党整个的统一领导是有密切的关系的。

（四）中心工作与经常工作

香港党青年工作对于每一个形势转变的中心工作一般的是能抓得紧，而且每个任务也进行得相当彻底。但这里有着这样的缺点，就是事情已经变化以后才来真正拼命布置工作，转变工作，没有在事前早为准备与全盘的筹划。如动员工作在广州失陷后才来准备，财政问题的斗争是在国民党已经进攻以后才临急应付，使支部工作领导关系非常混乱。而且正因如此，必然产生了第二个弱点，就是抓紧了中心工作就忘掉了经常工作，因为这种急时抱佛脚的工作，必须动员所有的力量去应付才不致失掉时机，故经常工作不得不暂时放下来，每一个工作结束以后，必然弄得筋疲力竭，一时不能恢复元气。如动员工作急起来不得不拼命的把干部动员去了，缺乏全盘周密的计划与配备，

结果浪费了不少干部，而且只有“消费”，没有“生产”，那能不使这些团体喘不过气来，半年以后也不能恢复元气。这个就因为干部的幼稚，没有必要的政治远见和缺乏工作经验而形成的。

(五) 布置工作与检查制度

布置工作与检查制度在香港党青委机构的领导上是有着这样的特点：1. 每个工作的布置是有中心，一切其他工作都围绕着这一中心工作。2. 实际很少说空话，每次会议一定有问题解决和工作布置。3. 有尺度容易检查，吹牛皮说空话的一两次就会露出原形来，而会受批评的。比方动员工作，根据这个团体的特点决定以动员人力或物力为主，动员哪一些人，可以动员多少，怎样动员，在什么时候可以完成什么数目，那么下次你就要做报告，就这样检查工作。4. 进行相当彻底，比方动员不到决定的数目，就要指出为什么，要怎样克服困难，下次做了再报告等。

但是由于在(四)项指出的缺点的限制，因此：1. 布置工作中只限于中心工作，很少注意布置经常工作计划。2. 经常工作的检查制度没有建立起来。3. 从来不注意经验教训的总结去教育干部、改进工作，总结的只是一些个别的工作，全盘的总结与筹划是很少的。

总之，香港青年工作领导机构的作风是有着他的优点，能够抓住中心，灵活、切实、迅速，但是也是因为这样，养成一种实际主义。“见事做事”、“零售碎件”，实际上就是事务主义。

八、香港青年工作三年来的总结

(一) 三年来工作的结果

一般青年工作已经开始，而且已经建立了初步的规模，准备了政治上、组织上的初步基础。在政治上提高了群众的民族觉悟，决定了群众的抗战胜利信心，扩大了党在群众中的政治影响，加深了群众的左倾程度。在组织上团结了将近五千群众和三百多左倾青年在党领导下的团体方面，而且发展的比较普遍，学生方面比较主要的几个男女中学、中文小学和个别的中文大学、英文中学都有了党的活动。青工方面，纺织、船坞、铁路、汽车、印刷、渔民、食品工厂、码头工人和个别的同乡会都建立了群众的组织。根据这个基础，准备今后更大的广泛的发展的可能条件。

三年来工作的结果，青工工作只是已经开始，但仍未真正的深入的团结了群众，仍限于一般化的救亡运动，没有与群众自身利益联系起来，群众组织仍然很狭小，很薄弱，党的青年工作全部〔虽〕然很少，很幼稚，没有足须的质量与数量来坚持与发展今后环境更恶劣的青年工作。这点由于：

1. 党一贯来把青年工作的偏向的存在，特别是对于知识青年，对他们估计得太低太坏，夸大其弱点，换言之，就是对于知识青年的革命性估计不足，因此就没有采取必要的办法去培养青年干部，随便调动青年干部的工作，使他们没安心于自己的岗位，积蓄一点工作经验，逐渐提高自己的工作质量，因此就没有大胆精密的吸收大批知识分子入党，加强对他们的教育工作，使青年干部得到

源源不断的补充；因此就没有加强对青年支部的领导，建立工人支部的青年小组，提拔必要数量的党内青年干部，建立党内青年支部领导系统；因此就没有决心和采取必要的办法去建立、健全青委的领导机构，加强对青运的领导，研究青运发展的规律，积蓄工作经验，培养独立工作能力，以建立党内青年工作的整个系统。

2. 一贯的没有注意青年群众的切身问题，没有注意改善青年群众生活的工作，以一般群众救亡工作来代替青年运动。因此青运就与一般群众运动没有分别，不能真正的动员与团结自己本身群众，不能深入校内、厂内组织全校、全厂性的团体，因此青年团体就等于一般的救亡团体，不能成为青年的核心与家庭，因此青年干部就与一般救亡分子没有两样，不熟悉群众生活与要求，不会深入群众的下层，不能成为广大群众所拥护、所爱戴的领袖。

3. 一贯忽视青运中的宣教工作，没有建立青运的中心刊物，不去进行群众的经常教育工作。设法建立群众团体的宣教系统，把宣教组织工作分裂开来，而成为事务主义的严肃主义的领导。因此使青年运动仍然停留于很少的狭隘的范围，不能更广泛的领导群众，发动群众的自动性，建立更多的我党的群众团体。因此就不能产生更多的左倾群众，团结在我党周围，使党的更大规模的发展成为有可能。因此就不能培养更多的党内党外的青年工作干部，更好的提高现有干部的质量、能力与认识。

4. 一贯的狭隘的工作作风妨碍了工作更大的开展。唯我独尊，目无余子，没有与朋友、与落后分子一道前进、一道工作的精神。因此就使工作走到狭隘主义，突出与孤

立，容易暴露，经不起打击。因此就不能推动朋友的工作的开展与我们互相配合、互相帮助。因此就不能使到干部看得更远更广，使他们力求进步。

(二)对今后香港青年工作的意见

1.党的领导

估计到轻视青年工作、轻视知识分子的偏向在香港党今天仍有可能存在，因此要开展香港今后的青年工作，必须首先从党内进行以下的工作：

(1)要彻底克服香港全党的轻视青年工作、轻视知识份子的倾向，使全体同志了解青年工作是党内工作不可缺少的重要的一部分。青年工作的任务是教育整个青年的一代，要动员全党来进行青年工作，使各方面能够互相配合，互相发展。

(2)要下最大决心建立健全的青年工作领导机构。市委常委要讨论青年工作，加强对青委会的领导，要在不妨碍秘密原则下，青委会可以检查各中心青年支部工作，市委会要尊重研究青委会各种建议，以建立整个党内青年工作的系统。

(3)党要加强对青年支部的领导。要培养与提拔必要数量的青年支部的工作干部，加强对青年支部的教育工作，特别是阶级教育和统一战线的教育，使他们了解统一与斗争的统一关系，克服过去的关门狭隘的作风和领导权宗派观点的了解。

2.群众工作

估计到香港青年工作仍有可能停留于狭隘和一般化的

阶段，估计到青年群众生活仍有可能一天一天的恶化，因此必须注意：

(1) 开展改善青年生活的工作，由此去团结动员更广大的基本群众。要每个同志都了解群众生活与要求，更多的反映到领导机关来，使每个同志都要回到校内、厂内去，克服过去脱离群众的作风。

(2) 建立青年运动的中心刊物，利用现有的一般化的把厂内、校内的团体来进行逐个教育工作，如学赈会、晨钟社等。使这个工作成为这些团体的中心工作，建立完整的健全的宣传工作系统，建立这些刊物的发行系统，党要给这些刊物必要的帮助，使他负起教育广大群众的任务。同时也要发挥〔挥〕组织的作用，就是这些团体将来因环境而不幸被封闭，也有可能独立的进行工作。

(3) 组织工作的中心要放在厂内、校内，以支部工作为核心成立各式各样的厂内、校内的组织，这些组织必须青年化、社会化，注意解决青年的切身问题，使它成为青年的导师与家庭。

3. 干部问题

估计到干部问题是目前香港青年工作的一个最中心、最严重的问题，特别是党内更加缺乏，因此注意解决干部问题是开展青年工作的锁匙，所以：

(1) 必须培养大批的左倾青年，那就必须加强群众中的思想上的、政治上的教育去完成这个工作。

(2) 大量发展党的组织，吸收大批的知识分子入党，给他们以必要的阶级教育。

(3) 党要相当固定青年干部的工作，不要随便调动

青年干部，于必要时最好能够与青委会讨论然后决定。

(4) 加强对青年干部的教育，特别注意青运理论的系统的研究，要深入了解、讨论群众的切身问题。

这就是几点对香港今天青年运动的意见。

关于组织民先的经过

这在一九三八年初动员工作××××××××××政治形势的有利，在半年工作中，涌现了大批的救亡分子，这些分子既没有足够××××××××××共产党员，但又不满足于学赈会这样的工作内容，他们是迫切的要求教育，因此××××××××××党就感觉有组织一个水准更高的，带有干部性质的团体的必要，去团结教育×××××××青年，正在这个时候民先派人到了广东，发动组织广东的民先队，并派人到港讨论成立香港中队部，经过省青委的同意后正式决定在港组织民先队。

民先队组织的基本任务是团结教育一些进步青年，成为团结训练非常干部的组织，但是因为接受过抗救会的经验，极力使带有群众性，成为群众的组织，避免把它弄成青年团或抗救会的第二党的东西。考虑到香港环境绝对不会容许这样组织的公开出现，所以决定采取秘密组织的形式。

不久广州失陷，整个党就忙于动员工作，关于组织民先问题就没有用很大力量去推动。在一九三九年春（大概是一月），这个工作又重新被注意起来，由党调出了三个干部成立的民先队筹备会又活动起来了，并通知各青年、学生支部发展民先队是当时支部工作之一，假如该支部发

展了三两个民先队员，支部就得决定一人参加民先，和他们成立一个分队，主要的是参加支部去领导而由筹备会派人与之发生组织关系。支部对民先队的领导要尊重筹备会的决议。筹备会暂时由特委青年部直接领导，俟成立香港市队部后，才组织党团领导之。民先队的组织是以市队部为最高领导机关，下设区队部、分队小组。依分队为单位，依照学校单位或厂内单位组织之。

经过两个月多的筹备，队员发展到一百二十人左右，党员约四分之一以上，在好些学校青年团体都建立了分队的组织，但绝大多数只限于党领导下的范围，没有党组织的地方发展非常困难。这些分子都是一向团结在党周围的群众，队员一般的要过着“支部”式的组织生活，主要的内容是发展组织、读书、报告问题、讨论群众工作。他们和党员一样的执行着党的关于群众工作的决议（只是通过民先队名义吧〔罢〕了），差不多每一个队员都是群众中的活动分子，那时动员工作还在进行，民先同样的执行着这个工作，队员动员回国就有三、四十人。

在工作进行中不〔还〕逐渐感到一些这样的困难：

一、活动范围非常狭隘，发展工作逐渐到了饱和状态。

二、架床叠屋的工作方式（党——民先公开工作），本来已经闹着干部慌〔荒〕，又要放一批干部在民先里面，使干部不够分配，工作反忙不过来。

三、一方面要转变工作方式更社会化、青年化等去争取最后的一点一分的公开合法的可能，使恶劣黑暗的环境更迟一天到来，现在民先这样的秘密（实在是半公开半秘

密)的群众组织在香港出现一定会促使香港政府更早一天的先下手为强的来镇压群众运动,这是一种自己打自己嘴巴的事情。因此这种重复救国会的秘密群众运动路线真有重新考虑与转变的必要,提出向省委报告经省委同意后就正式决定解散民先(从筹备至解散约有四个月)。队员除了一些发展为党员与动员回国外,其他的都分发到各校或学赈会工作。

吴有恒关于香港市委工作给 中央的报告

——1936年9月至1939年11月香港的政治环境和党的组织、群运、统战等工作*

(1941年2月16日)①

说 明

一、因为以前工作上的不深入，而路上又不能带任何文件（连一个字也没有带），因此全部报告都只凭记忆所得，当有很多疏忽或错误的地方。

二、有些数目字和省委报告里面所说的不同，如党员总数省委报告为五百七十余人，这个报告里为六百三十一人。省委的报告系将在巩固党的检查工作中被认为应注意的（其实都是认识较浅或较幼稚而已，当时我们乱用名词说这些人成问题）约六七十人都算作非党员了，其实当时并未开除他们党籍，而且也不应该开除；其次是省委报告中没有把文化支部的同志算入。党领导的工人群众（已组织的）在这报告为二万余人，而省委的报告为一万人，应以这个报告为确。

①这是吴有恒对此报告写说明的时间。报告时间是1941年1月。

三、很多检讨和意见都是根据现在我们的认识写的。

吴有恒 一九四一年二月十六日

一、香港的政治的和经济的环境

(一) 香港是华南最大的商港

香港市是包括香港岛及九龙半岛的一个港口，交通非常便利。陆上有广九铁路通广州，抗战后还新筑了广九公路，然而主要的交通却是海上的航线。主要的航线为：1. 太平洋线——经上海、日本等地而至美洲。2. 大西洋线——经南洋各地、印度洋各地，至非洲以至地中海、大西洋。3. 沿海线——由安南的海防以至中国沿海各港口。4. 内河线则有省港、港梧、港澳、港江（江门）等线。计抗战后仍经常走海洋的船总数有二百一十三只，共有一百五十七万一千吨，经常行走内河的有船二十七只，共有一十四万二千吨。这些只是算经常定期行走的大轮船，至于不定期的如小轮船、木船等尚不计算在内。英帝国主义就是依靠这个交通便利的条件，使香港成为华南最大的商港，成为英帝国主义操纵华南的经济与政治的中心。

英帝国主义把香港作为一个自由港（无税的口岸）。这个条件使香港的商业更加繁荣起〔来〕。这些商业表现着显著的殖民地与帝国主义间的经济关系，由广州、梧州、江门等地输送出来的是一些农产品 蚕丝、茶叶、毛（鸡鸭猪毛）等，矿产品 钨砂、铁砂、锑砂、玻璃砂，甚至造瓷器用的泥；而输入来的则是棉织品、毛织品、丝织

品、化学用品、铁机器、军火。在战争以前，由内地输出的主要为丝与钨砂，由外国输入的主要为棉织品与建筑用品。战后，主要的输出仍是丝与钨砂，而主要的输入则为军火、交通用品了。广州失陷以后，香港与内地的交通几乎断绝了，特别是安南、广州湾拒绝军用品过境后，香港对内地的军用品的输出完全停止了，甚至交通用品也停止了，许多汽车、铁轨等停在香港运不出来，特别是中国政府订下在香港运不出去的军火，听说还有一两万杆以上。然而香港仍可以经过广州湾、海防、澳门输入一些日用品与输出内地的一些原料，因此，香港仍是繁荣的。战争使香港比以前增加了几乎一倍的人口。一九三六年香港的人口（包括九龙及近郊）总数为九十三万，一九三七年底，即达一百二十万，广州失陷以后人口空前的增加，据官方公布的统计为一百八十万，这个数字虽然不一定精确，然而总算差不很远的。战争还使香港增加了不少的资本家与资本，单从上海搬到香港的工人在二百人以上的大工厂就有二十家以上，此外，还有新开的如汽车厂及其他小工厂都增加了很多，特别是小纱厂、小织布厂增加了更多。这一方面是由于许多资本家不能不继续他们的营业（大的资本家是维持他们的老招牌，小的资本家是要维持他的资本），而另一方面则是香港市本身消费的增加与自欧洲战局逐渐形成以后，欧洲方面的来货短少了，而香港的资本家则可以利用香港工资的低落与中国原料成本的低落（法币贬值以后更甚），虽然销路小了，但仍可以赚钱，许多生产如纺织物、橡胶制品、罐头食品等且可运往南洋各地。因此，战后的香港仍是繁荣的，从工业上看、从市面上看是比以

前更繁荣的。

战争除给香港带来了一些工业资本家及其资本外，还带来了更多的游资，据去年香港报纸公布的统计，单存于汇丰银行一家的游资及其资本家，计存款一万万以上者三个，五千万以上的八个，一千万以上者十三个（都是港币）。这些资本家都是抗战前并不在香港，而且现在他本人也并不在香港的。这些游资（当然香港本身就还有许多游资）操纵了香港的法币市场，操纵了物价，造成香港物价空前高涨、法币价格非常混乱的状态。

抗战后的香港贫民的生活因物价的高涨陷于非常困难的状态。房租高了三倍，粮食高了百分之八十，燃料高了一倍以上，而工资则反而一般的都缩小了百分之十至二十。每月赚十余元的工人，每月单交房租一项就要化了他五元到十元。曾经有一个时期，贫民被迫在街头露宿的在五万以上。抢劫的案件每天都有，大规模的绑票等等也有了，香港是一天天不安起来了，香港的资本家已经不能不组织自卫团自卫了。

日本在占领了广州后即对香港当局不断的威胁，甚至在广九路投过弹，炸死了十多个英国兵和印度兵，然而直到去年的十一月，香港的人口还未疏散，市面上还一样热闹，它还是一个繁荣的都市，一个拥有一百八十万人口的大都市。

抗战以来，这个都市的工业发展起来了，然而这一点并没有把这个商港的性质改变了，去年在工业上特别繁荣起来的仍然是造船业，造船业的产量据去年报纸上的公布已超过意大利而居世界第九位了（这个公布大概是不准确

的，可能是超过意大利某个都市)。去年单太古船坞就有两艘二万多吨的轮船下水，同时两艘二万多吨的轮船又在继续建造着。全香港的造船在业工人在一个时期，单太古、九龙、海军三个大船坞即达三万五千人至四万人，全港的造船业工人总数约为五万人。帝国主义本国海军扩充，使他们不能不把商船建造的责任放在香港造船身上。香港的轻工业三年来也是比较蓬勃了的，然而香港究竟是一个孤岛，它的周围缺乏大量的轻工业原料，如棉、丝等，因此香港的轻工业始终是贫乏的，大部分的工业是从外国买回一些工业品再加一加工吧〔罢〕了。例如香港没有一间纱厂，全部布厂的棉纱都是要靠日本与印度或上海来的，有百分之九十的华资布厂是采用日本纱的。加以香港是在战争的包围中的孤岛，许多资本家都不敢大量投资，因此它在轻工业上面没有上三千人以上的工厂。假如日本再加紧对香港的封锁，完全断绝了它与中国内地的交通，那么这些工业必然会一落千丈，那是不待说的了。

(二) 香港是英帝国主义“封建的”地统治着的殖民地

英帝国主义在香港的侨民连警察军队算在内也不过一万八千余人，然而它已经统治了九十多年了，这一方面固然由于经济上的完全统治地位——差不多每个大一点的资本家总要和汇丰银行有点关系，许多大的企业如交通、造船、机器等都是操纵在英国资本家的手上。然而，利用封建力量却是它统治香港的一个特点。

利用封建力量首先就是封建的教育在香港。教育事业

中的黑暗是比国内任何一个大都市更睁眼不开的，每一个学校都规定要读“香港汉文”，大部分的学校都要读四书五经，尤其是英文学校更非特设一中文“经书”一课不可。什么前清翰林，前清太史，所谓朱汝珍太史，赖际熙太史等被尊为上等绅士。在帝国主义政府帮助之下，建立大规模的孔圣会、孔圣堂，建立了几十间孔圣义学，甚至还为了“孔圣会救伤队”、“孔圣会体育部”、“孔圣会运动场”办了许多讲经队。于是在社会上就到处都有所谓名士之流，无数年青的人也穿起长衫“吟诗打对”了。这种毒害使香港的知识青年从来没有过“五·四”运动，也没有过“五·卅”运动，整个香港几十年来都处于愚昧与无知之中。

封建的提倡还不单表现于学校的教育，而且还充分表现于风俗习惯的封建性，迷信、拜神烧香、占卦问卜被奖励提倡，神庙的司祝也由政府统制，每年以每间数万元的招商承办。至于天主教、基督教那些洋封建的流毒，也更不在说了。香港的下层社会特别是下层妇女，在这些封建的风俗习惯下可怕地落后。

其次，关于香港的封建团体的组织，也是英帝〔国〕主义依靠以维持治安镇压反动的工具。最大的封建流氓性的组织，在所谓致公堂（三合会）底下，万、全、和、合四大帮，号称有三十万人，全部的暗探、巡捕都加入了这些组织，作为它里面的干部，而所谓三代有功于皇家的资本家中央的士公司（汽车公司）总经理颜成坤则是这些团体的老头子。省港罢工以后，香港是仍然陆续组织了许多工会的（据一九三七年底不完全的统计有一百六十多个），然而这些团体多是官办的、资本家办的，或者是三

合会的公开机关，带有非常浓厚的封建性与行会性，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就是靠这些组织来监视工人与麻痹工人。

利用封建力量还表现于封建力量和资产阶级买办阶级的关系上。无数的大资产阶级都同时又是一个有名的名士，是所谓华人绅士，有名的周寿臣爵绅就是一个百万以上的资本家，并不是说这些洋奴都真的是孔孟之徒，然而孔孟之徒却是他们的副业，虽然他们信的是耶苏，可是为了他们的安全，他们总要念几句“诗云子曰”，满口仁义道德。

然而假如认为英帝国主义纯粹靠这样“文明”的一套来统治这个殖民地，那是不对的。封建的方式只是其统治方式中之一种，而且只是其日常工作中的工作，英帝国主义并没有忘记省港大罢工时，香港工人阶级所给予它的苦痛的教训（这些教训他是时常公开提起的），他并没有放松了他的武装，他并没有放松过他的严密的侦探组织。英帝国主〔义〕在香港约有一万陆军，二十八只军舰（内主力巡洋舰一艘），三千警察，去年因劫案多了，还组织了二千四百个的自卫团（商团），在现在的情形下，这些力量是足以镇压任何暴动的，虽然他是不足以支持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七天（根据他们的演习），然而英帝国主义对于保卫香港倒没有象保卫新加坡那样的决心，他那鲤鱼门炮台的新炮也拆下来运到新加坡加强新加坡的防卫力去了（目前的情形也很不同）。在去年，英帝国主义正要策动远东的慕尼黑会议的时候，他担心的倒不是日本人来进攻，而是一怕共产党会在他肚子里捣他的鬼，从广州日本

的特务机关里聘来二十个教官，英帝国主义也在香港开办了他的反共侦探训练班了。政治侦探长廖独康（叛徒）收买二十多间咖啡店作为他的耳目，已经摄了我们个别同志的照片到处查访了，捕风捉影的关于我们香港党组织的各级机关的名单已从各方面搜集起来了。虽然从去年我们所得的情报看起来，他们的收获还很少，然而香港的反共侦探机构是加强了，听说去年还决定增加一百名政治暗探，他们的意思很明显的是：现在还把你那些“红”了的团体和人物放着不管你，他就跟着这个线索来找，布置一个一网打尽。

去年即一九三九年七八月间，香港侦探总长曾经公开演说，在报纸上发表说：“香港是有共产党活动的，但他们很守规矩，没有妨害秩序的举动。”这当是一个对我们起麻痹作用的东西吧。我们看到的是他一面这样公开来“安慰安慰”，而暗地里却是那么张惶的紧张的行动。

英帝国主义究竟是一个有经验的统治阶级，是一个能文能武的不容易对付的家伙。

（三）香港是汉奸汪派、托派、投降派活动的自由地带

由于英帝国主义的妥协政策，因此他一贯的纵容了汉奸汪派、托派、投降派在香港的自由活动，香港成为这些匪徒们活动的自由地带。

1. 汪派在香港的主要据点仍是他们所办的那三间报馆。去年“八·一三”三报工友的罢工给他以很大的打击，自由报因此停办了。去年在汪派林柏生、樊仲云的主

持之下，在香港还组织了一个文化协会（名字记不清了），办了一个蔚蓝书店，出版《自由》杂志及其他小册子。香港最著名的大报《工商报》的主笔被以三千元收买了，条件是写专攻击苏联的文字（并不指定要他反对抗战，主张和平）。汪派在文化界方面的活动，可算是有部分收获的。汪派在香港还组织了所谓中国社会党（江亢虎为首领的），托派马超凡做了中国社会党的香港党部的组织部长。这个组织主要的是以似是而非的社会主义的纲领来收拾一些曾经消极过的、自首过的、腐化过的，以前所谓“左倾分子”来作他们的傀儡，一方面是向外掩蔽这些家伙的汉奸脸孔，打算把这些家伙放在工人的队伍里去做一做欺骗工作。

2. 托派在香港主要的是担负了他们之所谓下层工作。其主要人物之一胡兰成在汪派机关报任编辑（专写社论，笔名流沙），不大做群众活动。托派周公礼曾经在国民党办的华南中学中进行过活动。杨四端在九龙办了中华儿童学院。然而活动力最大的还是以马超凡为首的托派在工人中的活动。马超凡利用他过去曾经是工人领袖的地位，在工人中进行欺骗、收买、挑拨、破坏等工作。他组织了理发、肉行、餐室、小贩、派报等工会，不断的进行对我们所领导的各个组织与斗争进行破坏工作，几乎我们所领导的几个主要团体里面都有了他们的活动。除马超凡外，托派在工人方面活动的还有陈星源、陈文、方才、廖茂等，都是曾经被我党开除出去的坏家伙。

类似于托派组织的有江公怀组织的所谓共产主义战斗同盟，似乎就是托派里面的一个派别（据廖承志同志给我

们的情报，江公怀是个托派），但人数不多，没有什么显著的活动。

3.日本特务机关在香港是比较受英帝国主义的注意的，曾经常有送日本侨民出境的事情发生。然而日本却并没有对英国客气，在去年曾经有一次，日本轮船运来了二百个广州流氓，在码头上架起机关枪大摇大摆的上岸，英国警察没有什么办法。日本领事馆办的《香港日报》增加了中文版，最近且增加了英文版，用二十六万元买了间新厂扩充营业。英帝国主义在一天天的对日帝国主义妥协，而这些妥协是要砍他〔自己〕的墙脚的。

（四）国民党和其他党派在香港的活动

香港的国民党是以吴铁城为首的，吴以中央海外部部长的资格兼任港澳特派员。在香港，这个家伙已经是半公开的投降派了。他的机关报《国民日报》是和托派机关报《华南日报》同一间写字间办公的，汪派机关报《华南日报》的编辑兼任了《国民日报》的编辑。虽然《国民日报》上有时也登了一些攻击汪精卫的文章，然而那都是敷衍一下的，它的中心内容仍是反苏反共。

吴铁城的主要群众活动的基础，在文化界面方是依靠以黄淑陶（华侨中学校长）为首的侨教会的活动，在工人方面则主要的是依靠托派马超凡及陈星源的活动。黄淑陶是香港CC的主要干部，同时是三青团的主要负责人。侨教会本来是两个独立的团体，一个是代表着国民党直辖学校的华侨教育会，一个是代表香港的“学阀”经营的学校的中华教育会，抗战以后两会被国民政府教育部命令合

并，中华教育会里面的主要学校也和华侨教育会的学校一样取得教育部的津贴费。参加侨教会的主要的是各学校校长与教员，全部在国内立案的中学校长都参加了，大概有一百多个学校单位（大部分为中学校）。黄淑陶利用他的地位，在各学校强迫学生加入青年团，然而青年团却始终没有什么大发展，活动范围也不广，就是在华侨中学也因受学生反对而迫得黄淑陶不能不由宣布全体参加的方式改变为个别吸收。去年国民党港澳特别支部曾做下了发展六十万党员的决议，但可以相信这些决议是永远也不会实现的。

在工人运动方面，托派陈星源是公开以和吴铁城有关系的面孔出现的，香港绅士杜其章（约二十万的资本家）荣任了国民党海外部的劳工部长，杜其章则利用其绅士地位，做了五六个工会的顾问。吴铁城在工人方面活动的主要方式是收买（以每月四十元的价格收买各个旧工会、封建团体的头子）。现在和他们经常有联系的工人团体有二十个左右，主要的是马超凡组织的那几个工会和华人机器会、酒楼茶室工会、方言（客栈）工会、集资（起落货）工会、同德工会（苦力）、煤炭（苦力）工会等等，大都是有资本家参加而且资本家占领导地位的。在这方面他们是收获到一些成绩的，抗战以后国民党在香港可算是扩大了几倍的力量，在抗战以前他们是没有这些活动的。

在香港，国民党由于未能象在国内一样的取得了统治全权（他们的活动在香港还是半秘密的，在香港没有公开的国民党党部），因此他们不能不更注意于在群众中和我

们斗争，他们不能不用更大的力量去收买流氓、工贼等人物，来破坏我党在群众中的活动。

香港的国民党势力主要的是CC的（吴铁城也是CC），蓝衣社在香港的力量很小。蓝衣社在香港的负责人为罗伟疆，是以前广州市党部主要人物之一，在港开办了文化中学，和黄淑陶等不甚合作，有时还和我们靠近一下，如借地方给他们开会、办夜学等，但他们究竟是没有做什么活动。

西南派是在陈济棠支持之下的一些人物，在港办了德明中学、导群中学，收拾了胡汉民的一些走卒，以区芳浦为主要负责人，没有什么群众活动，和CC、蓝衣社都不见得合作。

这两三年来在香港耀武扬威的只有CC一系，由于CC、汪派、托派的打成一片，因此造成他们似乎是声势浩大的局面，但是深入的检查起来，这亦不过是收买与一时欺骗的作用，真正强有力的群众组织，他们不但根本组织不起来，就是现在也还未能弄到一个比较象样的团体。

其他党派在香港很少活动。国家主义派张润洲、陈铁一办了西南女子中学和梅芳中学，没有显著的活动，但近来都和CC勾搭起来了，但关系不很密切，这些家伙是没有本领自成一派的。

社会民主党（民族革命同盟）在香港已经没有组织，蔡廷楷在香港，听说日本拉他拉得很紧，这个家伙是有可能做汉奸的。

第三党自抗战后活动分子差不多全部到广东内地去

了，在香港也不见有什么活动。

因此，在香港的群众中就只有我们和以吴铁城为首的CC（包括托派）相对抗了。

（五）香港的群众

香港的群众。中下层的群众保持着高度的抗战热情。工人是不会忘记与放弃大革命时省港罢工的光荣传统的，抗战以后海员、码头工人的反日罢工，以至去年“八·一三”的报馆工人反汪罢工，都表现了群众的力量，而一九三八年七八月间举行的著名的义卖运动，则显著地表现了工人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小商人之间的密切联系，以及一九三九年以来的二十多次的自卫性质的经济斗争。这些都是表现了工人群众的积极性与其力量的增长的。

香港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也开始觉醒了，开始了他们的“五·四”运动了。抗战以前香港只有半间卖比较进步的书籍的书店（只有半间），到去年就有十五间经售进步书籍的大书店与无数小摊子了，甚至在CC办的华南中学一个班三十四个人中有二十六个人是经常订阅新华日报的，反共的教育并没有使香港的青年与知识分子减轻了他们对共产党与共产主义的倾向，青年与知识分子都日渐由无组织的情况下组织起来了。

几年来香港党对群众运动是很注意的，基本上香港党是建立了她和群众之间的联系了。我们组织过各种救亡运动，也领导过各种斗争——从反日反汉奸的斗争到经济斗争，已经初步建立了党在群众中的基础了。目前香港群众运动的环境是日向恶转的——一方面是香港英帝国主义政

府压力的增加，另一方面是CC、托派的破坏工作必然更加紧。然而，假如有正确的领导，香港党和群众之间的联系是更可能扩大与更加密切起来的。

二、三年来香港党的组织工作

(一) 三年来香港党组织的建立发展与巩固工作

1. 香港党组织的重新建立（一九三六年九月——一九三七年底）

香港党的组织自一九三四年被最后破坏后，除在海员方面仍保存几个人的支部以外，香港已经没有党的组织了。香港的群众运动也在这种镇压之下，由一九三四年——一九三六的两年间，长期的沉寂起来。一九三六年香港的警察总监在报纸上公布：“两年来香港没共产党的案件，共产党的组织被消灭了。”显然的，动摇分子乘机“改行”了，而少数积极分子则因找不到党的领导，也没有什么活动。自一九三四年——一九三六年，香港的确是死去了一般的沉寂着。

“一二·九”运动刺激了香港的群众。一九三六年初香港的群众运动开始跟着国内的学生运动的开展而重新复活起来了。社会民主党（民族革命同盟）的机关报发表了一些进步的言论，响应了国内的救亡运动与我党的“八一宣言”的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红军西征胜利的消息被大号的字登载着，于是以这个报纸为中心，开始团结了一些左

倾青年，由民族革命同盟主持之下，组织了大众报读者会。可是这些左倾的青年不满意于社会民主党的投机的领导，他们信仰的是共产主义，他们要求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幼稚的左倾使这些青年们在一个老党员（一个失了关系的工人）领导下拒绝了和大众报的关系，把读者会改组为香港抗日救国会（简称抗救会），抗救会是个非常关门的秘密的群众组织，参加的都要过严格的小组生活，出版油印的秘密刊物，并于马路上贴“拥护八一宣言”、“拥护红军”等标语，有一些时候甚至采取直接反对英帝国主义的行动（如在英帝国主义的海军船坞工人里面作反英宣传）。因此，这种关门同时又是暴露的作风，很快就招致了香港侦探的注意，自一九三六年五月以后，复活的香港群众运动又受了打击。由于抗救会油印刊物偕行内有反英的宣传，英帝国主义于五月间逮捕了抗救会几个干部，乘机查封了经售巴黎救国时报及其各种小册子的现代书店，兼搜查了半岛书店及大众报，没收了一切进步书籍（这些书店都是民族革命同盟办的）。以后，就不断地逮捕抗救会及民族革命同盟的人，到六月间就总共有十九个人被捕了。

这些教训没有使抗救会改变了他那过左的作风，相反，更使他盲动起来了，他们不管三七二十一的拼命反对民族革命同盟和当时筹备组织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华南区总部。他们坚持了他们那些愚蠢的办法，于九月十八日夜里，在一间小学校里布置了一个秘密的纪念大会，到会八十六个会员全部被捕了。有些干部被作为共产党员而受了毒刑，有九个人被递解出境，到广州又被捕枪毙了。经

过这次打击，大部分干部逃跑了，被押送出境了，消极了，整个组织全部瓦解下来了（抗救会全部号称有五百会员）。

这个打击使群众一部分发生了悲观失望的情绪，仅有的几个团体，如所谓抗救会的外围团体妇女互助社及其所办的夜学、凡声社（青年的），及民族革命同盟所领导的妇女读书会等都停止工作解散了。另一方面的倾向则是更左倾的反英心理，在工作上则觉得谁也有奸细嫌疑，养成更严重的关门主义。第三党张梅生利用了这一部分抗救会剩下来的干部的左倾情绪，于是他自称为中共两广特派员，和抗救会的组织干事曾眉等组织了中共香港市委（共有党员约二十人），成立了抗救会的临时指挥部，企图把抗救会的组织改组为军事性的组织。并且猛烈地攻击救国会华南区总部和民族革命同盟大众报，拒绝和他们合作（张梅生是第三党中坚持保存第三党独立组织的一派人物，第三党的取消派如徐谦等，是主张取消第三党加入民族革命同盟的）。

我党于一九三六年四五月间开始在港有个别党员的活动。孔志成同志由北方局派来，于四五月间找到了救国会何思敬（何是华南的负责人），并参加了救国会的工作，到是年九月，开始在港发展了个别党员。可是这时各会工作上的最大困难，却是如何打破当时群众运动中的“劫后萧条”状态，不打破了这种萧条状态，党是没有办法在群众中活动，仅有的几个党员将只会关在救国会的机关里毫无作用的。党并没有马上在群众中和张梅生争辩，却在群众中提出了“争取公开，利用合法，改变左倾作风”的口

号，并且开始在自己工作上执行了这些原则。十月底我们推动基督教青年会召集了追悼鲁迅先生的合法的群众大会，跟着发起了援助绥远抗战的募捐运动，在海员、洋务工人中组织了三十六个工人团体的联合筹赈会，在基督教青年会以探访队名义组织宣传募捐队，并组织了三百人的歌咏班，在海员工人方面则开了个几乎是十年未见的有七百群众的合法的大会。这些工作在事实上的成就，使我们足以克服一些悲观者和被张梅生利用了关门主义者，在工作上他们不能不逐渐和我们合作。于是，党有可能说服了这些左倾青年去打击张梅生的冒牌活动。在这些工作上，党发展了自己的组织，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间建立了有四个支部的香港工作委员会和一个海员支部。海员支部主要的是找到了旧的组织（邱坚一同志负责的）邱坚一、刘达潮等同志。市工委的组织主要的是在青年学生团体中，在抗救会中的新发展的有几个是从民族革命同盟中发展的。市工委书记姚铎同志是曾经在大革命时代参加过党以后失掉关系，参加了民族革命同盟新被恢复关系（大概那时候组织手续很马虎，无所谓恢复关系或重新入党之分）的，组织部吴有恒是个新同志（曾参加民族革命同盟），宣传部陈卓凡，是个恢复关系的老党员（现已腐化，在翁照垣处做官）。市工委底下有文化、学生、妇女、工人四个支部。工人主要的是一些苦力工人，群众活动主要的是依靠学生支部和妇女支部的活动。党的主要发展对象是在抗救会的干部中，经过在鲁迅追悼会、援绥会等工作上的合作，党对这些干部进行了关于救亡运动的统一运动（其实只能算是一些救亡干部的团结运动），在救国会华南区总部的

名义领导下，组织了香港各界救国联合会，联合会底下组织了学生、妇女、工人等救国会及筹备组织文化界救国会，这些组织都是非常狭隘的，全部不满五百人。张梅生反对这种统一，然而党究竟是在这些组织里和抗救会的干部取得了联系，说服了这些干部反对张梅生的冒牌领导。我们向这些干部指出张梅生不是共产党，是假冒共产党名义的投机分子，他的路线是完全和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相违背的。这样我们领导了抗救会干部向张梅生的斗争，迫得张梅生自己承认还没有和中共中央取得联系，把所谓中共香港市委改组为和平促进会，但和平促进会已再不能骗得左倾青年的信任，只改组了一个月后就因各个干部不肯参加而解散了。党打击了张梅生的投机活动，却争取了张梅生底下十多个积极的左倾分子，在抗救会的旧干部中发展了十个以上的党员。这些干部都是香港的本地干部，和群众有比较密切的关系的。

大约是一九三七年的一月间，姚铎同志调动了工作（大约那时候是建立了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姚被调往南委工作），陈卓凡离港往汕头去了，市工委改组由吴有恒同志任书记，胡作民（苦力工人，以后查出是自首分子，被开除了）任组织部，徐青任宣传部。党已经击败了张梅生的投机活动，以后不久即自动解散了各界救国会及下面各个组织，因为接到了党中央（北方局？）关于解散救国会的决议，同时自己也觉得有把群众工作更公开的推进的必要。救国会解散后，党在学生、妇女、文化界各方面都组织了公开的群众团体，在苦力工人中组织了兄弟会，在女工中组织了姊妹团，党的活动更带群众性了，到四五月

间，市委的组织发展到七十人左右，在印刷工人、机器工人中建立了支部，海员支部发展到约十余人。

五月间南委因和广州市委之间有了无原则的纠纷，大家互相攻击排斥，闹得一塌糊涂。南委孔志成同志因为广州市委书记黄达功同志到陕北去，就想乘机解决，取得对广州市委的领导，将吴有恒同志调往广州参加市委工作，广州市委也调了一个学生支部的书记李士洋同志到香港代吴有恒同志做市委书记，这种无原则的调动干部使党的工作受到非常无谓的损失。吴有恒同志离港后，香港市工委由李士洋同志任书记，并提拔了一个文化人李游子（是个曾经从党内逃跑去三次的动摇分子）做组织，一个学生刘名标同志做宣传。李士洋同志是个只有十八、九岁的中学生，只在一个有三个人的学生支部做过书记，没有社会经验与工作经验，又从来未到过香港，不熟悉香港情形，加之那时候南委和广州市委之间的纠纷，他也可算是广州一派，因此他并没有很好的站在党的立场上积极工作，他只工作了两三个月，就推说回广州升学离港去了，书记就由李游子负责，刘名标同志做组织部，宣传部没有人，市委连会议也开不成了。李游子一点也没有负起责任，很多组织关系都被他失掉了，有些支部四个月也没有去接头一次，到是年十月，只剩下党员不够三十人了。

一九三七年的一年，可算是香港党的组织工作上最严重的一年，最混乱的一年，党的组织几乎是没有建立起来就被奸细和投机分子断送了。党曾经用很大的力量和这些奸细投机分子斗争，才挽回了最后的危机。

首先是关于广东第四路军特务机关收买的内奸林坤的

事件。林坤是一个拉黄包车的工人，以前在海陆丰（即海陆丰人）参加过内战，环境严重时逃到香港，于一九三六年底被恢复党籍，一九三七年五月被提拔参加职工运动委员会（不知任何工作）。当时香港的组织很特别，职工运动委员会是直接领导几个工人支部的，大约就在这个时候，林就被第四路军的侦探机关收买了。他向四路军作了情报，送上了关于职工运动委员会的名单，连出席职委会的市委同志的名字也送上去了。这个情报给我们在广州四路军工作的同志看到了，因此市工委立即决议开除林的党籍，断绝和他的关系，他领导下的一个支部党员也放下了（以后逐渐个别恢复关系）。这个处理在中断了林的继续活动的意义上是有些收获的，其中一个客观的原因还是由于林实在还是一个简单的人，一时受了利诱的，他也怕我们会手掉他，以后他就仍然拉黄包车，没有作什么活动了。不过，这一个严重的事情的发现并没有引起市工委以至南委应有的警惕，没有马上在党内开展关于反奸细的教育与注意巩固党的工作，没有马上去和党内的松懈马虎现象作斗争。

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胡作民不满意党开除林坤这一回事，他在他所领导的海陆丰籍的苦力工人里面煽动他们反对党的领导，南委派姚铎同志去和他谈，他对姚说：“你弄到钱就不顾我了。”原来他是和姚铎一同参加过民族革命同盟的，在同盟的时候，他每月可以拿到一二十元的津贴费，后来姚铎又介绍他进了党，以后姚铎也被同盟说他是共产党，把他开除了，胡作民就跟着没有了那笔钱，因

此胡就怀恨在心。

南委决定开除胡的党籍（1937开除），派陈森同志（苦力工人，后负责市委职工部）去从下面接回胡所领导的关系统，在下面支部讨论了关于开除胡作民的事，结果下面的同志指出了，胡作民在苏区的时候是因参加AB团被扣留过的，以后他向国民党自首了，自己逃跑来香港，他在那些海陆丰籍的苦力工人中，早就是没有什么威信的了，因为他们知道了他过去的那些真史。

胡作民实在是一个投机分子，他已经没有半点工人气味的了，在工作上他是会吹牛虚报的，他的工作只是为了骗取一些津贴费，他参加了民族革命同盟以后即没有做工，拿了津贴费逍遥地过日子。他的交游很广，他和托派杨四端很接近，他把托派马超凡（五月入党）、陈文介绍入党（马、陈同时入党。也许马超凡和陈文那时候还没有正式参加托派）。马超凡介绍李景云，陈文介绍李甫入党。李景云是个吃大烟的印刷工人，曾在苏联受过军事训练，李甫是在大革命时铁路工人，革命失败后逃在香港做流氓，也吃上了大烟瘾了。陈文还打算介绍托派杨四端入党。马超凡、李景云都是印刷支的负责人，陈文不知那时党部只二三人。

马超凡在大革命时是全国印刷总工会的常务委员，大革命失败后在香港做工头，参加了社会民主党（民族革命同盟），这个家伙是一个比较有本领的投机分子，他参加党是要“进来看一看”的（他自己对人说），他和托派陈星源的关系非常密切。

马超凡在党内煽动反对南委和市工委，他说这个党不

是真的，我们要找真的关系，他和陈星源等组织一个委员会，说是要找党的关系的，马的活动被党察觉了，开除了他的党籍。李景云被南委调往闽南工作，开小差回来后也被开除了党籍。李甫因被党发现他吃大烟，一九三七年底开除了党籍。陈文一九三八年初被党开除党籍的情形我不清楚，因为那时候他是直接属于南委领导的（大约是因为他和广州近郊的农民有些关系，南委想靠他去开展那些地区的工作）。我只知道他首先曾经受过南委的批评，他自己承认了错误，由连贯同志（在八路军办事处工作的）和他接头，但过了一两个月后，南委就宣布把他开除党籍了。

关于清洗马超凡、陈文这些分子，在香港党的组织的巩固上是有其意义的，因为事实上证明这些人都是投机分子，而且现在更明显的看出这些人已经变为托派，变为汉奸（组织中国社会党的香港党部的组织部长马超凡）。然而这些斗争在当时却没有在党内展开起来，整个南委及市工委对这些事情都是如此马马虎虎的，随便吸收进来，发现了他不好时又随便的滚他出去，这其间是很少从政治的意义上向党员解释的，因此仍然是对于党内的除奸教育及阶级意识组织观念的教育上没有什么显著的收获，而且连这些经验教训也没有总结过。

这时候党的组织生活是非常涣散的，在整个市工委领导之下的关系已经是象上面所说的只剩下不到三十个党员了，而这些党员中仍能继续开小组会的只有文化界方面，由连贯同志参加的一个四个人的工部，妇女支部有两个月的时间没有人去接过头，结果只剩一个人了，学生支部

只剩下两个人，除了文化支部外，一般的都没有群众活动，有个别同志（如妇女支书及学生支书）有些群众工作，而实际上党是没有去领导他们的。象这样的组织当然不能应付当时“七·七”抗战后在香港群众中激发起来的广泛的群众运动。

南委于十月间由广州调吴有恒同志回港参加市工委工作，由李游子任书记，刘名标任组织部，吴有恒任宣传部。南委在这个市委会议上没有对过去的工作做总结，也没有给李游子的怠工作斗争，因此这个市工委的组织仍然是非常不健全的。

（一）李游子又名李曙明，大约是在大革命的时候就参加了党，曾经在汕头市委（？）做写油印工作，因为恋爱问题他不满意当时的领导同志（据后来我们和他斗争时他自己说的），就自动离开了党，后来他在他的故乡大埔又重新加入党，曾经做过丰顺县委书记，不知什么原因（大约是环境严重）他又自动离开丰顺失掉了关系。以后又恢复关系调任博罗县委书记，博罗县委派他到省委开会，开了会后他自己不敢回去，就也不找县委、省委的关系，在香港参加了国民党，并且和香港一个侦探头目的女儿结了婚，后来那侦探头目死了，他就承继了他的遗产。他非常怕他的老婆，因为他的老婆全知道他以前当过共产党这一回事。后来（一九三八年）我们和他作斗争时，他自己说他这些历史是曾经向南委报告过的（他是南委直接发展的），可是当时的南委的干部政策和发展政策是非常马虎的，大约是因为同乡和朋友等感情关系，就无原则的相信了他，提拔他做市工记委书。在市工委的时候，李游子从来

不自动召开会议，开会议的时候多是在他的家开的，只要他的老婆把他的名字喝了一声，他就要不管三七二十一跑了，几乎没有一个会议开得完结的。常常开会议的时候，他坐着就睡了觉了。他拿了南委二百块钱去开了一间书店，以后他就把这间书店据为己有，还天天说书店亏本，向党要津贴，他认为党给了他那二百块钱是当然的。开会议的时候也从来不讨论政治问题，他自己做了一个计划向大家念一念就算了。象这样的领导和外面蓬蓬勃勃的群众运动比照一下，谁也要闷死了的。

李游子除了领导一个文化支部外，他不领导任何一个支部，而且各个支部的关系（除陈森同志负责的两个外）都散失了，在一个星期内吴有恒同志找回了以前的各个支部关系（有一个机器工人支部因已经四五个月没有人去和他们接头，他们怀疑党的组织，不肯恢复关系），在学生、妇女方面有了新的发展，重新建立了支部，并建立了一个青年店员支部。大约经过一个月的时间，党的组织领导系统会议生活重新建立起来了，当时全港市工委有党员数量恢复到六十余人的数字，共有十一个支部，吴同志负责接头的有八个支部，以后李游子因自己不去出席文化支部，文化支部又由吴同志去负责接头了，十一个支部中竟有十个支部由吴同志负责的，造成领导上的畸形状态。马超凡、陈文现有活动，胡作[民]已去乡下，其余没有活动，开除他们对党无影响，他们认识的人很少。这时候张文彬同志已由中央派往南委工作（张同志做南委书记），经过张同志亲自到市工委检查的结果，市工委被改组了，由吴有恒同志任书记，刘名标同志任组织，

李游子任宣传，不过还没有展开和李游子的斗争。到十二月市委正式成立，在这个会议上出席的有学生支部书记钟明同志，文化支部书记连贯同志，罗雁子同志，妇女支部书记曾莉芳同志，抗大学生周伯明同志，职委会陈森、李吉明同志，近郊农民支部书记吴雨三（？，现已消极）及市工委吴、刘、李三人。张文彬同志代表南委领导这一会议，总结过去的工作，批判了李游子的消极怠工，提出健全组织生活，开展群众运动与大量发展党员的方针（当时市委共有党员一百二十人）。

会议上由张文彬同志指定吴有恒、李吉明、周伯明三同志负责市委工作，吴任书记，李任组织，周任宣传，市委的领导机构基本上是比较健全了。

市委成立以后，由于组织生活的比较健全，立刻在下层展开了关于思想意识的斗争，主要的一个斗争是关于和邱东平（一个在贩烟商会做书记的同志）的斗争。邱利用他在商会的地位发起了一个筹赈会，他却串同〔通〕了那商会的一些商人把那募捐来的钱吞没了，市委决定开除（内战时是团开除，以后其所谓觉得革〔命〕没有兴趣）邱的党籍，并把这件事向党内传达，提高关于无产阶级意识的教育。同时在海员工作委员会（由海支改组）里面开展和方才、廖茂的斗争。方才和廖茂本来是一个老党员（曾经失过九年关系），在这一次组织海员工会的工作里，他们两个人受了国民党联义社王德一千块钱的贿，进行反对党所决定选刘达潮同志做海员工会委员长的活动。当党和他斗争时，他说：“随你的便吧，我可以另组织一个共产党来和你们竞赛，看谁的工作做得好。”完全不承

认他的错误，党决定开除（一九三七年九月）了方才和廖茂的党籍，并在海员同志中作传达。方才出席过六大，能力强，廖茂没有什么能力，他们生活腐化，自己英雄，看不起刘达潮。

（这些斗争的进行使党的领导机关在党员中提高了威信，使党的纪律巩固，使党员的意识提高了，因此党这时候能够比较坚定的抓紧当时向上发展的群众工作，组织了海员工会、洋务工会、印刷工会、煤炭工会，在青年工作方面组织了惠阳青年会，成立了学生赈济会等等工作，并且领导了部分海员工人的反日罢工（如日本船船员的离船，英国船在澳州因反对运铁赴日全体罢工等），领导了反对装运汽油的码头工人的反日斗争。群众工作的开展使党的基础日益巩固，使党的发展越有可能，党在现在才算是真正的建立起来了。由一九三六年九月开始建立党的工作以至现在（一九三七年底），共约十五个月，这十五个月里党是已经建立而同时又是几次几乎死去的。

总结这一时期的工作，使我们这样的认识：

（1）建立香港党的工作，主要的是由于我们是能够基本上执行着党的政策的。虽然我们对于党的政策上有不少错误的了解（如在西安事变时的敦蒋口号，如在群众工作上反对民族革命同盟的一切活动等），然而我们终算是肯去执行党的政策，只要我们接到党的一个文件，我们就如获异宝一样去研究执行。因为有了这种精神，因此我们能够当时沉闷的严重的环境下开展了群众运动，在这些群众运动中发展了党的组织，在这些群众运动中发展起来的党员，成为以后香港党的主要基础，而且成为主要的干

部。

(2) 当时的不根据阶级的观点，不根据工作上的考验，不根据一定的组织原则与手续去发展党员与提拔干部，是一种最危害党的作风，这种作风在南委表现得更厉害，南委常常直接去发展党员，因为他们没有群众工作，因此他们所发展的党员大概不外下列几个来源：①所谓失了关系的旧党员或革命分子，②别一个政党（如民族革命同盟）的分子，③亲戚朋友。而当时对于考察这些对象真是非常马虎的，特别是处理关于吸收别个政党的分子入党这些工作上更马虎得惊人，因此投机分子、变节分子、自首分子等都混进来了，特别是对于那些变节分子的容忍，对于那些失了关系而又参加了其他党派活动的所谓旧党员的容忍是最大的危险。统计当时发生的几件严重的错误，几乎都是由这些分子发生的，象胡作民、林坤、马超凡、邱东华都是失了关系后参加了社会民主党（民族革盟）的分子，李游子是失了关系后参加国民党的分子，这些分子都是当时南委没有经过群众工作上的考验就发展了并马上提拔作为干部的，而且当时也已经清楚了他们这些变节的历史的，可是竟处理得如此马虎，因此严格说起来，这应该是政治上的错误，而不单是组织手续上的问题。对于这些错误，当时南委的宣传部长姚铎同志更须特别负责任，因为这几个人都是他亲自负责介绍进党的。这些痛苦的经验教训，在当时南委是没有具体地总结过的，最少是没有向市委传达过，在市委本身也没有能够象我今天这样彻底清楚来检讨过，只是一般的反对“马虎”罢了。对于这一点的认识不够，无论在何时何地，都会给党以莫大的

危险。

(3) 党的教育工作做得非常差，只有学生支部和妇女支部是有经常的教育工作的，在这两个支部的主要教育是阶级教育、组织观念的教育（当时几乎完全没有关于一般理论的教育），因此在这两个支部能够锻炼出几个干部。在一九三六年发展的党员除了海员方面几个老同志以外，在市委的范围内的（三十人）现在只有学生支部、妇女支部有四个同志成为干部，而且几乎也只有这四个人现在仍然留在党内。当时在教育工作上有一个困难，就是其他的支部关系都是把握在李游子、胡作民等手上，而这些家伙是绝不肯对同志们进行什么阶级教育、组织教育的。而在抗战以前那种环境里，阶级教育对于整个党员的修养是更有其严重的意义的。

2. 香港党组织的发展时期
香港市委成立以后，香港党组织有了大量发展党员的可能：（1）一般的干部都经过整理，党的组织基础基本上是比较以前健全了；（2）领导机关比较健全了，这个领导机关的特点是富于积极性的；（3）群众工作头头的较前开展（抗战后的新形势）了。

香港党开始在这样的环境下执行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定。在发展工作的第一阶段，发展的主要对象是群众工作最有基础的地方，主要的是向着当时已经组织起工会的海员、洋务、印刷的五个工业部门（另一方面则在各方面开展群众工作（保证各个支部都有群众工作）），求得党组织的普遍发展。

一九三八年的一月，党提出发展一倍党员的任务，并

且特别对印刷、洋务、海员、学生等部门提出更高的数字，发展计划是被各个支部主要地讨论着的。到二月以后，党的组织已经发展到二百一十七人（黄文杰同志来巡视时的数字）。在印刷工人方面由一个人发展到九个人，在洋务方面发展到约二十人，海员工人约二十人。党的组织普遍于纺织、橡胶、造船、铁路、市政、捕鱼、码头、学生、新闻界等职业部门，群众工作也普遍于这些部门了。

二月间在张文彬同志的领导下开了市委的扩大会议。在这个会议上指出了发展工作的成绩，并在会议上选举了补充市委的委员，市委由三人扩大至七人，计有职委会书记陈森同志、学生支部书记钟明同志、妇女支部书记曾莉芳同志、文化支部书记罗雁子同志当选为市委委员，常委仍由吴、李、周三同志负责。扩大会议仍然给市委以继续大量发展党员的决定。

党仍然是继续以前的方针进行发展工作，直至是年六月，才结束这个发展工作的第一阶段。到六月间，在市委底下的党员约有五百人，在海委底下的约有六七十人，有百分之九十是工人。

六月以后，党开始其发展工作的第二阶段。经过第一阶段工作的结果，使党的组织上有下列的现象：（1）党在海员、洋务、印刷、苦力、捕鱼、橡胶等部门有了很大数量的党员，而在重工业如造船、铁路、机器及市政工业如汽车、电车、电话、自来水等部门只有一点薄弱的基础，在这些部门的群众工作亦是非常薄弱的；（2）党在工人方面有了很大的数量，而在知识分子方面的发展却是

非常薄弱的，当时的文化支部只有十余个党员，学生支部只有九个党员，而这些部门却有很庞大的群众工作；（3）几个月来忙于发展，很少教育，形成一般党员（新的党员）的教育工作非常缺乏，他们都向党要求教育，在入党表上有十分之八是这样写的。干部更形缺乏。

在这样的情况下，党的工作方针是（1）主要的发展方向是重工业及市政工业，以及知识分子、学生，特别是学生方面应该有几倍的发展；（2）要在现有的党员中加紧教育工作，办训练班，提拔干部，并规定了学习制度，每星期除了支部小组会议外，要加开一次学习会议。

这个工作一直到广州失陷以前（十月）为止，基本上也是完成了的。在学生方面由九个党员发展到五十个，在造船业、汽车、自来水等部门建立了支部，但文化支部的发展却是非常慢的，重工业和市政工业的发展数字也是很小，海员工人发展到大约一百人以上，市委连澳门（当时澳门是市委领导的一个支部，有党员五十人）共有党员约六百二十人，全港（市委及海委）共有党员六百七十人左右。由一九三八年一月到是年十月，共十个月的时间，党的发展时期跟着广州失陷的新形势而被结束了。在这一个时期里面，香港党的整个组织工作都是基本上完成了他的任务的。党的组织有了差不多五倍的发展，群众工作也更向下层、更切实、更普遍了，党组织了并发展了几个工会（海员工会被封闭了）及其他工人小团体。党领导了印刷工人、煤炭工人的经济斗争，领导了学生赈济会里面的和国民党的破坏争夺做斗争，领导了印刷工会的反托派马超

凡的斗争，领导了几乎动员了整个香港中下层全部参加的著名的“义卖运动”，在这些群众运动里更加培养了党的基础与锻炼了党的干部，使党有了这样的可能，足以担负广州失陷后，负责向内地输送干部，及发动与支持东江的武装斗争等更繁重的任务。

在这一阶段中，香港党的领导机关的干部的流动性是很大的，开始的时候市委由吴有恒任书记，李吉明任组织部，周伯明任宣传部，以及李吉明同志调往琼崖（现任琼崖特委书记），就调欧照汉同志任组织部，以后欧照汉同志又调往琼崖（现任琼崖特委委员），就调周伯明同志任组织部，吕良同志以职工部参加常委，常委没有宣传部。这种干部的不断调动曾经影响到组织工作的进行，然而这时候市委却始终保持其一些优点：（1）高度的积极性；（2）学习的热情；（3）自我批评精神好。因此他〔它〕能够不断的进步，这一时候干部的进步是最大的。

其次，是在于在发展了大量的党员以后，能及时的注意于教育工作，在市委底下办了二个训练班（主要是训练一些领导支部及做初级训练班讲师的干部），几乎在各个支部都执行了增开一次学习会议的制度，因此这一时期发展来的党员，基本上是能巩固的。

至于这个阶段工作上的缺点，则主要的为：

（1）在发展时所谓突击、竞赛等方法的运用，曾经使部分的地方发展了一些不够格的分子，如在学生及苦力工人方面，但奸细及参加过其他党派则是没有的。在恢复关系的工作上吸收了几个自首分子（所谓集体自首，大概都是东江革命失败后的农民同志），这是以后在巩固工作

当中调查出来的。(2)工作的计划还有些不切实际的地方，如我们在发展到五百人时还提出过发展一倍的口号，没有很好的想到这时候的一倍是一千人数以上的数字了，没有想到那时候在群众工作上，在自己主观力量上都是不能实现这个口号的。这个口号后来被省委指正了。(3)没有及早的用更大的力量向知识分子、学生、重工业等部门发展大量的党员，造成在以后组织上的畸形状态。这几方面的党的工作始终是最薄弱的一环，而在香港的环境下，是最需要这方面的工作的配合的，广州失陷以后，我们就没有什么机会来补救这些缺陷了。

3. 香港党组织工作的向内地输送干部及党员时期

广州失陷以后，香港市委改组为粤东南特委（取消市委，只设香港、九龙两区委）；粤东南特委管理的地区为东江的惠阳、东〔莞〕、宝〔安〕三县，中区的中山、南海、顺德及广州近郊等地，开展这些地方的敌后游击战争为粤东南特委的中心任务。

在广州失陷以前，香港党是广东省委以下的最大的一个单位（琼崖除外），而且是他最老的单位之一，因此广州失陷以后，在广东各地有继续沦陷的可能，而那时候广东的党的组织分布是很狭隘的，党员是很少的。因此，这时候的香港必需担负了：（1）动员大量的干部、党员及群众到东莞、惠阳、宝安、南海、顺德等地，开展这些地方的游击战争；（2）输送干部党员到其他各地开展各地的党的组织工作。省委明显地给香港党以这样的任务。

香港党对于执行这一任务是很坚决的，香港、九龙两区

委及海委都将回国工作作为香港每个同志的应有任务来在支部小组展开讨论与解释，党通知每个党员准备随时调动回国工作，关于这种精神可以说全党都了解的，虽然以后动员的工作一般的是完全出于自愿的，然而这种不顾一切服从党的调动的原则，对于党员的教育有了很大的意义，我们在整个动员工作期间还没有碰过调不动的党员。

动员工作的方式，第一种是经过党内的鼓动介绍直接到党所领导的部队，如惠阳的曾大队，东莞的王大队，南顺的吴勤部队等；第二种方式是主要的方式，动员党员参加各种工作团到各地工作，我们曾经组织了二十个这样的工作团；第三种是经过党的决定到各地做党的组织工作的干部。由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到一九三九年七月这个时期，九个月间从香港连海员动员出去的党员约二百三十人左右，另从澳门动员的约二十人，我们是完成了黄文杰同志在广州失陷之前的几天所给我们动员三分之一的党员到内地去的任务了。

所有这些被动员的党员中，知识分子学生约占百分之三十弱，其余百分之七十为工人，工人中占数最多的为码头苦力、黄包车等工人，约数为四十人——五十人，其次为海员、洋务、印刷。工人的动员，主要的是到东江参加曾生同志的游击队，其中少数是曾经参加过内战的东江红军战士。

动员到内地区域的分布，大约是东江占百分之七十，琼崖占百分之十，南路占百分之十，西江中区占百分之十。

在东江，整个惠阳县的党的工作几乎完全是香港的工作团建立起来的。在广州失陷后一个月中，党即动员了约五十个党员到惠阳工作，而当时惠阳的党员只有二十人（主要的还是广州失陷以前从香港回去工作的工作团里面的党员），惠阳曾生同志的部队就完全依靠香港动员回去的党员与群众组织起来的，那就是不用说了。在东江除惠阳外，海丰、陆丰、东莞、宝安、博罗等县都分布了相当的数量。在西江、中区主要的为南海、顺德、恩平、开平等地。在南路主要为高州数县，成为建立南路（高雷）特委的主要基础。

关于干部的动员，统计在这个时期内约共动员了：市委一级（连海委）五人（内有两个是特委委员）；区委一级八人；支部书记约三十四人。所有这些干部，可以说是市委及海委两年来最大的积蓄了。干部动员数量与原有数量的比例，当在百分之七十以上，即是说，旧有的干部（广州失陷以前的干部）有百分之七十以上被动员离港了。

广东省委曾经认为香港党在动员工作上（帮助开展敌后武装斗争及内地各县党的工作上）是有成绩的。但同时指出了这一工作上的缺点，香港党本身亦曾检讨过动员工作中的缺点。

（1）在动员中没有更好的顾虑到香港党组织的根基问题，因此动员以后，香港党的组织是大大地伤了元气，直到现在还不能复原。特别是：①关于干部的动员没有顾虑到香港党的领导机构本身的困难，象香港区委曾经调出了三个区委书记，九龙区委曾经调出一个区委书记，两个

区组织部，即是说，一个干部提拔起来刚刚弄熟手就被调走了，而这些干部是经过较长期的培养才略能称职的。在香港区动员的结果曾经使我们要提拔一个刚好略会看报纸的苦力工人来做区委的宣传部，所有比较老一点的知识分子全被动员走了。②在群众工作干部的动员上也没有很好的顾虑到群众团体以后的工作问题。我们是很随便的便把群众团体里面负主要领导责任的同志调走了，象在印刷工会我们调走了三个最主要的群众领袖，在学赈会我们调走了几个最主要的活动分子，在惠阳青年会我们调走了一切干部（约十余人），在琼崖同乡会我们调走了一切琼崖籍的同志。这样调动的结果使我们在这些群众团体里的领导十分削弱了，甚至再不能取得领导了（如琼崖同乡会、西乡长县同乡会、会宁同乡会、海陆丰同乡会等都是），这自然会使香港的群众工作向下降，使党不能继续发展。

（2）动员工作的缺点还表现于被动员的干部的配备不适当、运用不适当、浪费干部等问题上面。我们曾经动员了约三十个知识分子到东江的部队里去当战斗员，里面有支部书记甚至区委书记；我们曾经动员了四个工人领袖到中区的一个工作团里面，因为这几个同志都不会唱歌演戏，因此在工作团里一点也没有发生作用，还几乎被当地党开除了党籍；我们曾经动员一个最主要的女工领袖（一个有几万女工认识她的，领导过义卖运动，领导过几次二三千人的集会，领导过厂内斗争的女工领袖）到南路的学生赈济会的工作团里去做一个团员，她在这样的工作团里当然会比一个普通会唱会跳的学生也不如了。在这样无原则的调动下，干部浪费是非常大的，一方面影响了香港

的工作，另一方面是没有加强了内地的工作。

为什么会产生这些弱点呢？这主要地是由于：

(1) 对于香港工作的重要性与长期性没有应有的认识，只看到香港现在不是和日本帝国主义斗争的地方，因此就认为香港的工作无足轻重，没有认识香港是华南一个最大的都市，党要依靠这里去组织广大的工人，同时也要依靠这里去更长期的支持内地的抗战。而我们当时都是认为内地工作比香港工作重要十倍，特别是在英日矛盾更尖锐的时候，对香港更存“三日京兆”的心理，大家只想早点离开这闷沉沉的安乐窝到内地打游击去，这种心理使我们不能不产生不管香港如何三七二十一的现象。

(2) 在工作上则粗心大意的作风，也是造成上列的缺点的。只要内地要人，就向香港提出几天动员若干的要求，没有更具体去计划布置，因此下面就只靠一些紧张动员，于是一些积极分子干部都打了先锋，大家都要求回内地去，党也就马马虎虎地批准了，因此造成旧干部被动员了百分之七十，群众中的主要干部几乎全部被拖走的现象。

4. 香港党的组织工作的巩固工作时期

由于动员工作伤损了香港党组织的元气，到一九三九年七月以后，香港党的组织内呈现了显著的贫乏衰弱的现象，即：(1) 干部非常缺乏，两个区缺乏书记，迫得我们要从特委青年部、妇女部及职工部，以后而且还要从内地抽干部出来负责，这结果自然是扶得东来西又倒，特委的各个委员会又无人负责了，区以下的干部几乎全部是新提拔起来的，偶然存着几个广州失守以前已经在职的干

部，那就不是能力小积极性较差的便是一些自己的职业忙得不可开交的人，党的组织领导是很成问题，各个区委、海委都忙得不可开交而且又领导不起来了；（2）发展组织的工作事实上几乎完全停止了，数月只有十余人或更少数字的发展；（3）群众工作的活动缩小了，特别是一般的忽视在香港的群众活动（只注意到内地去的动员工作），许多团体如印刷工会、学生赈济会等大团体都只靠几个人在上面支撑，可是工人的斗争及学生中的斗争都紧张起来，要求党加强领导。

在这种情况下，党不能不提出巩固工作。在七八月，特委向香港党提出加紧教育工作，整理组织，逐步恢复广州失守前的基础的决定，同时在这原则下确定了：不再向内地动员了，香港党的现时的中心任务是（1）衰落了香港群众团体活跃起来，使衰弱了的党的组织强健起来；（2）基本上不再普遍提出发展党员的决定，只个别的吸收在这些期间中在群众团体中积极活动的有作用的分子入党；（3）办训〔练〕班，训练现在的新提拔起来的干部，即：训练新的一批支部书记、支部指导员。

特委并且办了一个两个月的训练班，香港送了十个区委或准备做区委的干部到这个训练班去受训。

这个决定以后，香港党基本上是克服了以前的动荡不安的状态，没有了惟内地之命是听的现象了。九龙区办了一个八个人的训练班（支书以上干部），并且继续办了几个初级党员的训练班，香港办了两个共十一个人的训练班，以后也办了几个初级党员的训练班，海委则利用轮船的修理期间开办了一个七个人的训练班，这些都是不脱离

生产的短期(一个星期)的训练班。经过这些工作以后，党的工作基本上是安定起来了，群众工作也重新开始活跃，主要是各个群众团体都恢复了一些日常活动。

十月我们接到了党中央关于巩固党的决定，因此使我们对于巩固党这问题的重要性有更深一步的认识，因此党正式开始关于巩固党的工作：

(1)关于审查工作：首先是由特委对区委、海委的审查，然后由区委负责去审查底下的支部。对于中心支部书记及主要的支部指导员的审查，则仍是由特委参加负责的。审查的方式是：①直接和他谈话；②问别人，问和他共同工作的人对这个人的认识。主要的是采取第二种方式。

关于中央这个决定，因秘密工作关系是没有向下层公布的，只对区委常委以上的干部个别传达了内容要点，而且决定分几次，配合实际工作，如讲到教育工作的需要时传达关于教育的工作，讲到香港的奸细活动、叛徒活动时提出保卫工作等等。

审查工作的结果发现了：①香港、九龙、海委三个领导机关的干部中，有四个同志是阶级意识比较差的，这主要表现于他们的私有观念上，四个人都是太看重于自己的家庭生活，未能自觉地和自己的私有观念斗争的。四个人中有三个是工人，有一个是现在继承他的父亲做起小商人来的知识分子。关于前三个同志，组织观念还是好的，家庭实在也有些困难，受党的教育很少，负担工作不久，对于这三个同志，党决定加以特别注意的阶级教育。对于第四个同志，党决定撤销他的领导工作并明显地和他这种意

识斗争。②发现七个自首分子，都是从前参加过东江的游击战争，失败后在乡间集体自首过的，但并没有做过出卖同志等事情，在港工作也不太积极，党决定开除这七个人的党籍。③发现了约五十个组织观念比较薄弱，或不能经常到会或不能经常缴费，或不能坚决的执行党的决议的党员，这些人里面大多数是一些知识分子、自由职业者、小职员、失业失学的青年之类，党决定对这些人施以更严格的教育，减少他们的领导工作，在一般的工作上再考察他们。④发现了七个腐化分子，都是工头，有一个压迫过厂内同志发动的斗争，有一个放高利贷，其余几个都是在生活上非常自私，不肯按收入比例交党费的，或是在群众团体中××××的，党决定开除其中六个出党，但仍保持和他们的个别关系，不和他们宣布（因为估计可能引起他们的反感发生的破坏作用）。对其中一个是老党员，则决定和他作斗争，加紧教育，希望他能转变。

审查工作的结果，可以说是对于干部党员的思想意识、组织观念上的了解是比较以前任何时候都清楚，同时也比较以前任何时候都更为注意的。

(2) 关于教育工作：a. 由特委特别为香港办一个训练班，集中区级及支部指导员等干部八个人，脱离生产训练两个星期，训练的内容主要地为阶级教育（如何从阶级的观点上认识党的策略及各党派的政治主张）及关于组织观念、关于纪律等问题的教育。这训练班主要地是准备香港的中级干部的骨干，并且依靠这些骨干来领导与教育底下的党员与干部。b. 关于一般党员的教育未有具体计划，只决定以提高阶级意识及组织观念为主要方针。在教

育工作方面的注意是不够的。

(3) 关于整理工作：①接到了省委的通知，解散了香港、九龙两区委，组织市委，并由市委书记代表省委领导海委，这对于整个香港工作的统一的领导与计划性等等方面都是有好处的。②改组过几个支部，如树胶厂支部及苦力支部，这些支部都是因为支部书记、支部干事不负责任或者是不够格分子，因此支部生活、支部的组织很不健全，经整理后提拔了好的干部做支书、支干，都较前健全了。

香港党的巩固工作到我们启程的时候（十一月底），基本上还只是做到审查的阶级，教育工作和整理工作都是做得很差的。整个巩固工作执行的结果是：（1）领导机关对于全党对于下层的了解是较深刻了，一般的可以说已经基本上了解各个干部各个党员在思想意识上的表现。

（2）市委的建立与市委底下支部指导员、支部书记的重新配备（这些干部主要地是被审查过与被训练过的阶级意识、组织观念较强的同志），领导机关与领导系统都较以前健全了。在教育工作上虽然做得少，但党已经提拔了约十个主要的支部指导员及中心支部书记，这些干部都是比较坚定而且在斗争中经过锻炼的。

巩固工作执行的缺点，仍然是表现于忽视从教育的意义上来认识巩固工作。我们在执行巩固工作时，只知重视意识的表现，只要某个党员表现得不好，就说“这个宝贝哟，”把许多稍为不好的同志都放在“宝贝”之列，即是说轻视他们，对他们大概都是认为没有什么前途的了，这种看法特别是对待知识分子尤为甚。由于检查工作的结果，更

加严重地造成轻视知识分子向倾向。这种倾向可能使香港党在多一个不如少一个的观念下，随便开除一些党员，特别是那些所谓成问题的知识分子；这种倾向可能使党的领导机关只知道怨恨下层同志没有出息，而不知道细心的检查自己在领导上应负的责任。根据我们离港时的情形看，这种倾向是可能继续发展的。

（二）香港党组织的现状

1. 目前的党员数量及其分布（一九三九年十一月的状况）

香港党员的总数，包括现在的市委、海委及文化支部（由廖承志同志那边公开系统领导的）三个系统，总数为六百三十一人，内计属于海委的一百六十八人，属于文化支部的十八人，属于市委的四百四十六人。文化支部只包括在香港作文化宣传工作的如开书店、办刊物的同志，八路军办事处的同志不算在内，原来是市委领导的，后来因他们“红出面”了，就由廖同志他们代管理，原则上是属于市委系统并向市委纳党费。在这个总数中，计：工人占百分之八十，共五百一十一人；学生占百分之六，共三十八人；职员、自由职业者占百分之五，共三十四人；其他（主要是失业失学青年、小贩、公务员等）占百分之九，共五十八人。

这些党员及支部的分布如下表。香港区支部分布：洋务支部四个（大酒店一，小酒店或住家二，工会里工作的一）。印刷支四个（商务支，其他的是分散于各印刷的）。

香港党员总数及其分布表

类别	人数	支部数	备考
总数	631	77	
海员	168	22	
洋务	68	8	(即酒店及洋人侍仔, 厨师) 半岛酒店、粤东酒店各一支部, 尖沙嘴、九龙塘各一支部
印刷	63	10	中华书局占五支, 三十二人, 珠江日报一支
造船	14	3	黄埔船坞二支, 太古一支五党员
铁路	3	1	广九路英段
汽·电车	14	2	九龙汽车公司一支, 香港电车公司分散的一支
自来水	7	1	九龙自来水
邮、电	7	1	九龙邮政党员一人, 香港电话多三人, 其余是分散的
黄包车	38	5	九龙一支十二人, 香港四支
码头苦力	37	4	九龙仓一支八人, 九龙一支分散的(另外有个别的), 香港二支, 分散的
捕鱼	17	1	完全在长洲岛渔场(九龙区)
纺织	17	2	都在九龙, 棉一人, 总统二人, 共有六厂(除棉布外均小厂)
橡胶厂	28	2	香港胶厂占二十三人, 冯强三人
食品	24	2	大同罐头厂一支十二人, 港牛奶公司支一
职员	11	1	银行、洋行职员
学生	38	6	九龙的华南、华仁、中华职校各有一支, 另有女生支一, 包括学校正风、梅芳各一支
文化人	23	2	九龙有一支党员五人, 一是全港的文化特支
其他	54	4	

以上这些党员，按其所在地域来说（海员及文化支部除外），在九龙区的计二百五十四人，在香港区的计一百九十一人。

从各个职业部门上来说，党员分布最多的是海员、洋务、印刷三部分，原因是这三个部分是群众组织最有基础的。

从各个产业单位的集中程度来说，最大的一个支部是中华书局的支部，共有党员三十二人，其次是香港树胶厂、大同罐头厂，日本皇后轮船、丰平轮、丰庆轮，都有十五个以上的党员。

在总数六百三十一人当中，约有五百五十个是一年党龄以上的党员，因为自广州失守以来，新党员发展得非常少。

从整个分布看起来，范围是相当广泛的，几乎所有比较主要的部门都有了同志，所有有了同志的部门都有了或多或少群众工作。从领导作用上看起来，则所有几个主要部门，我们的最大的支部都能建立在它的主要单位上，如在海员我们的最大支部是在最大的而且最能起领导作用的日本皇后轮上；在印刷工业我们掌握了中华书局，在树胶工业我们掌握了最大的香港树胶厂；在食品工业我们掌握了最大的食品工厂大同罐头厂；在造船业我们在两个最大的船坞（太古、九龙）建立了支部；在洋务工人方面，主要的支部建立在失冒士打、半岛、海景三间大酒店。（因此，党的支部对于各种职业部门的工人的整个的领导就容易，更有了中心。

女党员约占全体党员总数之百分之十四，约九十人左

右。

2. 目前的领导系统

(1) 目前香港党的组织分三个系统：市委、海委、文化支部。①市委是最大的一个系统，关于整个香港工作的方针、计划等是由市委决定的，除了海员的工作外，它要管理全部的工作，就是文化工作也并不因文化支部交给廖承志同志代管而放弃了，市委底下仍有文化支部管理一些未暴露了的文化人。市委管理之下的有五十四个支部。市委之下没有设区委，一切的支部直属于市委管理，由市委指定支部指导员管理一般的支部，支部指导员对市委负责，支部的工作是在市委来解决的。目前市委底下共有支部指导员九个人。重要的支部如中华书局等支部仍由市委直接领导。②海委管理的支部二十二个，及约有十个至十五个的个别关系。海委的职权只限于海员的工作，在岸上的海员群众团体及船上的支部工作。海委是直接属于省委领导下的一个单位，在广州失守后交由粤东南特委代管，粤东南特委取消后由省委港澳特派员管理。③文化支部以前是市委直接管理的，现在交由廖承志同志他们代管，主要工作是出版、开书店等工作。

(2) 市委、海委、文化支部及办事处的联系：以市委书记为中心，构成几方面的联系：目前的市委书记是代理省特派员的工作的（因省特派员吴有恒同志已离港来延），市委书记同时参加对海委的领导，他直接代表省委参加海委的会议。市委和办事处方面有联系，大约都是经过秘密交通的联系，必要时则由市委书记与廖承志同志找秘密地点接头，关于省委的文件指示电，关于中央的政治

决定等也由廖同志处传达。廖承志同志对于整个香港工作的方针上常常是负责决定的。

3. 目前的领导机关及其干部

目前的领导机关，市委和海委都是新建立与补充的过，一般的说起来是比较广州失守以前的市委和海委，健全的程度还是比不上的，比特委直接领导，在能力上也还是比不上的。这原因是：（1）几乎所有以前的“老香港”干部都调走了，新的负责同志是外来的干部，对于香港的底细没有那么清楚；（2）一向领导工人运动的有比较丰富的工运经验的同志走了；（3）在政治上阶级立场上更坚定与明确的干部如特委书记、组织部、职工部（后任香港区委书记）等同志走了。

然而新的领导机关有其优点：（1）它建立了市委，对香港的工作有更统一的领导，工作范围缩小了，不象过去特委时的顾得内地就放松了香港；（2）它已经培养了一批中级干部（支部指导员）；（3）干部的工作热情与积极性是很好的，特别是市委的干部，至我们这一次来中央，它曾经确实是把×香港的主要干部抽空了，至少会影响到香港党今后的工作的，因为目前是个环境更向下逆转，工作更难做的时候。

关于各个领导机关及其干部，分述如下表：
市委及其干部

职别	姓名	出身	文化程度	党龄	在党内工作过的	担负的工作	性格	能力	意识观念	备注
书记	虞焕章 (男) 25	家庭中小学教师	大学	1937	广州市委宣传部	宣传	虚心，学无止境，工作刻苦，学习态度好，责任心强，斗争精神很丰富，上进心很浓	文化宣传工作经验，工作经验较丰富，工作认真负责	家庭观念重，已决心改正，做了自我批评，做了自我斗争	广州人，会讲广州话，对了解
组织部	李明 (男) 30	贫农家庭，小学教师	受过小学教育，中学程度	1936	中山县县委组织部	组织	学习刻苦，斗争精神很丰富，上进心很浓，责任心强，斗争精神很丰富	工作经验较丰富，工作认真负责，对组织工作有较丰富的经验	组织观念很强，自我批评很深刻，很好，也很好，很好，很好，很好	中山人，对了解
宣传部	曾莉芳 (女) 22	工人家庭，大学生	中学	1936	香港市妇联	宣传	斗争性强，上进心很浓，责任心强，斗争精神很丰富	工作经验较丰富，工作认真负责，对组织工作有较丰富的经验	组织观念很强，自我批评很深刻，很好，也很好，很好，很好，很好	香港人，参加过土生土长，参加过香港革命
职工干部	陈曼夫 (男) 24	戏院工人	中学	1938	粤东特务干部	组织	上进心很浓，斗争精神很丰富，责任心强，斗争精神很丰富	工作经验较丰富，工作认真负责，对组织工作有较丰富的经验	组织观念很强，自我批评很深刻，很好，也很好，很好，很好，很好	对了解

市委的职委会、妇委会、青委会都因缺乏干部还没有建立起来，以前粤东南特委的青年干事、妇女干事都送到省委训练去了。市委没有执委会。

海委及其干部

职别	姓名, 性别, 年龄	出身	文化程度	入党时间 (党龄)	在党担任过的工作	性格	能力	意识观念	备考
书记	潘汉夫 (男) 35	学生	中学	大革命时期, 曾坐牢	在广后, 任海委, 抗战八年, 组织。	负责, 办事, 学, 积, 意, 当, 义, 实, 相, 主, 注。	实际, 工作, 治理, 是, 非, 常, 不, 很, 常, 组, 织, 阶, 级, 观, 念, 革, 命, 诚, 琼, 崖, 熟, 悉, 准, 备, 在, 现, 走。	很好, 很, 事, 琼, 崖, 熟, 悉, 准, 备, 在, 现, 走。	人, 在, 现, 走。
组织部	吴光海 (男) 25	海员工人	小学	1937	海委组织部干事	学, 不, 点, 神, 精, 碎, 习, 好, 英, 雄。	有, 争, 斗, 的, 经, 验, 有, 相, 当, 的, 观, 念, 自, 觉, 的, 还, 有, 变, 实。	有, 争, 斗, 的, 经, 验, 有, 相, 当, 的, 观, 念, 自, 觉, 的, 还, 有, 变, 实。	入, 过, 特, 委, 的, 训, 入, 过, 特, 委, 的, 训。
宣传部	符镜洲 (男) 35	洋务工人	小学	1938	香港区区委委员, 支部指导员	不, 做, 积, 出, 懦, 怯, 敢, 事, 性。	有, 办, 法, 工, 作, 有, 力, 对, 群, 众, 有, 能, 力, 有, 观, 念, 已, 不, 愿, 再, 做, 了。	有, 办, 法, 工, 作, 有, 力, 对, 群, 众, 有, 能, 力, 有, 观, 念, 已, 不, 愿, 再, 做, 了。	斗, 争, 决, 定, 和, 准, 备, 工, 作, 党, 决, 定, 和, 准, 备, 工, 作。

组织干事	梁竟民 (男) (海南人) 30	海员工人	小学	1938	支部书记	积极, 热心 情, 粗心	工作少办法, 少经验, 但在 海南岛籍的 海员工人中有 威信	对党忠诚, 阶级意识强	入过特委办的 两个星期的训 练班, 不上 ×
------	------------------------	------	----	------	------	-----------------	--	----------------	---------------------------------

海委原有委员现已大部分离港，现没有执行委员会。

市委的支部书记及支部指导员的干部共六十三人，海委没有支部指导员，共有支部书记二十二二人，文化支部书记一人。统计香港除上表所列干部外，尚共有支书一级以上干部共八十五人。

所有这些支部书记，他们的能力和党龄都是非常参差不齐的，因为有一些支部是新的、小的，有一些支部则相当大。然而一般的说，现在的干部都是经过执行巩固工作中审查过的，有些坏分子（如树胶厂支书）已被撤销工作，在组织观念上目前的干部是比较好的，而且领导机关也注意于他们这一方面的审查与教育的。

目前严重的问题是海委的干部问题，由于海员的教育工作的进行很困难和一向的不注意，又因海员干部的容易暴露，目前已陷于难以支持的状态中，海委书记被叛徒廖独康（一九三〇年的海委书记）追踪不能不调离香港了，在群众工作中的干部太红了调不回党内来，我们来的时候海委书记已不敢外出，我们要求省委从内地调干部来对换，不知这事情解决了没有。

市委目前的干部是比较健全的，市委书记虽然有些缺点，然而在整个市委来说，自我批评的精神是很好的，各个同志都能经常留意于自己的弱点，因此基本上他是能够胜任目前的工作的。对于支部的领导组织工作的管理方面当没有大问题，而且市委的干部一般的都有较好的组织观念。

宣传教育工作的干部非常缺乏，无论海委和市委的宣传部长都是不适宜于负责宣传工作的。在下层知识分子出

身的干部很少，较好的知识分子干部如文化支部的支书本
来是以前市委的宣传部，却因为太红，不能调到党内来工
作了。

根据我们的估计，目前的香港党的干部是还能够应付
目前的香港工作的。从其干部的坚定上来说，这些干部是
能够禁〔经〕得起环境恶转的打击的，但在要求工作有更
大的开展上说，那就是能力还是薄弱。

兹将支指、支书等主要干部列表如下（关于海员几个
大支部，如日本皇后、丰平、丰庆等支书，我因知道得不
很详细，这里不写了。只知道这三个支部在船上的活动很
好，日本皇后支书张高全是大革命时的老党员，其他两艘
的支书是大革命后的党员）：

职别	姓名 年龄 性别	出身	党龄	文化 程度	性格	意识观念	能力	备注
造船厂 支指 (顺德 铁路)	何廉 (造 船工人) 男, 25	造船 工人	1938	小学		家庭观念 略重, 对 党的尊重 与执行决 议的精神 还好	在群众中 能活动, 工作有办 法	前九龙区 组织部, 未暴露
纺织支 指	冯女修 , 女, 18	纺织 工人	1938	小学	沉着 , 忠 实, 积极	很好 (在 特委的 训练班 中是模 范学 员)	群众领袖 , 对群众 工作及 支部工 作均有 办法	不很暴露
中华书 局总支 书	夏国钧 , 男 30	印刷 工人	1938	初中	沉着 , 积 极	阶级意识 很强, 但 对组织观 念还较差 , 常不能 完全执行 党的决定	很有办法 , 丰富的 斗争经验 , 支书工 作经验则 少	暴露, 是 中华书局 几次斗争 的工人代 表

职别	姓名, 年龄, 性别	出身	党龄	文化程度	性格	意识观念	能力	备注
大同罐 头厂支 书兼支 指	邓俭, 20 女, 本省人	罐头 厂工人	1938	小学	沉着 坚定, 积极	很好 (在特 训班学 委是中 是模范 员)	群众领袖 支部工 及群众 工作都 有办法, 领导过 经济斗 争	已暴露, 被警察 检查过 她表现 很镇定
树胶厂 支书	曾莲芳, 女, 22	胶厂 工人	1938	小学	沉着 忠实	很好	群众领袖 领导过 全厂的 斗争	现已被 厂主开 除
半岛酒 店支书 兼洋务 工会党 团书记	刘祥, 40 男	油膝 工人	约大 革命 后	小学	沉着 忠实, 坚定	很好	办法不多 在群众 中有威信	
洋务支 指	蔡振兴, 男, 35	洋务 工人	1938	小学	忠实 不活 泼	很好, 对自 己个人生 活不很注 意, 不能 为党工作 , 不顾自 己生活	办法不多 组织工 作经验少 , 但现在 尚能称职	前香港区 组织部
印刷支 指 (及 学生)	何清, 25 男	教员	1938	中学	积极 负责, 但相当 英雄主 义	对党的信 仰尊重, 很好, 英 雄主义 经批评 后很痛 切地自 己斗争	聪明, 有 办法	前香港区 宣传部
支指	周振, 男, 24	工人	1938	中学	忠实 积极, 负责	很好	相当聪明 有办法 , 实际工 作经验 还少	

职别	姓名, 年龄, 性别	出身	党龄	文化程度	性格	意识观念	能力	备注
支指	张南, 24 男	电话工人	1938	中学	忠实负责	很好	聪明, 有办法, 但工作经验较少	
苦力黄包车支指	王平, 30 男	黄包车工人	大革命后		忠实	阶级仇恨很深, 对党还仰私有浓厚	没有什么办法	曾经做过香港区宣传部
汽车支书	陈文汉, 30 男	汽车工人	1938	小学	忠实积极	很好	群众领袖	
银洋行职员支书	黄思静, 26 女	银行打字员	1938	中学	忠实积极, 坚定	很好, 党费交得特别多	能领导这个支部与群众工作	
文化支部书记	杜埃, 30 男	新闻编辑	1937	大学	忠实积极, 坚定	很好 (他被香港政府逮捕警告过, 但他表现得很好)	理论上很进步, 在文化界中有中上地位, 活动力强	以前 (三八年) 是市委宣传部

(三) 领导机构和领导方式

1. 关于集体领导与分工领导

集体领导与分工领导配合得不好，是香港党在领导方式上的一个严重的缺点。特别严重的是在取消了市委，香港党由特委直接领导的时期，在一九三八年的市委时期，领导方式上的集体领导与分工领导的配合，基本上是比较好的，整个领导工作上是比较经常的有计划的。在特委的时期，由于工作重心放在内地，由于特委本身各个委员会的不健全等等，就更明显的暴露了这些弱点。当党一个决定以后，常常不能在各方面同时起反映。这些现象表现于：

(1) 关于市委工作和海委工作之间的联系问题。海委虽然只限于做海员工作，然而它同样必须参加全港的一般的群众运动。在广州失陷以前，香港市委和海委只有横的关系，特委成立后，海委的工作虽然一般的在特委会议上讨论，然而因为这是代管（代省委管理）性质的，因此里面的具体情形，尤其是各个船各个支部的工作，不在特委讨论，只由特委书记梁广同志单独负责解决。因此海委对特委实在是一个半隶属的关系，特委的组织部不清楚海委的工作，这结果自然使海委和香港、九龙两区委的关系疏隔起来。尤其是在海员工人的组织余闲乐社里面就有七百个洋务工人，余闲乐社在岸上各个支社的工作都是洋务工人负责的，在这些群众中主要的领导者是市委方面的洋务工人同志，而余闲总社的党团的领导则是由海委负责，因

此常常发生海员工人与洋务工人方面的争执，余闲总社与其支社的争执。这期间其实是各个同在执行着各个自己上级所给予不同的决定，如有一些就只是因为市委方面决定卖花募捐，而海委方面则决定演戏募捐，两方面的同志就在下面争执起来了。甚至海员方面个别的同志要求党解散洋务工会，说：“洋务工会是由余闲乐社产生出来的，现在是忘记了祖宗了。”而洋务工会的个别同志则要求党解散余闲乐社，说：“既然有了产业的工会，何必要什么乐社的落后组织？最少也要禁止洋务工人参加余闲乐社。”至于其他的工作不能一致配合的就更多了。由于特委本身忙于内地工作，香港的工作特别是海员的工作常不能提到会议上具体讨论，因此这种缺点后来虽然注意了，但还没有完全克服。

我认为对于海员工作虽然有些国际性，但她的中心究竟在香港，她的活动也在香港，因此此后关于香港的工作与海员工作的领导必须统一于一个机关或一个负责同志，如以后省委所决定的特派员负责领导一样。而且由于香港环境与工作的复杂，这个机关或这个同志应该是专门管理这一地区工作而不是兼管其他的，如特委的时候，特委的同志一到内地巡视工作，香港的工作就只好放下了。

(2) 分工与集体领导的配合不够还表现于香港区委的工作和九龙区委工作的配合不够上面。香港、九龙两个区并不是香港的各〔个〕别的行政单位，香港的各种群众组织也没有香港与九龙单独组织的，大致上总的群众团体都设在香港，而群众（特别是党领导下的群众）则多在九龙，因此香港的工作和九龙的工作就常不能配合。后来我

们决定由九龙区委书记与香港区委书记每周接头一次，比较改善了，但仍常有在行动上不能一致配合之处。

(3) 分工与集体领导配合不够还表现于职、青、妇各方面工作的冲突。因为特委本身忙过不了，有一些决定不能同时在各方面传达与解释清楚，因此在下面就不能配合了。如：职工部向来就很少讨论青工工作与帮助青工工作的发展，党领导的各个工会没有专门的青工工作，青年部也不来关心这些工作。如当妇委决定要在学生赈济会里面成立女学生的单独组织女学团的时候，遇到学生支部的同志拼命的反对。

(4) 分工与集体领导的配合不够还表现于党团与支部领导之间的冲突。由于没有很明显的向同志们解释了党团与支部的关系，因此党团的决定在党内未能及时通知了支部的时候就常常碰到支部的反对。

(5) 分工与集体领导的配合不够最后还表现于各级的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的分工不明上面。宣传工作没有建立起自己的工作系统，特委的宣传部只有一个空头部长，而且常常出去内地巡视，忙于组织工作上面。教育工作的缺乏主要是由于宣传工作制度还没有建立起来的。现在已经注意了，但是宣传工作的干部非常缺乏，要克服这个困难即宣传工作跟上组织工作，还要一个长时期。

根据上面所述的缺点，可见：

(1) 对于香港的工作必需有统一的领导。特委成立的时候，一方面是为了要抽出干部到内地去，一方面是根据了党章上凡省委或特委所在地的中心城市不另设市委，由省特委直接领导的原则，取消了市委。殊不知第一，因

为香港和内地的关系是不密切的，他是不同一个国度的地方，对中国内地的工作是不能起中心城市，如广州在广东一般的作用的；第二，因为在战争的环境中，特委底下的复杂的战争环境，必然使特委对香港不能经常兼顾，而取消了市委后，香港就没有了独立工作的可能了。

(2) 对于一个领导机关的各部(组织、宣传、青、妇、职)干部的配备，使各部能健全，能建立自己的工作系统和制度，对于整个工作的配合与克服领导机关(常委)的跑腿主义、“无事忙”等等是非常重要的。过去我们对这一点没有很好的认识，因此随便调动了各部的干部，使各部都成了空洞无人负责，因此对各方面的工作的领导就都薄弱起来，而常委几个同志都忙得要命了，这不能不是事务主义的领导。

但特委的领导也有其特点：(1)它是具体的、实际的、了解下层的、很少给下层以空洞的指示。它能够和下级保持密切的关系，而且能够具体地解决下级的困难；(2)它是灵活的，在总的集体的决定下各个同志能充分的有权力去解决各种问题。它很少开大的会议，但接头、会谈是很密切的；(3)它对于工作的传达执行是迅速的，党曾经要求过在紧急的传达下能够在二十四小时内传达给全港的一切党员，这一决定在动员工作中的情况看是可能的。

目前的市委的领导是更集中了。市委在领导方式上是有了特委的这种长处的，同时自提出巩固党的工作后，党的领导干部一般的是开始注意于从政治上、意识上提高自己的工作。希望他们能够纠正过去领导工作上的弱点。

2. 上下级关系

香港党的上下级关系是密切的。各个支部小组每周开会一次，支部会议支部指导员必须出席，中心支部则由市委直接出席，支指及中心支书每周和市委接头一两次，一次主要是传达与布置工作，一次是检查工作，听下面的详细报告。在动员工作和斗争的时候，甚至每天接头三次。对党团的领导由青、妇、职各部干事领导，各部干事每周和市委（特委）接头二次。在过去特委对各部干事的接头常因内地的工作忙而疏隔了，但最少是能够保持一星期一次的。因此，党的上下级关系很密切。这种密切使党的领导机关能够了解下层的具体情况，同时下层对于领导机关的威信一般的是很高的。上下级之间没有什么对立与不团结的现象。

上级和下级接头或出席他们的会议的时候，除有特殊的政治传达外，一般是首先由下级报告几天来的工作和提出意见，各个人都报告完了，然后由上级根据报告发表意见，经过讨论后分配执行。在这一点上是具体的灵活的，同时让下级有充分发表意见的机会。在我们的上下级关系中，还没有发现什么官僚主义、空谈主义的作风。

然而在这种领导工作上都存在着下列诸缺点：（1）解决的问题都是实际的，同时又是琐碎的，一件工作的执行经过多次的讨论布置，而每一次都只是解决与布置了一部分。这种“零售碎片”的领导，使我们对下层干部缺乏整个的全盘的教育，使很多东西都不能不依靠上级来解决，下级缺乏了解决全盘工作的习惯，而且没有这种胆

量。(2)因此,造成了下级缺乏独立工作能力,干部提拔与培养非常慢,下级天天要找上级,上级天天要“出街”,一天接七八个头,不能不成为跑腿主义者了。

(3)因此上级很容易暴露,很容易成为全党周知的“负责同志”。

3. 领导方式的变换

香港党曾经因各种情况,变换与改善过自己的领导方式。首先是在一九三八年的四五月间,党已经由几十个人发展到五百人,已经由没有什么群众工作发展到有很大的群众工作时,党只有一个常委会三个人的领导机关已经是忙过不了了,每个同志每一星期要参加十多个支部会议,弄得每天一早出去晚上十二点、一两点钟回家,拉矢[屎]也没有空。因此,我们就决定建立区委。我们把全港分为九个区,设九个区委。可是建立区委以后,马上就发现了几个缺点:(1)市委自己变成一个空空[高高]在上的领导机关了,一切都经过区委,因此对于下级工作的领导是不密切而且不实际的,对下级是困难了解的。(2)增设了许多机关,增加了目标,危险!

这些缺点经省委指出了,因此又决定了取消区委,[决定]:(1)市委组织部增设组织干事到四个人,负责领导支部;(2)一部分的支部交青、妇、职委代管。

这个决定的执行,又发现了下列现象:(1)组织部的工作成了单纯的领导支部,组织干事没有真的做组织干事的日常工作;(2)青、妇、职各委忙于领导支部,因此支部工作和党团的工作混淆了,群众工作松下来了。

因此，党才决定成立支部指导员制度，党当时决定了：（1）领导支部是党的常委的责任，支部工作要直接提到常委来讨论，组织部并不以管理支部为唯一工作；（2）提拔几个好的支书做支部指导员。

支部指导员本身不象区委一样是一个机关，是市委底下的一级党部，他只是市委下面工作的个别干部，直属于常委会管理。支部指导员的任务是向下传达上级的决定，向上反映下级意见与现象，他不是一个权力机关，不能解决开除党籍与批准入党等问题。每个支部指导员大约领导两个至四个支部，不脱离生产。有些支部指导员同时又是支部书记，但他不将另一个支部的工作向自己的支部报告。现在，大部分的支部指导员是兼支部书记的。

支部指导员的设立可以说是解决了当时的困难，我们现在还没有发现这个方式的缺点。

其次，由于环境的恶转，我们在领导方式上也稍有改变。抗战发动以至广州失守几个月后，党的会议是尽可能大与长的，一九三九年三月的特委的扩大会议开了九天，然而就是在这个扩大会议以后香港的环境更恶劣了。在扩大会议的时候，八路军办事处就被逮捕了七个同志，余闲乐社被逮捕了三个同志。党估计到环境会更向下转，在这以后开始决定少开大会议，多接头、多会谈的方式。到八月以后，还规定了下级会议的时间不准超过两小时。

这时候，党关于政治问题的传达或比较复杂的决议的传达，是不一定在一次会议上解决完了的，而且常把它配合到各个支部的实际问题来提出（如上面所说的关于巩固党的决议的传达一样）。会议上提倡简单实际的作风，反

对空谈，要问实际的数字，实际的情况。

这种作风在下层很普遍了，支部会议上是很少讲空话，很少由“张伯伦说起”的现象的。以前在一些学生支部、文化人支部及中华书局支部上，这种由张伯伦说起的现象是相当严重的，分析自己支部的工作，总是首先说张伯伦态度如何如何影响到香港政府，又如何影响到他这个团体或学校等等的。现在，这种人在香港党里面大概是很难找出来了。

至于对于海员的支部的领导，因为他们总是一两个月才回来一次，有一些要半年才一次，因此和他们布置工作就不能不是长期的布置了，在这些时候，就不能不只好信任这些干部。对这些同志的要求是首先要求他们能够在航程中继续支部生活，其次是能够进行些群众活动，对他们的要求只好如此简单。对于有一些船，则定期由航空寄给他们在预先约定的商埠如檀香山、新加坡等地一些报纸或重要的小册子，或用写信的方式寄一般的指示信，或用公开团体如余闲乐社等写给他们关于群众工作的指示信。

在斗争或动员工作时，党的领导同志就亲自到下层去，如上面所说的一天接头三次。

4. 关于中心工作

由一九三八年以来香港党各个时期的工作看起来，党是能够根据各个具体情况，决定其各个中心工作的。党在领导上能经常注意到中心工作的研究与执行，抓紧中心工作这个口号在党内是相当熟习〔悉〕了的。党所提出的中心工作是简单明确的，如“动员回国”，如“加紧阶级教育”，如“开展群众运动，使每个支部都有群众组织，每个人都有

群众工作”等等。

在对于中心工作的传达上是做到普遍传达了的。因为决定得简单明确，因此很容易为下级同志了解，很容易在各方面都执行起来。我们从来还没有同时决定几个中心工作等事情。

对中心工作的领导上的弱点，则是中心工作与日常工作的配合不够，常常做了中心工作就忘记了日常工作，这是由于在领导上一向都是只强调了中心工作，而对于在执行这中心工作的时候，日常工作应如何做法是很少替下级想法子的，很少事先告诉他们的，事后才检查到：“噢！忘记了这些，忘记了那些了！”

对中心工作，领导上的弱点还表现于常常不能更早的事先估计到更周密的布置，而如已经碰到新的困难了才重新决定（如发展工作后的教育工作），这一方面是由于没有经验，没有这些先见之明，而另一方面则由于整个香港党普遍的粗心大意的作风。

5. 关于检查制度

一般的说，香港党是注意检查工作的，如和支部指导员每周两次接头中的一次，主要地是听下级报告的，在这些时候，领导机关一向都很注意于追问下边的实际情况，要求数字、尺度，非常地反对任何的吹牛皮，哪怕你只说了两句也不放饶过你，香港党是很明显地有这种作风的。因此，它对下层是很了解的，对中心工作的执行是很彻底的。

可是香港党却实在没有建立起正常的检查制度，检查工作始终是做得不好。因为：（1）上面所说的这些检查

工作是十足的一种抓一件算一件的零账，从这种检查上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噢！你做错了！应该这样变一下！”或者是“你做得很好，好得很，现在加油来完成第二件吧！”不会作总结，提出经验教训的；（2）检查的时候很少拿原定的整个计划定期去检查，而只是天天拿一点点事情天天追问，因此对于原定的计划之是否正确，对于计划在执行中的修改等都是很少的。因此我们在执行动员工作时就不察觉到动员空了以后的影响，在执行发展工作时就不能在工作上发现了教育工作的重要，而硬要发展以后再发展，第三个发展，一直到不能发展的时候才改变方针；（3）有时候是全盘检查了，但又多是事过境迁以后，只能得出一些事后的经验教训，特委及市委的时候都曾经作过计划执行了一半就要开始整个检查的决定，但执行得却不好，很多都是计划结束后才来检查的。

至于领导方式的研究与检查，我们过去是做得很少的。现在想起来“实际主义”（严重地说来是事务主义）的领导是整个香港党在领导工作上的一贯作风，他的优点在此，他的缺点也在此！

（四）党内教育工作

忽视教育工作，是香港党工作的最大缺点。全部工作中，教育工作是里面最薄弱的一环，没有什么显著的成绩可说。

三年来的过程，教育工作是在忽断忽续的情况上进行着。

一九三六年底党开始建立了支部以至建立了市工委的

时候，党对教育工作是注意过的，然而被注意的却只限于新党员、新干部、知识分子，对于工人同志及恢复关系的党员的教育是很少的。教育的主要内容为阶级意识与组织观念，很少研究理论。党印过方志敏同志的遗书，要每个党员都读烈士传，并举行了各个纪念仪式（纪念方志敏、瞿秋白等同志），为党奋斗，为革命牺牲的精神被非常强烈地提倡着。用各种办法来刺激党员对国民党、对资产阶级的仇恨。

这种教育在学生支部、妇女支部、文化及青年支部等同志里面，是执行得很严格的，那时我们只有一些共产国际月刊和巴黎救国时报，我们读着共产国际七次大会的各个报告，可是我们很少研究他关于政治分析关于策略的部分，我们拿来在支部会议上读的却只是季米特洛夫同志的报告里面关于共产党员要在法庭在监狱斗争的一段，关于方志敏同志的遗书，关于上述季米特洛夫同志报告的这一段，关于庆祝特曼诞辰的文章，关于烈士传等等，常常是在支部会议上一字一句的读的，读得常常有同志哭了。检查关〔于〕教育工作时就问有没有读过上述这些文章，我们提出要学这些烈士的号召！

这样的教育的结果是，新党员的党性提高了，积极性提高了，纪律性提高了。有两个是抗战后，因为当时强调纪律，生活上严格（二人是女学生，一人已恢复了党籍，另一人是所谓自由主义的分子），过了几个月以后，他们自己看得不对头就自己离开了党。但直至抗战以后，在香港党的组织里面的积极分子就只有上述的受过这样的教育的分子。到现在这些同志里面只有四个同志因自由主义而离

开了党，而其他所谓恢复关系的同志，及在一九三八年发现的老农会员占多数，多半是消极的。当时的工人同志，现在约有二十个以上离开了党了，而且里面有了托派，有了奸细侦探，有了自首分子，有了贪污腐化分子，有了日本特务人员等等。

为什么那时候不能对这些老同志及工人进行这样的教育呢？这是由于：一方面认为是认为这些老同志及工人同志对于这一点是毫无问题的了。不知道这些人里面都有些是长期失掉关系的，许多没有受过党的教育了；有些是曾经消极动摇过的，就是新工人党员本身也并不是无产阶级意识天生等很丰富的，因此我们主观上忽略了。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这些支部都是自首分子胡作民及侦探奸细林坤领导的，他们那里肯去进行这些教育！这种教育工作到一九三七年五月就停止下来，因为那时候市工委由动摇逃跑分子李游子（现在已作日寇特务人员）做宣传部以后甚至做书记了。这时候，什么教育工作也完全停下来了。

现在检查起来，当时强调阶级意识、组织观念的教育是对的，有了它的一些成绩的，当时香港党是在一个严重的恐怖环境下建立起来的，抗救会几次的破坏以至纪念“九·一八”时，八十六个人全体被捕。香港政府对共产党的搜捕很急，党在当时的教育方针是根据这些客观环境定下来了。在这些教育工作中，我们有了下列这些缺点：

1. 因为忽视了理论的策略的教育，因此对党的政治路线了解得很不彻底，影响到工作上的关门主义、左倾的作风不能克服，长期的存在到现在，香港党的干部的倾向还是过左的。
2. 因为对阶级教育只强调了牺牲，对组织教育只

强调了服从，对于党的建设的教育的意义的了解是不够的，因此在工作上反映出来的积极性就有点类似于拼命主义，在和自由主义分子斗争时有官僚主义的倾向，说：

“不管你同意不同意，我有要你这样做的权力！”把一个同志骂得哭起来了，后来她消极了，其实她并不是个很坏的分
子，现在她还是积极的工作着。

一九三八年初市委成立以后，由于党的发展与群众工作的发展，而且工作是比较以前复杂得多了。由于抗战，由于统一战线工作的开展，由于群众情绪的高涨，由于反日的斗争与经济斗争，由于反托的反国民党的破坏政策的斗争，又由于党内支部工作上的领导方法方式，布置工作检查工作的方法方式等被从实际的情况中提了出来，因此党不能不注意于教育工作。

当时教育工作的内容是侧重于教给干部、党员以实际解决问题的种种办法，大概是侧重于策略的教育（对各党派各阶层的策略）及领导艺术、群众工作的方法方式等等。是年七八月间我们办了两个两星期的训练班，训练了十六个中级干部，依靠这些干部在下层开训练班，或到小组会上做报告，大约有一百五十个党员上过一个星期或五天的初级训练班。此外还送了两个市一级干部往长江局受训，送了四个支书往省委受训。

当时我们的训练班的主要课程是：1. 统一战线；
2. 支部工作；3. 群众工作。

除了办训练班之外，还区〔规〕定了每个支部小组除了普通的会议外，还每周增加一次学习会议，学习会议规定各同志要看的书及检查是否看过了。有一些支部轮流做

读书报告，有一些支部则由上级来讲课。市委的宣传部下
面有四个专门的讲师。

当时规定必须阅读的书有民族统一战线基本教程。在
干部方面则须读王明同志的反帝统一战线、新形势与新政
策及当时各个中央负责同志发表的文章。

这一时期的教育工作可以说是最被注意而且是执行
得最普遍的（一般的支部都有学习会议），也有了一些收
获：1. 曾经根据了当时在香港的群众工作的经验，作了一
些关于策略（如对各阶层及香港政府的态度）及工作方
法方式上的总结与研究。总之这时期的教育工作是给了一
般同志以一些办法的，有了这些办法使广州失陷后香港党
能够送出大批干部到内地做各种工作，特别是群众工作。
2. 它在党内掀起学习的浪潮，使很多党员及干部开始自
觉地去进行学习，以后教育工作放松了，但几乎会看书的
同志都买了《论新阶段》、《论政党》等书看，有个别同
志不会看书的还买了请别人读。

在干部中这种学习的风气保存得更好，以后市委一级
的干部都看了《斯大林言论集》、《王明同志言论集》、
《中国现代革命史》、《中共英勇奋斗的十五年》、《中
国问题指南》及《大众哲学》等书。虽然不能挤出时间来看
书，但有空时就看书这种作风是养成了。

这时期的教育工作没有显著严重的缺点，我们虽然侧
重于工作方式方法及统一战线理论的教育，但并没有放弃
强调阶级独立性这一点，没有放弃提高组织观念的教育，
因此还不见得就是个偏向。

一九三八年十月广州失守，特委成立，动员回国工作

的任务提出后，日常的教育工作被放松了，学习会议也开不成了。

一九三九年七八月间，特委才向香港党提出加紧教育工作的任务。这时候一方面是由于国内形势的逆流，一方面是由于我们在群众工作〔中〕发现了一些右倾现象，如一些同志否认非法斗争的合法主义的倾向，如只愿做募捐救济工作，不敢领导斗争的心理也有，同时还发现了在群众工作中一些干部的英雄主义等等。因此，当时决定的工作方针是以加强阶级教育为主。十月我们接到了党中央关于巩固党的决定，教育工作方面就更加注意于阶级教育的工作。

党为了培养中级干部（能够坚定地站在阶级观点上去领导工作的干部），办了一个八个人的训练班，里面是八个区的和支书以上的干部，教材有两个，一是中国革命问题，侧重于各个阶级的实质的分析，一是党的建设问题。这个训练班时间两个星期，因为课程的中心很明显很简单，在给干部以明确的阶级观点及组织观念上是成功了的。参加这个训练班的有七个是工人干部，一个是知识分子干部。这个训练班大约是十一月初才结束的。

这时候环境很困难，集中的训练班已经很困难办了，香港政府已经非常注意共产党的活动，每周增加一次学习会议的办法也行不通了。党当时决定：必须把学习当作每个党员的日常工作，在支部会议小组会议上每次都要切实检查每个人的学习工作，并布置这些工作。规定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论政党等书为能够看书的同志必须研究的书，并制定一个加强阶级意识的提纲，是作为每次小组会议上

分次一段段的讲授的，讲授的人是支书或支指或指定的同志。

配合着巩固工作，教育工作的计划是决定了，但才开始执行。在巩固工作的时间，我们的教育工作是跟不上审查工作的。全部的党员在我们来的时候基本上已经审查完毕了，而教育工作却还正在开始。这一方面固然由于客观上的困难如环境恶劣不能办训练班，如没有教师等，但一方面也实在由于我们在执行巩固工作上的一个偏向，只注意审查而不注意教育。对意识上较有缺点的分子所采取的是深恶痛绝的态度而不是耐心的长期的教育态度。

对于海员的各个支部的教育工作进行得很困难，海委只能利用船的大修期间（如昌兴公司的四大皇后轮每年有一个星期的大修时间）召集船上党员开短期的训练班。一九三九年海委办了两个这样的训练班，受训的约有十五人。

在海员支部中学习工作的进行是比不上市委，它的干部的学习精神也较差，在船上的同志则多是喜欢吹吹牛皮，认真的学习的很少，因此海员的干部进步得非常慢，很难提拔。

加紧对海员支部的学习领导是对海员工作的领导上一个大问题，因为如果不加紧自动的学习，他们是永远不会提高独立工作的能力的，而他们又常常是几个月才回来一次的。

总结三年来的教育工作，勉强的来找出香港党教育工作的一些优点，那么：1. 它是能够在各个不同的阶段里决定各个不同的教育方针，而且这些方针基本上是正确的；2. 它一贯地注意于阶级意识及组织观念的教育。

而在缺点方面，则是：1. 没有确实的把教育工作当作经常的工作，所有教育工作的被提出都是急来抱佛脚的实际主义的。就是要用的时候就火一样的向党内提出教育呀学习呀等要求，用完了就放下不管，长期的休息下来了。学习制度没有能够经常的建立起来。2. 因此对于马列主义基本理论的学习，无论在党员干部方面，都是非常肤浅的，非常不注意的，在干部中间谈领导艺术工作方法方式的会，谈得非常热烈，而对于马列主义、列宁选集、《资本论》却是没有哪一个认真去看的。

现在在香港，能够作比较有系统的政治报告的大概只有现在的市委书记和文化支部书记了，至于其他的同志，要他作政治报告，就算他心里似乎明白，也是说起来星星不成文章的。可是如果谈到什么怎样组织群众团体、怎样利用公开合法、怎样抓住资产阶级的弱点等等，却就在大半的党员里都可以吹得一套。

因此，香港党的教育工作是“半边不遂”的，是残缺不全的。

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缺点呢？这主要的是由于：

1. 香港党几年来确实是做了一些实际工作，而且所有的干部都是从实际工作上产生出来的，这几年来香港的环境究竟还是向好转的多的（如抗战前到抗战后，逆转还是近来的事），在这样的条件下造成了工作的开展的局面，于是使这些干部自己觉得：“妈的，我只是这样的干呀干的，就干出一些成绩来了，那天天谈谈什么辩证法，从张伯伦说起的人却什么屁也没有干出来！”这种自满于自己的一些收获的观念，是造成了轻视理论的倾向的重要

原因。工人工作做得比知识分子好得多，

2. 因为轻视理论，因此就发展成为轻视知识分子，更由于这几年工人工作做得比知识分子工作做得好得多，香港的知识分子（那些在皇家教育下造成的知识分子）又是特别幼稚脆弱的，因此更加重了轻视知识分子干部的观念。对于知识分子的吸收，尤其教育、提拔的工作更是一向未能真的注意的，虽然有时觉得没有这些人工作上很不便利，因此决定发展知识分子，但不能因此就说香港党真的尊重了知识分子了。因此，知识分子干部的缺乏，使我们曾经不能不把一个几乎还没有会看报纸的同志做香港区委的宣传部长，使我们连教识字班的同志也常常找不到，象现在我们所有公开的女工夜学都是一些女工同志自己去做教员的。

3. 因此也就是使我们有这样的观念，轻视了宣传部的工作，宣传部几乎是永远不健全的，宣传部工作和组织部工作一样，是领导支部，领导经济斗争。一九三八年时市委的宣传部不参加常委，一九三九年特委的宣传部只有部长一个孤家寡人，海委有八九个月时间没有宣传部（只附设一个宣传干事，写写信抄抄文件），象这样的轻视了宣传部的工作，怎样能够做出好的教育工作来呢？因此香港党的教育工作是没有人专门负责的，要的时候是大家来忙一会，不要的时候大家都忙到别的事情上面去了。

至于文化教育工作，就更一向被忽视，只在女工方面比较办了一些识字班、夜学，党员参加的很少（他们大概都是参加什么团体、什么斗争去了），现在全港尚有文盲的党员八十人，略识字的党员二百四十二人，真是严重的

现象。

我以为香港党目前的教育工作必须清楚的认识下列这些要点：

1. 要认识教育工作是一个长期的工作，它不是一种什么突击运动，必须经常的有学习计划，学习工作检查，不论环境如何变动，中心工作放在哪一些任务上，学习总是每个干部的经常任务。在香港最近已经把学习当作任务来提出了，可是，关于这种长期性、经常性是没有更清楚明确的了解的。因为急来抱佛脚的实用主义的认识已经深印在脑根里面，要和托派斗争就开夜车看论反对派，要和关门主义者斗争就看左倾幼稚病，这种毫无预算的理论学习，已经非常普遍了。

2. 必须把教育工作当作组织工作的一部分，要在小组、支部进行教育工作，训练班是不必冒险办，而且在现在的环境下是完全不应该办的。制定教育工作计划，规定关于教育工作的检查制度，规定学习制度，这是目前香港党在教育工作上的重要工作，必须责成党的支部小组负起教育工作的责任来，不要指望市委怎么不开训练班呢？怎么不来讲课呢？等等。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无论在怎样恶劣的环境里都能继续教育工作，都能保证党员及干部的不断前进，才能保证组织的巩固与健全。

至于香港党的一贯的从实际讲起，不空谈的作风还是好的，应该发扬。目前的任务是如何把实际的经验理论地总结起来与认识起来。

(五) 支部工作^①

关于支部的数量及分布已经在上面说到了(请参看上面党员数量及其分布表),在总数七十七个支部中,中华书局的总支部下的六个支部其实应作一个支部计算,总数应为七十二个支部。

在一九三八年以前香港党在支部的编组上,是不了解产业单位这个原则的,因此当时的支部很大,混合支部很多。一九三八年初开始纠正了,以后的支部都以生产单位为编组原则,不能按生产单位的始按照职业或地域编成混合支部。我们的原则是在不能按照生产单位时,是尽可能按照职业部门,再没有办法了才按编地域的混合支部。

现在,在全港的七十二个支部中(中华书局总支当作一个支部算),计按产业单位编组的有四十一,按职业部门编的有二十六,按地域编的混合支部有五个。列表如下:

	产业的	职业的	混合的
支部	41	26	5
人数	323	241	67
占总支部比例	57%	36%	7%
占党员总数比例	51%	38%	11%
备考			

^①“支部工作”原文排“六”。但从上下文内容看,作者把顺序号“(五)”漏排了。因此,下文的(七)(八)(九),即依次为(六)(七)(八)。

所有这些混合支部，主要的是一些失业失学的青年，做小买卖的、店员等等。

目前职业的和混合的支部党员的人数，几乎占了全体党员数量的一半（百分之四十九），这个数目字是很大的，这证明了几年来香港党关于以产业为单位的改造党的下层基础的工作还做得非常不够。现在的产业的支部除了几个以外一般的都是人数很少的，而另一方面则职业的支部及混合支部不能积极发展转化为产业支部，显著的例子是象造船业里面的党的基础已经有一年多了，现在一共只有十四个同志，在太古船坞我们有了一个四个人的支部将近一年了，最近才发展到五个人，而这个船坞却是经常有一万六千人作工的香港最大的工厂。又如中华书局我们有很健全的群众组织，领导过三次大的斗争，假如我们稍微开门一点，在这个工厂里可以发展到一百人以上那是毫无问题的，然而现在的中华书局支部只有三十二个同志。又如纺织工人我们有十七个同志，可是没有一个厂有两个人以上的。过去在纺织工人中曾经有过两个工厂支部，每个都有四个人，后来动员几个回国去了，这两个支部现在就只好编入混合的职业支部。又如学生，一共三十八个同志，〔六个支部〕，我们只有三个学校成立了独立的支部，这三个支部的总数一共十三个人，而其他三个支部却共有二十五人。

这些现象都是很清楚明白的显示了改造支部的基础的工作上的努力的不够。虽然在职业部门中有很多是困难按产业单位组织的，如黄包车夫、苦力、自由职业者，但大多数是能够改变的。只要一方便已经建立在产业基础上的

支部大量发展，而现在已经在各厂各学校的个别关系努力发展成为独立的支部，那就可以改造了产业的比例了。

为什么会产生这些弱点呢？原因是：

1. 许多支部和同志的活动都是离开自己的产业单位来活动的，如印刷工人就有很多天天忙于工会的工作而忽视了自己的厂里面的工作，学生里面这样的情形更多，他们都觉得学校里面太闷了，不肯埋头在学校内苦干，而偏要到外边各个一般的团体里面当一个活动分子，做个救亡专家。这些影响自然使工厂里学校里不容易发展党员，有很多是呆了一年两年还是孤家寡人一名的。这种现象过去曾经检讨过，提出过开展厂内校内工作的口号，目前是稍为有一点成绩了。近来做厂内校内长期埋伏的下层工作的口号更因巩固党的决定而强调起来，这个口号的执行将会帮助支部基础的改善的。但我们还没有能够更明显清楚地提出过改造支部基础的工作，作为巩固党的工作里面的内容之一。

2. 由于我们在大产业工厂、学校里的发展工作，还没有抓得紧，督促得紧，发展时对于这些发展的主要方面没有更具体地计划，长期的日积月累的去进行发展工作，而是一时的向这方面来突击一下，打下了初步的基础后就不继续努力了。象我们曾经决定过一个时期的主要发展方面为重工业及学生知识分子，这个决定执行的第一步结果是在这各方面都打下了基础了，然而第二步呢？放松了。既然不能抓紧大的学校、工厂顽强地向这些中心钻，自然是不能建立大的产业支部的。

根据香港党的支部现状，如果以，1. 能经常按期开

会缴费，执行决议进行党内教育，自我批评思想斗争，有健全的群众团体，对群众有坚强切实的领导，支部中有群众领袖，有能够坚强执行领导的、执行党的决议的很好的支部书记或支干，具备了上列这些条件的为甲等支部。

2. 能够经常按期开会缴费，能执行决议，能进行自我批评，有一般的群众组织，大部分党员在群众中积极活动，能对群众起领导作用的，有一般比较好的支书或支干的，列为乙等支部。

3. 能够经常按期开会缴费，执行决议，知道检查工作与批评，有一般的群众活动或组织的，列为丙等支部。

4. 不能经常开会，执行决议的精神不好，群众工作很少或只有个别的同志去活动的，列为丁等支部。

那么就有如下表：

各类支部质量比较表

类别	支部数	人数	主要单位	备注
甲等	7	120	中华书局、大同罐头厂、日本皇后船、橡胶厂、文化界、银行职员、半岛酒店	银行支等于知分支
乙等	24	约200	海员七个、汽车、铁路、造船、自来水、印刷、黄包车、两个青年团体	
丙等	33	约251	码头、渔民及洋务、海员、印刷之一部分，学生之一部分	
丁等	8	约60	苦力与混合支部，海员有三个	

所有这些支部，整个的说最大部分是相当健全的。

所有的支部一般都能够每周按期开会缴费，就是丁等支部也能够两个星期开一次会议，两个星期以至一个月以

上不开会的支部是没有的，不缴费的支部是没有的。

所有的支部一般的都有群众工作，就是丁等支部也有部分同志在群众中有领导作用的，完全没有群众工作的支部是没有的。

所有的支部会议都能布置与检查工作，整个支部会议都是吹牛皮的支部是没有的。

大部分的支部是有相当的自我批评精神，而且相当严格的检查自己的工作的。

大部分的支部都有一两个比较好的支书和支干的。自从巩固工作提出以后，所有较坏的支书、支干都换了。

对于支部的领导，一般的是如下：

支部会议规定每周一次，由领导机关或支指来出席，支部会议布置了工作以后约隔三数天，复由支书和上级接头一次，报告会议以后的情形。有一部分的支部不能执行这一次接头，但有一半以上的支部是能够执行一次以至两次的接头的。

对海员的支部则只有等他们的船回来才由上级去参加开会，有一月两月半年不等。约有一半以上的支部能够在船上自己主持经常开会的。

支部会议的内容，一般的是首先由各同志报告工作，提出意见，然后由上级同志根据下级报告说话，有时由支书做结论，但很多的时候是只由上级说了以后大家就没有意见，就分配工作了，在这些时候支书常常没有什么作用，给上级代替了。支书的任务就变成只负责在会议后督促执行决议了，这种上级包办主义是很普遍的。

除了做政治传达以外，很少由上级先说话的。

我们曾经规定的普遍开会日程是：1. 文员工作（包括党的群众的）报告；2. 检讨与布置工作；3. 学习报告与检讨分配；4. 自我批评。关于后两项在执行时常常是缺了，或者是时间关系，或者是不注意。

对支部的领导方式，我们可以说从来没有怎样改变过，这种方式在好的方面说是上下级关系很密切，了解下层，工作做得实际，但缺点很大：1. 剥削了支部工作的独立性与其独立工作的能力，许多支部三天不见上级就要“遑遑如也”了。就是他们有独立工作能力（如中华书局支部）也常不敢下决定。2. 培养不出干部，不能从支书支干去培养出好的有独立工作能力的干部，常常是这样：市委的同志一天碰几次头开几次会议，市委的同志是有相当进步的，但市委一调走了个把人要从支部来提拔补充，就很困难了。3. 在秘密工作上说是危险的。

这种缺点在过去我们还有系统地检讨过。虽然说过：反对包办主义，要培养干部，注意秘密工作等等，因为没有彻底了解这种领导方式的缺点，因此不能改变过来。香港市委的支部一般的是经过整理了的（海委的支部因客观条件的困难，有许多未经过严格的整理，特别是欧战以后有几个支部许久不回港了），而且一向在领导上是相当注意于支部的整理工作的。因为发展时的马虎，因为动员工作的影响，曾经有很多支部陷于无生气的状态。有计划的整个规模的来整理支部，前后共有两次，第一次是一九三八年大量发展以后，第二次是一九三九年动员工作以后，特别是一接到巩固党的决定以后。

现在将经过整理的香港橡胶厂支部作为例子。

香港橡胶厂支部是一九三八年初建立的，它的发展在当时是马虎的，只经过一些旧的关系，很快的发展起来了，除了当时的募捐筹款等一点点的救亡工作外，没有什么群众工作，因此大部分同志是没有经过群众工作的考验的。这个工厂有一千一百个工人，是香港最大的树胶厂。

一九三八年六月党开始对这个支部的整理，当时这个支部的状况是：党员人数共十八人，三个男工，十五个女工，三个男工里面有两个是工头，有一个是工人，支干会就由这三个男工负责，一个叫刘德的工头做书记，一个叫陈文的工头做组织，一个叫邓耀辉的男工做宣传。支干会因市委直接出席是能够经常开的，可是下面的小组会是常开不起来的。刘德总是说：“她们不懂得什么，根本就不会开会，她们自己不愿意开会。”十五个女工里面约有十个以上是文盲。也约有十个是曾经参加过海陆丰苏维埃的农民暴动失败后逃来香港做工的。支部没有群众工作，厂里没有任何群众组织。党当时对这个支部的下层实际情形是不了解的。

我们当时对这个支部是采取这样的方针：1. 给这个支部以这样的任务：开展厂内的群众工作，建立群众组织，办妇女识字班，教育文盲的女同志和女工；2. 派人参加她们的小组会议，和下层女工同志个别谈话，了解下层情况。

支干会对开展群众工作这个任务认为非常困难，认为女工们毫无头脑，不能组织，经过上级同志解决后才勉强去执行。党并从外边调两个学生来帮助他们工作，如办识字班及组织工人互助社，结果识字班办起来了，互助社也组

织起来了。识字班有三十余人，互助社有六十余人，所有的同志都参加了这两个组织，稍为有一点群众活动，可是小组会议还是很健全。

市委起初派男同志到下面去找她们谈话。那男同志回来报告说：“她们土头土脑蠢得很，谈不出什么。”后来我们就派了妇委的同志去参加她们的小组会议并个别谈话。这个女同志和她们搞了一个多月，混熟了，就听她们对她说：“我们不愿刘德来开会，刘德来开会就只有他说的，别人不敢说话，他做工头常骂工人，陈文也常骂工人，刘德是写过自首书的，不革命的。”

市委根据这些反映，开除了刘德的党籍，因为邓耀辉在群众工作上表现得很积极有能力，就提拔邓做支书，提拔一个女工曾莲芳做组织干事，陈文调做宣传干事。

后来又因男工出席女工会议不方便，曾莲芳负责四个小组忙过不了，就又把女工分开另成立一独立的支部，由曾任书记，这时男工已发展到四个人，就成立支部，由邓任书记，邓同时负责和曾关系，指导女工支部。

女工的支部成立以后，工作就逐渐活跃起来，一九三九年六月厂方因为准备搬厂（由香港搬到九龙），因此工人中有了几个迫切要求：1. 搬厂后工人全体要一样有工做，不准因此辞退工人；2. 搬厂后的工人宿舍要由厂方负责（因工人离了家到新地方去不易找到房子；3. 补回搬厂时休工期间工人生活费半个月工资。

党决定要领导这个斗争，可是邓动摇了，跟他布置了，他不敢拿到下面去讨论，于是区委亲自参加了女工支部的会议，在女工和男工的支部里面都讨论了这个斗争，

全体同志都同意领导这个斗争。

于是，展开对邓耀辉的斗争，特别是在女工同志中更热烈，他们指出了邓是信天主教的，每个星期都去教堂礼拜。邓说：“信教是他私人的事，共产主义并不禁止信教的自由的。”

支部决定开除邓的党籍。男工支部改由陈文做支书。

于是开始作斗争准备，把全厂分七个部分，工人分为七个组，每组推出一个代表，成立代表团作为总的领导机关。全厂工人都参加了这个组织（一个并没有名称的组织），各组都开了会议。

每个以前是土头土脑的女工同志，现在都变成群众中的积极分子了。曾莲芳同志被选为总代表。

和党〔厂〕方交涉几次没有结果，厂方非常轻视工人的力量。支部决定以静坐罢工来解决这个斗争。

在一次和厂主交涉没有结果以后，代表团一退出写字间，手一举（一个暗号），全厂一千工人全部在一两分钟内停了工了。

厂方手足无措，完全答应了工人的条件。

斗争以后，厂内的互助社的社员突增到六百余人。曾莲芳同志成为群众公认的领袖。

陈文在这个斗争中本来是有点动摇的，经过斗争以后，厂主就对他拉拢，给了他三百块钱，他私自收了，没有向党报告。

厂主于搬厂后借故开除了曾莲芳同志，党要陈文设法转圆，他不肯执行。

他一贯对工人态度都不好。

他没有得到党的同意就自己去参加了香港政府的自卫团（商团）。

于是在支部里展开和陈文的斗争，陈不肯彻底承认错误。党估计这个人是不回来的了，但现在他还没有胆量，也没有那种忍心来危害党，但将来的危险是大的，因为他全知道了厂里的每个党员（陈文是老农会员，老党员，实际上已开除）。

陈自己大概是一方面受党的指责，一方面是受厂方的压迫，拿了几百块钱想离开香港到内地，党批准他离开，并立即改组了支部，把两个支部合并为一个支部，由曾莲芳同志任书记，这时候党员已略有发展，共二十三人，男工三人，女工二十人。在斗争后发展的都是群众领袖（陈文前途上不会坏）。

现在的支部是共有五个小组，女工四个，按各个部分组织的，小组长都根据在斗争中的考验，更调了更积极的坚决的干部，新发展的六个女工都是比较有文化程度的（有三个是斗争的代表），因此也改善了支部里的文化程度的比例。

关于曾莲芳同志被开除的事，党发动了二百五十多个工人签名向厂方要求恢复她的工。结果厂方答应发给五十元补助费，并由副厂长写介绍信介绍曾往别厂做工。我们因估计群众经过第一次斗争后休工一个月，现在谁都赶紧做工赚钱，不能再发动更高的群众斗争，就让步接受了。

曾莲芳同志于休工时间参加过特委办的两个星期的训练班，成绩很好。这个同志的特点是阶级意识很强，组织观念好，能坚决执行决议，她有小学程度的文化水平。

现在这个支部已经算是香港的甲等支部了，她的支部组织比较健全了，会议经常了，同时有了中心干部。虽然同志仍有文盲，能力也转弱，但并没有坏分子，而且在这个厂的工人里我们是能切实的领导的。

互助社虽然很不健全，六百社员中只有二百余人能经常交社费，但这个组织是在群众中有威信。

这个支部可以说是由丁等支部转变为甲等支部的。

由这个支部的整理工作可以指出香港整理支部工作的特点：1. 一般的都注意在群众工作中来锻炼与提高支部的质量。2. 能坚决和坏分子斗争，并能坚决的清除他们出党或撤销他们的工作。3. 因为许多需要整理的支部一般的都是先天不足的（发展时的马虎），因此整理工作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如我们把黄包车夫支部由丁等支部变成乙等支部是经过领导历时四个月的经济斗争，培养了群众领袖与坚强的支书，才成功的。又如关于汽车支部的整理也是经过了长期的群众工作的。又如关于捕鱼工人支部的整理由丁等到丙等也是如此。这几个支部都是人数相当大的支部。

整理工作中的主要缺点就是教育工作跟不上，无论干部教育、党员教育、党内教育、文化教育等都不很注意的。所有支部的进步几乎是全靠群众中、工作中、斗争中自己熬练出来的。

兹附一个好的支部及坏的支部的例子，以供参考。
最好的一个支部算是中华书局的支部，已由周小鼎同志向刘明同志报告过，我这里不重复。

陶化大同罐头厂厂内支部；

陶化大同罐头厂是九龙区的一个规模相当大，而且是完全采取新式技术、机器设备最完美的食品工厂，主要的出品是酱油、罐头、蔬果等，原料多从内地运来，而制罐所用的铁片则差不多是完全用日本铁的。本来原名是大同罐头厂，后来和厦门的陶化罐头厂合并就改为现在的名字而成为厦门的分厂了。工厂的经理因为做了汉奸，为中国政府在厦门抓了枪毙。厦门失陷后，厂方为着仍然企图恢复厦门厂的营业——实际上和日本人已有勾结，就以这样的原因极力压迫工人的救国运动。

全厂有工人五百至六百人，绝大多数为女工，只有少数男工负责工头和掌理机器的工作。全厂除机器部外还分为好几个部门，如装罐部、切菜部、装璜部等。厂内女工一般的工资为每日二毛半至三毛，大部分都是日工，每日工作时间为十一小时，中午吃饭时间是一小时。广州失陷以后，营业就一天天的冷淡，工人每月只能做二十天左右的工，因此工人的生活就陷于无法维持的地步，很多以前在市区居住的都大部分搬到工厂（在近邻）附近的乡村居住了。

党在这工厂的工作的建立是在一九三八年三四月间。首先在九龙城学德励志社所办的司机训练班中发展了蔡顺发同志，他是工厂里的工头之一，经常帮助工人解决各种困难，特别是教工人识字，所以他在女工中是有着很好的威信，通过他的努力，很快就成立了支部。广州失陷后他回到东江参加游击队后，支部就由邓俭同志（女工）负责。和蔡同志一块儿回去的有六七个党员，占当时支部人数一半以上。一九三九年春间，邓俭同志调到特委训练班受训。

代替她的工作的是蔡顺发的弟弟蔡顺义同志。他虽然文化水平比较高，但是还相信宗教，认为宗教与革命是不会对立的，在这一个短的时期进行过和他的斗争，其他工作没有很大的发展，邓俭同志受训回来后负责该支部指导员工作，继续着和蔡的斗争。一九三九年十月间，就正式开除了蔡顺义，邓俭同志重新负责书记兼其他两个支部女工支部的指导员，经过整顿后工作重新活跃起来，成为香港党的最好支部之一。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间，整个支部有十二个同志，其中除了三个是男同志外，其余都是女的。支部会由邓俭（书记）、邓清（邓俭的姐姐，两个都是装罐部的女工，负责组干，）、黄丽珍（宣干）三个女工同志负责。其下分为二个女工小组和一个男工小组，每组三人，尽可能的依工作间来编的。邓俭、邓清两同志，特别是邓俭同志不特是在大同工厂女工中有无比的威信，而且早已成为九龙城一带女工所公认的领袖，经常是一千至二千女工群众大会的组织者与领导者。邓俭同志在一九三九年七月间推动保安公司的女工罢工响应男工的经济斗争后即受到警察到她家里的检查，由于她的镇定和有办法，警察没有得着什么就跑了，以后她就不大负责公开的群众工作，主要的交给邓清同志负责了。宣干黄丽珍同志也是群众中（主要的是厂内）的活动分子，和群众也有着很好的关系。支干三人都有小学的文化程度，因此支干在同志中是有着很高的威信的。小组同志在厂内各部门分布得相当普遍，一般的只是略识字，有三两个是完全不识字的。大部分都是厂内读书会 and 九龙城一带姊妹团中的活动分子。

支部生活一般的说是健全的。经常到会交费，执行决议，自我批评的精神都相当好。支会除了一般的内容外，讨论得最热烈的就是政治报告和群众工作。支会经常能够保持每周开会一次，有时另有汇报一次。支干对小组的领导是密切的，过去是一般的领导，因为小组长能力的薄弱，支干经常会代替了小组长的工作，后来才注意培养小组长，多着重和小组长的谈话，不过这只是开始，小组仍然不能独立开会和解决问题。

支干的经常工作主要的是着重于教育工作。也曾在区委的直接主持下开过两个星期（大约只有八天）的训练班，大部分都参加的，经常的就以识字文化教育为主，在小组会里要检查，课本是利用公开出版的读书生活社的读书常识、中国历史等，而且她们都参加了教育服务团的职工夜学。在星期日或节假日（星期日工厂是放假的）的早上，支书同志就教她们看报纸，解释给她们听，因此她们对时事问题是相当感兴趣的。其次就是群众工作，她们大约有一半是专负责厂内活动，其余的就分配在姊妹团工作，没有一个同志不参加群众活动的。在这个支部周围有团结着有组织的群众（没有参加群众组织的不算在内），大约有三百五十至四百人，在召开群众大会时能够动员女工至少一千人以上。至于最后，党的发展工作，一向来做得比较差，虽然每个同志都经常指定有两个发展对象，但是一般的把条件提得太高，这个不好，那个又不够格，其次是同志的文化水平太低，因此就产生了没有信心去说服人家的现象，党没有及时的去说服她们，所以发展得相当慢的。

群众工作向来是各个支部最主要的最活跃的一面，支

部和群众的联系是很密切的而且是很经常的。广州失陷后，在党的号召下，它第一个热烈的响应了这号召，在厂内动员了四十人（内面有六七个党员）回到敌后方参加惠宝人民游击队，在里面，不论在行动上和工作上都起了模范的作用；此外还动员了两个司机到陕北来。一九三八年十二月间胜利的领导和全厂女工，向厂方要求女工和男工一样的发过年红利的斗争。一九三九年七月间，邻近她们工厂的保安防毒面具公司发生经济斗争，她们一面动员了全厂工人进行募捐慰问保安的罢工工友，另一面推动和组织了保安公司的二百多女工的罢工响应男工的斗争。至于经常的救国募捐和群众教育工作，虽然时时都会受到厂方的干涉和禁止，但是一方面利用厂方股东与股东间的某些矛盾，进行了联络与争取的工作，另一面依靠与群众的密切联系，和职员、男工取得一致的团结，利用午饭和工余的时间进行工作，所以厂方也没有很大的办法，工作还是经常的进行着。在这些工作中，培养出为整个九龙城区一带的女工所公认和拥护的领袖——邓俭、邓清两个同志，锻炼出虽然是新的，虽然是小的，但是可靠的党的群众部队。在这些群众中，党的决定，假如不是错误的话，是有保证执行的。这个所以成为事实，由于：1. 支部进行着经常的、长期的群众组织工作，在工厂内组织了大同读书会有七、八十人，包括男工和女工，工人和职员中的积极分子，成为全厂工人的领导核心；工厂外，成立了一个有三百四群众姊妹团，里面包括了九龙城一带主要工厂的女工前进分子，领导着一个教育服务团（有五六十个文化水平比较差的女工和部分的妇女知识分子），在下面开办了

一个四五十人的女工夜学。2. 抓紧了女工群众的迫切要求——女工的教育工作，并且能够比较关心群众的切身要求，提倡工人间的友爱和互助精神，增进了群众的团结。

3. 在支部里抓紧了群众工作，造成了不做群众工作是可耻的这样的风气，比方在检查党员工作的时候，假如群众工作做得不好，她在报告时就会表现得面红耳赤，非常难过的态度等。

至于区委对这个支部的领导一般的说，关系是密切的。在以前区委每周参加支干会一次，和支书接头一次，现在就每周和支书接头两次，有时也参加支干会的会议。不过一贯来是有了这些缺点：1. 检查工作不经常、不深入，比方以前的支书蔡顺义是信仰基督教的，党虽然知道一点，但是很少，以后检查起来才知道是很严重的。2. 不注意总结工作去教育同志，这个支部也曾进行过相当多的群众工作，但是做过就了，并没有研究过工作中的经验，以提高同志的能力。3. 没有及时去克服党员中发展组织的关门主义，本来这个支部的工作环境的群众一向都是在党的影响领导下的，群众是纯洁的左倾的，这都具备了大量发展党的组织的可能，可是党没有看到这点而及时的说服同志大胆的进行大量发展党的工作。4. 支部的同志太暴露，没有更好的注意掩蔽工作，没有特别注意培养提拔党内的干部，到一九三九年六月以后才把邓俭同志掩蔽起来，这是在她家里被警察检查之后的。

总之，这个支部一般说来是比较健全的，和群众的关系比较密切的，而现在的问题就在于：1. 加紧支部的文化识字的教育，提高其政治与文化水平，加强它在群众中

的领导作用；2. 大胆的发展党的组织，特别是在和它有联系的其他重要工厂建立党的组织，避免以大同工厂的同志去领导别的工厂的斗争（如保安公司）；3. 注意掩蔽工作，公开干部和秘密干部一定要严格的区别，如邓俭同志既然掩蔽起来了就绝对的以后不能任意在群众中过出风头，太过露面；4. 注意厂内群众的哪怕是琐屑的切身要求，为实现这些要求而斗争，以团结组织全厂的群众，但是应该采取合法的，最低限度是尽可能合法的或断或续的彼起此伏的或者一个车间一个车间的形式来进行。避免（最低限度尽可能避免）全厂性的以政治面目出现的“阵地战”。

这个支部的群众是已经相当突出的，现在要想法子使它不受打击。

一点补充

在这个支部里还进行过和两个群众工作中的破坏分子的斗争。

首先就是和大同厂内的女工中的破坏分子罗满的斗争。罗满是厂内的一个女工，行动非常秘诡，每个星期一必定告假，人们问她，她就扯三拉四的支吾以对，在群众中专和邓俭同志等对立，她也是大同读书会的会员，但是每每在群众中造谣中伤邓俭的，比方说邓俭和邓清都和蔡顺义睡过觉，说邓俭是共产党员危险分子，说邓俭是利用群众等。当时支部就认识了她的破坏行为，因此就不断的在群众中揭破她的造谣中伤的阴谋，在同志中号召和鼓励和她斗争。群众依然是相信我们的。在动员回国工作的时候，

她又攻击惠宝人民游击队是共产党的，有个别工人从东江有事回港时，她又煽他们不要回去，支部的对策目前是忘记了，不大清楚，以后罗满是完全没有办法在群众中活动了，因为群众都不相信她。于是她就改变了不再在群众公开活动，而经常侦察、监视邓俭等的行动。支部在各个斗争中，克服了同志的惧怕斗争的弱点，提高了对破坏分子作无情斗争的认识。现在估计起起〔来〕，罗满可能和国民党的特务朱日水有关系。这个问题对在于巩固与掩蔽支部的工作中是值得注意的。

其次就是对朱日水的斗争。朱日水本来是香港的一个文化青年，在话剧界中，不特在香港而是在广州都有点名堂的。在一九三八年的时候表现得相当进步的，经常也给人介绍进步的刊物，所以妇女教育服务团就请他为顾问，在群众中有很不差的威信的。到一九三九年，国民党收买了他为特务（据我们所得的材料），他就开始进行破坏教育服务团的工作。他自己不出马，而另外介绍一个人名徐明的来代替他的顾问工作，他自己就告假不来。徐明就布置极力破坏邓俭等的威信，后来徐明给教育服务团开除了，朱日水又装作不知其事的回来。在保安公司罢工作，朱又进行了欺骗工人代表，破坏罢工，但是在我们的打击之下，没有什么成功。这个斗争的详细情形现在都记不起来了，结果朱日水又为群众所开除而没有活动的余地。这次斗争，大同支部表现得比以前更坚决更有办法了。

红磡街坊支部（一九三九年十月）

这个支部共有三个同志，书记是魏添，前是海员工人，现在失业，党龄有半年，也曾参加过海委办的短期训

练班，家庭中有母亲一人、老婆子女共五人，家庭经济完全需要他个人负责，家里没有什么财产，只是做海员时存下有现银约七八十元，失业后生活相当困难。其他一人是船坞工人，也曾做过海员的，党龄只有二个月，没有过过什么组织生活，现在也失业，不过有时也能够找到一两天的临时工，家里也有老婆子女，生活完全靠他，所以生活也相当困难的。最后一个是失学青年，离了学校不久，主要的家庭经济还有父亲负责，他个人寄居姊丈家，个人生活需要自己解决，后来在一所染布房里找到店员的职业，是一个新发展的一个同志。三人文化程度还不差，一般的能读得懂普通报章刊物，都有小学的程度，这个支部是八月间才由海委方面交过九龙区委来，那个店员的同志在九月初才正式接到关系的。

三人都是很幼稚，书记虽然受过一下训练，但是一方面因为失业的影响，另一方面又有点英雄主义的缺点，对于党的决定表示满不在乎的漠不关心，组织观念相当薄弱，在每次要他召开支部会时，他总是诸多推诿，比方，和他约好接头时，他没有到，到他家里找他，谁知他却和一个亲戚去喝茶去了，所以两个月来，只开过一次的正式会议，其他接头和个别谈话约有三次，其中一次是和魏添谈，两次是和其他两个同志接头的。在那次唯一的支部会中，正式提出向他们批评，而且很细心的对他们解释，书记总是唯唯否否〔诺诺〕，散了会后什么都忘记，什么都仍然不管了。其他两个同志表示现还比较好，而且发言解释他们对这些问题实在是因为不懂得，下次召集会议时他们要是不是因为上工，那么他们都到会，只有魏添没有到。

党费两个月中交过一次，除了魏同志外其他两人都参加自强体育社，和个别群众接近，谈谈时事问题等，其他都没有什么工作。

在两个月中，就在这样的情况中过去，区委并没有决心进行把它整理，后来那个青年同志找到店员的职业后，那是更加困难召集开会了，以后才把他〔们〕编散，分别附到其他支部里去。

这就是香港市最坏的一个支部。党对这个支部的关心与领导是最不够的，这里表现得几个这样的缺点：1. 这三个同志根本就不应该编成一个独立的支部而应该分别的附编于其他支部或者只是成立一个小组而附于其他支部，因为它既不是一个产业单位，又没有一个独立的群众工作环境，更没有单独负责开辟一面工作的条件与能力。2. 对他们的缺点太夸大，对他们的质估计得太低，因此就失去了整理这个支部的信心而把它搁在一边任其自由发展，因为书记虽然有缺点，而且表现得不负责任，但是当到党批评他时还不敢怎样，对党的信仰还是有的，当时表现得这样散漫，是和他的失业问题有着很大的关系，党没有看到他的生活问题的影响而好好的关心他说服他，而其他两个都是新同志，对党的问题还是很不了解的，因此表现得这样还并不算得要不得，只要加强对他们的教育，这种现象是有办法克服的。3. 看到这样现象是不对的，又没有下决心把它重新整理，几次想把它编散，后来因为其他工作忙又搁下来了，这是因为对他们觉得没有希望的原故。

(六) 干部问题

香港党在干部工作上担负着两个特殊任务：1. 向内地输送干部；2. 培养工人干部。香港党的干部政策是以这两个任务为中心的。

对于向内地输送干部的任务，香港党执行得是很坚决的，毫无吝啬的，特别是动员回国工作提出以后，总计抗战以后香港党动员到广东内地（到陕北来学习的不算）的干部，约如下表：市委一级十一人；区委一级八人；支书一级三十四人（是估计的数字）；群众中主要干部二十人（估计的〔数〕字）。以香港这样的几百人的组织基础，输送出这样数目的干部，负担显然是太大了。

所有输送出去的干部，一般的都是比现在留在香港的干部强的，在内地，这些干部对于内地的工作起着很大的作用，如所有输送出去的干部中，现在在内地担任特委一级工作的就有七个人。

在成份上，输送出去的干部中：市委一级十一人中工人占六个人，区委八个人中工人占五个人。在其他的两种干部中工人约占百分之七十。

几年来，香港党是勉力完成了向内地输送干部这个任务了。

在这一工作上的主要缺点，就是输送干部的工作没有和培养干部的工作配合起来，结果弄成了鼓一下气，以后就不能继续了。

至于培养工人干部的工作，是一向没有和输送干部这个任务同样被明显的重视，大概只是一方面由于党的组织

有很大的工人比例，除了工人以外找不出别的干部，另一方面是由于一向有轻视知识分子的习惯，因此对于知识分子干部的培养很少。

关于工人干部，除已经输送的外，在市委一级（连海委）六个人中有两个人是工人干部，占百分之三十三，支书一级（连支指）八十五人中约有七十人是工人干部，占百分八十二。

这些数目字很明显的表现着我们对工人干部的培养是没有更大的注意的，在市委一级的干部在比例上就很少了，在过去的特委及广州失陷以前的情形也是这样。这当然也有它的客观原因：工人干部的培养更困难，而我们过去输送了六个市委一级的干部到内地去了，这个数目是不容易补上来的。

至于主观方面，则是由于：1. 我们一向不注意文化教育工作，而工人干部最非常需要文化教育工作的。2. 我们很少办训练班，而工人干部是非常需要这种教育方式的。知识分子干部更多的需要实际工作上的学习，而工人干部却更多的需要学校式的训练。因此，这不单是很难把工人干部很快的培养起来，就是一般的干部也培养得很少。3. 至于领导工作上的上级来包办的领导方式，一天接头三次的死死抓住的作风，自然也是困难培养干部的。

一九三九年六七月以后，香港的环境恶转了，办训练班的方式已经非常困难，当时我们对于干部培养，除了侧重于自习之外，还曾经决定过一个带徒弟的方式，即由领导的同志每一个人要负责教育一个干部，如市委教一个支指，支指就选择一个支书或支干，支书又选择个别副书记

或组织干事来各人自己负责教育，自己选定了的人，就多找机会去和他谈话，逐月逐日的教育他，督促他，象师傅带徒弟一样。

当时我们向这些干部提出的口号是：每个人都要准备一个替身。

这个工作执行得是有些成绩的，目前的中级干部中比较好的干部已经开始培养出来了。在严重的环境中，这种办法确实是一种能够经常培养干部的办法。

目前香港党干部的倾向，主要的是左的倾向，由于对于逆流现象认识的不足，以为只有分裂的前途，由于工人斗争的日趋剧烈频繁，因此影响到干部的过左的倾向。特别是在市委及支指等主要干部中，是很困难找到右倾的现象的。

而且这样过左的倾向还不是今日才这样，而是久已有之的，如轻视知识分子呀，不注意对错误的干部的耐心教育呀等等。

使这种过左的倾向还不一下子很容易在群众工作表现出来的是公开合法的工作方法方式的运用，香港党在运用这些方式上已经略有经验了。

在群众工作的干部里面，也发现了一些英雄主义的倾向，但这不很普遍，还只是个别的现象。

香港党的干部的团结，是一向被注意着而且也有很好的成绩的，在干部中从来还没有发现不团结的现象，虽然下层的同志中有个别吵吵嘴，但不成什么意气之争，整个组织上可以说是团结得象一个人一样的。

这是由于：1. 我们一向注意于组织观念的教育，把

党提得很高，在党的决定下，在党的工作里，谁也没有有什么私人的意气；2. 我们一向很注意于自我批评，相互间的批评；3. 领导的干部在全体干部中有威信，在工作的积极性上，在阶级立场上，在组织观念上，都使同志们佩服的，如曾经有一个同志和特委书记吵了嘴，后来他自己了解自己的错误了，说：“小林（特委书记）的组织观念是特别好，一点也不放松的，我不应该。”4. 我们还经常注意批评各种可能引起同志之间的隔阂的各种本位主义，如市委与海委之间，如职工部妇女部青年部之间，如这个群众团体与那个群众团体之间，又如香港与内地之间，各种本位主义是很少存在的，偶或有之，但很快就被克服了。因此，香港党的干部能够数年如一日的团结下来。

最后，目前香港党的干部政策中应该注意的是干部的保护，特别是群众工作中干部的保护问题，如海员、印刷、洋务、罐头厂、树胶厂等支部中有不少的坚定的办法的干部，而现在都暴露了，如何调动与掩蔽这些干部是一个大问题。

（七）秘密工作

香港党建立于抗战前的一九三六年，又适当香港抗日救国会大破坏的期间，环境非常恶劣，因此香港党虽然历史很短，却有一些秘密工作的传统与经验，抗战以后环境虽然比较好一些，但香港究竟比不上国内，这个环境使香港党不能不经常注意秘密工作。

抗战的初期广州失守以前是香港环境最好的时期，在

这个时期因为一般的救亡运动的活跃，左倾书报的大倾销，在这种情形下，党的秘密工作是略为放松一下的。广州失守后一九三九年初香港政府开始逮捕共产党员了（八路军办事处被捕七个人，海员余闲乐社被捕三个人），虽然这些人以后都释放了出来或驱逐出境（内欧照汉同志——一九三八年初的港市委组织部长，是被判一年苦工监），然而环境确实是日趋严重了。因此党决定提高全党对秘密工作的注意：

1. 加强秘密工作的教育。分析香港的日趋严重的局势，指出要坚持地方工作，并涉及一般的秘密工作技术的教育。
2. 颁布秘密工作条例。除一般条例外，我们还增加一些特殊的：（1）不准做会议笔记，不准带小簿子（那时候是曾经相当流行的许多同志喜欢带着个小簿子出席这个那个会议，上面自以为是的弄一些暗码来做笔记），提倡用脑记，并规定会议前检查各人身上的文件才开会；（2）各种支部会议党团会议时间不准继续超过两小时以上；（3）不准在茶楼咖啡店内开会、会谈。这些条例都向各支部小组传达了。
3. 进行销毁各种秘密文件及笔记。各领导机关及各支部都要清查各机关或各人的文件，一切的支部、党团不准藏任何党的秘密文件。销毁一切存下来的干部调查表、入党表。并规定以后不发给入党表，入党者只用白纸写个自传就成了。
4. 搬迁住久了的机关。
5. 调走暴露了的干部。

除了第五条件，其他一切都做得很好。

香港党是注意秘密工作的，然而在这工作上却有很大的缺点：1. 秘密工作只注意在秘密工作的技术上，而不

注意于党的与群众工作的领导方式上，这样的秘密工作是鸵鸟式的，不改正那种对支部的一天接三次头的领导方式，不改变在群众工作上的太突出的做“红色独脚戏”的作风，什么秘密也是秘密不了的。2. 干部的掩护——社会化很不够。市委有五个脱离生产的干部，海委有三个脱离生产的干部，没有职业与社会关系的掩护的。但如不改善领导方式，干部是不能不脱离生产的，因为现在脱离生产也还是忙过不了。3. 对暴露了的干部的调走工作执行得不够，如现在的海委书记潘汉夫同志已被侦探认识了，可是几个月还没有调走，这原因是没有更早的准备了代替的干部。现在一些群众团体里面的干部也是一样。

至于目前香港的暴露程度，则首先是在群众团体方面。党所领导的三个最大的工人团体余闲乐社、洋务工会、印刷工会是完全被众所周知的共产党领导的团体了，这主要的是由于一方面这三个团体“鹤立鸡群”的做了很多独脚戏，而另一方面则是由于这三个团体里面的主要干部都是众所周知的老党员，如印刷工会的何子祥，洋务工会的何潮，余闲乐社的周石永、周才等同志。

其次就是中华书局和大同罐头厂两个支部就主要的是因为他们领导了经济斗争，反托派、反国民党的破坏分子等斗争，中华书局的工人是左得可怕的，公开演戏的时候唱延安颂、抗大校歌，这两个厂的个别同志都被侦探注意的，大同罐头厂支书的家被警察搜查过。但在侦探方面大约现在还不能确定那一个是共产党，在我们看到的香港侦探的所谓共产党人名单里还没有这些同志的名字。

其次就是文化支部，因为做的是宣传出版工作，很容

易暴露，支书杜埃被扣捕过，不过大概也只有杜埃一个人是被侦探比较确定了的，其他都还不很暴露，另一个拉特同志本来很暴露，现在已经送走了。

领导干部暴露的有海委书记潘汉夫同志，被侦探（叛徒廖独康）认得，现在藏起来，准备调走。前特委书记梁广（是在港有存案的）似乎曾经被钉梢，现在梁已离港了。领导机关的暴露还不大，现在的市委比海委更好。

一九三九年五六月间我们看到了香港侦探机关的所谓香港市委名单（那时候我们还只有两个区委未建市委），这名单里把香港分成十一个区委，列举名单约有三十个人，名单里面有六七个名字是对的，除了一个在洋务工会妇女部做书记的同志之外，其他都是老同志。至于里面各个人的职务就更糊涂了，如说洋务工会妇女部书记叶洁同志是市委组织部兼山顶区委书记等。其他的名单，都是一些过去的党员而老早已经脱离了关系的。

从他们这些名单看起来，我们可以知道：1. 一些老同志是最容易暴露而且最被他们注意的。2. 在目前群众工作上虽然有了很多积极活跃的干部，但他们尚未被确认为共产党，这些干部还可以及时掩蔽起来。3. 他们也许认为香港的党的组织相当庞大（如分十一个区），听说他们说香港的共产党员最少在一千以上了。4. 从他们对于党内的什么市委、区委，以及各部工作等看起来，他们做这个情报还是在党外臆测的，未是个混入来的奸细。

因此，马上设法调动了一些已经暴露了的干部，群众工作不要太突出，把活动中心主要放在一些黄色工会落后的团体里，香港党的组织是能够及时掩蔽起来的。

（八）执行纪律与自我批评

香港党对于执行纪律的精神是提得很高的，从来没有对违反纪律的同志放松过，也许在这一方面有过火的地方，但从来不会右倾过。一般的执行纪律的情形，从上面关于组织工作的历史及所举的支部工作例子可见一般〔班〕。

党在一九三八年后，对于执行纪律，都是能够经过支部，经过斗争起了教育的作用的。

至于自我批评的进行是相当普遍的，在所有甲等支部与乙等支部中，自我批评的精神都很好。自我批评一般的是知道侧重于思想意识等问题上了。

自我批评工作的缺点是同级的批评多，上对下的批评多，而下对上的批评制度则没有很好的发扬。这里面也有客观的原因，就是：1. 在很秘密的情况下，下级对上级是很不了解的；2. 常常是因为要保证领导机关的威信，故不怎样强调去发扬这些批评，但领导机关对下级做自我检讨的报告是有的，不过没有成为经常的制度。

然而有足够的自我批评的精神仍然是香港党的优点，香港的干部能够在独立工作的环境下获得些进步就在这里了。

三、三年来的香港群众运动

（一）三年来香港群众运动的历史

1. 在抗战以前

香港在一九三四——一九三五年间，香港是一个沉寂的孤岛，是一个有群众而没有运动的时期。

一九三五年的“一二·九”与一九三六年广州学生的“一·一三”运动，才刺激起香港的群众运动。这些国内的运动使香港的群众运动具备了一〔系〕列的条件：

(1) 群众的救亡情绪高涨了，有点蠢蠢欲动；(2) 一般的救亡书报能够少数发售（有了三间发售进步书籍的书店），在思想上准备了一些左倾分子；(3) 从广州逃来了一些救亡分子，可以说是带来了基本种子。

因此，在二三月间，就以社会民主党（民族革命同盟）的机关报大众报为中心，成立了大众报读者会，这个读者会几乎收拢了当时在港的所有的一百多个左倾青年，这些青年不满意于社民党的领导，于约一个月后就和大众报决裂，自己改组成立为香港抗日救国会。到五六月间，发展到四五百人。

抗救会有非常严重的左倾关门盲动的作风，他们猛烈地攻击社民党、大众报及破坏他们在群众中的活动，名为争取领导权，自己秘密出版了一些油印的刊物，在马路上撒拥护红军抗日、拥护八一宣言的传单与贴标语，因此，造成香港的满城风雨的空气。

抗救会是个很严密的组织，有小组会议，有政治报告等等，完全是一套党的工作的方式。然而同时他又是很复杂的，他里面有第三党，有托派，还有其他投机分子。

抗救会有所谓外围组织，在青年中有课余社，凡声社，在妇女中有妇女互助社，在大众报还办了妇女周刊，还办了一个夜学，总计抗救会组织起来的群众（连它本身）

约共七八百人左右，可以说是当时最活跃的、最大的救亡团体。

社民党当时也投机地做了一些群众工作，组织一个二三十人的妇女读书会，办了一个女工夜学，还推动一些太太们进行组织中华妇女会。

抗救会的左倾作风招致了香港政府的打击，五六月间抗救会的干部两次被捕了十九个人，连带社民党的两间书店受了检查，一间被封闭了，大众报也受了检查与警告，搜去存放着的一切巴黎救国时报及其小册子，香港的侦探以为到处都是共产党了。

抗救会没有改变自己的作风，于“九·一八”纪念日八十六个参加秘密举行的纪念会的干部与群众（大部分是干部）全体被捕了，有三十几个被监禁一个时期后驱逐出境，于是：（1）大部分救亡分子见风势不对离港了，留下来的暂时不敢作什么积极活动；（2）群众害怕、消极，所有群众团体甚至女工夜学都停止了活动，只有一个青年组织课余社仍有少数半公开的活动。

香港的群众运动又死一样沉下来了。

党在这样的环境下开始建立了自己在香港的党的支部，并开始当时的群众活动，设办法接近当时群众中的一些埋藏下来的活动分子——抗救会的与社民党的，向他们提出关于“九·一八”大破坏的经验教训，要求他们坚持工作，而且明确地提出了这样的工作原则：争取公开，利用合法。并且，在十月底，党通过大众报，推动了基督教青年会发起举行鲁迅先生逝世追悼会，推动了一个香港太平绅士（永远的绅士）来做大会的主席。这个大会是完

全在公开合法的情况下进行的，到会的群众有四五百人，通过了成立鲁迅图书馆的基金募捐委员会，并通过募款救济上海反日罢工的纱厂工人的决议。

这个追悼会顺利完成了，给香港的救亡分子一个很大的影响，纠正了那些一定要秘密的鬼鬼祟祟的才算是救亡的革命运动的观点。因此，争取公开，利用合法这个原则开始为当时的救亡分子的公认与初步的了解。

十一月绥远抗战以后，党就抓紧这个机会，在海员、洋务工人里面发动了赈济绥远难民的运动，发动了三十六个海员工人、洋务工人的封建落后团体，组织了海员洋务工人赈绥联合会，并且商得一个资本家的同意，在他的大酒店的礼堂开了个七百人的群众大会。在青年工作方面，我们发动了二十多个干部参加当时基督教青年会的援绥运动，我们参加了他们的探访队（实际上是到各校宣传募捐的工作队）。在青年会，以慰劳会（慰劳工作者）、结束会等名义召开了三次四五百人的群众大会。并且在九龙青年会成立了三四百人的歌咏班（救亡歌曲）我们参加了这个歌咏班的活动。

这些公开合法的活动是使香港党的群众活〔动〕由狭隘的范围到广大的范围，由无基础到有基础的关键。

同时也是使香港的救亡分子由左倾的关门主义的观点到正确的统一战线政策下的群众活动的最好的教育。

几乎是全部的抗救会残存下来的二三十个干部都倾向于我们这边，接受党的领导了。

然而当时的香港党的群众运动的政策其实也只是半开门的，党一边参加了与推动了当时的一般的公开的合法的

救亡运动，而另一方面却也进行组织秘密的非法的救国会，首先是组织了各界救国联合会的筹备会，以后组织了学生救国会、妇女救国会、职工救国会及文化界救国筹备会，约在一九三七年一月各界救国会正式成立。当时的群众：学救七八十人，妇救五六十人，职救三百人，文教三四十人，总数约四百五十人至五百人之间。

所有参加这些秘密团体的，其实都是当时的左倾分子，包括了社民党的、抗救会的大部的干部与群众。各个救国会都有自己的所谓外围团体，如学救有课余社、少年之友社，共有群众百余人；妇救有妇女读书会及恢复了抗救会的妇女生活社，有群众百余人；工救有海员洋务赈绥会；文教则进行小学教师联合会等活动。

救国会的组织工作完全是第二党的作风，承继了抗救会的错误。

然而救国会的工作在当时也有它的意义的：

她统一了香港救亡分子之间的无原则的纠纷。抗救会被破坏以后第三党张梅生曾经利用抗救会干部的左倾情绪，自称为中共两广特派员，组织中共香港市委并组织了抗救会的临时指挥部，猛烈地进行攻击救国会华南区总部（是在党领导下的）及民族革命同盟，造成了香港救亡分子中的分裂，一边是所谓救国会派，而另一边是所谓抗救会派。经过在鲁迅纪念会、援绥会等公开工作中的合作，经过党多方找机会向这些干部解释，主要是对抗救会干部的解释，虽然受张梅生的猛烈反对，然而双方的干部都同意于组织统一的救国会，虽然在救国会中仍然有各存野心的倾向，然而基本上是统一了行动，统一了组织了，在抗日民

族统一战线的口号下统一起来了。使这些干部真正的接受了统一战线的基本理论，是当时工作上的最大的成功，也就是和张梅生的捣乱作斗争的胜利。因此，党就能够取得与准备了一批干部，作为党的工作发展的基础和以后群众运动的主要骨干。

然而救国会终究是障碍着广大群众运动的开展的。救国会组织了以后，我们在基督教青年会的工作停顿了，海员洋务赈缓会的工作也没有以前活跃了，其他各个所谓外围团体也只能半公开半秘密的活动，没有发展。

大约是二月以后，党接到了南委转来的关于解散救国会进行公开合法的群众运动的决议，约在一个月內，党把所有的各界救国会都解散了，所有的各个救国解散都是经过群众的讨论与通过的。这时又碰到张梅生的反对，然而终于是胜利地通过了。

救国会解散以后，我们就集中力量于公开合法的群众组织。在海员工人方面是以余闲乐社为中心，发展与健全这个落后的组织，余闲乐社发展到七八百人，于五、六月以后就着手筹备组织海员工会。在苦力工人方面组织了几十个人的兄弟会。在女工方面组织了三百个人的姐妹团。在学生方面组织了五六十人的学生生活社，出版了学生生活周刊，在一两间学校内组织了读书会。在一般青年里组织了新生社（课余社改组的）、青年同乐社等。此外还组织了一个同乡会：西江七县同乡会。

所有这些团体，有一部分是已经取得合法的地位（政府注册立案）的，有些是未有正式的合法地位的，如姐妹团、兄弟会、学生生活社、新生社、青年同乐社等等，然

而这里一个有原则，就是一切都是公开合法的群众活动。我们在当时的原则是争取公开，利用合法，而这个原则的具体执行是：合法的团体作公开的合法活动，不合法的团体也要作公开的合法活动。

因为在香港当时组织一个合法的团体是不容易的（政府很难批准），然而作公开的活动却是不困难的，我们在当时是不论他承认与不承认，我们自己要公开参加各种合法的社会活动。我们参加了华商总会发起的庆祝蒋委员长五十大寿的大会，我们参加了欢迎广东省主席吴铁城的大会，我们逐渐的取得了不承认的承认、不合法的合法地位。因此，我们能够准备下一些抗战后大量开展群众运动的基础。

2. 抗战以后

“七·七”——“八·一三”的全面抗战使香港的群众运动处于新的环境中：（1）群众情绪空前高涨，自发的反日罢工与动员人力物力的筹募工作非常热烈；（2）英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抗日运动采取半只眼开半只眼闭的态度，对于用捐款赈灾等名义下进行的抗日运动是容许的，虽然不准你用抗日的字眼，不给你合法的地位，然而也不象过去那样过分禁止你；（3）资产阶级、国民党、落后分子等等出来搅一搅什么救亡运动了，统一战线工作有了空前有利的条件。党决定了抓紧时机，迅速的、广泛的开展抗日的统一战线的群众运动的工作方针。在这个方针下，党把群众活动完全摆脱了过去那些小圈子里兜来兜去的做法，完全放在广大的、大刀阔斧的统一战线的活动

上去了。

在学校方面，我们参加了由香港大学与基督教青年会发起组织的香港学生赈济会，这个团体以后发展成为六百五十多个学校单位参加、经常有组织生活过的群众也有五千余人的庞大的团体。

在文化界方面，我们组织了中华艺术协进会（包括了一些著名的电影明星、话剧家、画家、文艺作家等，会员有二百人）、文化界座谈会（包括了新闻记者、教育界等一百六十人）两个团体，并且在艺协的领导下组织了九龙各社团赈灾联合会，一个包括一百五十余个落后团体参加的庞大的组织。

在妇女工作方面，我们参加了基督教女青年会、妇女兵灾筹赈会、妇女新生活运动会、妇女慰劳会的工作，这四个团体以后在我们的推动下成立了总的领导机关四妇女团体联席会。

在下层妇女女工当中，我们组织了香港妇女协会、妇女协竞社，扩大了姐妹团的组织，办了五六间夜学，组织了一千个以上的女工。

在工人方面，我们组织了海员工会、洋务工会、印刷工会、九龙煤炭工会、染房工会等，约五千工人的组织，并且组织包括三十多个工会的工人筹赈联合会。

工作的范围空前扩大了，而且也空前活跃了。

工作范围的广泛可从一个例子看出来：我们曾经发起过一个卖花筹款的运动，推动了华商总会招〔召〕开了各社团联席会议，结果在三天之内花卖出了三十五万朵，这说明了有三十五万个人是买了这个花的，这个人口占当时

香港人口四分之一强。

工作方式也是多样的，有赈济会、赈灾会、回乡工作队、救伤队、慰劳会、歌咏队、剧团、国难宣传训练班、探访队、卖花卖旗队等等。

一般的组织也有工会、体育会、同乡会、同乐会、姐妹团、青年会等等。

就在我们直接推动之下出来活动的也有各种落后团体，如同乡会（西江七县同乡会、会宁同乡会、海陆丰同乡会、潮州同乡会）、商会（惠阳商会、贩烟商会）等等。

统一战线工作则有推动了香港最有名的永远绅士罗文锦大律师做海员工会的顾问，做学赈会的顾问，永远绅士杜其章做印刷工会的顾问，〔做〕艺协的顾问，香港厂商联合会的主席叶兰泉做洋务工会的顾问等等。这时候的工作上的特点是：（1）上层统一战线的工作做得相当好，因此工作有相当顺利发展的条件。（2）一切组织都是撑起了庞大的架子，下层工极是赶不上自上而下的上头工作的步骤的。

因此，这是庞大的群众运动，而同时又是散漫的、空洞的、脆弱的群众运动。

然而，这时期的群众运动对于香港群众的政治觉醒的提高，对于宣传鼓动，对于香港以后的群众运动的广泛的基础的取得与建立，是有她很大的意义的。

然而，在这种有利的条件下，在党内就产生了左的机会主义。我们企图乘机建立香港总工会，而结果就受了香港政府的打击，连海员工会也被封闭，工人筹赈联合会也被解散了，参加了这个筹备工作的一些黄色工会受到警

告，而且使香港政府颁布了紧急治安法令，限制救亡运动。

海员工会被封闭（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以后，虽然环境未马上恶转，但由此以至一九三八年春季以后，香港环境是日渐恶劣了。当时的情势是：（1）香港政府严格的限制，一切抗日活动只限于救济难民的工作，说：“你们要抗日就回你们中国去，不要在我这大英帝国的地方组织什么团体，大英帝国是中立的。”声明不准任何团体领导经济斗争。（2）国民党见我们把群众组织起来了，知道某些团体有点红，就来进行争夺、破坏工作，如对学赈会主席林家耀同志的攻击，关于出席世界学联的代表的竞选等等。

许多资产阶级的绅士们的脸色也逐渐变起来了。卖公债、捐款等的贪污事件在各个工厂及商会发现了。卖日本货、用日本原料的商人又普遍起来。华商总会已经不作兴把救亡工作再干下去。

在这样的情况下，客观的环境已经要求，运动必须由上层转到下层，由上层统一战线到下层统一战线，由一般的动员以至更深入的组织性与更切实的群众性了。

我们向各方面的工作都提出这样的要求，要以下层的实际的组织工作来巩固充实目前的各个合法的庞大的群众团体。

因此，在学生方面，就组织了学赈会的各区的段委会（中级领导机关）进行下层的校内的活动。

在工人方面，把中心放在工会的日常工作与各厂的厂内工作。

在妇女方面，我们自动解散了我们自己划地自封的所谓香港妇女协会，要把一两个干部去做上层妇女工作（四妇联合会），而把全部的党员放到下层群众里去活动，组织洋务工会的妇女部，晨钟体育社的妇女部等等。

在文化界工作方面，我们在艺协之下组织了各种研究组织研究班，并进行组织香港青年记者学会。

群众运动基本上是慢慢向下层比较切实地开展起来了。

这种转变的具体表现是一九三八年七八月间的轰动了海内外的有名的义卖运动。

义卖运动是首先由卖瓜菜的小贩自发的运动，在轻工业的中心区深水埗市场有几个小贩自发地进行三天的义卖，然而当时深水埗总统纺织厂的女工支部的同志很快地抓紧了这个机会，她们组织了义买运动，她们要求厂方将每月从她们的工资中扣去的所谓救国公债费交出来送到义卖场义买（其实厂方一向是克扣了这些钱放在自己的腰包里的），这个斗争胜利了，于是她们集合了几十块钱，几十个工人排了队，打着旗子标语，用巡行的方式把钱送到义卖场去。于是，在群众中开始了义买运动。

党迅速地把握着这种新鲜的方式，首先是在自己所领导的这一区的几个大工厂如大行树胶厂、棉艺纺织厂、南针电筒厂等组织了义买运动。在大行胶厂、棉艺织造厂都进行了反对厂方克扣所谓救国会公债费的斗争，取得胜利，单大行工厂就向义卖场前后三次义买，一共捐出了三千多块钱。

于是，义买运动象火一样蔓延起来了，每一个工厂的

送钱来义买的队伍，都有成千成百的工人，这些队伍是巡行示威的队伍，同时也是最简单而又最有煽动力的宣传队伍，工人们有最简单的三个字的口号“救国呀！”常常是几百人齐声震动山岳地在街道上大叫。巡行的队伍常常在奸商（如卖日本纱的纱商公会）的门口转来转去，使这些奸商们心惊胆跳，也拿出了三千块钱来了。

党动员了许多群众在义卖场做宣传工作与维持秩序工作，鼓动这些小贩们把运动延长下去。深水埗的瓜菜小贩的义卖运动延长至十三天，其他各行也跟着来了，全港各处也跟着来了，义卖运动继续了一个多月。全港没有一个市场不进行了义卖，共筹了七十万余元港币。

在党更切实地领导着的深水埗区，运动是更带群众性与组织性的。

我们动员了该区的流氓帮口通过了禁令，不准任何扒手流氓在义卖场捣乱，动员了十八个著名的流氓头目把守义卖场的钱库，动员了童子军来维持秩序，动员了几个青年团体来宣传，到一些工厂里教工人唱巡行时唱的歌，动员了各厂之间的义买竞赛（如大行厂与南针厂前后竞赛三次），动员了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竞赛（如棉艺厂工人捐多少，资本家就要独资捐多少）。最后，在瓜菜小贩的义卖结束以后，当他们把钱送到全港各社团筹赈联席会（在华商总会）交纳时，我们组织了一个一万人的巡行队伍（送款队），当队伍经过一个工厂时，里面的工人就出来参加了队伍。

巡行时曾经遭警察的干涉，然而他们却不敢拦阻队伍的进行。巡行后，有四个小贩领袖被捕了，党立即发动营

救他们的运动，动员了一个大律师义务替他们出庭辩护，动员了深水埗区一百多间工厂和商店签字向政府保释他们，当他们被判决罚款时，我们在群众中替他们筹募了这笔罚款，以后并组织了小贩工会。

义卖运动在当时的群众运动上有了什么意义呢：

(1) 它使下层的群众运动由过去的被动的（过去其实就是资本家官办的克扣）到自动的活动。这以后，特别是各个支部的工人中，群众运动是广泛地在下层开展了。

(2) 它提高了中下层阶级在社会上的地位，向社会揭露了这些中下层阶级的抗战热情，使群众认识这是抗战中的主要力量，同时也反映了资产阶级的卑鄙无耻。正当小贩义卖时华商总会就有吞没捐款的事情发生，又香港富商绅士杜其章吞没了二万元的捐款，又香港最大的富翁（家产约值二万万）“义买”了三十元，华商总会主席李星衢的捐册共捐得款二元四角，这些事实都被报纸上明显登着，和小贩义卖的七十万余元做了一个非常深刻的对照。

义卖运动当然也更加引起英帝国主义对下层群众运动的注意，然而义卖运动却并没有招致了警探对党所领导的一些主要团体的压迫，却正是因为义卖运动是个广大的群众运动，是一般群众的“热闹戏”而不是几个红色团体的独脚戏。

这时候，在群众运动中和国民党、托派的破坏与争夺作斗争也是很紧张的，在印刷工会我们开除了托派马超凡的会籍；在学生赈济会我们击败了国民党的破坏，保证党对学赈会的领导。我们瓦解了托派何人魂组织的华侨回国杀敌义勇队，我们瓦解了托派商隼明组织的中国学生贮捐

会。

在工人斗争方面，我们也领导了中华书局工人的经济罢工，海员工人的反日罢工，煤油仓码头工人的反日罢工等等。

自一九三七年七月以至一九三八年十一月这一年期间中，香港党的群众工作基本上是可以跟着新的形势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而且，基本上也就逐渐走向巩固与切实的。虽然我们的组织工作还是很差的，然而究竟是准备了一些应付广州失陷后直接支持援助广东内地的抗日战争的群众基础。

3. 广州失守以后

直接支持与援助广东内地的武装抗日斗争，成为香港群众运动的中心任务，也就成为这时候香港各个群众团体工作的中心内容了。而这些工作中的中心工作，是：动员群众，回国参战。这个口号被响亮地在各个群众团体里面提出来，党的一切支部都讨论了这个工作，各个在党领导下的群众团体都讨论了这个工作。于是，开始了热烈的动员工作。

由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到一九三九年七月八个月间，从香港动员到广东内地的群众（包括党员二百三十人左右）共约六百五十人——七百人左右，计：动员到东江惠阳曾生同志游击队、东莞王作尧同志游击队、博罗陈文博同志游击队的共在三百人以上，其中以曾部约占百分之九十；动员到东江华侨服务团、歌剧团、工作团等的共约一百二十人，其中以惠阳约占八十人；动员到琼崖（回乡服务

团)的共约四十人;动员到西江、中区等地的共约四十人——五十人;动员到南路参加张炎的学生军的一百人,服务团的三十余人;还有其他零星个别的等等。

所有这些动员的人中工人约占百分之六十,学生知识分子约占百分之三十五,其他约占百分之五。

所有这些动员工作,主要地是用服务团、工作团等名义动员的。

在这个期间里面,我们一共组织了二十个大小的工作团、服务团等。

所有这些动员工作,大部份是经过群众团体来组织的,如学生赈济会就组织了五个工作团,一共动员了二百四十二个人。

参加组织这些动员工作的主要是下列诸团体:学生赈济会,惠阳青年会,东江华侨救乡总会驻港办事处,琼崖同乡会、商会,恩平同乡会,余闲乐社,海陆丰同乡会。其中主要地是利用同乡会及赈济会。

动员工作对于开展东江的武装工作及地方工作是有决定意义的,对于开展其他各地特别是南路张炎处的工作也有很大的意义。

动员工作还包括了财力物力的动员。所有这些工作团是由香港经常供给他们活动费与生活费的,东江惠阳曾部的经济来源,有三分之一是靠香港的募捐。

基本上说,香港党对于动员群众回国参战这个任务是完成了。

在群众动员工作上所表现的主要缺点,仍然是如党内动员工作所表现的缺点一样,没有更好的顾虑到香港的工

作，没有对香港工作作长期打算，没有能够更好的配备干部，因此浪费了不少干部。

动员工作结束以后，几个主要的团体印刷工会、惠阳青年会、晨钟体育社、学赈会等干部都走了百分之七十以上了。被动员了的大概都是各团体各工厂里最积极活跃的党员与群众，不积极活跃的人是不愿意回去的。

动员工作是到一九三九年七月才由党宣布结束的。

4. 投降分裂逆流现象的来临，曾经很敏感地首先反映到香港的群众运〔动〕里面来。

远在广州、武汉失守以前，在香港的资产阶级里面，已暴露着很多动摇妥协的症候，全港的织布厂有百分之九十以上是用日本纱的，全港的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工厂厂方都假救国公债、救国捐等名义克扣吞没工人的百分之五的工资，引起了各厂工人无数次的反对斗争。全港最大的粮食行宏记办馆，因供给日舰伙食引起四百运粮的码头苦力工人的罢工，全新纺织厂（在香港、澳门、新加坡有名的纺织厂）的厂主因代日寇收买烂铜铁被群众反对，因而引起扣捕与审判爱国青年张云清的轰动全港的案件。

广州、武汉失守，特别是汪逆出走到港以后，资产阶级对工人的进攻就更明显了。关于禁止工人的救亡活动，关于开除工人里面的活动分子，关于减工资，关于延长工作时间，关于借故关厂等都变本加厉地来了。

商务印书馆强迫工人搬回上海印伪满洲国及维新政府的教科书（是上海厂的主要生意）去了。

孔祥熙办的保安防毒面具公司也用日本原料，开除救

亡分子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党不能不领导工人的自卫斗争，所有这些斗争，是经济性的常常又同是政治性的。在这一个期间里，我们领导了中华书局两次大的罢工斗争，领导了保安公司的罢工，华艺纺织厂的工作，香港树胶厂的罢工，以及商务印书馆反对搬厂、恢复战前工资、全港印刷工人的改善生活待遇，中华汽车公司反吞没所谓公债捐的各种合法的与非合法的斗争。

最后，我们领导了南华、天演、自由三汉奸报的工人的反汪罢工。

一九三九年的一年，在工人运动中，经济的与政治的，合法的与非合法的，自发的与有党领导的种种斗争，是空前频繁紧张，此起彼伏地进行着。

同时，也是和托派、和国民党的投降派斗争的最尖锐的时期，国民党利用了托派马超凡、陈文等组织了几个工会，在工人运动中进行严重的分裂运动，因此，在印刷工人里面就有了两个工会，两种改善生活斗争，在理发工人中有男工和女工的对立，男工纠党殴打女工的事件，在许多部门的工人中都发现了托派的活动了，而这些托派，同时又都是国民党的活动分子。

在教育界、文化界方面，汪派也特别活动起来了。

因此，党就不能〔不〕在各方面，特别是工人方面，应接不暇地领导着反托派反投降派的斗争。

第二次帝国主义大战之后，海员工人中又翻起了各个反战的同时又是经济的斗争。

自动员回国的工提出，六七百个群众中的活动分子

被动员离港之后，香港的群众运动的实力本来是大为削弱了，然而由于有了上述的不断的政治的与经济的斗争，香港的群众运动又逐渐在斗争中锻炼起来，培养了新的干部，更切实地团结了群众，香港的群众运动到一九三九年的十一月我们离港时，虽然许多地方未恢复元气，然而在另一方面说，又是更坚强有力了，因为他们已经经过更复杂的锻炼。

以上是关于三年来的香港群众运动的历史。

5. 由这个历史看来，我认为香港党的群众工作，有以下几个特点：（1）它基本上能够抓紧各个不同阶段的特点的，因此它能由秘密的活动到公开的活动、由发展到巩固，由上层到下层等等；（2）它基本上能够抓紧这个地方的特点的，因此它能够利用英帝国主义和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不作反英活动），利用华侨的民族热情，利用群众的革命传统，因此它能够〔在〕不准组织，却也组织起来，不合法却又合法起来，进行了合法斗争，也进行了非法斗争；（3）它是能够面向下层，尤其是面向工人群众的；（4）它是富于斗争性，从各种政治的经济的斗争中发展与巩固起来的。

因此，当逆流来了以后，当香港环境恶转以后，香港的群众运动并没有向后转，而是向前进展着，而是更深入更带组织性了。

至于一贯来以至以后存在于香港的群众工作中的主要危险是什么呢？那么，仍然是左倾：

这种左倾表现于：（1）工作的突出；（2）对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的不注意，没有建立了经常的统一战线工

作，用一下就把他丢开了。

这种倾向是会保存下去的(我们未有深刻的检查过)，如不了解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的原则，那么，目前这一点点力量，就再经不起几个斗争了。

(二)三年来香港的职工运动

1. 香港工人

香港工人的总数，我们一向没有做过精密的调查，香港政府一九三九年秋公布过香港的产业工人的总数为四万五千人，这个数字是无论如何也不正确的。现在将我们的估计数字，列如下表。

香港产业工人数量估计表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

类 别	人 数	
1. 海员	50000	内包括了帆船工人12000人
2. 纺织	60000	
3. 造船	50000	
4. 市政	15000	
5. 食品	20000	
6. 橡胶	5000	
7. 印刷	7000	

8. 机器	5000	
9. 日用品	15000	
10. 铁铜器	10000	
11. 烟草	5000	
12. 铁路	500	
13. 矿山	3000	
14. 水泥、砖瓦	2000	
其 它	10000	
总 数	259500①	

①原文如此。各分数和应为257500人。

香港非产业工人数量估计表(一九三九年十一月)

类别	人数
码头苦力	30000
洋务	30000
佣人	50000
店员	50000
建筑	50000
铁铜木工	10000
捕鱼	5000
酒楼茶室	10000
其他手工业	50000
其他雇工	10000
总数	295000

香港 工人 总数	产业工人	259500
	非产业工人	295000
	工人总数	554500

工人人口约占全市人口四分之一以上。

香港的工业并不很集中，除了造船业有两个上万人以上的厂外，其他就没有上三千人以上的工厂了。如纺织业工人总数有六万人，可是全港没有一间厂上一千工人的，最大的为棉艺织造厂，只有七百余入。

新起的工业是比较集中的，如橡胶业五千工人中有三间一千人以上的工厂，如印刷工业七千人中有一间近二千人的厂，一间一千人的厂。

至于一般的大概以一二百人的占多数。

抗战以后，从广州、上海搬来了许多工厂，特别是纺织业、日用品等轻工业的工厂，这使香港增加了一些产业工人，约四五万人，但同时也参加了香港的失业工人。

目前香港失业工人的数量，我们没有统计过，现只将我们所知道的一些企业里的数量表列于后。

香港几个主要工业部门失业工人数量估计表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

类 别	工人总数	失业工人数
海员 (只算大洋船)	30000	16000
纺织	60000	5000
汽车	6000	3000
印刷	7000	500
烟草	5000	2000

造船	50000	10000
筑建	50000	10000
总计	208000	46500

从上面这个表看起来，工人失业的数字是很高的，在七个主要工业部门工人总数二十万八千人中就有失业工人四万四千七百余人，几占总数百分之二十三。

至于产业工人的失业人数比例如上表，六个主要产业部门一十五万八千工人中，就有失业工人三万四千七百人，占总数百分之二十三。

而在个别部门中：如大洋船海员工人总数三万人中，失业者一万六千人，占总数百分之五十三。又如烟草工人总数五千人中，失业者二千人，占总数百分之四十。

这些事实都说明了，在主要的产业工人中，失业工人数字是更高的，更受战争的影响的。

大约在产业工人中，平均五个人中有一个失业工人，全港所有产业工人中失业工人总数当在五万人以上。

至于在非产业工人中，战争对他们的影响是比较没有这样明显的。如在洋务工人中，根据洋务工会的调查，五千四百会员中只有失业工人四五十人。洋务工人是因一些洋鬼子及高等华人迁避来港反而减少了失业的数字的。一般的佣人大约都如此。

在非产业的工人中，大约以码头苦力工人、建筑工人的失业数量较大，在这些工人中，长工是非常地缩减了，

一般的工人大约是一个月只做半月的工，或者一天只赚半天的钱（如苦力工人）。

全港五十五万工人中，大约会有失业工人十万吧？

抗战以后，工人的工资一般地是减少了，工作时间是延长了。

有一些厂并没有明显地减少了工人工资，然而他把长工改为散工，把日工月工改为件工，因此在这里工人是实际地被减了工资，特别在一些厂如烟草厂，以前一个月每日都上足工，而现在则每星期只上三天工，因此每月的收入就由战前的每月十八元变为目前的每月八元了。这里缩减的数目是百分之六十。

有一些厂是利用失业工人的众多，他就在所谓维持工人生活的名目下招了大批工人，把他们轮流上工，因此他们名义上是某厂工人，而其实每月不过在该厂上工十天二十天而已。资本家因此虽然无限地延长了每天的工作时间，但并未影响到他的工人的劳动力，因为第二天来上工的却是第二班工人了。

许多厂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工作着的：他们平常不去做什么存货，却强迫工人在厂里整天整夜的等着，只要订单一到，马上便连日连夜地赶着做，因此工人的工作时间是毫无规律的，有工作时可以连续做二十个钟头，而没工有作时也要在厂里等十二个钟头，这些都是按件计资的，有时候是在厂里坐了一天，没有赚到一个铜板。

所谓在业工人其实也是在这样情况下的半失业工人！

又有明显的如造船业的太古、黄埔两大船坞，有船修理或建造新船时，工人会突增至每厂在一万五千人以上，

而平时却只有四五千人。这些临时工常常一年只找到一两个月的工作。

因此，工人的每月的实际收入是锐减了。现在将工人生活待遇状况表列如下：

香港工人生活待遇状况表(一九三九年十一月)

类别	每月工资			工作时间			食	宿	备考
	最高	一般	最低	最高	一般	最低			
海员	90	30	6	12	9	8	资方	资方	
造船	55	24	7.5		9	8	自己	自己	
纺织	30	8	4	16	12	10	自己	自己	
橡胶		8	4	16	12	10	自己	自己	
印刷		10	4	16	12	8	资方	资方	
汽车	42	18	7.5		10		自己	自己	
电车	30	24	9		10		自己	自己	
自来水	24	18	6		10		自己	自己	
机器	36	12	0		9	9	自己	资方	
店员		8	3				资方	资方	
佣人		4	2				资方	资方	
码头		12	8				自己	资方	
建筑		9	6				资方	资方	

香港战前后工人生活待遇变迁表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

类别	每月工资		工作时间		注
	战前	战后	战前	战后	
纺织	10	8			
橡胶	10	8			
印刷	20	18	9	12	商务、中华书局等大厂
烟草	18	8			
罐头厂	10	7			

香港战前后物价变迁表(一九三九年十一月)

类别	战前	战后	增长比例 (以战前为100)	注
米	每元18斤	每元13斤	136	
油	每斤\$.14	每斤\$.28	200	
柴	每元150斤	每元60斤	250	
菜	每斤\$0.02	每斤\$.08	400	
猪肉	每斤\$.40	每斤\$.80	200	
牛肉	每斤\$.30	每斤\$.65	217	
鱼	每斤\$.16	每斤\$.30	187	
盐	每斤\$.01	每斤\$.02	200	
粗布	每元5码	每元3码	167	每码等于三英尺
一间小房间的房租	\$3.00	\$10.00	333	

从上列三个表看起来，战争以后，香港的物价以一倍、二倍、三四倍的指数增加着，而工人的工资却百分之二十、百分之三十，以至百分之六十、七十的比率往下降着，即使并没有减少了工资的，也困难招架这高涨的物价了，何况除了那种种的克扣以外，实际的收入比表中所列的数字还少。自抗战以后，全港的工厂都在所谓救国捐、公债捐等名义下克扣了工人的工资，而这些“捐”有百分

之九十以上的厂都是入了资本家的私囊的。而〔比〕一般的克扣，更加来得惊人。

如海员工人，在所谓涉孖沙（包工头，又是一种封建行会似的组织，凡海员工人上工都要经过涉孖沙的介绍，无论有工时无工时都要向涉孖沙纳税进贡）制度之下，每月工资三十元的，竟实际收入只有十八元，有十二元是在各种各样的名义下克扣去了（如所谓馆用、先生钱、神诞钱、发新粮钱等等）。

由此可见工人的实际生活陷于如何苦楚的境地。

估计一个一家四口的工人家庭，其战前战后的负担，约如下表：

香港一个普通工人家（四口）战前战后用费比较表（一九三九年十一月）

类别	战前	战后
伙食	\$ 12.00	\$ 16.00
房租	3.00	10.00
用水	免费	0.50
灯火	0.50	1.00
杂用	2.00	3.00
总计	19.50	30.50

由此可见，一般的负担是增加了百分之五十八了，而这些数字里还没有把疾病、教育、衣服等费用算在内。

在这样的情况下，工人们只好被迫离开房子到马路上露宿，或者搬到近郊盖一所小铁皮房子住着。在广州失守以后，香港曾经有五万人在街道上露宿的，这里并不完全是外来的难民，其中最少有二三万人是香港的工人家庭的，甚至，象我们有四个女工同志就是这样每天全家在街头露宿的。

什么子女教育，父母赡养，也常常顾不得了，马路上多了无数的小叫化、老叫化，特别是小叫化。

资产阶级连一点假慈悲的救济计划也没有过，唯一的办法就是拘捕无业游民驱逐出境，拆毁工人的棚户以整市容，以重卫生；增加警察，设立市民自卫团（商团）以维持治安。当中华书局的一千二百工人因被厂方解雇失业时，英帝国主义的代理劳工司长对工人代表说：“你们一定要离开香港，你们要知道香港的米、菜不是给没有职业的游民吃的。”有时候他们也如此露骨地说话的。

在香港，有二十五块钱住一个月的狗屋（狗的旅馆）。当保安防毒面具公司的工人要求改善生活而绝食了八天饿死了人的时候，厂长孔令侃（孔祥熙的少爷）却正在花了二千块钱把他的狗送进医院里去疗养。

工人的斗争的情绪是不能不高涨起来了，自广州、武汉失陷以后，工人们为保障自己的利益的自卫性的经济斗争，据我们所知，到一九三九年十一月止就有二十五件，参加斗争的人数一万二千四百五十人，这是香港四五年来未见的景象了。

香港的工人，本质上是有下列几个特点的：

（1）他们是有很深长的革命传统的，无论是反满清

的革命，一九二五——二七年的大革命，香港工人都建立过伟大的功绩，产生不少的英雄，特别是海员大罢工，省港大罢工给香港工人以不可洗刷的深刻的阶级教育，现在在香港工人中，只要你提起了苏兆征、邓发，他们就会眉飞色舞的，在海员工人里有些消极分子，只要你提起苏兆征的名字去骂他一顿，他就会伤心得哭起来。在香港的工人中，有一个普遍的经验：“红毛鬼，怕他个卵，只要我们工人齐心，再来一次省港大罢工，香港就变成臭港了。”很年青的工人也会这样说的。

(2) 在香港工人里面，改良主义的，法西斯主义的影响是很少很少的，香港工人自大革命以来没有脱离过党的领导（即在一九三四——三六年海员工人里面，也还有党的支部，其他各方面也有失掉关系的党员积极的活动，如香港抗日救国会，就是由一个老工人党员领导的），没有离开过共产主义的思想系统的，红毛鬼是不能在香港工人中作任何欺骗的，英国工党的改良主义在香港工人里是无所施其伎的，工人们从省港罢工及十年来的斗争经验上早已认识了它的帝国主义的本质。国民党的法西斯政策在香港是困难活动的，他们在香港也还是和我们一样的处于可怜的“在野”地位，英帝国主义上过孙中山的大当，现在还不肯给国民党的老爷们在香港公开挂起招牌来。在广州，我们曾经在机器工人中碰到一个十多岁的小孩子，也要乱吹他在十多年前广暴时如何杀共产党等等，这些法西斯思想在香港工人中是找不到的。

(3) 香港工人是富于活动性的，比起广州的工人来，他们是更老一辈的工人，他们是更早的就有了自己的

社会活动与政治活动，他们具有华侨的一般特点，特别关怀着自己的祖国与故乡，在他们之间，什么同乡会、什么广府帮、潮帮、福老帮、惠州帮、四邑帮等，地方关系的组织真多得一塌糊涂，香港的三合会各个帮的组织号称有三十万人。他们是有广东人一般的活泼性的，什么体育会、俱乐部，也是满街满巷地挂着招牌。可以说，最大多数的工人都参加了各种各样的下层组织的。在九龙黄埔船坞有三十七个团体组织着，每一个工人都参加了团体的。根据一九三七年底的调查，全港有一百六十个工会，虽然这些工会已经不象个工会了，然而它总算是个工人团体。

在香港的群众运动里面，工人是无论什么时候也比较其他各界活跃的，这几年来他们开了许多个比较其他各界更多人的群众大会，他们会组织义卖运动、义买运动，他们会绝食罢工，他们会抬棺巡行（保安防毒面具厂的斗争），他们举行了各种的反日反汉奸的罢工，他们封锁了汪逆的三间机关报，他们行刺了林逆柏生（船坞工人陈锡林），杀死了日本人（咖啡店工人），甚至还举行过暴动（钨矿工人，杀死了英国工头）。

由此可见，香港的工人是如何富于活动性，如何容易组织容易动员。

由此可见，香港工人是大部份组织起来了，是大部份活动着的。目前的问题，是我们还不了解他们这种特点，还没有从他们这种特点来研究对他们的切实的正确的领导艺术，我们还没有能够灵活地切实地去掌握这广大的机动的部队。

香港政府非常害怕香港的工人，尤其怕海员工人。他

常常明显地告诉工人的群众领袖说：“香港政府最不能忘记的就是一九二五年的大罢工了，你们当心，我们有权可以随时解散任何团体，拘捕任何人的。”一九三七年底海员工会被封闭时，一个侦察说：“丢那妈，你们这些海鸭，放松一下也不成的。”

因此，香港政府十多年来时时刻刻都“关心”着我们的工人运动。

香港政府对香港的工人运动的政策：

第一种是压的政策：a. 他绝对不容许香港有什么工人的统一组织，不容许你有几间工会联合起来的任何组织，甚至不容许你各个工会互相之间的普遍的联络，他硬说：“你们不能和他们来往！”不讲什么道理。b. 他不容许任何的罢工，香港法律是不容许罢工的！c. 有时候就拿出了所谓紧急治安法令来，或者说：“港督批准了。”就封闭任何团体（如海员工会）。至于对各团体的检查、警告，就更是家常便饭了。第二种是麻痹的政策：英帝国主义是允许组织工会的，然而这里有一个条件，就是要把资本家和工人组织在一道，最少也要请个资本家来做主席或顾问，而这个工会活动的主要内容是慈善事业，所谓慈善事业的主要内容是会员死了大家科派一点棺材钱，这是完全少不得的，或者办什么义学，读读四书五经，因此，香港有了一百六十间工会，这些工会多是劳资合办的，最少也是工头和工人合办的，领导权不能落在工人手里自不必说了，机器工会的主席韩文惠是个机器厂主，资本家香港太平绅士杜其章做了五六个工会的顾问，甚至我们组织

的海员工会也不能不请一个包工头来做主席。

有许多团体甚至是公开挂起工商会的招牌的。

然而英帝国主义却不能象国内的统治者一样方便，他不能用红须绿眼的“鬼”来做中国的工人运动，因此他不能不主要地运用第一种政策。

第三种就是斩草除根，擒贼擒王的捉共产党的政策了。有时候他会容许你一些团体“红”一下，可是这只是为了看清了好一网打尽。

英帝国主义是绝对不容许在香港有共产党领导的工人团体存在的，以至不容许有什么纯粹的工人团体存在的。英帝国主义在殖民地的政策不象在他们本国，完全是如此斩铁截钉，没有一点婆妈气的。

2. 三年来香港职工运动的历史

自一九三四年后，香港党只在海员工人中保存了一个三四个人的支部，这个支部继续着群众运动，将日本皇后轮的群众团体余闲乐社（俱乐部）搬到岸上来，扩大了组织，吸收洋务工人参加了，成为海员洋务工人的团体，约有二三百个会员，是香港政府承认正式备案的俱乐部性质的工人团体。

余闲乐社除一般的团结了日本皇后轮及岸上的洋务工人外，并没有什么显著的群众活动。

一九三六年春，香港抗日救国会的组织里包括了约有三百的工人群众，这些工人群众大约都为左倾分子，抗救会的外围团体妇女互相社及课余社均团结了约几十个的女工及青工，妇女互相社及课余社都办了女工夜学。民族革

命同盟组织的妇女读书会也办了一个女工夜学。

抗救会的领导者洪标，是个老工人同志（此时失了关系），然而抗救会的中级高级干部并没有很多工人分子参加，在社会上一般比较活跃的还是几个从广州逃难来港的知识分子。

六月间，抗救会因为日本人殴打海军船坞工人曾福的事件，发起援助曾福的运动，发了传单，在自己的油印刊物《前路》及《偕行》里都评论了这件事，并且大约也捐了一点钱给曾福。然而这些宣传品的内容却是反英的，鼓动船坞工人向英帝国主义抗议，要求惩办凶手的，因此引起香港政府的注意，以后，就几次的拘捕了抗救会的干部。

“九·一八”纪念日香港抗救会八十六个人全体在会场上被捕以后，抗救会的工作停顿下来了，本来抗救会在工人方面最活跃的还是女工工作，可是在这次纪念会里被捕去两个最主要的女工干部阿金两姐妹，因此妇女互相社的工作停顿了，女工夜学也停办了，妇女读书会的女工夜学也停办了。

抗救会的工人工作是非常狭隘的、宗派的、关门的、秘密的工作，在香港公工开的人运动上并没有什么显著的活动，除了引起几十个工人中的积极份子的被捕外，没有什么有意的影响。

这时候党所能够掌握的，只有海员支部及其所领导的余闲乐社，党提出了建立工人统一战线的方针，并且指出了争取公开利用合法的工作方式，在十一月绥远抗战爆发以后，我们就在海员洋务工人方面发起了援绥运动，以余

闲乐社为中心，推动了三十六个团体共同组织了海员洋务工人赈绥联合会，在新新酒店公开开了七百人的工人群众大会，这样的大会听说在香港已经十年不见了，并且公开印行了赈声、余闲、坪潮（惠坪公所一个海员工人组织的会报）等定期刊物，在这些刊物里公开宣传全国人民联合抗日的统一战线的主张。

赈绥会在募捐工作上有了相当的成绩，因此她在香港有了很好的社会地位，在群众中有威信，很多群众及其他团体自发的募捐都交到赈绥会来汇交，赈绥会就成为香港政府未承认而又不得不任其活动的不合法的公开团体。

然而这时候香港党的群众工作的另一方面却仍是左的，秘密的。在赈绥会以前，我们就在海员工人中有了海员救国会的组织，只有十八个会员。赈绥会以后，就发起组织香港职工救国联合会，约在十二月底职救正式成立，有会员约三百人，大约一部份是以前抗救会的群众，一部份是民族革命同盟的群众，一部份是党所领导的海员洋务工人。在苦力工人、黄包车工人中，党能够领导的约有五六十个职救会员。职救会除了海员洋务赈绥会之外，没有其他公开群众活动。

职救会领导过三个斗争，一个是尖沙嘴洋务工人的反克扣斗争，参加者约五六十人，失败了；一个是深水埗洋务工人的反包工头剥削的斗争，参加者一百二十人，采取罢工打架的方式，这次斗争胜利了；一次是制藤器工人的反对减少工资的斗争，参加者约五百人，罢工，失败了。

除第二个斗争外，其余两个，党的领导是很薄弱的。

在职救会里的各派系的干部，很不团结，抗救会有抗

救会的一套，我们有我们的一套，民族革命同盟则基本上是没有什力量。

大约是一九三七年二三月间，我们接了解散救国会的决议后，就自动解散了职救会。

职救会解散了，香港党的职工运动才算是基本上从秘密的活动走上公开活动，从非法的活动到极力争取合法的活动。

在市工委方面，也成立了职工运动委员会了。

这时候绥远抗战早已结束，赈绥会已经没有了什工作，党就经过赈绥会的三十六个团体的关系，开始活动组织香港海员工会。

除了海员、洋务工人方面有了余闻乐社、赈绥会及进行组织海员工会的活动外，市委所领导下的工人运动仍是很狭小的，在苦力黄包车夫工人中组织了几十人的兄弟会，并在三合会中有点活动，并企图组织印刷工会。

然而这时候市工委职委会里混进了一个第四路军的侦探奸细（黄包车夫林坤），职委会又是一个自守分子胡作民做书记，在印刷支部混进了托匪马超凡和吃大烟的李景云，因此工作几个月，一点儿也没有开展。

在青工及女工方面，我们组织了新生社、姐妹团，大约团结了三四百青工及女工，工作是比较活跃的。

至于国民党在抗战前，在香港工人中是没有什么显著活动的。托匪在工人中的工作也很少。

抗战前的工运情形，大概如此。

抗战以后，香港工人运动跟着一般的群众运动的发展而发展起来。海员及码头工人的反日罢工激烈起来了，在

赈灾慰劳等名义下组织起来的群众团体无数，海员洋务赈绥会改为赈济华北难民会，我们所领导的青工团体也参加了九龙各社团赈济联合会，取得了领导地位。党领导着海员工人的罢工，码头工人的罢工及纺织工人反对用日本原料的罢工。

海员工会是在这样顺利的环境下——香港政府英帝国主义想利用中国的抗战，资产阶级的绅士们想利用正在汹涌起来的群众运动（香港华人代表最著名的大律师太平绅士罗文锦做了海员工会的顾问），我们请了一个比较进步的包工头做海员工会的主席，于是海员工会于八月间正式成立。

于是积极组织印刷工会及洋务工会。

于是于领导了煤油仓的工人反日罢工以后，我们就组织了煤炭工会九龙分会，领导了三光布厂染纱工人反日罢工之后，我们就改组了染房工会。

在一般的组织里，我们扩大了余闲乐社，建立了深水埗、红坎、筲箕湾、九龙塘等支社，会员发展到千余人。我们组织了惠阳青年会，会员约七八百人，里面约有百分之七十是工人，组织了西江七县同乡会，会员七百人，百分之八十是工人。把新生社改组为晨钟体育社，这社员约二百人。

当时职工运动发展的特点是：（1）由小组织很快就发展成为几百人的大组织；（2）由一般的组织发展为产业的、职业的组织。

然而很快这种发展就受到了打击。

大约是九、十月间，全面抗战的局面既已因“八·一

三”的上海抗战而形成，因此广东的国民党当局也就想乘机来向香港工人抓一把。于是各派各系派来了各式各样的“干部”，进行各式各样的“工人运动”。

首先是广东省党部书记长谌小岑（一个曾经是共产党员的叛徒）带领了他的干部袁洪范、袁炳辉（两个都是叛徒）来港，一眼就看上了我们的海员工会，和海员工会取得了联系，组织了约有三十多个工会参加的香港工人筹赈联合会。然后依靠这个筹赈联合会进行活动，组织香港总工会。十二月间成立了香港总工会的筹备会，筹备会就附设在海员工会里。

其次是余汉谋也派人来，依靠着机器工会（华人机器会）筹备组织香港工人联合会。

又其次是广东省主席吴铁城也派人来筹备组织香港总工团。

整个香港给这些老爷们今天开个工人代表会议，明天发个什么筹备会或筹备处的通知单，弄得满城风雨。

当时香港党是采取了左倾机会主义的策略，以为这些大人物来，大可以利用恢复一九二五年以前的气象，因此自己也野心勃勃，企图凭借仅仅组织起来未到三个月的海员工会（有会员三千余人），就想空头地组织香港总工会，而且，认为他们这三派之中以谌小岑为最进步（咀巴里一般是进步一点的），就想用谌小岑去统一其他两派，真的想马上建立香港工人统一阵线，在党内市委、海委及职委都讨论了组织总工会的工作大纲，在党内也弄得满城风雨。

十二月初香港政府颁布了紧急治安法令，我们没有注意它。十二月底，香港政府通知罗文锦绅士辞退海员工会

的顾问，我们也还没有警惕。罗打电话来辞职时我们只在电话中挽留一下，也不去问他究竟，还想第二天才去找他，谁知第二天清早警察就来了，海员工会就被封闭，罪名是企图组织非法的总工会，煽动罢工，扰乱治安。

海员工会的被封闭是对香港职工运动的很大的打击，因为他虽然建立了不久，但在群众中的威信是非常大的，在其他工会中的威信也是非常大的。这一事件给我们很大的教训：

(1) 在香港政府这样害怕工人与压迫工运的情形下，香港工人的公开的总的组织是不能与不应该组织的，不但因为我们现在只有一个海员工会，就算有十个五十个海员工会也不成。而当我们还没有半斤四两的群众力量时，就想利用这个利用那个来企图恢复一九二五年的气象，那就当然是更大的笑话。命运注定了香港的工运要一点一滴的从下层做起，要掩蔽，要长期埋伏，不能贪那些大便宜。

(2) 在现在，合法的工会就只好做些合法的工作，由工会下命令罢工，公开领导斗争，这边接头那边谈话，堂堂皇皇地说这个斗争是我发动的，那个斗争是我主持的，这种作风是行不得的。下层发动非法斗争是一回事，那是需要的，可是由合法的团体如海员工会出头领导这个那个斗争，那是吃亏的。在海员工会的三个月的期间，确实是领导了许多斗争（反日的与经济的），然而错误的却是工会事事风头主义地公开站在领导地位，引起资本家的仇恨（香港政府有告海员工会的状子据说有一二十件）与香港政府的疑忌。合法的团体领导斗争应该是利用他那合法的地位来调解、谈判、告状子等等，而不是连自己也离

开合法的地位非法去了。

(3) 上层统一战线不是临时的扶手棒子，用过了一下就秋扇见弃地把人家丢下了，而应该是长期的经常的工作。请人家来做顾问，就要真的尊重他的顾问地位，不要未合法时就先生长先生短的去求人家替你注册立案，组织起来以后就不特不问，连顾也不顾一下了。如海员工会就是什么事也不去顾问那罗大律师的，连我们发起组织香港总工会的事情他也不知道，甚至连最后他打电话来辞职时，我们也毫不在乎，顾也不顾一下。

这样的作法，当然是无论那一个也不能和你“统”下去的。

海员工会虽然被封闭了，但由于中国抗战正在积极地继续着，因此香港的政治环境基本上仍是好的，而不是马上就坏透了。英帝国主义还允许在所谓赈灾慰劳等名义下组织一些救亡团体，还允许一些有绅士做担保的团体立案。部份的资产阶级还有些抗战的热情。

因此，海员工会封闭时，印刷工会和洋务工会都未正式成立，然而我们还能请太平绅士杜其章来做印刷工会的顾问，请中华厂商联合会的主席叶兰〔泉〕（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者）来做洋务工会的顾问，印刷洋务两工会都于一九三八年一月正式成立了，这两个工会积极参加了当时的各种筹赈工作（特别是洋务工会），两个工会都吸收了一些老的工人领袖参加了领导机关，因此在工人中的威信很高，虽然比不上海员工会，然而它总算是在当时的工人团体中最有社会地位中的一个。

印刷工会领导了中华书局一个多月的罢工斗争胜利

了，大大提高印刷工会在香港工人群众中的地位。

然而也因为这样，印刷工会受香港政府的最后警告，被认为红色工会。

香港政府对工人运动的注意比封闭海员工会时更严重了。

在印刷、洋务两工会成立之后，跟着还能合法成立的工会就只有一个戏院职工会了。

煤炭工会的九龙分会刚成立就出马领导反对包工制，结果给包工头禁止工人参加工会，工会连房租也欠了几个月，没有办法，只得结束了。

染房工会本来是被我们改组过的旧工会，但因为下面没有党员的活动，没有下层的实际工作，无形中又停顿工作了。

当时在工人团体的干部里有两种倾向，一种是只知道做救亡工作，天天来个什么卖花、演戏筹款，弄得工人参加了工会或团体唯一的任务就是出钱；第二种倾向是只知道改善生活经济斗争，说现在来不及做救亡工作，说目前工人不需要这些。前一种以洋务工会为代表，什么捐款竞赛（半岛酒店和海景酒店的工人）、焚债运动（把买来的公债票烧了）等等，在社会上比较出得风头。第二种以印刷工会为代表，因为开始做了一些募捐工作，给托匪马超凡攻击说工会加重工人负担，不改善工人生活，自己就发了慌，不敢大胆再做救亡工作，怕工人们反对了。

后来经市委指出后，印刷工会于一九三八年六月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通过工作方针：（1）积极参加各种救亡运动；（2）尽量利用公开合法的可能，改善工人生活；

(3) 健全下层组织，整理各支部，定期召开各支部联席会议，组织各种文化娱乐慈善的小团体，建立妇女部。

这是香港市委当时在工人运动方面的工作方针的基本内容，而当时主要的工作还是放在第三点上。

在这样的方针下，做了一些工作：

(1) 印刷、洋务两工会经过一些整理组织的工作，洋务工会根据地域及生产单位组织各个区分会及支部，以前它是没有这些组织的。印刷工会调整了上海工人和广东工人之间的隔膜，对中华书店商务印书馆两大厂的领导加强了。两个工会都成立了妇女部，特别是洋务工会的妇女部成立后，女会员扩大到七八百人，另建了独立的会址。在洋务工会里，各种座谈会、歌咏班、剧团、球队、读报班、图书室等小组有十多个。在印刷工会也有歌咏班、座谈会、图书室、夜学等组织。这两个工会基本上是比较健全了，印刷工会有会员约三千人，洋务工会有三千余人。海员工会封闭，党决定以余闲乐社为海员的中心团体，余闲乐社的会员发展到三千人左右。

(2) 在其他各方面建立了群众工作：①在黄包车工人中建立了手车夫生活互助社。②在船坞工人中取得了致基体育社及自强体育社的领导。③在铁路工人中建立了铁路俱乐部。④在罐头厂工人中建立了大同读书会。⑤在汽车工人中建立了学德励志社有取得了摩托车研究总工会的领导。⑥在树胶工人中建立了互助社……

党向各个支部提出了每个人都要做群众工作，每个支部都要有群众团体的号召，这号召在当时的各个工人支部里是起了反响的。

(3) 在印刷工会开始做合法的改善生活的斗争。在黄包车夫里也领导着改善生活的斗争。

这时期的工作，使党和工人群众的联系较前密切了。工人的组织更健全些了。

广州失守后，在动员群众回国参战这个中心工作之下，各个工人团体都积极地执行着这个工作。余闲乐社组织过四个工作团，洋务工会特设回国工友的津贴费（每人十元），大同罐头厂读书会的六七十个工人中动员了四十个回东江打游击。总计全港在党领导下的工人群众（连党员）共约四百人被动员回国工作了。

印刷工会的几个主要的群众领袖司徒维、邓一鸣都动员离港去了。

就是在这个时候，托匪马超凡积极向我们攻击，所谓国民党的海外部长吴铁城也来港委出了杜其章做劳工部长了，于是在香港的工人运动中展开了激烈的党派斗争。

特别是在印刷工人中的斗争更为激烈，马超凡组织了印刷总工会来和我们的印刷工会对抗。

同时，经济斗争也尖锐起来了。由一九三八年的一月到一九三九年的十一月间，共发生经济斗争二十五起，参加斗争的工人总数一万二千四百五十人。

九月帝国主义大战发生以后，在海员工人发生了带有反战性质的经济斗争。估计这种斗争是会更向前发展的。

3. 香港的职工组织

关于香港工人的组织状况，我们以前没有整个统计过，根据一九三七年底的调查，全港共有公开的工会（包

括工商会)一百六十余间,这些工会大约有一半是劳资合办的,有百分之三十是包工头、工头等行帮组织,领导权操纵于工头的,有百分之二十可能是比较纯粹的工人组织,然而也很少工会的意味了,大约都是带行帮性的,或者是俱乐部性质的(靠抽打麻将的水来维持会租及办公费的)。然而正是由于这些(包括劳资合办的与工头办的)工会,都刚刚是因为她带着浓厚的行帮性与俱乐部性质,因此它大部份仍是有群众的,也许群众并不热心拥护这些组织,如华人机器工会有会员四千人,经常交会费的只有八十人,然而他们总算是参加了些这组织。

至于其他的秘密的帮口(如三合会)及公开的帮口(以俱乐部或慈善机关、同乡会等名义出现的)俱乐部体育会等组织,则更是普遍了。估计在这样的情况组织起来的香港工人,约占其总数的三分之二,即约计三十五万——四十万人。如香港三合会的四大帮合计就号称有三十万人(这个数目是夸大的)。如全港建筑业工人总数五百人,参加万安总公会(劳资合办的帮口性的三合会的支部)的就有三万五千人。如黄埔船坞四五千工人没有一个不参加了各种组织的。

在女工方面的组织情形则很差,没有发现什么独立的女工组织,纺织业则未有工会。然而在一些非常原始的组织形式下组织起来的也不少,如在青年女工中的七姐会(乞巧会),在佣人中的拜金兰、十姐妹,则是相当普遍的。

一般地说,目前香港工人的组织仍是相当原始性的、封建性的、行帮性的。这一点和香港工人的革命历史是矛

盾的，因此，在一般的工人中，不满意于这种组织的情绪很普遍，抗战以后，就有许多工人要求改组自己的黄色工会，海员工会一成立不两个月就有了三千会员，甚至海员工会被封闭六个月后还有从欧洲整个船几十个工人寄钱寄信回来参加的。我们在工人中的活动分子就常碰到一些工人拉着说：“你来帮帮我们的忙，改组我们那个工会吧！现在还是这样糊涂下去，真是太丢脸了。”印刷工会就是由三个行会——景源工会（碎件行）、真相工会（石印行）、汉文排字社（报馆）合并组织成的，可惜当时我们没有抓紧更多的这些机会。

除了我们组织的与近来托派组织的一些工人团体之外，在香港的工运里党派的活动是很少的。

国民党在香港没有什么工人团体，抗战后（一九三七底？）广州开的华侨代表大会，湛小岑等亲自来港拉拢，亦只有二十个工会派代表到广州参加，其中最主要的是华人机器会、方言（客栈）工会、石行（打石）工会、酒楼茶室工会等。

国民党在香港的工运里是没有干部的，他的干部如韩文惠（机器工会主席）、高赞（叛徒，酒楼茶室工会主席；香港最大的金龙酒家、银龙酒家、英京酒家的经理），可惜都做了大资本家，骗工人不得了，因此吴铁城就只好请杜其章绅士、马超凡托匪来帮忙，弄得托派、汪派，国民党的工运，在香港是一家出品，并无分枝号别。

兹将香港托派所主持的与有个别活动有联系的工人团体表列于后：

香港托派控制的工人团体

名称	人数	性质	历史	托派干部及其活动	备考
印刷总工会	200	工会	一九三九年新组织的	马超凡任委员长	只有报馆工人参加
餐室工会	100	劳资混合	一九三九年新组织，本来是个俱乐部		
理发工会	700	劳资混合	一九三九年新组织的	袁顺洪在内做书记	
派报行情公会	500	劳资混合	一九三九年新组织的	陈文在内做书记	
青草体育社	150		大约是一九三七年前的组织		
集贤（起落货）工会	1000	工会	十余年的老工会，后为包工头保持	何人魂在内做书记	以前有三四千会员，现在信仰降低了，会员少了

香港托匪有个别活动或联系的工人团体

类别名称	人数	性质	历史	和托匪的关系	备 考
万安慈善总工会	35000	劳资混合，三合会支部	很老的行会	托匪周公礼在内做宣传部长（从三八年到现在）	建筑行
侨工息影社	1500	包工头、工人混合，三合会支部	很老的帮口	托匪方才在内活动做书记	大部分是海员工人，我们在里面亦有工作，地位还好
方言（客棧）工会	3000	行会	老行会，现在象个很阔气的俱乐部	内书记和马超凡有点来往	
煤炭（起卸）工会	700	包工头把持的工会	很老	主席和马超凡有来往	
小贩（菜市）工会	4000	劳资混合，带三合会性质的	三九年新建立	托匪商隽明在旺角分会做书记	我们有党员在旺角分会做秘书（副主席），有威信，力量较托匪强
太古船坞				有个别的活动，但未见组织团体	

总计香港托派能够直接控制的工人团体有六个，包括了约二千七百个群众。其中控制力最强的是理发工会，而且也是实际上最多人数的一个团体，因为他们曾进行过“改善生活”（请参考下面和托匪的斗争一段）。

有个别活动或联系的有五个团体，大概都是行会帮口，这五个团体的会员总数达五万人，但和托派的关系都

水务联艺会	550	自来水工人, 职员	俱乐部性质	一九三九年新建立	副主席是党副 员, 下层同志活动
水务俱乐部	100	九龙区自来水工人	俱乐部	旧团体, 一九三八年党取得领导	领导机关及下层都能掌握
铁路俱乐部	150	铁路工人	俱乐部	一九三九年新建立	上下层都能掌握
青年生活社	70	铁路青工	读书会	一九三九年新建立	上下层都能掌握
学德励志社	100	九龙汽车公司工人	读书会	一九三八年新建立	上下层都能掌握, 有五个同志在活动
电车工人读书会	60	电车工人	读书会	一九三九年新建立	有两个同志在活动, 能掌握
致基体育社	100	太古船坞造船工人	体育会读书会	一九三八年建立	有五个同志在活动, 能掌握
自强体育社	350	黄埔船坞工人	体育会读书会	旧团体一九三八年党取得领导	上下层都能把握, 有四个同志在活动
人力车夫互助社	500	黄包车夫	互助社(工会性质)	一九三八年建立	上下层均是我们的, 有三十多个同志在活动
大同读书会	60	大同罐头厂工人	读书会	一九三八年建立	有十二个同志在活动, 能领导全厂工人

九龙教育 服务团	100	女工	教育团体	一九三八年建 立	上下层能掌 握	
晨钟体育 社	200	青年女工	体育会	一九三六年建 立，原名新生 社、课余社，三 七年底改名的	上下层都能 掌握，一向在 党领导下的	
香港树胶 厂工人互 助社	600	橡胶工人	互助社 (工会性 质)	一九三八年建 立	有二十三个 同志在活过 全厂的斗争	
商务印书 馆工人互 助社	800	印刷工人 、职员	互助社	一九三八年建 立	党在领导机 关有位，能 下掌握斗争	有国民党 活动
半岛工余 别墅	400	半岛酒店 洋务工人	俱乐部	旧团体，一九 三八年取得领 导	上下层都能 切实掌握	
新声社	100	九龙货仓 码头工人	俱乐部	旧团体，一九 三八年取得领 导	有四五个同 志在活，能 掌握	
联义馆	200	长洲岛渔 民	三合会， 参加的完 全是参加 过东江暴 动的	旧团体，一九 三七年取得领 导	有十六个同 志在活，能 在岛上讲“ 事”	
长洲学德 励志社	60	长洲青工 、青年渔 民	读书会	一九三八年新 建立	有二个同志 在活，能 领导	
国华俱乐 部	60	海景酒店 洋务工人	俱乐部	旧团体，一九 三八年取得领 导	有九个同志 在活，能 掌握	
七姐会	800	各种青年 女工(未 嫁的)	姐妹团 (封建性 的)	一九三七年组 织，是党领导 建立的	有约三十个 同志在活 ，能掌握	

女工夜学	500	女工	学校		
九龙城夜学同学会	30	青工	读书会	一九三九年建立	有同志领导
青年同乐社	180	青工(少数失学青年)	读书会	一九三六年建立,原名凡声社,一九三七年抗战前改名	有五六个同志活动,能完全掌握
惠阳青年会	1200	青工占百分之七十	同乡会	一九三七年建立,始终在党领导下(抗战后的)	有五六个同志活动,能掌握
西江青年会	130	青工占百分之九十	同乡会	一九三九年在党领导下建立	有三四个同志在活动
业余联谊会	700	银行职员(比较低级的)	俱乐部	一九三八年由党领导建立	有八个同志在活动,能掌握
业余联谊会	250	银行职员,包括了一些高级职员	俱乐部	一九三九年建立,党取得领导	有三四个同志在活动,目前尚能领导

香港党有个别同志活动的工人群众团体

名称	人数	群众	性质	历史	党的领导	备注
小贩工会 旺角区分会	600	菜市小贩， 劳资混合	行会带三 合会性质	一九三八年八 月义卖运动后 三九年组织成 立	有党员做副 主席，下层 有党员活动	有托派活 动
侨工息影 社	1500	海员、打 石工人（ 客家帮）	三合会，区 九龙城力量 最有的支部	旧团体，一 九三八年有 几个党员进 行活动	在领导机关 有两个党员	有托派活 动
染房工会	200	染坊工人	工会	旧工会，一 九三八年曾 经改组，后 去离开了	现在在领导 机关有一个 同志	
文员协会	500	香港政府 机关及洋 行文员	职工会	一九三九年 组织	有三个党员 在内活动	曾领过薪 加斗争
肉行工会	500	屠夫，劳 资混合	行会	一九三八年 由托匪组织 把托匪打走 了	以前有两个 领导，后来 有党员在港 机关，现有个 别关系	
永生别墅		海员工人	帮口	旧团体	有个别同志 活动	
咏雅别墅		海员工人	帮口	旧团体		
航乐别墅		海员工人	帮口	旧团体		

九龙叙兰别墅	海员工人	帮口	旧团体		
义和堂	海员工人	帮口			
陶义俱乐部	海员工人	帮口			
群义馆	海员工人	帮口			
香港叙兰别墅	海员工人	帮口			
天和堂	海员工人	帮口			
公泰	海员工人	帮口			
联兴	海员工人	帮口			
九龙联义馆(?)	600 码头苦力工人	三合会支部	是海陆丰籍苦力工人组织，约有一半是参加过东江暴动的	有一个同志在里面做师爷，下面有十个多个同志	

根据上面两个表，香港党能直接领导的职工团体共三十三个，群众二万三千二百五十人。有党员活动的团体一十七个，群众约七八千人。

4. 香港工人的反日反汉奸的斗争

自抗战以来，香港工人的反日斗争即趋尖锐化与具体化了，这首先表现于拒运日货，与日本船上的海员的自动离船回国等事件上。

首先是关于海员工人的反日罢工。当时党经过自己在船上的小组与海员工会余闲乐社等团体，号召海员工人的反日斗争：（1）在日本船做工的中国海员自动离船，拒绝替敌人工作；（2）拒绝运输任何军用品赴日；（3）

要求公司改航线，不走日本。

在这种号召（同时也是在那种客观形势）下，所有行走日本航线的中国海员都起来斗争过了。根据我们所知道的不完全的统计，单单在“七·七”事变至一九三七年底这五个月当中，参加这种反日罢工的工人就有五千四百七十九。所有日本轮船公司的船员三千五百人全体离船回国了。

任何一个载运军用品赴日的船都引起了罢工，单单英国昌兴公司四个皇后轮就有八百四十五个中国海员因反对运军用品赴日而罢工离船了。

发生这种斗争的，普遍属于中国的、英国的、德国的、荷国的、挪威的、瑞典的以及日本的所有使用中国船员的各个公司。

然而当时一个主要的弱点，却是所有这些斗争，都是简单的采取离船的办法（当然在日本船的就只能采取这个办法），而没有占领了轮船坚决的抗议，并进行合法的调解与国际工人之间的配合，以取得完全的胜利。在所有的斗争中，能够取得这种完全的胜利（使资方服从了工人的要求，工人仍然保存了职业的），只有在澳洲罢工的英国铁行公司的两只船工人二百五十九人，他们在船上坚持了斗争，和岸上的码头工人（外国人）取得联络，当公司请得意大利的轮船来转运时，码头工人罢工了，当地的总工会（英国人的）和他们取得很好的联系，请他们去演讲做报告，各方面设法援助他们，当地的华侨团体致公堂（三合会）出面来调解，中国领事及中华公会也出来调解，因此，这两个船的斗争是完全胜利了。公司无条件的答应了

工人的要求，停止了载运军用品赴日。

这个胜利当然也由于这两个船都有了党的小组与海员工会余闲乐社的群众组织。

同时，在香港还发生了英国轮船茜温厘号英国海员二百五十人的反日罢工，这个斗争的原因是公司要载运汽船〔油〕赴日，我们的海员工会于罢工爆发后取得了对这个罢工的领导，罢工坚持了二十余天，资方不能不屈服，工人完全胜利了。（英帝国主义封闭海员工会时所指的海员工会的罪名之一就是煽动国际的海员罢工）

在岸上，首先是关于码头工人的罢工。由一九三七年的十一月到三八年的二月间，由党直接领导的码头工人的罢工有四次，参加的工人共三千人。这些斗争都是取得胜利的。如：九龙货仓二千码头工人拒绝起卸日货的斗争坚持了罢工几天，结果日货终于运不上岸来；美商美孚煤油公司五百工人拒绝装运汽油供给日寇，罢工七天，结果公司不能不取消日寇十二万加仑汽油的定货单。

此外，自发的码头工人的罢工，是很多为人所不知道的，我们以前没有统计过，现根据记忆所及的有宏记办馆（香港最大的华资粮食行）四百码头工人反对运粮接济日舰的斗争，有运钨矿的码头工人把钨矿丢在海里等等。

其次是工厂工人反对用日本原料的斗争，在党领导下的有三光布厂三百五十人，岭南电器厂的三百人，都采取了罢工的方式，都使资本家屈服了。至于自发的就没有统计过了。又大行工厂一千工人反对用日寇原料的斗争，也在党的领导之下用抗议的方式取得了胜利。

又如太古船坞五千工人全体拒绝修理日本船的罢工，

与被骗至日本船满间丸上作修理工作的几百工人自动离船的罢工，党都是取得间接领导的。

至于反对资本家吞没工人救国捐款（九五扣新）的斗争，在党领导之下的有三起，参加的工人二千四百人，都是采取交涉的方式与实行部分的怠工、罢工，都获得了胜利。

商务印书馆五千个工人拒绝调回沪厂为汉奸印教科书的斗争也在党的领导下获得胜利的。

最后是关于一九三九年“八·一三”南华、天演、自由三汉奸报馆六十余工人的反汪罢工。这个罢工是自发性质的，罢工后党取得了领导并在里面发展了党员，组织了三报工友回国服务团，并组织了三报离职工友的救济筹募会，坚持了四个月没有一个人上工，虽然汉奸方面以八块钱港币一天的工资来引诱（以前一个月只有八元），结果还是一个也没有动摇的。

从以上这些事实看来，香港的工人在反日反汉奸的斗争上，不但如一般人的出钱募捐，而且在自己的行动上表现了他们对日寇及汉奸的制裁，战争以后最少也有五千二百个海员工人为了反日斗争而失业了，然而他们忍受着这种痛苦，不乞怜不呻吟，目前香港有一万六千个失业海员，然而没有哪一个向日本船去乞一碗饭吃的。汪派三报工人的罢工是首先由南华日报发动的，南华日报罢工后，汉奸们把稿件送到天演日报，天演日报的工人又罢工了，他就送到自由日报，自由日报的工人却跟他开一个玩笑，给他出了一张完全是广告没有半页新闻的报纸。报馆从西菜馆里定了几十个大菜来请工人谈话，工人进到那会议厅里

去一看到那摆着的大菜，便一哄走了。以后汉奸们虽然出八块钱一天的工资也没有半个人复工，在这些斗争里都足以显示了工人阶级的坚定性。

香港党是关心这些斗争并积极领导这些斗争的，无论是自发的或有计划发动的，党都用了很大的力量去注意。如关于发动码头工人的拒运煤油的斗争，并经发动很多个团体去援助与坚定那些散漫的码头工人，坚持了七天的罢工，取得了胜利。如在澳洲铁行公司两艘船罢的工坚持罢二十多天。如南华、天演、自由三报的斗争坚持了四个月。

香港党对这些工作上所表现的缺点是：

(1) 我们并没有更有计划有组织地来组织这个运动（当时是以不买日货，不供给敌人等口号提出过的），使它成为长期的更普遍的行动，由工人以至于一般市民。因此这些斗争主要地还限于抗战的初期，还限于海员与码头工人及个别的产业工人方面。一九三八年下半年至三九年以来，香港的日货又充斥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布厂都采用日本纱了，这时候的政治形势与群众情绪（失业及工资减低，物价高涨所给予的经济上的压迫恐慌与广州武汉失陷，后部分群众中的失败情绪）及资产阶级投降的坚决性与日益无所忌惮，英帝国主义与日寇更加采取妥协政策等都使我们不容易再掀起大规模的反日运动了。虽然当时党的基础是薄弱的，然而事实上也是我们还没有从主观上来注意组织这个运动——这个比募捐、慰劳、演戏筹款、买公债等更深入群众，更实际性的斗争性的工作。

(2) 没有经过这些斗争来进行群众的组织工作，海

员工会被封闭后几千失业海员就散失了，煤油仓码头工人经过党领导，他们坚持了七天的斗争，可是我们以后没有在这些工人中建立了任何的团体。这些都说明了当时的市委和海委都是给大变动的时代弄得眼睛有点昏了，跟着那些汹涌起来的什么慰劳运动、募捐运动转圈子，忘记了下层的组织工作，当然也不是完全忘记了）。

(3) 就是没有具体地顾及到工人的生活的救济问题（如海员工人离船后几千人失业）。

这些弱点在以后领导三汉奸报的工人坚持了罢工当中是基本上克服了。然而对这些问题的了解还是很肤浅的。

5. 香港工人的经济斗争

三年来在香港发生的劳资经济的争议事件，根据我们所知如下表：

三年来香港工人的经济斗争统计表

工人	时间	参加人数	原因	要求	经过	结果	党领导否?
深水埗兵房洋 务工人	1936	120	因为包头规定每人要 领出入证(十元六元)	要求取消六元牌费	罢工, 打包工	胜利	有党员领导
尖沙嘴洋务工人	1936	100	因坊馆(粮食店)取 消对工人的制度	要求恢复这百分之五制度	交涉、馆抵制和	失败	有党间接的领导(救国会)
制藤器工人	1937	500	资方减少了工资	要求恢复工资	罢工月余	失败, 组织了本家 工人抵制	有党领导(救国会)
李善记糖果厂工人	1937	300	厂方开工常超过十 八小时以上	要求减少工作时间	罢工	失败, 开以纳元保 全除, 的工保	没有党的领导
中华书局	1937	750	因厂方延长夜工由 六小时一工算变为 十小时一工算	要求恢复以前制度	罢工十余天	结果改为九小 时	自发

荷国渣华公司 海员工人	1937. 11	520	因荣记包工头克扣 工资每人每月2.5 元	要求取消这种 克扣	罢工,海员工 由交涉	胜利	有党的及海员工 会的领导
香港煤炭起卸 工人	1938. 2	700		要求增加工资	交涉,总工 会,煤炭官 打由负责	胜利	领导没有 工会的,煤 炭的,党的
九龙煤炭起卸 工人	1938. 3	300		要求增加工资	交涉,九 由分会,交 工负责	失败	党领导的
中华书局	1938. 3	850	因厂方不履行合约	要求履行契约	罢工月余	胜利	党领导的
中华书局	1938. 12	200	因厂方加倍罚工人 工作错误的罚款	要求照正当手 续罚款	罢工	结果发展为全 厂罢工,一并 解决	党领导的
中华书局	1938. 12	200	因厂方藉口工人打 架开除两个工人	要求不能以打 架为理由开除 工人	交涉	结果发展为全 厂罢工,一并 解决	党领导的
中华书局印钞 部工人	1938. 12	800	因厂方开除工人活 动分子六十九人	要求恢复并保工 人工作,开除 十人无证过 九人	罢工四天,全 厂停工,全部 工人,共八 千八百五十 人	结果发展为全 厂罢工,一并 解决	党领导的

大同罐头厂女工	1938.12	500		要求和男工一样发过年红利	交涉	胜利	党支部领导
华艺织造厂	1939.2	150				失败	党间接领导的
坞矿工人	1939.2	200	因被英人工头虐待		英走把扼头暴动工人散了		自发的
政府机关及洋行职员	1939.5	500	因物价高涨	要求增加工资	交涉(由文员负责)	胜利	党同发的,有同志下活动
九龙黄包车工人	1939.3	200	因包车头增加车租及房租	要求停止加租	打官司并拒绝交租	胜利	党支部领导
锯木工人	1939.6	700		要求增加工资	罢工三天	部分胜利	自发的
皇家车房工人(红坎)	1939.6	200	因英人工头打工人		罢工	完全失败,全部工人被开除	自发的

印刷工人	1939	3000		要求减少工作 时间九小时， 增加膳宿费	打官司，负责 (由工会自行 执行九小时制)	胜利	党领导的
商务印书馆工人	1939	1000	因资方藉故 扣工资	要求恢复战前 工资	交涉，打官司， 罢工	胜利	党领导的
商务印书馆工人	1939	250	因厂方藉故 调走工人领袖	要求停止调走	签字挽留	失败	党领导的
香港树胶厂工人	1939	1100	因厂方搬厂 宿舍，不发给 补助	要求厂方给 宿舍并因此 开除工人	静坐罢工一天	胜利	党领导的
保安防毒面具厂工人	1939	350	因厂方开除 工人领袖二人	要求恢复并 签订新合同	绝食二十天， 罢工	失败，工人被 押出一部分 出境	罢工的，取得 自后党领导
报馆工人	1939	500		要求工作改 善，生活其他 条件	罢工，绝食， 有一部	除珠江外，其 余都失败了	党是江报的， 其领导是托 派余动
中华书局全体工人	1939	1800	因资方解雇 一千二百人 关厂	要求取消解 雇	交涉	到十一月底 未结束	党领导的

金边的士(汽 车)公司工人 ⁸	1939• 100		要求减少工作 时间为十二时	交涉, 罢工	胜利	自发的
中华书局电 课工人 ⁷	1939• 100			罢工一天	胜利	党领导的
香港树胶厂 工人 ¹⁰	1939• 250	因厂方开除工人 领袖	要求恢复她的 工作	签字交涉	厂方答应发 补介 助金及负责 绍职业	党领导的
电车工人 ¹¹	1939• 300	因厂方任意 罚款	要求取消罚款 条例	怠工, 交涉	我们来时未 结 束	党领导的
和丰公司船 海 ¹⁰	1939• 180	因世界大战	要求加薪及保 险	罢工月余	胜利	领导党的
英国太古公 司 ¹⁰	1939• 350	因世界大战	要求加薪及保 险	交涉	增加工资一 倍 及保险费 订合同时 签字增加 平约增 险	有个别同志 领导力的不 强
英国昌海员 兴公司 ¹¹	1939• 120	因世界大战	要求加薪及保 险	交涉	走新保 险 资及 工 资	党领导的
荷属KPM公 司 ¹¹	1939• 500	因世界大战	要求改换航 线及 增加工 资及保 险	罢工(在苏 伊运河), 武 装干涉	答允了增加 工 资及保 险	党领导的

胜利二十二起，失败九起，党领导的二十五起，无领导八起。斗争未结束二起。

根据上面这个表，自一九三六年十一月起至一九三九年十一月止这三年中，共发生经济斗争三十四件，参加人数共约一万七千六百九十人。

如依年份计算，则一九三六年（其实只几个月）为二件，参加人数二百二十人。一九三七年为四件，参加人数二千另七十人。一九三八年为七件，人数三千五百五十人。一九三九年为二十一件，参加人数一万一千八百五十人。

如以广州失陷后一九三八年的十一月至三九年的十一月为一年，则是年的斗争凡二十五件，参加人数一万二千四百五十人。

由此可见经济斗争是一天天发展着频繁着扩大着，特别是广州失守后这一年为尤甚。

为什么呢？（资本家进攻工人的办法）

这主要的是表现了资产阶级向工人的进攻压迫是跟着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后的甚一日，几乎所有这些斗争都是资本家向工人开刀，然而工人不得不还击的。这里面包括了：第一是对于工资的减少，尅扣与工作时间的延长。如商务印书馆工人抗战后即颁布所谓国难支薪办法，所有工人职员薪额只能按照战前百分之九十，甚至百分之六十。又如中华书局工人战前每天工作九小时，战后延长至十二小时。第二是由于厂方自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后即不断地想办法压制工人的救亡活动，取缔工人运动，这表现许多斗争都由于开除工人活动分子、工人领袖而起，这一点

上，如中华书局厂方于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开除了六十九个工人活动分子，如保安防毒面具厂开除了两个参加卖花筹款（“七·七”纪念日）工作的工人干部，如商务印书馆的藉故调走工人领袖，如香港树胶厂的借故开除工人领袖等等。以至于一九三九年八月中华书局竟下决心把经过三次大斗争与四次小斗争的沪籍工人全部解雇了（粤籍工人也同样解雇了），资产阶级这种对工人的进攻是和国内的反民主的逆流现象相配合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工人不能自卫的还击。

因此，决定了我们在这一期间的斗争是自卫性质的。

一九三七年的一年，工人的经济斗争只有四起，参加的人数只有二千人，这种现象能不能说明当时的资产阶级对工人的态度好一些与工人的斗争性差一些呢？不！这必须清楚地看到：

第一，一九三七年的下半年（“七·七”以后）在海员工人与码头工人中发生的反日斗争凡十七起（只根据我们记忆所及的）参加的人数达八千三百九十九人。至于其他各厂内反对用日本原料的斗争，在当时也是非常热烈的。工人们在民族抗战的生死关头，暂时放下了自己的痛苦，忍受着生活上的迫逼，这是事实。

第二，当时的物价的高涨没有一九三九年那样厉害，工人的一般虽然是收入少了，但实际生活没有一九三九年那样困苦。

第三，一九三七年的时候，党的领导力量薄弱，而且有一个时期——自三四月以至十月，市委是完全松懈了一切工作的，党内混进了奸细自首分子占领了领导机关，在

这样的情形下是不会去发动什么工人斗争的。

在抗战的初期，有部分的资产阶级对工人的束缚是稍为松一些的，但这只是关于政治上的束缚，不过稍让他们活动一点而已，对于经济上的束缚，那是从来没有放松，相反的是抗战以后反而变本加厉的。如所谓国难支薪办法，如克扣吞没了所谓救国捐、公债捐，百分之九十五支薪等等（单九龙汽车公司七百工人，所谓公债捐的名义下六个月被资方吞没了一万三千余元），有些工人被克扣到百余元者。全港每一间厂都执行了所谓救国捐、公债捐（九五支薪）的办法，可是就有百分之九十以上是被厂方吞没了的。

工人们不但在抗战中被资本家克扣了减少了他们的工资，同时还在自愿的原则上加重了他们的负担。如英商昌兴轮船公司的四大皇后轮的每个普通海员工人，平均每月要负担八元的捐款，每月二十五元的工资却每月自动负担八元的捐款，这种情形一直到一九三九年以后才减少了一些（因为他们对国民政府那些官僚们不大信仰了）。这也可见工人们为了祖国的抗战是曾经如何忍痛挨熬过生活上的迫逼了。

所有三十四件斗争中有二十八件是有党的领导的，有二十三件是胜利了的。大约党直接领导的斗争都很少失败，在二十八件中有二十件是胜利的，有两件尚未结束。

自发的斗争九起中，只有两次获得了胜利，有一次获得了部分的胜利，其余都是失败了，而且有几个是失败得特别惨重的。如皇家汽车房的二百工人及李善记糖果工厂的三百工人罢工后都是全部被开除了。如保安防毒面具工

厂的工人绝食四天饿死了人，厂方也毫不屈服，结果斗争还是全部失败了。在这些情况里资产阶级香港政府对工人的态度是非常野蛮，如全部开除，如押解出境（保安公司四五十个工人被武装押送出境）。你绝食吗，他就说：“让他饿死一两个看他们以后还敢不敢！”（保安公司经理的话）。因此，假如没有相当的组织，是很困难胜利的，特别是采取了非法罢工以后。

这几年来，香港党逐渐在她所领导的反日反汉奸的与经济的斗争中获得了一些经验，这些经验：

（第一，是对于斗争的领导，逐渐有组织了，有比较大的斗争。如中华书局的第二第三两次大斗争，如印刷工会的减时运动，如香港树胶厂的要求搬厂后的各种优待条件等，都是组织了特别的组织来领导的。这个组织相当于斗争委员会，然而他并不采用这些名字，如印刷工会的减时运动委员会，树胶厂就以七个代表团名义之下按车间分七个组，并不成立什么触目的组织等等，因此斗争起来以后，就不但已经参加了群众团体的群众参加斗争，而常常能够因此保证了全厂全部的工人都参加斗争，甚至无组织的工人都参加了对斗争的领导工作（如树胶厂）。又如在斗争中，及斗争后对工人的组织工作——在斗争中要使每个工人都觉得他自己在工作着，觉得他自己是在参加了这个斗争，这是非常需要的。如在中华书局的斗争中，我们把工人按宿居分了组，经常进行讨论与教育的工作。在斗争后发展与整理群众团体也是非常必要的。对于这一点可以说我们已有初步的认识。又如在斗争中对于外边的援助力量的组织，必须使各方面的工作和这个斗争配合起来。

但又不露出相互之间的痕迹。如绝食罢工时，我们发动外
界的慰劳运动，如对三汉奸罢工工人的募捐救济运动。又
如美孚油仓的工人反日罢工时从外界动员去的宣传鼓动，
与阻止其他临时工往上工。又如保安防毒面具工厂男工绝
食后，我们就组织女工的罢工来响应等。

第二，是我们对于斗争的技术上，也有一点进步了，
如运用了比较复杂的斗争形式。如在中华书局采用绝食罢
工，如在香港树胶厂采用静坐罢工，如在保安公司的斗争
中我们反对采取绝食罢工的方式，我们跪着要那些自发斗
争的工人吃东西，他们死也不肯（结果真的饿死人了），
如把保安公司死难工人的出殡行列组织起为抬棺巡行，如
在印刷工人（全港三千人）的减时运动中自动执行新的作
息时间，提出吃茶去的口号，于星期六下午动员了全部工
人离厂到茶馆里去这种变相的罢工，又如充分的利用资产
阶级法律上的矛盾进行合法的斗争，如印刷工人的减时运
动硬是打了九个月的官司，如黄色车夫的反对加租的斗争
打了四个月的官司。

第三，对于上层工作与下层工作的配合，合法斗争与
非法斗争的配合，合法团体与非法斗争的关系等等，都有
了比较正确的了解与运用了。我们无论领导任何的非法斗
争都一方面积极于进行合法的调解，如中华书局绝食罢工
时，我们推动了一些牧师神父来讲：“这是不合于基督精
神的。”推动了香港最著名的绅士大律师（英国人）警告
香港总督“如不迅速解决，真的饿死了人，我就和你到伦敦
打官司去！”如中华书局第三次斗争时，我们利用了商务
印书馆和中华书局的矛盾要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王云五签字

在我们的请愿书上同情我们的斗争，利用江浙同乡的关系要张一麟出来调解，要杜月笙来调解，官司打到国民政府去。如各个斗争时工会都是站在第三者的态度来调解，而不是自己站在非法地位。如在印刷工人的减时运动时，工会斯斯文文的在上面打官司，却在下面动员了一百五十多个工厂向工会提出改善生活的积极要求书，并且在下层开始了怠工，甚至打人、罢工，然而工会始终不失其合法地位。

第四，对于不脱离群众和群众在一起的了解也是有了的。如对保安公司的斗争，当我们不能说服工人停止采用绝食的方式时，亦只好坚决的和他们在一起，又如一九三九年七月报馆工人在托匪马超凡煽动下罢工时，马超凡鼓动他们来打珠江报（有党领导的属于印刷工会的）工人时，党却领导了珠江报的工人和一般的报馆工人一致地罢工了，并且表现得最坚决（采用绝食的办法），于两天内获得了完全的胜利。这一方面是教育了那些落后的工人，另一方面也团结了他们。经过这次斗争后他们几乎完全离开托匪的影响了。

群众的经济斗争将往前继续发展下去，已经是不可否认的客观事实（一方面由于资产阶级的剥削压迫的加紧，另一方面则由于很多群众已经从斗争里提高了觉悟程度），然而目前我们对于工人经济斗争的领导工作上仍然存在着严重的弱点，即：

（1）在许多干部特别是中华书局的干部中已经形成了左倾的、轻敌的、不肯妥协的倾向。如这一次中华书局一千二百人被解雇的斗争，就因为我们的一些干部不肯及

时的妥协，〔以〕致把斗争拖长了。估计这种倾向会继续发展的，因为在斗争胜利时这些同志固然会因胜而骄，而失败时也可能因败而愤（冲动起来）的。

（2）我们在许多地方的组织工作，特别是在重工业的及非产业工人里面的组织工作是还很脆弱微小，应付不起更严重的斗争的。

（3）我们对于利用各种旧工会的工作做的非常差，因此缩小了我们在斗争中对于各种合法的利用的范围，同时也没有更大的可能去组织各方面的斗争，现在我们斗来斗去都是个印刷工会、余闲乐社，再斗多几回，大概这两个团体就会“寿终正寝”、“封之大吉”了。

我们来的时候（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市委决定对于经济斗争也可以说是对于工运的方针是：目前是准备力量长期埋伏的时期，不是决战的时期，主要是沉着的组织工作，而不是紧张的斗争工作，因此对于各种经济斗争可避免时尽量避免，不可避免时亦尽量采用合法方式。我们的原则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我们自己并不必去强制地组织各个斗争。

我认为这个方针是正确的。

6. 香港工人运动中的反托匪斗争

在香港，我们和托匪开始在工人运动上面的斗争，（是一九三八年初太古船坞的工人的反日罢工事件中，工人们因为拒绝修理日本船浅间丸号而罢工了，托匪用第四国际中国支部华南区总部的名义在厂里贴了传单，这传单的内容大约是煽动工人拒绝修理日船，同时指出英帝国主义

(厂方)和日帝国主义是互相勾结的，号召工人要坚决和资本家(厂方)斗争等等。这里面的阴谋，是企图把工人反日的斗争转变为反英斗争。当时我党在太古船坞尚未有同志，只有个别的关系，我们就通过这个关系，和托匪在工人中展开斗争。我们要工人把斗争只放在拒绝修理日本船，厂里其他的工作我们还是要做的，斗争的对象不是一般的厂方而是他们修理日本船这一件事。工人们其实也没有因托匪的煽动而举行了反英的总罢工(拒绝做其他工作)。结果，厂方取消了修理日本船的合约，日本船拖到海中去，另从湾仔托包工头等等(闻即是太古船坞托匪介绍的)，代请了二百多个临时工人到船上修理，那些工人不知道修的是日本船，上了船去。托匪就在太古船坞鼓动几百工人到码头上等他们(船上工人)回来，说他们破坏罢工，是汉奸，要打架。后来我们向工人解释这些人是被骗的，不是真正的汉奸，我们要联络他们罢工，不应当和他们对立打架，结果没有打架，而船上的工人上了船一看见是日本船，也自动不肯工作回来了。

这是我们和托匪在工运上斗争的开始。

托匪马超凡在印刷工人中本来是有点历史的(他以前是全国印总的副委员长)，在建立印刷工会的时候，他和我们一个同志吕良竞争(这个同志是新从安南回来几个月，在香港工人中没有什么历史的，马超凡在港被恢复党籍曾经和他编在一个支部，后来马被开除了。因此马知道他是党员)，结果却是吕同志以最多票数当选为文书部(等于主席)。我们并在印刷工会的常委执委中发展了何子祥等七个同志，印刷工会的领导机关都给我们把持了，

马没有办法活动。

马就在工人里散播说现在工会领导机关的组织不成，要设委员长制，鼓动工人要求改委员长制度，不过相信马的话的人不多，马在执监财委会把这种主张提出来，结果否决了。〔执监财委会〕并且向工人们解释，问题不在于什么制度，而是在于这个领导机关是否能够工作，不站在工作观点上提议改委员长制的，只是企图个人的地位，这个问题就被打下去了。

马就利用工会常委的一个叫关柱的亏空公款的事来攻击工会，说工会贪污腐化，应该改组。我们就向工人解释，承认关柱事件是工会工作中的缺点，然而要求工人认识关柱事件只是他个人问题，要求工人仍然拥护工会。

这时候工会做了一些募捐工作，马就对工人说工会不顾工人生活，后来我们在一九三八年六月的第二次代表大会里就通过了改善生活的方针，并跟着组织减时运动委员会，进行合法的交涉打官司，工人们就说，工会已经在做了，我们要看结果如何。

马见在印刷工人中不大能活动，他就离开香港两三个月到广州印刷工会去活动，结果又受到广州印刷工会反对，广州失守前他又来港，就进行组织肉行工会（屠夫的行会），他向印刷工会借会址开会，印刷工会因为他们还没有弄好合法的开会手续（呈报），不肯借给，马就煽动了率领了几十个屠夫到印刷工会打架，在工会吵闹了一顿。事后，工会就以破坏会章，捣乱工会等名义把马开除了会籍。

这个开除工作做得不好，没有指出他一贯破坏工会分

裂工人的罪行，结果引起了一部分工人的不满（主要是报馆工人），因为马以前是报馆工头，他就向报馆工人说：

“印刷工会排斥我们报馆工人，现在我们报馆工友一个常委也没有了，我们要改组工会。”他就召集了一次临时代表大会，每个到会的发给五毛钱车资。这个大会大约到了一百多个报馆工人，他们就是通过否认印刷工会现任执监财委的决议，通过由马等来改组印刷工会。

印刷工会动员了一百多个支部（厂），发表宣言否认他们临时代表大会的决议，号召参加临代会的工人团结拥护工会，并发动被马等伪选签名参加了他们的支部否认，指出马的捏造。马就和印刷工会的西人顾问科士文（据说是英国工党）带了二三十人来印刷工会抢印信，打算强行接收，印刷工会就把法律顾问孖士律师（英国人）请来拉他们到劳工司讲话，劳工司否认马的临时代表大会的合法地位，并对马说：“你要组织工会就自己另组织一个，何必要和印刷工会抢夺呢？”

事后马就自己组织印刷总工会，大约有三四百个报馆工友参加了。

印刷工会合法的改善生活的官司打胜了（九小时工作及八块钱膳宿费等），印刷工会号召全港工人自动执行九小时工作制，但马却向报馆工人说，我们要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等英国劳工大臣来港时我们就有办法了，后来又等吴铁城来调解时我们就胜利了。他们用印刷总工会名义向报馆资方提出要求八小时工作及十二元的膳宿费，资方不答复，工人不断的迫马去交涉，印刷总工会连续向资方提出过三次最后警告，说如果不答应就罢工了，资方

也不答复，到七月八日，华字日报的工人首先罢工了，以后就全港的报馆工人除了星岛、大公、国民及三汉奸报之外，全部罢工了，罢工的约四五百人。

我们为了争取团结报馆工人，因此在我们自己有支部的珠江日报也举行了罢工，而且采用了绝食的方式，并且由印刷工会负责向厂方交涉、抗议，印刷工会向全体工人发出宣言同情与援助他们的罢工，发动各厂工人去慰问华字报绝食的工人，并且向香港政府提出抗议，要政府立刻解决这个纠纷，要厂方接纳工人的要求。印刷工会准备召集罢工工人的会议时，马超凡忽然以一个紧急通知把二百多工人骗到九龙去，说是要去开会，结果罢工延长了八天。港政府曾经拘捕过马，但立刻又释放了，以后马就不见了踪迹，也不到印刷总工会，这个斗争完全没有人负责去交涉，除了珠江日报外，全部失败复工了。

马在这个斗争中发了两个匿名的传单，第一个说是共产党要煽动工人总罢工了，第二个是斗争失败后说斗争被共产党出卖了，印刷工会就是共产党把持的工会。

在珠江日报的斗争获得胜利时，他煽动另一些罢工工人（里面还请来了十多个流氓）来珠江日报打架，珠江日报工人设法避开了并向他们解释，应该向资本家争取斗争的胜利而不应该因为个别的斗争胜利了反而破坏自己的团结，结果没有打起来。

报馆工人不但八小时工作没有争取得，就是连印刷工会已经取得了的九小时工作制也没有办法实行了。工人们对于马超凡就失了信仰，在斗争中也体验到印刷工会并不如马超凡所说如何破坏他们。因此对印刷工会好感起来，就

有约二百人退出了印刷总工会，印刷总工会只剩下一百多个会员了。印刷工会派出人去和他们联络，要他们参加印刷工会，这个工作在进行中。

南华、天演、自由三汉奸报工人反汪罢工后，马经过陈星源向吴铁城领到了一千多块钱救济费，他自己吞没了一半，每个工人分了半个月工钱就不管了。他自己住在大中华酒店写〔惬〕意地享乐，工人们却日则在街头流荡，晚上在文化中学睡地板，工人们明白了国民党及马等所谓救济援助原来是如此。马对罢工工人说：“不怕，现在中华书局厂方准备请你们去做工了。”（其时中华书局刚刚解雇了一千二百个工人），过几天又对工人说：“中华书局被解雇工人往南华、天演、自由三报做工去了。”想煽动三报工人对中华书局工人的仇视。

可是，事实上往南华报做工的，不是别人，而正是他们印刷总工会的主要分子，一个常务委员和几个工头，南华日报是在他们的帮助下复版了。于是，印刷总工会在工人中完全失了信仰。现在所剩下的会员，也并不是马的死党，而是华字报、循环报等几个报的工人，因为这几个报的工头是印刷总工会的支柱，工人不参加总工会就会被停生意，甚至被打，因此不能不参加的。

马在肉行工会兼做书记，后来我们在肉行工会里发展了两个同志，指出马是托匪，又因为马贪污，就把马滚出去了，肉行工会里马已经不能活动。

马曾经在洋务工人里发起组织酒店工会及餐室工会，他把一个俱乐部约一百人改组为餐室工会，至于酒店工会则未组织成功，因为洋务工会在洋务工人中威信很高，马

在里面又不像在印刷工人中有历史有基础，因此他提不出什么名堂来。

在侨工息影社（三合会支部）托匪方才曾经取得了书记的位置，现在已经被我们活动把他撤职了，他在里面现在没有什么信仰，大概马超凡等也不失相信他，因为他在一九三七年还参加过党，而现在他又没有做出了什么成绩，他似乎很苦闷，找到一些党的同志，要求党给他领导。此外如在小贩工会的旺角分会，我们的一个同志做副主席，托匪商隽明做书记，这个地方是要斗起来的，但现在还没有爆发，因为这个团体是新组织的，我们在里面还没有很稳固的地位，他还不知道我们这个同志是什么人。

至于在理发工会，在万总工会（建筑行会）我们都没有人，还没有和他们斗争起来。在洋务工会，我们开除了托匪邓克，在余闲乐社开除了托匪何人魂。在和托匪这些斗争中，使我们有这样的认识：（1）托匪在工人运动中的主要任务是分裂工人的团结，他们用各种方法来达到这种目的。如：a. 他们在太古船坞工人中就煽动船坞工人去打浅间丸轮船上的修船工人，这种挑拨是在所谓打汉奸的口号下进行的。b. 他们在三汉奸报工人罢工的时候就说中华书局厂方要聘请罢工工人去做工，又说中华书局被解雇工人到三汉奸报做工去了。这种挑拨是在“中华书局资方如何明白民族大义，劳方如何无耻该被解雇”等原则下进行的，虽然嘴巴里没有明白说出来。c. 他们在报馆工人罢工时煽动罢工工人去殴打已经取得胜利（厂方妥协了）的珠江报工人，说他们

这种单独的解决是破坏全体工人的罢工的，这种挑拨是在“全体工人统一行动”的口号下进行的。如在理发工会里，他们规定了增加价目，全体参加理发工会的商店都加价了，没有参加这个工会的女理发室（他们根本就不需要她们参加）没有同样加价，他们就煽动男工人去打女工人，捣毁女理发室，结果女理发室请了打手来保护营业，这种挑拨是在所谓“女工破坏男工利益”等口号下进行的。

他们利用行会观念组织各种对立的组织，如利用报馆工人组织印刷总工会和印刷工会对立，利用餐室酒店工人组织餐室工会和酒店工会和洋务工会对立等等。

托匪在这些挑拨工作上有着相当研究，有时进行得相当巧妙，真的能够把群众动员起来的。

对于这一点的了解，我们有个别的同志还是了解得不够，如我们有些同志主张聘请拳师，只学武艺自卫（印刷工会），或者主张用警察力量来压迫他们，这些都是危险的做法，对托匪有利的。

(2) 他们的组织工作主要的是要把资本家和工人组织在一起，消灭了工人组织的阶级独立性。如他们的理发工会、肉行工会、派报行情公会都是劳资混合的组织，却挂起工会的招牌，摆起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面孔，资本家们在这里用一些“好心人”的手段麻痹工人阶级的警觉性，用团结合作等行会观念来麻痹工人阶级的斗争性。

(3) 有时候他们也进行所谓改善生活——在所谓劳资合作之下的改善生活。如理发工会的增加价目，如派报行情公会规定卖剩了的报纸不准贱价发卖等，实际是把工人的斗争对象向着一些顾客，使工人忘记了资本家的罪

惡，而且在实际上是给予了资本家以更大的利潤。如理发工人的工资是依营业所得和资本家依百分比分的，一般都是工人三成，资本家七成，这个比率不变更，营业价格增加了，只会给资本家增加了更大的收入，资本家可以从工人方面榨取更大的利潤，而工人所得的不过稍为增加一点罢了。

我们过去没有很好的研究过这些对策，没有从本质上来了了解托匪这些政策的实际内容，因此不能更切实地向工人指出他们这些欺騙，因此在这一点上我们和他们的斗争是没有成绩的，托匪也因为这一点的成功，在理发工会拥有最多的群众（七百人），而且是受骗最深的。

然而对于这一方面的活动，是要受客观限制的，在产业工人里，这种改善生活的办法是完全行不通的，如在报馆工人里面，结果就只能掀起了激烈的尖锐的劳资斗争。

(4) 托匪不只是直接和日寇和国民党的反共派有密切关系，而且他们的行动还是直接受资本家的指挥和策划的。如在反对印刷工会的运动中，香港最大的印刷厂之一东亚印刷厂就给了马超凡一千块钱活动费。因此不要相信托匪会真的发动任何反对资本家的经济斗争（除了一些带有政治作用的斗争之外），而且他绝对不会使这些斗争胜利。也许他为了这个资产阶级和另一个资产阶级的矛盾，和发动一些帮闲性质的斗争的，但这种现象很少。我们的一些同志不明白这一点，因此常为托匪的什么改善生活呀，革命命令罢工呀等等吓昏了，以为这些真的是他们干的，弄得自己“无所措手足”。假使托匪真的会来干这一套，那么当然是件很麻烦的事，可是我们要清楚这

是不会有的事，这些斗争还是共产党才能领导的，不要怕托匪会抢去了你的领导权（如印刷工会几个同志都有这种胆怯）。

（5）然而也必须戒备，他们的在政治作用下也可能发动经济罢工。如报馆工人的罢工应该是可以说有这些政治作用的，罢工的时间恰恰是在“七·七”纪念后的第一天，有许多重要的纪念文章还没有登完。又，可能托匪（应该说是汪派）是利用这些斗争使一些动摇的报馆更容易就范。又，这一次罢工就只有三间汉奸报和吴铁城的国民日报，国民党的大公报事先答应了工人要求，工人没有罢工，然而工人斗争失败后他们也就不履行那些答应的要求了。

我们没有了解到这一点，因此事先没有很好的准备，没有向工人及资方指出托匪这一阴谋，而只是简单地以为马超凡不会发动这个斗争的，以为这个斗争是完全自发性质的（当然也有部分是自发性质的）。因此没有能够更好地解决这个斗争，使这个斗争能够全部迅速而又胜利的结束。虽然我们直接领导的珠江报的斗争的结束是迅速而又完全胜利的。

（6）目前托匪非常注意于三合会等行帮的、封建的组织的工作。在这些组织托匪并不怎样暴露面目，不反对抗战也不公开反共，而是企图以吹捧巴结等手段取得领导地位或领导的作用，有是他们的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办法，我们过去在这一点上的认识不够，因此我们在这些团体里的工作很少，在里面用各种方法（人事关系或以至封建关系或者因为这些托匪的贪污腐化招摇撞骗等）

来和他们的斗争更少，所有各种斗争都是太政治化，为落后的群众所不能接受与了解的。

这方面的工作如不注意，托匪的势力就会壮大起来。过去我们有这种观念，以为托匪那里能够在工人中有真正的基础，因此非常轻敌，不知他公开以托匪反共反抗战的面目出现时当然没有工人跟他走，而他用封建的、行帮的、落后的口号来号召工人时，工人会大批的盲目的跟他走了的，而且他并不放弃他那左的口号，（也许日本如果真的来进攻香港时，香港的托匪会在工人里号召组织苏维埃来无形中配合日寇的进攻也说不定的。

然而我们对于如何和托匪争夺落后的群众的工作是非常不注看的。在党领导的进步的团体如印刷工会等把托匪打退了并不算怎么一回事，而在落后的群众中把他打垮了才是真工夫，我们现在却还没有这种真工夫——主要是没有懂得这些才是真工夫。

(7) 托匪也利用群众的抗战的热情（左的倾向）来破坏我们所进行的合法的抗战工作。如托匪何人魂在余闲乐社办的救护队中提议把救护队改组为华侨回国杀敌义勇队，因为我们没有向群众清楚地解释了为什么不能用这样名义的政治意义，因此群众不了解，有六七十个群众被何人魂拉走组织华侨回国杀敌义勇队去了，虽然以后华侨回国杀敌义勇队里也因为我们的反对活动而解体，然而托匪却已起了他的破坏作用。

又如托匪马超凡攻击印刷工会的卖花筹款等救亡运动说：杀鬼嘿，人我不见得卖几朵花就可以救国的，有本领的回国投军去。这些也是足以破坏我们的工作的进行的。而

我们一向不注意教育群众从政治上了解这些工作的意义与了解采取这种工作方法方式之必要。

(8) 在香港这样的政治环境中，不能对托匪施以法律上的制裁；甚至不能公开说是反对托匪，因此和托匪斗争，绝不是把他从我们活动的团体开除出去便算了事，假如他在群众中仍有威信，仍能活动，开除出去他还是继续他的工作甚至更有害处。如印刷工会开除马超凡，余闲乐社开除何人魂，结果都给他带走了一部分群众，以后费九牛二虎之力还争不回来，这真是大损失。因此必须使群众在政治上或者“人事上”都完全认识了这个托匪要不得时，才坚决的清洗了他，完全经过群众的同意与群众的执行。

(9) 用金钱收买群众也已经成为托匪活动的主要手段之一。如参加印刷工会临时代表大会的每人发洋五角，印刷总工会里面设鸦片烟局招待工人，参加他的活动的每天给洋两角等等。我们过去没有抓紧这点不断警惕工人，也是我们工作的弱点。

我们在香港几年来和托派的斗争是很频繁的，无论在文化界、学生界、职工运动等方面都有，然而都是一起一落的进行着，特别是马超凡这个败军之将，确实是不断的卷土重来，这一方面是由于客观的政治环境有利于托匪的活动。托匪有较长的工作历史，有较主要的机关（华南区总部），在此，而且有一些确实是比较有本领的活动分子（主要的是党的叛徒），有日寇、汪派、国民党的反共派的直接支持，有资本家的直接支持等等。然而另一方面也由于我们不了解上述的几个特点，不解知己知彼，对党员

没有深入的反托教育，这些教育不是流于纯粹理论化，就是流于纯粹的实际化，只讲如何去斗法，或只讲他们的不断革命论如何要不得，而没有很深刻的从托匪的实际活动中来了解他们的策略，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不是采取进攻的姿态，而是采取应战的姿态，因此不能更彻底地肃清托匪在群众中的影响。

关于和托匪的斗争，在香港我们是还没有“理论地”总结过的，所谓总结只是“已经把他们打垮了”、“还没有打死”之类，加以目前的同志一般地还非常缺乏和托匪斗争的经验（和国民党的公开的斗争的经验要丰富一些），因此就更做不出更大的成绩。

又托匪现在已开始采用恐怖手段来对付我们的工运干部了，如买凶手企图暗杀洋务工会的何潮同志及印刷工会的何子祥同志等。所有这些，都是我们应该注意的。

7. 关于女工工作

香港有约十八万的女工，其中产业工人占八万，非产业工人约占十万。在产业工人中，主要地是纺织工人，约占四万至五万，其实是树胶、烟草、食品、日用品等工业，在印刷工业上有几百人。非产业工人主要的为佣妇，约三万人，苦力（搬运、打石、挑泥等）工人约二万五千人，店员约二千人，家庭手工业及各种手工业者约四万人。

在产业工人中占总数百分之三十一，在非产业工人中约占百分之三十三。在全香港工人总数中约占百分之三十三。

在香港，妇女参加劳动的比率是相当高的，而且历史

也是相当长久的，所参加的部门也很广的，很繁重的，如码头工人、苦力工人、打石工人，甚至锯木工人、铜铁器工人，以至各种家庭手工业。

女工的工资一般地是比男工的工资低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如印刷工业（中华商务等大厂）男工一般的是二十四元，女工一般的是十八元。如纺织工业，男工一般的是十六、七元，而女工一般的则是八元——十元。（女工的工作时间和男工一样。香港政府曾经规定女工不得在下午八时以后工作，然而许多工厂，如食品工厂常开夜工至第二天早上五六时，纺织工厂也常常如此。

所有的产业女工，常常是件工，因此工人们常为着追逐工资而拼命工作着，工人们常不能有一定的收入，而每天总得回厂里去等工做，有时候一天也赚不到一个铜板。

一般地说，香港的女工有下列几个特点：

（1）她们有相当的独立性，有自信力，她们进行着繁重的劳动工作，在这些工作上表现了她们并不亚于男子，她们忍着痛苦，却不肯依靠别人，她们自己有相当的自负自信，她们之间有相当的互助联络，如所有全部的佣妇部有了自己的十姊妹团、拜金兰等组织，在纺织女工中有七姐会，及其他一般女工中有女屋（女宿舍）等组织。在女工和女工之间一般的是很亲切的，而且有一种无形中的女工们团结起来的精神的。这种原因是由于他们在社会上的劳动地位养成的，如这些女工特别是佣妇中有很多是来自顺德县崩溃了的丝织手工业工场来的，在这些手工业里，女工们已进行了自己的独立生活数百年，在这些女工里有非常普遍的风俗——不嫁。所谓拜金兰、十姊妹就是

这种独身主义者的畸形组织，又如未嫁的青年女工的七姐会，也是部分的带有这种意味的。

这个特点使近年来香港的女工运动常常在某一方面进行得比男工工作更为活跃，“自成一家”，而且也常有了一些独造的成绩。在女工同志中能够在短时间内发现与提拔了一些有能力的干部，

(2) 然而她们却不象香港的男工一样有深长的革命历史与传统，过去的香港党的女工工作是比较薄弱的。香港的女工没有过海员大罢工，在省港大罢工时的作用也不很大，以后也不象男工一样有不断的党的工作，因此在今天香港女工中找不到老的干部，没有老的团体，没有很多经验，比起男工来，这支军队是新编的，然而同时也是常常能够表示着她们更多的朝气的。这是她们的一个弱点，在这个弱点之中又还带着一些优点——更多的朝气。

(3) 在她们之中从来很少党派活动，因此她们是纯洁的，是一向在党领导之下工作的，是很少行帮性的。从工人工作上看来，香港党对女工工作的注意还是不够的，因为今天香港党的男工方面的组织远超过妇女，无论在党员数量及群众团体都一样。然而从妇女工作这方面看起来，则香港党对女工的工作是比对其他妇女的工作注意得多了。一九三六年底，党就把当时仅有的四个女学生党员中三人分配去做女工工作，而且分配了她们里面一个人进工厂里做工，从这时候起，党就在女工工作中生了根。首先，所有的女工还只组织于个别的一般团体及夜学里，到

一九三七年夏，就独立组织了七姐会（姊妹团），一九三七年底就组织了妇女协竞社，组织专门做女工教育工作的九龙妇女教育服务团，一九三八年年初就在印刷、洋务两个工会、余闲乐社、晨钟体育社、惠阳青年会等团体都设立了妇女部，妇女工作就更有规则地扩大起来了。

一九三八年的一年是女工工作最活跃的一年。在“五·一”节的时候，晨钟体育社妇女部办的女工夜学，曾经以恩亲会的名义在北河戏院开了一个二千人的群众大会，由三十六间工厂派出了代表组织了代表团，整个会场的领导布置与关于注册备案上下层的交涉等等完全是女工自己主持的，这样的女工群众大会在香港是第一次。

这一年旧历七月七日，深水埗的和九龙城女工七姐会（姊妹团）把自己的七夕会作为“七·七”纪念会，争取了大半的工厂部放了假或特许告假（因为七夕是乞巧节，资本家就不在意了），在深水埗召开了五百人的群众大会，在九龙城召开了一千五百人的群众大会。

在义卖运动中，总统织造厂的女工首先组织了义卖运动，以后就把义卖运动扩大起来，在义卖运动结束后的“送数”的巡行中，在一万余人的巡行的行列中，女工大约占了六七千以上。

在“九·一八”纪念节、双十节，深水埗的女工都召集了一、二千人的群众大会。女工的行动真给社会以莫大的影响，在香港，自从省港大罢工后，这样大的群众大会是从来没有开过的。然而现在却居然由一些女孩子们自己主持起来了。当时在女工中就产生了著名的群众领袖，在深水埗有陈达英同志，是一个大约有二、三万女工都

认识她的一个做了十年工的树胶厂工人，在这十年中她在三十多个工厂做过工，结识了很多很多的女工，未入党以前她就成为深水埗的女工的群众最拥护的领袖。

黄阳风同志、李洁珍同志和陈述英同志都是大行树胶厂的工人。

冯女修同志是南针电筒厂的女工。

在九龙城区则有邓俭、邓清两个同志，都是大同罐头厂的女工。

当时在表面上看起来，女工运动是要比男工的工作更紧张活跃的。

在广州失守后的动员工作中，女工同志大约被动员了三分之一，大部分的活动分子都被动员走了，特别是一些群众领袖的被调走大大影响了工作，如深水埗区的陈述英、黄阳风、李洁珍三个同志，如棉艺织造厂的陈曙晖同志、冯美坤同志，如印刷工会妇女部长孙兰同志等等，都被调走了。因此女工工作几乎一蹶不振，特别是深水埗区的工作始终未被恢复元气。在党内对妇女工作的领导也削弱了，陈述英、黄阳风、李洁珍三个同志都是市委的妇委委员，她们走了以后，妇委曾经“关门大吉”几个月。

然而由于女工工作一向是比较深入的，因此我们仍然能够拥有相当的群众，如一九三九年在何香凝、宋庆龄主持下的“三八节”纪念大会，全港四个纪念会场有群众三万人，这里大约有七千以上是女工。在深水埗区，因为会场里已经挤了三千人，而门外还挤满了告假来开会的女工，工油涌的要求，没有办法只得于退几天后再为这些女工

补开一次联欢会，从这些事实可见香港的女工是容易动员的，和党的联系还是很密切的。

曾莲芳同志领导了香港树胶厂工人（约有一千女工）的罢工，使她成这千余工人中的公认的领袖。在洋务工会妇女部的工作中也逐渐培养出八百洋务女工的领袖洗风来同志和叶洁同志了。只是印刷工会妇女部的工作自孙兰同志离开后就一蹶不振地没有办法恢复起来，直至最近才在中华书局的女工中有了群众组织并发展了党。

统计现在在各个工会各个团体妇女部及各个团体各个夜学中组织起来的女工约计三千三百人。在香港就几乎只有我们这一点点的女工工作了。此外，在基督教女青年会的夜学里有约四五百人。

目前的女工工作是逐渐恢复元气自气了。一九三九年上半年经济斗争中，如香港树胶厂工人的罢工（女工一千），如保安防毒面具工厂的工人罢工（女工二百余人），如中华书局反对解雇一千二百个工人的斗争（女工七八十人），女工都表现了积极勇敢和男工站在一起，而在香港树胶厂，则全部的斗争几乎完全是女工组织与领导的。

这几年来来的女工工作，亦表现了她的特点与特殊的经验教训（1）她是以独立的姿态出现的，就算她们只附属于一团体，然而她是带独立性地活动着，在许多场合她们的活动常比较她所附属的一般的团体更大。如晨钟体育社有社员二百人，妇女占一百四十人，而妇女部之下还办了女工夜学约二百人，还组织了姊妹团约三百人，开了几次

一千人——二千人的群众大会，发动组织了义买运动等等。又如她们组织与领导一二千人的群众大会，一点也不假手他人。又如她们办的夜学，校长教员都是自力更生的，陈达英、黄阳风、李洁珍、邓俭、邓清等同志都是女工夜学的校长或教员。

这种现象一方面表现了香港女工本质上的特点——有独立性与富于自信力，表现了他们在参加社会劳动上的独立地位，然而另一方面却也养成了一种偏向，就是：女工工作者就只看到女工工作，女工的工作和上层妇女以至女学生的工作的联系是很少的，不去利用女青年会的社会服务工作来开展女工的大规模的教育工作，而只是自己来当校长，当教员，自己去筹钱，半秘密半公开地来办一二百人的夜学。不去吸收大批的知识分子女学生来参加女工工作，而偏偏要“自力更生”，只念过几年书的陈达英、黄阳风等同志就居然当起校长来了，这自然只有吃苦不堪、事倍功半。

(2) 她们是可以很快的而且很明显地产生了群众领袖，而且这个群众领袖在她们之间是能够起最大的作用的。这种群众领袖的产生，大概不外：①在她们中间待人接物很好，能帮助人家，能排难解纷，能解答一些疑问，如职业、婚姻、家庭、水蒸汽、日月星辰、日本有多大、汪精卫是个什么家伙、哪个厂好、哪个厂坏等等；②领导她们进行政治的（如反对用日本原料、反对吞没救国献金）与经济的斗争的；③在女工夜学里面的校长和教员；④在救亡工作中特别卖力的分子。她们可以很快的拥护出一个群众领袖，很坚决地接受

这个领袖的领导，他们是很简单的，没有什么狐疑的，说干就干，只要你做领导的人干起来，她就毫无问题地跟着来。如曾莲芳同志在领导树胶厂工人大罢工时，她手一举（一个暗号），几千多工人就立刻完全停工。又如陈达英同志在深水埗的女工夜学里，女工们只要听到“英姐”来教书就不肯不上学了。

因为领袖在群众中的作用很大，因此对群众的动员，只要找到了她们的领袖就非常容易，因此我们有了几个群众领袖就能够在短时间内，在虽然没有什么经验与组织的传统下，却能做出了一些特别广泛与活跃的工作。同样，当这些群众领袖一离后，工作就马上会受着很大的影响。

在这些一般是比较落后的与缺乏组织习惯的女工中，对这些群众的领导，关于群众领袖的培养提拔与保存是一个极大的问题，不能马上设想用如何如何深入的组织工作，用集体的领导来代替群众领袖的领导，这在将来是可能的，在今天它也是应该努力的方向，然而绝不能因此抹杀了群众领袖的伟大作用。

我们以前就是不明白这一点的，因此把群众领袖乱调走了，就影响到以后的工作。在环境更恶劣，许多公开的组织成为不可能的时候，培养与准备这些群众领袖，将有更重要的意义。

(3) 在女工工作中，可以说只有我们的影响，因此女工的思想的纯洁与其左倾情绪是很坚决的。我们没有在女工中听到一句反共的言论（在男工中是有的），没有发现过托派的活动，也没有发现过国民党的活动，在我们过

去发展的约一百个女工党员中，除了一个洋务工人外，未发现一个组织观念很不好的分子。因此在女工中加强其阶级教育，大胆地发展党员是非常必要而且是可能的。我们过去没有看清楚这一点，因此这个不够格，那个有点家庭观念，看来看去看不让一个，在女工中的党的发展工作是相当关门的。

(4) 目前女工的第一个要求是减少对她们的特殊的压迫与剥削。如总统织造厂的女工提出的斗争的要求是增加大小便的时间与次数（厂方规定每天只准大小便两次，时间五分钟，而女工们特别是在月经期内尤其需要利用大便所的）。又如大同罐头厂女工要求和男工一样分过年津贴（红利）。如棉艺织造厂女工要求把午饭时间由四十五分钟延长到一小时等等。第三个要求是学习，是识字，是要知道一点时事。有些女工自己不会看报纸却天天花钱买报纸请人读给她听。在女工夜学里，一般的女工的学习是很努力的。第三个要求是要参加社会活动，要游行，要开会，要卖花筹款，要演戏（甚至自己编剧自己演），要交际自由，以至于一部分青年女工甚至要游行，要打球，要游泳等等。她们被禁锢得太久了，现在自己拱出了一条裂缝，就想大大地抖一下气。她们要向资产阶级社会里争取工人的地位，要向男性中心里争取女人的地位。近来，她们这种思想是逐渐成熟了的。谁管得我？她们已经开始有了这种神气。

我们过去对于她们这些要求没有系统地了解，因此在工作表现得一般化，很少为她们的特殊利益而斗争，没有更有计划地去发挥她们这种要求的精神。因此，我们就实

质上还没有做出了一些独立性的女工工作，有很多地方只是一般的工人工作，不过由女工来做吧〔罢〕了。

我以为今后的女工工作：

(1) 还是必须首先从教育工作上开始。目前，我们的女工教育工作还是非常狭隘的蛙〔固〕步自封的，今后必须更广泛的利用上层的、基督教的及一切知识妇女、女学生的关系，尽量扩大女工的教育工作，不要怕不晓得她们会教些什么，而是要怕女工不识字，不会看报纸，就不容易了解革命的道理（过去我们是怕前者而不怕后者的），只有从教育工作广泛开展起来的局面下，才有可能使更多的女工参加了社会的活动，才有可能使她们更广泛地和我们接触，才能更普遍地发现她们里面的积极分子，才能更掩蔽地、更长期地进行我们对女工的组织工作。

(2) 必须使女工工作成为妇女运动的一部分，必须使女工工作和一般的妇女解放运动、“改良运动”等等联系起来。过去我们是只知道把女工运动和工人运动和救亡运动联系起来，而不晓得把他和妇女运动主观地联系起来的，女工运动必须是妇女运动的一部分，过去的和女学生运动、上层妇女工作、知识妇女工作、妇女职业介绍、妇女教育、妇女卫生事业脱离等现象必须停止了。必须使女工运动成为妇女的一部分，才更容易吸收落后的广大的劳动妇女来参加，才能更切实地取得公开合法的活动地位，才能更灵活地运用各方面的力量来促成女工运动的进展，才能明确地掌握着女工工作的独立性，发挥其独立的作用。

(3) 必须在几个女工最多的产业部门建立广大的群

众组织。如纺织工业，如橡胶工业，如烟草工业，如食品工业，这些拥有最多女工的工业都没有工会（就是黄色工会也没有），现在应该着手在这些部门里进行建立工会或类似工会的团体，或者依靠几个主要的工厂建立广大的厂内组织，成为各该业的中心厂、中心组织。在这些组织里和男工采取一致的步骤，在这些组织里巩固了女工的斗争情绪与斗争的力量。只有在这些主要的产业部门里的女工组织起来了，全港女工的动员与掌握才有可能。过去我们是曾有这些想法的，然而没有向这方面努力的决心与具体办法，因为这个工作是比较组织个海员工便还困难十倍的。

（4）必须注意女工的特殊要求（经济的与社会的），而且具体地帮助她们解决这些要求。女工始终是女工，女工运动并不完全等于工人运动。这些要求哪怕只是很少的，很平凡的，然而每一个要求的解决都必然使女工的斗争更向前一步，使整个女工运动向前一步。

（5）必须在党所能够领导的工人团体（有女工群众的）建立妇女部，推动一些黄色工会建立妇女部以便我们打进去工作。过去是没有一个工人团体注意过女工工作的，没有一个男工注意女工工作的，今后必须造成这样一种风气，大家都来争取自己底下的女工，各个工会注意去组织自己女工群众，只有在这种情况之下，女工才能够普遍地从无组织走向有组织，从和男工脱离的走向和男工密切联系的，才不至于闹成男工和女工长久的隔膜，甚至对立，中了托匪的奸计，闹出一些男工殴打女工的事件（如托匪陈文煽动理发男工打女工）。

这种风气是可能养成的，如目前洋务工会、印刷工

会、余闲乐社等团体都成立了妇女部了，如洋务工会，如酒楼茶室工会等都是可能推动他们建立的。

(6) 必须推动所有的上层的、宗教的、女学生的、文化界的团体建立对于劳动妇女的工作。一般的所谓社会服务、平民教育等工作，只有推动了这些各方面的力量，对女工工作的帮助，不管她是大的小的，才能使女工运动逐渐从各个小支流汇成一个大流，才能用更快的速度赶上这个时代的需要。

(7) 必须培养与保存一些女工工作的干部。过去的经验，从香港调到内地农村去或沦陷区去的女工同志常不能起很大的作用，那种浪费干部的办法必须停止了。要造成很多个群众领袖，要让这些领袖和群众更长久地在一块巩固她对群众的领导，靠这些群众领袖来团结千万的群众。现在已经太暴露的群众领袖（如邓俭、邓清两同志已被警察检查过她的家），不要继续锋头太露了，要造就一些新的活动分子。在烟草工业、纺织工业及橡胶工业中都要大量发展党员。在各个重要的工厂，如大行树胶厂、冯强树胶厂、南洋烟草公司、东方烟草公司，普遍建立了党的活动基础，长期打算，一步一步的在这些企业里去发现与培养群众干部。

香港的女工运动目前还只是个萌芽时期，然而这个运动是有前途的，她的进展会很〔迅〕速的，问题就是党的领导。过去由于我们对女工运动的经验的缺乏与对女工工作没有把它当作妇女运动与工人运动的交结来看，没有起应有的注意，至今工作进行得很慢。假如我目前的了解已经进了一步的话，那么我希望现在在香港工作的同志也能

够在这一年的实际工作中取得比我更深刻透彻的了解。

8. 关于职员工作

香港党是一向都没有注意于职员工作的，从来没有主观地要把职员工作当作工人运动的一部分。虽然在我们的工会中也组织了一些工头、职员，在我们的同志中间也有些是工头、职员，然而我们始终没有注意这个工作，没有专门讨论过职员工作的问题。在一些场合，如在一些工厂里，对于职员是作为统一战线的对象，而常常不是作为群众工作的对象的。

目前，香港党有一部分的职员工作，然而这一部分的职员工作是没有和职工运动取得联系的，甚至它是一向不属于职工部的领导范围，反而是划给青年部的领导范围的。因为我们觉得这些是知识分子，和工人运动好象不会有什么关系，这种观点充分的表现了我们在工人运动中的狭隘的孤立的关门的认识。

目前香港党的职员组织，只有业余联谊会、业余联谊会两个团体共有群众约七百五十人，都是银行的职员，文员协会（政府机关及洋行职员组织）里有三个同志在活动，但没有什么领导力。一九三九年五月文员协会曾进行过加薪的斗争，是用合法的交涉方式的，结果是胜利了。在这个斗争里我们只能说是参加了，最多也只能说是有点推动作用罢了，实质上没有什么领导力的。文员协会共有会员约五百人。在香港政府及洋行的职员，在本质上一一般是较坏的，民族意识较薄弱些，虽然进行了加薪的斗争，然而这些工人是软弱的，多少是带点奴性的。里面有少部

分可能比较好，然而中上层的一般是比较靠不住。

业余联谊会及业余联谊社的群众完全是银行的职员，前者是单纯由上海搬来的银行职员，里面还包括一些较高级的，后者包括了香港本身的与上海的两种，而且主要的是中下级的。在这两个团体里，群众的民族意识很好，积极热情，活动力也强，他们在一次募捐运动里，曾经为我们在东江的游击队募捐过三千块钱的款，而且派出慰劳队到东江慰劳。在组织生活上也很紧张，有时事座谈，有唱咏〔歌〕、戏剧、体育等组织，还出了每月一期的会刊。

党在这些组织里有了支部，党员表现得都很好，而且很有能力。

所谓职员工作，就只有上列一点点了。

今后的职员工作中心不应该只放在这些银行洋行及政府机关的群众里，而是主要地应放在一切工厂与大酒店如百货公司里，在目前香港的一切的工会旧组织多是给工头职员把持着的情况中，在物价不断腾涨，薪金日益低落，职员生活日益困难，很多由中等生活跌到上等生活的情况中，一方面是显示了职员工作的作用很大，另一方面则显示了职员必然会日渐提高其斗争性。

必须向香港的同志纠正过去忽视职员工作的错误了。

9. 三年来香港职工运动的总结

三年来香港党对于职工运动，基本上是建立了初步的基础了，或者说，在各方面都有了一些雏形了，这表现于：

(1) 它在党的组织上，准备了占香港全体党员百分

之八十以上的工人成份，这些党员分布于各种重要的工业部门，使党能够在各个重要的工业部门上都有了党和群众的联系。

(2) 它组织了二万人以上的工人群众，这些群众基本上是党所能掌握的，和党有了相当密切的联系。

(3) 它领导了反日的、反汉奸的、反托匪的与经济的各种斗争，在这些斗争中巩固了党与群众的联系，锻炼了党的组织与群众的组织，获得了与积聚了一些关于斗争的经验，基本上它是继承了香港工人的阶级的斗争经验与其优良传统的。

(4) 它培养与提拔了一批工人干部，与向内地输送了一批工人干部，这些干部在香港与内地，都足以加强党内无产阶级的部干与其意识。

因此，香港党能够在国际国内逆流的袭击中基本上保持了党和群众的联系，能够提高全体党员的阶级警惕性与斗争性，能够具备有可能更向前发展的工作基础。

目前，香港党的组织与群众运动都是应该而且可能向前发展的。

然而这些成绩都只能说是选作初步的基础而已，香港的职工运动并没有跟着政治形势的需要与可能性而大大发展起来，今天的工作还是狭小的很，根基还是薄弱得很，在六十万工人的都市里只组织了二万工人群众，这样看来我们是还没有力量足以领导全港工人的斗争的，还差得很远很远。

问题不是什么客观的困难，而主要的是我们主观上的错误。

首先，是主要的由于我们在整个工人运动的三年来及各方面的工作，不但在作风上而且在认识上也还是左倾关门主义的，没有大胆的去发展成千成百的工人积极分子入党，没有大胆地去组织落后群众，没有依照统一战线的原则在各种场合去争取资产阶级与黄色工会工头的调协与合作（几乎完全是只有斗争没有团结的），所有我们领导的工人组织几乎都是太政治化了的，甚至在三合会里也自称为“革命分子”而形成一“革命分子”帮。在这里，不能因香港党这几年来利用公开合法的工作方法方式上的某一种成功，便以为香港党没有这种关门主义的作风了。这种作风表面上看来是没有了，然而因为在认识上有不够的地方，特别是对于既须斗争又须团结这一点上完全没有具体的了解，因此所有的工作就不能不实质上是关门主义的。

其次，因此我们就完全没有具体地严重地去进行过黄色工会与落后团体的工作，企图组织香港总工会的时候的拉拢联络并不足以说明我们曾经真心的注意过这些工作了，在我们自己领导的团体里，在整个香港的社会里是如此明显地自成一家，完全不去和落后的团体进行统一战线的工作，有个别的老工会一有了我们同志的活动（如摩托车研究总工会）马上就“红”起来了，不屑与以前的朋友们为伍了，这种“出类拔萃的”气概，不只表现于工人团体，而且表现于我们做工运的每个干部。

因此，我们在三合会里没有工作基础（目前的一点点工作也还只是建筑在里面的部分进步群众上面，而不是建筑在落后群众上面的），在黄色工会里没有基础，因此，

在四十万有组织的工人里，我们只在自己的两万人里面兜来兜去，而且也常常只在这两万人中最进步的几千人中做工夫。这种作法不改变，香港的工运的发展就饱和了，假如目前几个团体都被封闭解散，那就苦死了。

目前，关于香港的职工运动，必须：

(1) 必须在领导机关以至每个同志认识香港的职工运动的重要性。目前在中国象香港这样有大量工人的都市，除了上海以外怕就没有了，必须〔使〕在香港工作的同志了解，香港职工运动对于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工人阶级的广大群众的联系有非常严重的意义的。这种意义，并不单纯如我们过去所想象与了解的，以为我们的任务是抓着一部分左倾群众，一旦香港有什么三长两短，就溜之大吉，带他们回国来打游击，组织些什么海员大队（过去我们在东江组织过这样名称的游击队）、码头工人大队等等，如此简单得可笑，而应该把自己的任务了解为对香港六十万工人的全盘切实组织与领导的任务，这是长期的、艰苦的、地下的工作，哪怕日本鬼子占领了香港，我们也坚持着这些工作。职工运动的主要任务，就是长期而且深入的控制着资产阶级这种生命线（大城市及其企业），以待时机，而不是离开这些据点去游击。

(2) 必须进行关于职工运动的理论教育（过去我们是没有这些教育的）。要从这些教育工作上使同志们克服左倾关门的观点，要从这些教育里使同志们了解党的统一战线在工人运动中的具体执行，要使香港做领导工作的同志了解这些问题，而且能够长期地对党员以至非党干部作关于这些问题的深入教育。

(3) 必须严重地进行三合会、黄色工会各种落后团体的工作。要把目前组织工作的中心放在这些工作上面，从目前的赤色团体里抽调干部到落后团体去工作，要一如以前抽调干部到内地打游击那样热烈。那样有决心。

(4) 必须根据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原则来领导各种斗争，尤其是可能继续往前发展的群众的经济斗争。要有计划地使这些斗争个别地落地进行，要使同志们了解现在不是向资产阶级总攻击及不断攻击的时候。

(5) 必须健全对职工运动的领导机关，健全职委会（在特委时间职委会只有一个很弱的干事，目前市委也只有一个职工干事，没有职委会）。职委会的同志同时兼任群众团体的主要工作的办法现在已经不容许了，应准备有党内领导职工运动的干部与群众团体干部两种工运干部，即要有公开的干部又要有秘密的干部。

(6) 现在的已经红了的工人团体要逐渐使他灰色起来。多做一些慈善、救济、社会服务等工作，多和黄色工会来往联络，红出了面的干部最好能够调走，如不能调走，亦不要让他天天继续出尽风头下去，致受无谓的打击。

(7) 在造船业、机器业、市政工业、纺织、烟草、树胶等轻工业中，用各种方法与十分的注意力去开展群众工作与发展党员，积极的发展党员。

以上总的原则，主要的是深入的、广泛的、落后工人群众中的、长期的组织工作。

(三)三年来香港青年工作

1. 抗战以前的香港青年

抗战以前香港政府的统治是非常严厉，人民绝对没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自由，十人以上的集会，就认为非法，只要你写上什么团结起来，运动的字样的文章，就没有希望发表，因此素被认为爱好活动的青年在香港是非常沉寂。

由于当局的提倡和当时社会的实际需要，一般青年学习英文的风气极盛，英文学校的开设是相当普遍，就算想入去一些重工业工厂里当学徒，如铁路、船坞等，也要读过三五个月的英文夜学才有办法。至于一般英文学校的学生，他们读书的目的是很明显的，就是想在毕业后能够够在政府、洋行、大商店里面找个职员的位置（大概最高的有二百元，一般的三十元，最低的有十八至二十元的薪水），还有那些买办阶级、资产阶级的子弟就是继承父业，过其愉悦的生活了。因此他们读书生活也是非常单调的，除了每天的死读书，读死书之外，就什么都不管，国家民族好象和他们没有关系一样，报纸当然也用不着去看，假如有空的时候，也乐得到外国电影院去凑凑热闹，作为模仿外国人生活的学习。课外读物是一些电影画报和外国恋爱小说等，一些英文学校里都附设部分的中文，如古文、左传、骈文、四书等，而且好多学生从十二、三岁就入英文学校的，所以那些英文中学毕业生除了能够胡诌“之乎者也”的古文外，一般的语体文杂志、报章是看不懂

的，而且他们也不屑去看，因此香港学生的思想是非常落后的。被认为比较活动的就是一些体育青年，他们参加了各式各样的体育会，在学校里他们也算是最活跃的部分，但是他们除了为着夺取锦标而外，别的也是什么都不管。因此香港青年很受国内青年的歧视，特别是广州青年，都称之为蕃薯仔，是从番书仔的字音得来的，是没有思想的意见。

蕃薯仔并不能代表香港青年，他们只是香港青年的少数，因为英文学校虽然普遍，但只能占全港中学三分之一，至于小学，英文的更加少了。大部分的中文学校的学生，由于他们都身受着和见眼着帝国主义者的压迫，心坎中早已蕴藏着忿怒民族情绪，他们都希望祖国能够早日得到自由解放。不过由于压力太大，这种情绪只能汇成一道伏流待机而发罢了，特别是那些失学的青年，要想继续升学，又没有负起这样昂贵的学费，要想找职业，那么随处都是红须绿眼的“势力范围”，偶一不慎就要饱尝外国“火腿”的滋味（红须绿眼用脚踢人就说送火腿给人吃），因此他们都是满腔的民族仇恨，只要能够给他一点可能，就要乘机爆发的。

“一二·九”以后，香港青年思想受了很大的影响，大众生活的销数突破以前一切刊物的纪录，在随便一个比较大的报摊中都可以买到。进步的书店也要扩充了，而它还增设了两间，巴金的小说得到部分学生的欢迎。“八一宣言”的传播，团结了部分的进步青年，香港青年的政治活动开始了，在当时的抗日救国会五百会员中，极大部分是青年工人，其他是青年学生（约五分之一），领导成份差不多

全是失学失业的青年知识分子。在它两个外围团体 课 余社，凡声社里面团结了差不多两百的青年学生、青年工人和青年女工，而领导成份都是一些青年学生。

但是香港青年虽然有了点进步，仍然远远的落后于国内广州青年，当全国的学生运动进行得非常热烈的时候，香港青年大部分的仍在安乐窝里憩睡着，这点说明了，（1）殖民地与半殖民地统治的区别；（2）英帝国主义文化政策的相当成功；（3）同时香港虽然是华南的一个政治经济的中心，但仍不是一个文化城市，与广州、上海仍有区别的。

2. 党的青年工作的建立与转变

抗日救国会建立于一九三六年五月间，至“九·一八”，因召集秘密群众纪念会而被破坏。它在青年工作的开辟起些什么作用呢？（1）宣传民族思想与统一战线，虽然范围是很狭小的，但是却做成了小部分的左倾青年；（2）在工作中教育与锻炼了自己的干部；（3）开始了青年的群众活动，建立与扩大的两个外围团体课余社，凡声社。因此抗救会的活动是准备了青年工作开展的初步基础。

抗教会解散后，不久以抗教会剩下来而坚持活动的一些学生干部为基础组织了香港学生救国会，成为香港各界救国联合会的一个单位，会员有七、八十人，都是在学的学生，每个会员都要过着严格的组织生活，每星期开会一次，会议中有政治报告，发展组织，学习讨论，工作讨论等，有两个外围组织课余社与学生生活社，学生生活社当

时只有几个人，在大众日报副刊出版学生生活周刊，没有什么群众活动的。各校里，还有两三间学校有些三、四十人的小组织，在那边做了一些旅行、壁报、读书等活动。后来张梅生派了几个干部想进行夺取群众的活动而要求入会，为着拒绝他们，于是在会章里增加了“为着保持学救会是真正的学生组织，以取得广大群众的信任，只有在校学生才得入会”。因此就引起了和他们——以应子真为首的斗争，虽然以后由我们作让步而结束了，但是或明或暗的门户之争是没有停止的。在此以后发展工作好象已经达到饱和的状态，工作也没有什么开展。因此学救会的组织是继承了抗救会的关门主义与宗派主义，重复了群众运动的秘密路线的错误的，但是在另一方面它却准备了以后公开工作的干部基础和群众基础，并给予党的建立的可能。

在一九三六年十月间党已发展了一个学生党员石昂同志（华侨中学学生）。学救建立以后，吴有恒同志就以南总代表名义出席学救会负责指导学救会工作，在那里发展了钟明同志和林剑鸿同志（前者是学救组织部，后者是宣传部），因此在十一月间就正式成立党的学生支部，以石昂同志为支书。从支部建立之日起就很注意组织观念和气节的教育，进行过纪念方志敏同志和讨论过他的遗书，这点给与当时同志很好的影响。整个支部的群众工作都放在学救会上面，同时也直接领导着两个外围团体。党派了吴有恒同志负责领导这个支部的工作。自此以后，就成为今后开展青年工作的核心。

西安事变以后抗战形势日渐形成，群众开始比较活跃，关在秘密圈子里的学救会工作没有怎样的开展，里面

工作的同志也感觉得苦闷，提不起劲。接到党的解散救国会的决定以后，就从事解散学救会的工作，意见提出后，得到大部分学救负责人的同意。但是，这个从秘密到公开的工作的转变，也必然的会受到应子真等的激烈反对，攻击我们是动摇，逃避工作，经过我们进行全面的说服，同时指出张梅生欺骗的真面目以后，才得争取了他们，脱离了张梅生的圈套而重归与我们合作。学救会解散后，在支部直接领导下，改组了课余社为新生社，以学生生活周刊的负责人为基础，正式成立了学生生活社，有五十多会员，应子真等领导的凡声社亦已改组为青年同乐社。所有学救会员除部分的推动加入这些团体负责工作外，其他的都回到校内工作，相互间建立了一定的联系，有机会还召集大家开谈话会，交换工作意见，而且指定了几个人为召集人。可惜后来不久，这些关系的很多失散了。

抗战以前，由于工作范围的狭小，青工数量还是很少，而是一般的青年团体负责领导的都是失学的或在学的学生青年，因此青工工作都是结合在一起的。“七·七”以后，因为环境的顺利，学赈会的成立，学生工作得到空前的迅速的开展形成了一个独立的系统，与青工工作明显的分开来。成份的不同，工作的不同以至组织的不同，因此学生与青工的工作，以后就分别开来报告。

3. 香港学生运动

1. 香港学生

(1) 学生统计与学校统计：

学生估计表

学生总数	英文	中文	性 别		程 度		
			男	女	大学	中学	小学
110,000	20,000	90,000	70,000	40,000	1,200	20,000	88,800

学校估计表

学校总数	英文	中文	性 别		程 度		
			男	女	大学	中学	小学
1,200	300	900	800	400	6	130	1,064

说明：①这个学生总数的数字是一九三九年十月间香港教育司宣布的，其他都是一个估计。

②香港最大的学校，最多不过一千人，一般的总是三、五百人之间，最小的就是那些十个八个人的私塾。

(2) 学校种类、课程与制度。香港学生，依其性质的不同，大概可分为五种：

①官立学校。这是在香港政府教育司直接领导下的，有香港大学、两个中学、五个小学附建初中的，以上是英文的；两个中文师范（一个是男的，其他是女的，都是高中的）、一个初中汉文师范、两个工艺学校，有六七千学生，学费初中以下一律每月五元，高中的每月十元，还有其他图书费，运动费等。学制完全依照英国制度，教员中学以上的多为外国人，校长当然也是外国的，除了英文

外，还附设些中文，以四书为主，诗赋、古文也是必修的课程。中文教员都是一些老朽腐儒，或是中文师范毕业后的成绩优异的学生。中文师范当然以古文、四书为主了。校长都是那些前清的什么太史、举人。但凡是英文小学。规定了学生十三岁就要入学，过了这个限度是不收的。这些学校里，都设有免费学额，特别是初中毕业那一年，考到这学额，就可完全免费入中学的。而且一个学校免费学额的多少又要依该校学生平均分数为比例，用这办法使那些学生自己互相督促，那就非死读书不可了。帝国主义者还更另外摆出一副慈善爱民的面孔来欺骗民众，每年在那些平民义学里面，招考免费生，如及格的就可以免费升入官立的英文学校至中学毕业为止。至于那些教员，月薪都在六十元起码，还得逐年增加至五百元为止，如果任职满二十五年的，可以“食长粮”，退职后仍照月薪百分之几支薪作为养老费，这样去收买那些知识分子为其所用。因此在这样情况下，学生是很少有什么行动的。由于在毕业以后在社会上是比较有地位，所谓皇家书院毕业生，找职业比较在其他学校毕业的会享有优先地位，因此每年投考这些学校的是非常拥挤，录取十名的就有百人以上赴考。

②宗教学校。差不多所有的女子英文中学，和部分的男英文中学都是教会办的。这里说的就是基督教和天主教，中文中学也有八、九间。在这些学校里一般的都依照官立学堂的制度，以它为准。圣经是必修科，不及格是不许可升级的。在小学里他们也有着很大的势力，基督教办的圣公会议会在全港就有五、十六间，孔圣会办的孔圣会议学也有差不多同样的数字，天主教就比较少一些罢

了。这些学校都是附设于教堂里面，一面办学，一面传教。通过这些学生的关系，时时能够深入到他们的家庭，做说教的工作的。他们每年都得到政府的津贴与支持的，香港政府就依靠他们作为奴化中国人的工作的一部分的啊！

③党派活动的学校。多数是中文中学，以侨教会为统一机关。活动最少的为国民党的CC系负责人为黄淑陶（华侨中学校长），他就以这个学校为基础。另外的还有华南中学的郭肇华。这两个学校算得是全港的最大的最有地位的中文中学了，每个学校的正、分、业女三校合起来有一千七、八百人。不过黄与郭因为争学生的关系早就已经闹翻了。其次是蓝衣社的罗伟疆，以文化中学为基础，与民范中学的何础等有密切的联系。再其次是西南系的德明中学、非导群中学等，以区芳浦为负责人。他们三系都没有什么联系和合作的，蓝衣社与西南系的学校都在广东教育厅立案而自成一个广东教育厅的系统，比较有一点点的接近，但是仍是非常薄弱，CC派的就成为国民政府教育部的系统了。除此以外还有国家主义派的以陈铁一为主的梅芳中学、西南中学等，武汉失陷后就和汪派接近起来，并请汪派到校演讲。这些学校的课程与制度一般的是依照国民政府的规定，小学里就增设香港汉文为必读课程。

④汪派、托派学校。在香港的汪派和托派都是合流的，非在胡兰成、樊仲云等主持下的有华夏学院、仿林中学和长沙书院。不过他们的主要活动都是放在教师上面，在学生里除公开宣传汪派、托派的主张外，在组织工作上没有什么活动的，课程与制度和一般的中文中学一样。

⑤营业性质的学校。主要的以小学为绝大多数，如有

名的**頡智**学校等，他们办学的目的就是为了赚钱，除此以外什么都不会理会到的，制度是依照香港政府教育司的规定，经常都是香港政府意志的**执行者**。

(3) 学生群众生活。香港学生大概也可以分为以下的五种人：

① 死读书的。这部分学生大多数是出身于中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家庭，生活比较差一点，他们用了很大的力量，把子弟送到学校里，希望毕业后能够找到一个洋行职员或中国海关职员的职业，维持家庭生活的。另外还有很少很少的一部分是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儿女，家庭管制得非常严，要他们努力长进将来好继承父业光耀门楣的。他们除了死读书外，别的并没有什么**课余活动**。为了争取每年的免费学额，经常都有读书死的事实。他们的健康都是非常坏的。不过毕业以后，事实往往给他们毕业就是失业的答复。因此部分的他们对于现实社会表示得很不满，而往往容易倾向革命，一般是救亡干部的来源，不过他们都有着一个普遍的弱点就是死板的公式主义，要在长期的实际工作锻炼中才能克服过来。

② 享乐主义的。这部分学生以英文中学为最多，一般的都是买办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儿女。除了敷衍校课外，跳舞会、聚餐会就是他们课余生活内容，电影院是他们的第二学校，在那里模仿着外国人的生活，生活是非常洋化的。抗战以后，由于救亡运动的影响，部分的参加了救亡募捐工作，个别的在生活上也起了转变了。

③ 信仰宗教的。这主要是宗教学校的学生，特别是英文女中学，都是出身于中产阶级以上的家庭的。基督教的

更为活跃，大多数都参加了基督教青年会。生活都比较集体，除了球赛、歌咏、游戏等活动外，还经常的进行社会服务，抗战以后进行过各种募捐，救济难民的工作。天主教的那就比较好静，活动比较少了，生活方式与一般的享乐主义者没有很大的分别，不同的地方就是多上宗教的各种仪式而且还会懂得什么对得起上帝等的一套骗人的东西罢了。

④爱好体育的。这部分学生是比较普遍，数量的比例也比较其他的多，散布于英文中学和中文中学。差不多这些学校都有球队的组织，个别的女子中学也很出风头的，部分的她们都参加了各种体育会，生活算得比较最集体而活跃的了。他们大多数是出身于中下层的家庭的，由于要知道体育新闻的缘故，所以很多都欢喜看报，同时当然也会看看国内的抗战消息，因此谈起时事来都会感觉得很起劲的，民族观念比较深，对于祖国的抗战是比较关怀的。爱交朋友，尊重义气，互相帮助是他们个性上的一般特点。对于社会服务也很热心，一般的说起来他们是学生群众中最纯洁的最活跃的一部分，可惜头脑比较简单，也容易上人的当被人利用罢了。

⑤救亡分子。这里说的救亡分子是指在我党领导下的群众而言。因为除了宗教的已经说过外，别的如国民党实际上是没有什公工作的。他们多数是出身于中、小资产阶级的家庭，以中文中学的为最多，香港的学生救亡分子都有着这样的弱点：a. 积极、热情；b. 虚浮而不切实，注意表面工作，没有埋头工作的习惯，一般的不大上课，脱离了基本群众的；c. 实际主义的作风，忽视理论的修养。因

为香港学生工作，是在政治形势好转的条件下和本港救亡运动的推动下发展起来的，实际上依靠于本身的艰苦的组织工作是比较少的，所以他们就只是满足于一般表面工作的成就而不力求进步。

(4) 殖民地文化政策与学生思想

由英帝国主义统治了香港已经快要一百年了，香港学生从来没有有什么行动，这点和它的殖民地文化政策是有很大的关系的，一般的说来，它的文化政策有这样的几个特点：①主要的是利用中国封建文化和势力来执行奴化中国学生的工作。什么前清的翰林太史在香港就被尊为无上学者。香港大学的中文院长就是赖际熙太史，后来因为没有学生高兴上课才换上许地山，两个汉文师范的校长也是香港有名的仁义道德之徒，而且就算是洋校长在中国学生面前整天的摇头摆脑的宣传着什么礼义廉耻、国之四维等，四书被定为各校的中文必修科。这样摆出非常尊重中国的“国粹”的面孔来宣扬中国过去的奴隶道德，使中国的许多阿Q上了大当还当地他是好人，这就是假中国人的手，假中国的文化来达到奴化中国人的目的的把戏，是香港政府向来最得意的杰作了；②宣传英帝国的威风。除了在本港的高压政策外，还在文化上普遍的宣传英帝国的威风。学校里读世界史地首先就必须懂得“日不没之国”的历史的伟大和疆土的辽阔，经常的利用电影作为宣传的工具，什么“美官六十年”、“威多利亞皇后”等就半价优待学生，什么“古庙笳声”等宣传帝国对待殖民地人民的仁慈和宽大，但是假如还是不识抬举就要看看帝国的威风，所谓仁至义尽的帝国道德。还有香港汉文被指定为全港小学

校必读的课程等；③假仁假义的利诱与优待。学校里有免费学额，毕业后介绍到做后备警察、洋行职员、政府文员的职业，经常表示关心学生的升学与出路问题等来收买学生，来麻痹学生等。

但是不论它的政策是怎样奸狡和周密，帝国主义者的狐〔狸〕尾巴到底会在群众面前露了出来。帝国主义对殖民地的高压政策是无论如何也逃不过民众的眼睛，特别是感觉比较敏锐的学生群众，几十年来的奴化政策曾经使香港学生驯服了好多年，然而现在已经不能阻止了学生群众的民族觉醒。一九三八年底在一间基督教英文女子中学里面就发生了全班罢课，反对外国教员的打骂制度而获得胜利。一九三九年在一间香港有名的少谷学校英文中学里就有全班学生罢课。以放弃毕业会考的代价来反对校长委任一个反动的日本学生为全校学生领袖，结果虽然失败，但仍全班坚持到底。这些斗争都完全是群众自发的，这说明了就是资产阶级儿女，今天也已经开始觉醒了。帝国主义的政策不特奴化不了广大的学生群众，连资产阶级买办阶级的儿女也无法加以控制。几十年来的苦心并没有得到任何真正的成就，今天事实上已宣传〔告〕它的开始破产了。

(5) 一般的学生团体活动

①义勇军、救伤队、童子军这些组织除了童军外不是纯粹的青年组织，都是完全受香港政府的管理，依照英国系统的。义勇军是完全军事的组织，直接受军事当局指挥，一般的都不脱离生产，参加的要订三年合同，在这期间内不得擅离职守，如遇战事，就要直接参加作战。总共

有好几千人，中国青年都在七百以上，是一些崇尚帝国文明的洋化的资产阶级的青年，没有什么民族观念的。圣约翰救伤队是一个国际性的组织，约有一千的队员，都是中国青年，加入退出都比较自由，主要的工作是日常的社会服务。学生参加的以英文中学为最多，有些学校还没有学校支队，他们参加的动机主要的是社会服务，藉此在社会上交结一些朋友，部分的、特别是在广州失陷后比较多，是想学习一些战时技术，预备发生战争时可以救救自己，个别的进步分子就预备必要时可以回国服务。一般来说救伤队的群众是会比较热情比较纯洁，而且是比较接近社会的。童子军分为男的、女的、陆上的、海上的四种，以英文学校为绝大多数，个别学校没有校内支队。中文学校参加的很少，因为中文学校另有它的童子军，以学校当局为领导，但是依照中国童军编制的。全港的童军总数我们没有正确的统计过。参加的目的主要的就是因为爱好活动，而且群众都是大多数少年。不过他们都是得到学校的合法承认和经济上的帮助，参加的是会得到学校当局的鼓励的，因此也是校内活动的一个很好的方式。

②基督教青年会。男青年会比较女的活动得多，全港约有四千会员，学生成份在一千以上，一般会员是非常活跃的，工作方式的特点是青年化、多样化与服务化，虽然在这样的环境中，也能够进行过相当多的救国工作，抗战以前推动全港学生起来进行援绥运动的就是青年会。里面有个长期性的干部训练的组织中青团，组织相当严格，约有三百人，大部分是学生，参加的要经过两个团员以上的介绍，经过四个星期的审查才能通过。每周要过小组生

活，里面有时事报告，工作讨论等，经常都有各种什么锄奸训练、野战游戏等活动。宣传内容是服从领袖、服从政府、信仰三民主义等。整个青年会的工作就是靠这个组织为骨干的。里面的负责人为卢秉良、何德安，都是以前抗救会的会员，基本上算得是进步分子，而且工作办法非常多，青年会工作的开展是完全依靠他们努力的结果。不过卢秉良这个人领袖欲相当深，英雄主义的色彩很浓厚，因为怕我们争取了青年会的群众，所以早就把门关了起来，而且在学赈会的空前发展下引起了他的嫉妒，在一九三八年成立了一个基督教学联会与学赈会对抗，声明要瓦解学赈会，因此就做成了青年会几个不好的作风，首先就是不民主，领袖化，因此引起了一个歌咏班群众的反对，他却索性的把它全部解散，宣布他们都是危险分子。其次就是宗教化，不高兴和非宗教的群众混在一起，因为这样便于他的领导与控制。最后就是关门保守，做工作有限度，永远停留于一个状态中。虽然是走马灯的做了很久工作，但是并没有很大的发展，虽然主要的是因为青年会社会地位的限制，但是另一方面他却恐怕群众比他更进步，会影响他的领袖地位的。一九三八年底国民党想在香港组织三青团，黄淑陶通过师生的关系（卢前是华侨学生），首先就拉拢了他作为发展三青团的前进阵地，不过他也不愿意完全接受黄的指挥而坚持保持了青年会的独立领导。

女青年会约有二千会员，学生约有七八百人，主要的领导是一些买办阶级、资产阶级的太太们。在上层有相当活动，与妇女兵灾会、妇女慰劳会、妇女新运会共同组织了一个四妇女联合座谈会，进行过相当的慰劳募捐工作。

下面有华光团和友光团，是学生的组织，以学校为单位，共有团员约二千人，主要的是基督教办的女子英文中学，而且办有两三个平民义学，经常有各种夕阳会、冬令会、夏令会等活动，不过宗教色彩比男青年会更浓厚，因此范围只限于宗教青年，非宗教青年很少与他们合作的。

③一般的校内组织。香港的英文学校一般的都是没有学生会的组织的，每年开学由校长指定，有时也会由该校最高年级选举若干人为学生领袖，而由学校当局指定一人负责，这些领袖们主要的工作是协助学校行政，和群众是没有什么联系的。图书馆也是由学生管理，不过购书权是完全操在当局的。除此以外，还有一些救伤队、童子军、摄影室等组织，球类在英文学校也有组织的。至于中文中学，一般都有学生会的组织，不过多数是空头的形式的，没有什么工作，研究会之类活动是很少的。小学生更谈不上组织了。

(6) 群众特点与开展学运

①思想上很落后，但是热情积极，因此香港学生表现得容易动员，容易组织，但这并不是说群众真正的团结起来了，组织起来了，只不过是工作的开始，而且仅仅是开始团结群众，巩固组织是要经过很长很长的艰苦教育埋头工作的路程。

②没有组织的经验与传统，没有经过任何的锻炼，没有产生过自己的群众领袖，因此群众容易组织起来，又容易瓦解，干部容易产生，只在会议上做过三几个比较动人的发言就可马上成为领袖，但是质量非常差，政治上的开展非常慢，其坚定性斗争性非常不够的。

③学生成份与党派活动的复杂性，因此学生工作刚刚开展，很快的就会走上政治斗争的环境，在斗争中群众容易害怕，容易脱离组织，而且由于成份的复杂，英文的与中文的，官立的与私立的，宗教的与非宗教的，党派性的与营业性的，现在还有广州来的与本地的，广州教育厅系的与国民政府教育部的等，相互间的作风与习惯都不相同，而且都有了点成见，所以进行统一运动也是一个相当长期复杂的工作过程。

II、香港学运发展的历史

(1) 学赈会的成立与发展

“七·七”抗战以后，政治形势起了基本上的转变，香港的救亡运动在赈济运动的形式下得了空前的发展，各种各式的济灾会如雨后春笋纷纷成立。党根据这种形势，认为今天的学生工作只有以赈济运动的形式才能取得广泛的发展，才能取得公开合法活动的园地，但是估计到自己没有足够威信团体起来号召学生赈济运动，以团结全港学生，因此就打算推动青年会、侨教会，或香港大学起来担负这个责任。不久香港大学自动的发起召集全港中学代表会议，党就派了钟明、林剑鸿两同志，通过私人关系，认识了香港大学学生会负责人李政耀，并以个人资格参加了这个会议，事前曾向他用书面的提出一些意见。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日的一天代表会议就正式通过成立全港性的香港学生赈济会，以学校为单位，推举了执委会和常委会，决定了举行全港学生三天节食节用运动救济战区难民，并组织了探访队出发到各校募捐，藉此宣传学生赈济会成立的意义，和征的各校参加组织。自此以后，学赈会就由二十间学校

发展到一百多间学校的组织，并成立了九龙区和香港区的常委会，由两个区再选出若干学校成立了最高的执委会。

学赈会虽然是成立了，但是以学校为单位的，党没有一个同志是学校正式的代表，工作是相当困难的。在节食节用运动中，通过了以前学救会的转接关系，认识了华德商学院的代表林家耀，他是学赈会执委之一，同时在工作中表现的相当积极相当有办法，两个月后就发展他为候补党员。通过他的在执委会的活动，推动成立了宣传部干事会和组织部干事会，动员了一些以前的学救会分子和一些校内的进步分子参加了工作。首先就出版了一个会刊《学生呼声》，作为号召教育广大群众的喉舌。其后更提出通过成立了各段的段委会，取消了区委，于是学赈会最高的领导机关为全港代表大会，闭幕后就是执委、常委，以下为段委、学校，工作系统才比较完备。林家耀更被选为全会的副主席。

党的第一步建立全港性的学生组织的计划是完成了。事实上就会要求党给予关于整个学赈会工作的全盘估计与决定的必要。党认为：a. 抓紧赈济工作为中心努力做出一点成绩，以取得社会人士的同情和树立起全港学生的信仰；b. 在赈济工作中，扩大宣传鼓动，唤醒全港学生群众；c. 在学赈会里面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去团结群众，同时必须反对使学赈会学联化的过左倾向。在香港组织学联，事实上尚没有可能；d. 注意开展上层统一战线工作，以取得学赈会公开合法的继续存在；e. 与国内学生取得联系，传播国内学运消息与经验以教育群众。

在这个时期中学赈会是怎样发展起来的呢？首先就是抓紧了赈济工作为中心，差不多在初期是完全集中力量来

进行这个工作。募捐的办法是多种多样的，主要的是三天节食节用运动、长期贮捐运动、卖物会、游艺会、音乐会、卖花会等，在半年时间中募集了好几万元港币交到政府去，因此很快的取得了社会上的好评，树立了今后工作的公开合法的社会地位。其次，关于宣传鼓动方面也进行过很大的工作，主要的是依靠报界的帮助，在招待报界的会议上，发表了长篇的工作报告，和向全港同学表明了我们的工作方针，由各界大报纸以极大的篇幅而传播于全港，以后还不断的为学赈会发表消息。学赈会本身出版的《学生呼声》(半月刊)，每期出版五千份，还有八百长期基本定户，在大众日报出版了学生堡垒周刊，〔在〕珠江日报出版青年呼声周刊，由于这些刊物的出版，引起了全港学生的注意。但是特别收效的还是在举行节食节用运动时探访队的组织，队员由各校派出而由宣传部、组织部干事会各干事为领导，在出发前一天，举行座谈会，讨论出发演讲的内容，到时编为若干队，出发各校演讲；又特别组织两区的特别队专负责到各大学校和顽固分子的学校去。因此学赈会的每一时期的工作方针和工作状况能够通过这样的方式传播到全港各校学生中去。结束时又举行联欢会，推动探访队员中积极分子参加学赈会的日常工作，所以在每一次的探访队工作以后，学赈会的会员数目必有一些增加，而且一定能够吸收一些新的学生中的积极分子参加学赈会日常工作。第三，关于组织工作。由于下层基础太薄弱，进行校内工作非常困难，所以就利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去团结各校的个别群众，通过这种关系才慢慢的深入校内去。因此在每个体假日或其他机会，学赈会都在举行着各种旅行会、夏令营、下乡工作

队、联谊会、比赛会等工作，又组织了话剧团、新文字研究班、世界语班、口琴会，团结着一些群众。发展得最好的是儿童团和歌咏班。儿童团是一个小学生的组织，团长是杨升礼同志，一个十六岁的党员，组织遍布于全港，团员在二千人以上。在团长直接主持下开了一个干部训练班，自己编有儿童团干部课本、团员须知、团员手册等，聘请华侨中学的童军教练（国民党党员）为顾问，后来这个顾问派了一部分华侨学生参加儿童团，想打倒杨升礼，夺取儿童团的群众。但是由于团长不论在团员中或干部中都有很高的威信，在群众中揭破他们的阴谋，经过一个短时期的斗争，他们毕竟是没有办法，后来因为动员回国工作，杨升礼同志和一小部分团里干部回到东江去，儿童团的工作才削弱下来，余下来的团员仅得四百人罢了。歌咏班在一九三八年暑假时也得到蓬勃的发展，以宣传部主持下的歌咏干部训练班为基础，派出各段各校组织歌咏班，全港参加的人数也在二千以上，后来部分的干部因为升学关系或毕业后的生活关系，很多都离散了，工作的开展就没有办法继续下去，剩下来的只有三四段的歌咏班，人数尚余一二百人。这些组织在暑假期间都有相当发展，不过只是昙花一现，很快的就消失了。虽然，对群众也曾发生了一些宣传鼓动的影响，不过没有注意对它的领导，任其自生自灭——多多少少可以这样说，是当时工作一个很大的损失。由于当时工作得到空前的发展，干部问题同时也提到议事日程上面，对于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我们就抓紧各个干事会为基础，经常的做时事报告，在每个工作中，都注意总结经验教训去教育这些工作干部。另外还组

组织了一个时事座谈会，作为干部训练的课堂，在暑期中，举办了一期夏令补习班（实际上就是训练班），吸引一些进步分子参加，开学以后就动员他们参加学联会工作或回到校内开展组织，讲课是聘请文化界中的进步分子负责。这个工作因为没有集中很大力量去负责，因此参加的只有二三十人，没有得到预期的效果。第四，关于统一战线工作。香港工作的环境基本上与国内是有别的，统治者是英帝国主义，而国民党和我们都是被统治的民众，这种环境基本上是便利于我们和友党的合作的，但是由于对统一战线的不能深刻的了解，养成一种狭隘的宗派性的作风，这个工作并没有得到什么成绩，比方对于侨教会，对于一些社会名流，只是必要时利用一下聘请他为顾问，虽然也有向他们做工作报告，但是只是敷衍一下吧了，个别段委会也进行过师长座谈会，除了使他们了解一下学联会的状况以外，并没有得到他们任何的帮助，事实上我们也从没有打算进行过对小学教师的工作。至于对基督教青年会方面，虽然也曾打算进行一些工作，可是这只限于上层联系方面，而且由于学联会的干部唯我独尊的精神，过去又没有任何合作的历史，虽然也曾合作过一下（在学联会的时期），可是合作的目的是为着争取他们的群众，提出口号又太左，做成了相互间的成见，这些条件都妨碍了合作关系的建立，因此在学联会的威信一天天的提高下，更引起了青年会的嫉妒。另外组织基督教学联会，想藉此来打倒学联会，夺取全港学生的领导，虽是不发生什么作用，但是直到今天仍然存在着深原的成见。第五，对内地联系。在一九三八年初，学联会刚刚成立，为着取得广州当局和

广州同学的联系，在寒假中，由林家耀等组织了香港学生献旗团，出发到广州向吴铁城、余汉谋献旗表示全港学生一致拥护抗战，并到广州各团体参观，和广州学联会、学抗会等取得联系，约好了今后通讯关系。四月间，组织了香港学生代表团，出席全国学联代表大会，代表团是由林家耀、黎民悦（学赈会的官立英文中学代表）、何敏柏（华侨中学代表、国民党党员）、郑之焕（上海留港同学会代表，当时进步分子）四人组织而成。未开会前，利用香港华侨学生的地位，积极在政治部间活动，帮助了大会的能够实现正式开会，在大会中被选为主席团之一、全联执委之一。全联并委托香港学赈会负责组织海外办事处，联系南洋及其他各地华侨学生，和开展国际宣传工作，后以环境和干部缺乏的关系，没有很好的执行起来。其后乘国际青年代表经港的机会，和广州、澳门两地代表团在香港举行过省港澳学生工作联合座谈会，讨论一些开展工作意见和交换工作经验。自此以后，香港学赈会便和全联、广州、澳门等地的学生团体取得了经常的联系了。第六，国际宣传工作。一九三八年五六月间，国际青年来华代表团到港的消息传到学赈会后，事前即准备召开全港学生热烈的欢迎会，而且加紧从事搜集各地抗战材料，翻译工作报告等工作。在欢迎会中，到会学生群众约有一千人，广州、澳门亦派出代表来港参加，来华代表团都分别发表演说，各报以大字标题刊出并出版了四五个特刊，相当的鼓舞了全港同学。以后并由林家耀陪同代表团到广州分别到各团体演说，林负责翻译。代表团离港回国时，同样的举行过热烈的欢送会，供给了部分的国际宣传材料由他们

带回本国，并约好了今后的联系，互相交换刊物及工作情况。第七，反托派的工作。学赈会成立不久，在托派主持下成立了九龙学生贮捐会，和学赈会九龙区对立，企图瓦解学赈会九龙区方面工作，夺取领导。估计到贮捐会在学生中并无任何威信和社会地位，又没有任何的学生干部，因此瓦解这个组织完全有可能，当时学赈会又没有干部可以派入里面工作争取其下面的群众，所以就决定进行瓦解它。由于群众并不了解这是托派的东西，代替直接提出瓦解它的口号，我们只是决定特别加强学赈会九龙区的工作，加强与各校学生和师长的联系，重新整理该区长期贮捐工作，并进行了好几次的募捐工作，在工作中和它竞赛，而且举行过两次师长座谈会，向他们报告工作和要求他们的指导。自此以后，学生贮捐会渐渐被群众遗忘了，在最后的时期他们还做过一次挣扎，加紧工作，攻击学赈会，但是经过学赈会指出以后，在群众中学生贮捐会的威信更无法建立起来，工作就无形中停顿，他们个别的干部都参加了学赈会的工作，事实上等于完全瓦解了，不过还没有在政治上打击他，使他永远不能在香港学生群众中活动吧了！

当时整个工作的现象，就是主观力量大大的落在客观形势后面，党的组织的发展远远跟不上群众组织的扩大，到暑假期间，党的组织由三个人发展到十七八人，支部生活是经常的，讨论布置群众工作占开会时间三分之二以上，教育工作和发展组织是比较忽视的。十一月间，市委青年部成立以后，支部工作、公开工作都是集中于青年部长一人的身上，形成三位一体的领导，工作就在这样情况领导下进行着。

这个时期的工作，基本上完成了党所给予的任务的。建立了全港性的学生公开合法的组织，开辟了今后学生工作广泛的园地，在援助祖国抗战尽了相当的作用，提高了全港学生的民族觉悟与热情，但是相当主要的缺点，就是只满足于表面工作的成就，满足于空头的统一，没有在一些可能建立工作的大学校，建立校内组织作为开展学生工作的根据地；没有抓紧干部训练的工作，使很多工作都是自生自灭，缺乏足够干部负责领导开展各方面的组织，经常工作配合不起中心工作，使群众动员成为浪潮式的时起时落；工作先锋主义，突出孤立；最后的没有抓紧支部工作，特别是支部的发展与教育工作，党员的政治质量与工作能力没有很好的提高，使当时工作不能不受到相当的限制。

(2) 和国民党在学联会中关于林家耀亏空公款问题的斗争。

自国民党组织三青团的命令颁布以后，香港国民党CC系的华侨中学校长黄淑陶就积极活动，首先拉拢了青年会干事卢秉良，进一步的想夺取学联会，作为他底青年工作的基本阵地。但是自学联会参加学联以后，根据他的干部何敏柏回来的报告，就开始怀疑学联会的林家耀以至宣传部、组织部、干事会的活动分子，特别注意调查钟明同志的活动和关系，又和李政耀、林家耀（学联会的正副主席）分别做过个别谈话，准备如争取林没有希望时就打倒他而拉拢李政耀，整个的夺取学联会的领导，步步的进行肃清两个干事会的分子。

国际来华代表团来港时曾要求香港学生以单独的一个

单位，派出代表参加国际青年大会，因此就形成了李政耀和林家耀竞选的局面，两个干事会干事和大部分群众都拥护林家耀，大部分的执委、学校代表却赞成李政耀，国民党的何敏柏等就计划拥李倒林的工作，选举大会的一天，各个人分别发表意见以后，林的被选希望相当高，何敏柏就布置一个流氓（是一个学校的代表），提出质问学赈会财政为何这样久还不宣布（财政当时是由林负责的），并提出各种攻击，何就假作为学赈前途作想，要求林要留港清理财政，以释群众怀疑，巩固学赈会的社会地位等，因此群众情绪为之一变，虽经解释，亦没有很大作用，因为事前何等已早有布置，做〔造〕谣中伤不遗余力了。结果李政耀遂得，选而且更成立了一个核数委员会，整理财政事务，从此以后就以财政问题为中心，形成两系，斗争就这样开展起来的。

斗争展开以后，林家耀在下层群众中仍保持很大的威信，只有部分的学校代表和何等混在一起，大部分的执委表示中立。何等就利用在核数委员会中占多数的优势取得了财政数目册藏了起来，四处造谣中伤，打击林家耀。我们就进行宣传林家耀在学赈会工作的历史与功绩，在群众〔中〕提高其威信，要求财政问题公开处理，如有错误应由林照数填偿，并在群众中揭发这种造谣中伤的阴谋及其危害抗战危害学赈会的实质。虽然中途发现了石百恒（候补党员，学赈会的宣传部长）的动摇，不执行决定，同情了何等的活动，最后竟参加了倒林的工作而被党正式开除，可是大部分的中间力量还是属于我们的。何等看出了我们力量的不可动摇，就估计到学赈会无法夺取，所以就

决定整个打倒学赈会而以侨教会起来代替，并进行组织学生募捐的工作，打算把财政问题拿到社会公开，以达到彻底破坏学赈会在社会中的威信而垮台。

本来这个形势对于我们争取中间势力是有利的，可是因为林的处置失当而得到相反的结果。因为中途林真的发现自己数目上弄错了几百元而心慌起来，何等更利用那个流氓对林威胁，声明要提出法律控诉，而且这个流氓更乘机向林勒索，林因为以前曾向党提出过政治保证，说明财政上并没有半点不清的，所以就不敢把这事实向党报告，而暗中偷卖家里的产业，被家人发觉，声明要断绝他的家族关系，学校又晓得这个事情又快要开除他的学籍，他在群众中的威信就一落千丈了。党晓得这个事情以后，估计到林的地位是无法挽回了，决定转变策略放弃林家耀转向重新巩固学赈会，另一方面坚定林家耀，提高警惕反对任何的威迫利诱并设法帮助他偿还款项。在群众中强调款项不清只应由林个人负责，与整个学赈会并无很大关系，学赈会是全港学生的组织，一定要坚持工作下去，而且更向何等取着猛烈的攻势。结果林是退出执委会了，问题才渐平息。下届选举的结果副主席仍由我们同志得选——谢裕德（华夏学院的代表），广大群众仍是我们的。

在斗争中支部就成为领导的中心，青年部长钟明同志公开的主持了这工作，因此上下层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经常的党的决议能在二三小时内传达到每个党员。不过正因为这样，横的关系非常多，差不多每个党员都认识了钟明同志，斗争结束以后，于是不得不退出学赈会的公开工作，由此党的工作与公开工作才正式分工起来。支部工作

在斗争进行中是很紧张的，抓紧石百恒开除的例子，党特别注意进行组织观念、党的立场的教育，在后期也曾用过很大的力量去克服同志中惊惶失措的现象，所以总的说起来，同志在执行决议，工作积极，立场坚定的上面都表现得不错的。

这个斗争反映了香港学生的复杂性与幼稚性，很快的就走上政治斗争而又不免的发生惊惶失措的现象，同时它说明了：a. 在统一战线环境中，公开工作干部生活容易腐化，这样必然会引起工作的损失。b. 英雄主义是团结干部的敌人，只有使自己孤立，脱离群众，林的失败，自高自大也是原因之一。c. 群众团体的财政必须慎重处理，必要选择忠实可靠的非党干部来负责，而且要建立严密的审核制度，党的干部最好不要自己管理财政，不然的话，财政问题经常是破坏分子利用来破坏我们的一个很好的东西。

(3) 动员回国工作。

广州失陷以后，大批失学青年集中香港，另一方面由于家乡的沦陷，又掀起了全港群众保卫家乡的热情。党审度了当时形势，认为动员回国工作是当时中心任务，推动大批知识青年回到内地去，支持与开展保卫大广东的工作，而且估计到当时有充分成熟的条件来执行这个任务。

动员的对象主要的针对着广大的失学失业的知识青年，利用学賑会的财力物力组织回国服务团，在出发以前还要经过审查与训练，通过私人及团体的关系送到国内去参加工作。有些毕业的同学，就个别的介绍投考国内各军校，这点是通过黄淑陶的关系去实现的。

在动员工作中支部是起了决定的作用。一方面布置动员群众，另一方面就要动员党员，在这过程中也曾进行克服一些党员的动摇情绪和家庭观念，动员工作就在这些斗争中一步一步的提高起来的。广州失陷后，香港市委取消，成立了粤东南特委，特委的青年部亦跟着成立，从此青年部就不负责支部工作，直接领导学赈会党团，不久九龙区和香港区的青年部亦跟着成立，领导该区青年团体党团。特委青年部和两区青年部直接发生关系，自此以后，党内青年工作的领导机构才正式的建立起来。

动员工作的结果，一九三九年六月间才宣布结束的，是得到很大的成绩，推动了二百多个知识分子回到内地去，集中了很大的力量组织了第一服务团，开展了南路的一个地方的工作。不过由于动员太大，损害了香港工作的元气，对于干部的配备没有精密的计划以致浪费了一些干部，成为动员工作中最大的缺点。兹将动员工作的统计列后：

学赈会动员回国人数统计表

名义	人数	党员	性别		成份		教育		到哪里去
			男	女	学	工	中	小	
第一团	34	14	30	4	31	3	32	2	到南路张炎处
第二团	26	0	22	4	26	0	25	1	到西江工作
第三团	30	4	30	0	30	0	30	0	参加战时训练班
第四团	25	0	20	5	25	0	24	1	到汕头随军工作
女工作团	7	4	0	7	7	0	4	3	到惠阳工作
个别的	20	8	不知	不知	/	/	/	/	到惠阳游击队
一批没有名义的	100	5	/	/	/	/	/	/	到南路学生军
总数	242	35	/	/	/	/	/	/	

动员回国党内干部统计表

总数	级 别			性 别		成 份		教 育	
	区	支	组	男	女	学	工	中	小
16	2	6	8	13	3	14	2	13	3

说明：

①这只是以现在所能记忆的最低数字。

②人数总数、党员总数和干部总数比较正确，其他只是一个估计。

(4) 政治形势转变以后(一九三九年五、六月以后)

国内政治形势的逆流很快的反映到香港。

香港政府也开始注意与监视学赈会的活动了。香港政府政治部屡次要李政耀(那时他已从欧洲回来)到那边谈话,并提出警告,学赈会的顾问罗文锦和香港大学副校长表示准备提出辞职等。同时学赈会正因为动员工作损伤了元气,主要干部差不多都离开了香港,因此学赈会正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顽固分子和一些托派、汪派又乘机活动。国民党CC系的黄淑陶,把学赈会的干部都调回校内去,不派代表出席常委会,而集中力量在校内及其他一些学校组织三青团和童子军的活动。蓝衣社的文化中学又举行学生思想测验,进行个别的发展三青团的工作。国家主义派的梅芳中学进行监视学生行动,公开清汪派到校演说。汪派、托派在华夏学院公开宣传拥汪和平反共的主张,虽然他们都没有收到怎样的成绩,但是整个香港学生里面却有点给他们闹得乌烟瘴气了。

在这个情况之下,党就决定以开展校内工作为中心把大部分剩下来的党员调到校内开展工作,但是仍尽可能的保持学赈会公开合法的地位,不过学赈会的工作主要的是训练干部、整理组织、保持与群众密切的联系,并决定开展青年会的工作。在作风上要彻底转变,要多样化青年化,以取得在港继续的公开合法的活动,并从这个转变中去接近广大群众。

经过一个时期的努力工作,是有了一点成绩的。在校

内工作开展方面建立了十间学校的工作，在八间学校中我们同志都成为群众领袖，而且在梅芳女中学、正风女校方华南中学、华仁英文中学都建立了党的支部。在学赈会方面，组织了一个社会科学研究会，在暑期办了一个训练班，约有二三十人，作为训练干部的园地，重新恢复了歌咏班、话剧团、儿童团的工作，经常的举行各种海浴会、旅行会等活动，团结了五六百群众。会刊学生呼学声复刊了，改为一月刊，每期出版一千册。其后更成立了女学生团（简称女学团），团结着二三百群众，并且在暑期中组织过一个七个人的工作团回到惠阳工作，推动了个别团员以个别名义办了几个女工夜学。从女学团的组织起，女学生工作就开辟了独立发展的道路，成为学赈会工作的一部分了。学赈会的整理工作是和当时严重的干部荒斗争中建立起来的。

党的组织也因为动员工作关系大大削弱了，全港只剩下来的只有十多个党员，到现在已发展到三十八个同志，分为六个支部。在这时期中有计划的进行过审查工作，审查的结果一般的还没有很大的问题，不过却发现了一个普遍的现象就是太幼稚，阶级认识很差。可是当时党对他们的估计太低了，这是由于轻视知识分子倾向的存在，所以就因为他们搁在一边，没有加强对他们的教育工作，影响了支部工作没有得到必要程度的开展。

这个时期的工作总结起来，是有了一点成绩的，可是党所给予任务却还没有很好的完成，特别是表现得校内工作和干部问题还抓得不紧，这是由于工作的干部不熟悉于这种深入的埋头苦干的工作，就算青年部本身也没有很深

切的了解，党的支部工作没有做到必要的加强，这些都妨碍了工作的转变与开展。

Ⅲ、一九三九年底香港学生组织现状（见本书××页至××页《香港青年工作报告》五、香港学生运动（四）一九三九年底香港学生组织现状）

Ⅳ、香港学生工作总结（从一九三七年初至三九年底）

（1）整个时期的香港学生运动，基本上是完成了党所给予的任务的。虽然有很多工作并没有做好，但是在组织行动上提高了学生群众的民族觉悟，在动员工作上输送了大批的财力物力与人力，特别是大批的知识分子到国内去支持与开展着保卫大广东的斗争，在日常工作中教育了群众，锻炼了干部，加深了青年学生的左倾情绪而团结在我党的周围。

（2）三年来的香港学生工作是一个启蒙运动的过程。今天的启蒙运动的主要内容是唤起群众抗战，提高群众的民族觉悟，在这一点上三年来的工作是起了相当的作用的。但是在另一方面并没有注意到改善群众的日常生活，改善教育制度和教材内容，实行国难教育等的斗争去提高群众的政治水平与文化水平，使香港学生思想更提高了一步，克服目前的愚昧无知的状态。虽然这个工作没有做好，客观上是受着历史行程的限制，但在政治形势转变后这个工作应该开始，从这个工作去开展校内工作，团结广大的学生群众，虽然方式上是应该个别的一点一滴的进行。因此香港学生启蒙运动只是完成了一面，另一方面的任务不得不留到今天去完成。

这个工作的未提起注意由于：a. 把学生运动了解得单纯化，以为学生救亡运动就等于整个学生运动的唯一内容；b. 只看到学赈会不应该做成好象学联合会，不然就不能存在，但是没有明确的看到学赈会只是香港学生工作的其中一个方式，并不是唯一的方式，学联合会工作——改善学生生活等依然是学生工作的一个重要部分，不放在学赈会去做，那就应该放在党的青年部的肩上领导起来；c. 由于重组织轻宣传的倾向的存在，比方学生呼声的出版已有八百长期定户的基础，出版了十期但是还要中途停刊，学生报出版了几十期，青年部从来也没有写过文章或提出过意见，让其自生自灭等，和文化运动又没有很好的联系。

(3) 三年来的工作结果仍然停留于很狭隘的范围，直到一九三九年底只有不过十间的校内工作和学赈会的一千群众，学赈会有着广泛活动的园地有相当威信，但工作仍没有更大的开展，客观上虽然有着种种条件限制，没有比较长一点的时间的机会的整顿训练，但是主要原因还是由于：

① 没有抓紧校内工作。当为开展学运的最基本的组织工作，虽然提出来了但是又做不好。由于没有真正的开展为实现群众的日常要求而斗争，这个任务的未被提出又因为一般的学生干部都离了学校不愿上课，脱离了校内基本群众，因此只是满足于一般救亡工作的成绩，而不会觉得要开展为实现群众的日常要求而斗争的必要。

② 没有抓紧干部问题。事实上就根本没有注意过培养干部的工作，因为学赈会初期环境相当好，工作开展又容

易，而且在抗救会学救会时期已准备好了一些干部，所以只一号召就能吸引好一些干部参加工作，不会真正的感觉到干部缺乏的困难。其次由于在工作中养成的军师作风，因为在学赈会初期党的青年部负责同志自己参加了公开工作，虽然只是一个组织部的计划干事，但是威信非常高，不论上层下层的干部都信仰他，提出工作意见虽然经过会议的讨论与民主的表决，但是毫无问题的一定不会有人反对或不同意的，所以一般干部从来很少准备工作意见，而只是去听军师的灵机妙算的指示，因此根本就很难培养干部的。再其次就是干部的调动太多，比方动员工作时期，干部就很少有固定的岗位，随时都要调动工作，而变成万能干部，这样干部就不能积蓄经验，发展自己的工作。

③狭隘的工作作风。没有大政党的宽大为怀的统线工作的风度，唯我独尊，拒人于千里之外，工作太政治化，太突出孤立，没有与落后群众一同进步的耐心教育的精神，对领导权存在着宗派主义的观点，把领导权了解为一党包办。这个作风的形成就是：①工作开始时并没有其他党派的工作，在我们工作有相当基础时，而友党就来抢夺群众，因此做成了我们对他的成见而把门关起来；②友党在港并非统治者，工作又比不上我们，所以就引起了我们对他的轻视而不理他；③学救抗救时期的宗派关门主义的影响。

4. 香港青工工作

I. 香港青工

(1) 香港青工数目估计表

总数	产业的	非产业的	学徒	青年职员
150000	50000	60000	37500	2500

(2) 青工生活待遇估计表

类别	生活	每月工资			每日工作时间			食	宿
		最高	一般	最低	最长	一般	最短		
产业的		90	10	4	16	12	9	自己	自己
非产业的			7	2	18	15	11	资方	资方
青年职员		60	15	9	16	12	8	自己	自己
学徒		18	2	0	18	12	10	资方	资方

说明：①产业的主要是纺织、机器、海员等；

②非产业的主要是店员、佣人、洋务、酒楼、茶室等；

③学徒主要是店员、机器等。

(3) 抗战以后的青工生活状况

根据上面的估计，青工约占全港工人总数四分之一弱，约占全港人口总数百分之八，主要的以店员、纺织工人、机器工人、佣人为最多，学徒约占青工总数百分之二十五，以店员、机器为最多。

抗战以后，特别是广州失陷以后，大批失学青年集中在香港，由于生活的驱使，不少的中学生失学青年跑到工厂中或店铺里面做一天十五、六钟头的工，拿十块八块钱

维持生活，因此抗战以后原有的青工失业的并不多，可是由于这个影响，成年工（人）失业的指数就大大的增高了。

失业工人的增加，必然的会引起工人生活的痛苦，在青工里面减少工资的现象并不见得怎样明显，聪明狠心的资本家却更有着种种杀人不见血的办法，在这里可以看到两种这样的现象，第一种就是裁减成年工人或技术工人，大量的招收学徒代替他们的工作或者延长学徒年限，以学徒的工资做着技术工人的工作，比方香港的生活书店分店就正忙着招收大批的练习生而店里旧店员正在人人自危，时时都有着失业的危险。至于一般的机器工人学徒的年限已从三年延长到五年，在汽车厂里面简直是分不清学徒与技术工人的工作，这就是香港资本家利用来代替减少了工资的剥削青工的新花样，这不仅仅是个别的现象，而是抗战后非常普遍的公式。第二种现象就是提高技术，增设新机器，加重成年工人或技术工人的工作而大批裁减学徒，当然工人工资也不会因此而增加，这种事实大都是发生于比较大规模的工厂或新设立的工厂里面，不过这种工厂并不多，所以这个还不能成为剥削的最主要方式，因而影响于青年学徒的失业也并不大。因此抗战后对香港青工的影响并不在于原有青工失业的增加，并不在于一般工资的怎么样的减少，而在于工作的加重，工作时间一般的延长。

香港青工的生活是更加痛苦了，而且香港物价的高涨，生活程度的日高，使香港青工更陷于无法应付的地步。一般的物价比以前增加了三四倍，普遍的生活负担是提高了百分之八十五，因此抗战后的今天一般的每人每日的生活费只说是伙食费最低的也非五块钱以上不可，加上

房租等其他杂项那就更吃不消了，而且还有什么九五支薪，什么救国捐等，其实这些钱都是落在资本家的口袋里，工人实际的工资并没有这么多的，所以个中〔那种〕生活的痛苦也就不难可以想象了。而香港政府更有着种种的办法来压迫他们，失业就要被驱逐，睡在街头就会受到拘捕，还有什么自卫团等，就是送给工人们最高的礼物。因此这不能不引起青工情绪的高涨，他们正在热望着中国抗战的胜利，正在热望着民族的真正自由解放，他们诚挚在信仰八路军新四军，懂得只有他们才是工人以至全民族的救星，香港青工们思想一天天的左倾已成为一种无法否认的事实。

(4) 香港青工的特点与开展青工工作。

①抗战热情非常高涨。每一次救国募捐都有很好的成绩而且特别是相当普遍，在义卖运动的时候每间工厂的工人都举行献金竞赛，大批的青年工人和女工参加了万余人空前未有的巡行，在动员工作刚发起时，在一间大同工厂里全部不满一百个男工里就有四十多个工人回国参加游击队，里面就有大半是青工，因此在每次救国工作中他们都是站在最前的岗位的。

②爱好活动是香港青工的第二个特点。虽然参加什么组织的是比较少，但是爱好活动却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特别是爱好体育，其他的歌咏、音乐、国技都来得一套，很多团体的组织都是体育会、俱乐部的形式，那就很快的成立起来的。

③抗战以后一向都在党的领导下，从来没有其他党派做过什么工作，因此他们都是非常纯洁的，没有怎样受过

改良主义或其他欺骗宣传深厚的影响，一般的都倾向我们对新四军、八路军有着很好的信仰的。

根据上面的特点，香港青年工人是很容易组织起来的，只要你能够懂得他们的特点，但是一般的比较其他工人组织难以巩固，因为他们虽然有着热情，但是缺乏组织的经验和经济、政治斗争的经验，一般的没有参加组织的居绝大多数，从来没有产生过自己的有威信的群众领袖，所以组动青工是一个长期的艰苦的教育过程。

I、青工工作三年来的历史（一九三七年初至一九三九年底）

（1）抗战以前

自解散救国会后，争取公开利用合法就成为群众运动新的方向，党就决定所有的群众团体都要做公开工作，尽可能的能够在政府立案取得完全合法的地位，于是改组凡声社为青年同乐社，改组课余社为新生社，用旅行、歌咏、游戏、乒乓、办女工义学识字班等公开做群众活动，并且参加了华商总会主持的庆祝蒋委员长五十大寿大会献机运动等，跟着又参加了欢迎广东省主席吴铁城大会。从此以后，这些团体事实上已经公开活动起来，成为不合法的合法的团体了，而且都有着比较好的发展，群众约有二百人。

（2）抗战以后

“七·七”事变以后，在党推动下成立了合法的九龙区社团赈、灾联合会，青年同乐社、新生社都参加了活动，更公开的以合法面目发动各种筹赈工作了。

在香港惠阳商会里面原有党员活动的，团结着一部分

青年，一九三七年十月间群众情绪甚为高涨，在反对商会秘书吞没公款包办会务的斗争中，就以那部分的群众为基础成立惠阳青年会，虽然受到商会的反对，然而惠阳青年会却终于另行注册备案成立合法的团体，当时群众有二三百人，自己独立找到会址进行各种歌咏、话剧、座谈会等活动，并且举行了各种募捐救乡的工作，群众就一天天的发展起来，这种在党领导下的公开合法青年团体的出现在香港还是第一个。

香港海员工会被解散后，党就决定把工作转向下层巩固群众基础，健全现有组织，在一点一滴的工作方式中抓紧机会建立新的团体，因此新生社就改为晨钟体育社，并设法在香港政府备了案，不久更成立了妇女部，针对着布厂、纺织厂女工各种体育青年进行发展工作，并通过这样的工作中过渡到建立工厂青工的厂内组织。惠阳青年会组织了一个回乡工作团回到惠阳开展工作，成为今天惠阳游击队的前身。

在好一些重工业工厂中，党的工作继有发展，以支部活动为中心团结着一些青工群众。在九龙汽车公司建立了学德励志社有四五十人，一半是汽车公司青工，其他则是一些失学失业青年。在香港太古船坞建立了致基体育社，有好几十人全是船坞青工。在长洲因为有三两个学德励志社负责人回到那边（回乡），并成立了长洲学德励志社分社，团结着二、三十个青年渔民和工人。在九龙黄埔船坞中，原有一个自强体育社的组织，在一九三六年就已成立，有二三百会员，百分之八十是船坞青工，因为在那边党发展了一个支部，便取得了该团体的领导权。新声社原

是九龙仓码头青工的一个落后的组织，是一个俱乐部性质的团体，在那边也发展了党，取得了新生社的领导权，逐步的改造后成为今天一个进步的组织。在一九三八年的大半年间党就取得了这五个团体的领导，他们都进行着各式各样的救国募捐工作和日常的文化娱乐的活动，基本上是把党的青工工作活动范围扩大了，与广大的青工群众取得了更进一步的联系，在工作中提高了群众的抗战情绪而更加活跃起来。

一九三八年七八月间，产生了香港有名的义卖运动。在党的领导下，组织了各厂工人间的义买竞赛，动员了各个青年团体参加了宣传工作，推动了这个运动的发展，特别是深水埗的晨钟体育社在工作中取得了小贩无比的信任。在筹备送款队巡行的时候，晨钟社就成为当时小贩无名义的顾问。但是考虑到这种巡行在香港是一个过火的行动，必然的会招受到打击，但是群众情绪已不可遏止，因此晨钟社的同志就要退出这个行动，以免晨钟社遭受损失，党及时的纠正了这种脱离群众的逃避观点，而只改变了方式，通知各社团各工厂不要用组织的名义参加，而依然领导了巡行。在巡行中纠正了群众的过火行动和个别坏分子的扰乱，保持了队伍的合法的静默严肃的秩序。但结果还避免不了预料的打击，队伍虽然胜利的冲破了几次警察的干涉而达到目的地。但是几个小贩领袖很快的被捕了。于是各团体特别是几个青工团体发动了营救运动，推动了一个律师为之义务辩护，发动了好几十个商店签名保释，香港政府无可奈何只得处罚了几十块钱，放了出来。各团体还在群众中进行募捐偿付了他们的罚金，这个行动

的结果就是全港小贩工会的成立。

我们发动了这些青年团体参加了这个工作，发生了一些什么意义呢？①推动了而且实际上帮助了这个运动的发展；②在工作中各青工团体进一步的接近了更广大的群众，提高了他们在群众中的威信，准备了今后更广泛的活动园地；③在工作中活跃了自己群众，提高了工作的积极性。

一般的说起来，做了这个工作后，大部分青工团体工作都活跃起来而且都有了发展，如晨钟社就发展了一倍的会员。

(3) 广州失陷以后

广州失陷以后，动员回国工作就成为中心工作，主要的是依靠同乡会为基础。惠阳青年会与余闲乐社等团体成立了救乡的联合组织，后来与南洋东江华侨取得了联系，后又组织了东江华侨救乡总会驻港办事处，通过这样的关系，各社团，特别是主要的是惠阳青年会，其次是晨钟社，用个别动员的方式输送了大批的青工及其他群众到内地去，总数在三百人以上（从广州失陷到三九年五月），去的地方最多的惠阳游击队和东江服务团，其他小部分送到学赈会服务团及南路学生军等。做了这个工作以后，很多重要的干部都回国去了，各社团特别惠阳青年会和晨钟社的元气大为损伤，直到年底才慢慢的喘过气来。

利用救乡运动的发展，在党领导下成立了西江青年会，有一百多人在救乡工作进行中团结了西江青年群众特别是青工群众。

由于广州的失陷，广九铁路的群众情绪更加高涨起

来，在党支部的推动下，组织了青年生活社，是以读书会
的形式团结着五六十个铁路和船坞的青年工人。

这个时期的工作虽然建立了两个新的组织，但是由于
动员工作与学生方面犯着同样的缺点，各团体本身工作都
受了影响而转入整理组织、培养干部的工作中。

(4) 政治形势转变以后

国内的政治逆流，很快的反映到香港。

香港资本家更展开了向工人的进攻，于是工人方面的
自卫的经济斗争蓬勃起来，各青工团体就发动了不是用团
体名义而是个别的发动群众进行经济援助（同情募捐），
慰问工人，支持正义，向社会人士呼吁抗议的工作收了相
当效果，而且在工作中提高了群众的阶级觉悟与认识。

自吴铁城到港以后，很快的开始了对我们团体的夺取
工作，晨钟社青年同乐社都有了个别的国民党员活动，但并
没有什么作用。在惠阳青年会中他吸收了会长李庆祥入党
后，更展开了大规模的发展工作，也曾利用一个投机捣乱
分子江日澄（他与李庆祥回到东江，想利用惠阳游击队和
惠青会为资本，活动升官发财，失败后回来）。江日澄以
前因为落选，在外间进行破坏惠阳青年会的工作，而被开
除会籍的，鼓动群众破坏党青会，结果在我们揭穿后是失
败了。于是就由李庆祥出来做发展党员的工作，对发展的
对象是这样说的：“我们都是做救亡工作而且是 这样积
极，假如不参加国民党不特不会受到国民政府的保护，抗
战成功以后论功行赏，而且一定被人怀疑是共产党而受了
人家严重的打击。”他们发展党员就是用这样的恐吓利诱
的方式进行的，但是并没有很大的成功，整个惠青会做来

做去只不过发展了五六个党员罢了。

三、四月间省委青年工作决议传达到香港以后，我们也曾研究过在职工会成立青年部的问题，我们觉得在我党领导下的工会成立青年部是不适合的，这样只有使这些工会工作突出中更突出，因此，首先主要的任务在于整顿与巩固现有的团体，其次就应该在工厂建立青工组织，向黄色工会或同乡会建立青年部，然后才来在我党领导下的工会建立青年部的工作，因此巩固那些因动员工作而伤了元气的团体成为当时中心工作，青同社惠青会跟着成立了妇女部。

谈到党内青工支部的工作，从来也没有很明显的分开成为青年支部或青工小组，后来才把一些失学失业青年党员以工作地区（如团体）为单位组成三个混合支部领导该团体的工作。在广州失陷后已成立了晨钟社、青同社、惠青会、学德社的党团由区委青年部领导，其他的团体依然以支部为领导的。

Ⅲ、一九三九年年底香港青工组织现状

（1）青工团体状况

①党直接领导下的青工团体

团 情 况	体 晨 钟 社	惠 青 会	青 同 社	自 强 社	学 德 社	新 声 社	青 年 社	西 江	致 基 社	长 洲 学 德 社	总 数
性质	体育会	同乡会	读书会	体育会	读书会	俱乐部	读书会	同乡社	体育会	读书会	/
人数	200	1200	180	350	100	100	70	130	100	60	2490
群众	青工， 女工	青工 70%	青工 80%	船坞青 工	汽车青 工60%	码头青 工	铁路青工， 船坞青工	青工 90%	船坞青 工	青年渔民	青工85%
左倾群众	15	20	30	20	10	8	6	10	15	5	139
群众干部	8	12	10	8	5	4	4	6	5	4	66
党员	6	7	6	3	5	3	2	3	5	3	43

说明：①这只是一个估计；

②各团体详细情况已填在职工工作团体统计表上。

② 非党的青年团体

名称	人数	性质	群众	出版	活动	什么人领导	历史
南华体育会	3500	纯粹体育会	青年50%	会刊每月一次	主要是体育活动	资产阶级有社会地位上层分子	十多年
中华体育会	1500	同上	青年50%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钟声慈善社	1200	体育及慈善事业	青年35%	同上	体育活动及各种慈善事业	同上	同上
深水涉体育会	400	纯粹体育会	全部是青年青工占70%	没有	小足球最活跃，其他的	一些非产业部门青工，与晨钟社有联系	一九三六年建立
青年学习社	30	读书会	失业失业左倾青年	不定期油印刊物	主要是话剧组	一些左倾青年与学德励志社有联系	一九三七年建立
(总数) 团体5个	6630	体育会4 读书会1	青年占50%				

(2) 青工干部统计.

① 党的群众工作干部统计表:

类别	总数	别性		党龄			成份		教育	
		男	女	37	38	39	工	学	小	中
甲类	11	10	1	3	4	4	4	7	4	7
乙类	22	19	3	0	4	18	15	7	17	5

说明: 甲类是根据党的决定能计划领导百人以上的团体的干部; 乙类是根据党的决定计划, 能领导二十人至三十人的小组织的干部。

② 党内组织工作干部:

⊖ 纯粹做党内工作的青工干部是非常少, 很多青委、支书都是兼做群众工作的, 而且以群众工作为主要;

⊖ 以党内工作为主要的干部, 只有十个支部书记, 内面六个是男, 四个是女。详细履历是不大清楚。

IV、青工工作简单的总结

(1) 三年来的青工工作, 党的领导在政治上基本是正确的依靠于学救会时期准备下一点基础, 把握每个形势的特点, 针对着大产业部门的青工, 一点一滴的建立了好几个工厂的初步组织, 吸收了一些知识青年帮助了这个工作的开展, 团结了二千多青工群众在我党的周围, 输送了大批的人力物力到国内去特别是到我党领导下的游击队去, 而成为惠阳游击队的主要基础, 在工作中推动了广大的中下层群众运动的开展, 提高了他们民族觉悟与抗战的

积极性，所以说基本上是完成了党所给予的任务的。

(2) 一贯来青工工作的弱点同时就是最大的缺点，就是太一般化和一般的青年工作，千篇一律不能真正的深入的注意青工的切身问题，改善青工的生活更广泛的去团结青工群众，这点由于：①和学生工作一样把青工工作单纯化；②一贯来对青工工作没有经验，不懂得如何做，不比学生工作有着明显的系统，青工工作不是与一般的职工运动就是与一般的青年运动混在一起分不清楚，工人支部里也没有成立青工小组，因此青工工作必然的走向一般化了。

5. 党对青年工作的领导

香港党一贯来对青年工作的领导，在政治是正确的、密切的，但是香港党青委领导机构从来就没有很明显的确定过，是从摸索中碰了钉子才一步步的健全起来的。

自一九三七年底香港市委青年部成立以后，青年部的工作组织、制度究竟是怎样的，是完全弄不清楚的，在见一步做一步的情况下就工作起来。青年部、支部公开工作都是一人独办，经过了学赈会的财政问题斗争以后，才觉得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要分开起来，于是青年部长不负责公开工作而仍要给市委代管青年支部，学赈会党团也正式建立起来，一九三八年十月间东南特委青年部正式建立了不管支部工作，直接领导学赈会党团，不久香港区、九龙区的区委青年部也成立了，领导该区的青年团体党团，那时党内青年工作的规模才建立起来，可是仍然是不健全的，特

委青年部只是一个人孤头负责，区委的青委会因为动员工作的原故，屡次调动，对实际环境不熟悉不能独立的解决实际问题，干部又非常薄弱，一九三九年底香港重新成立市委，因为干部缺乏，市委青年部就无法建立，学赈会党团仍然保存，由市委书记直接去领导，其他党团都解散了，而由支部去领导，这样党内青年工作的系统就暂时没有了。

青委的领导机构虽然在某一时期也一下的比较健全，但是负责青委的同志对于整个青年工作的系统是弄不清的，仍然是见一步做一步的进行工作，除了学生工作的系统比较明确的了解以外，其他什么青工、青妇工作就从来没有讨论研究过，救亡工作就是青年工作的唯一内容。

在领导上具有着市委作风的优点，也同样的存在着弱点，能够抓着中心，灵活、切实、迅速，但是也因为这样养成一种实际主义，见事做事，零售碎件，实际上也就是事务主义。

由此可见：(1)香港党党内的青年工作领导机构从来就不健全的；(2)对于青年工作干部调动太多，使他们没有安心于自己的工作，积累经验，使青年工作领导机构健全起来；(3)香港党从来没有计划研究过培养青年工作干部的问题，使香港党青年工作干部从开始就闹恐慌而没法解决。

这个现象的来源，主要的就是由于香港党一贯来轻视知识分子，轻视青年工作的偏向的存在，没有大量的吸收青年知识分子到党内来而给予必要的教育，没有加强青年工作的领导，因此假如这个偏向不克服，整顿与健全，香港党的青年工作是没有可能的。

6. 香港青年工作三年来的总结

I、三年来工作的结果，一般的青年工作已经开始，而且已经建立了初步的规模，准备了政治上的、组织上的初步基础；在政治上提高了群众的民族觉悟与信心，扩大了党在群众中的政治影响，加深了群众的左倾程度；在组织上团结了差不多五千群众和三百多左倾青年，在党领导下的团体里面，而且发展得比较普遍。根据这个基础准备了今后更大的更深入的发展的可能条件。

II、三年来工作的结果，工作只是已经开始，但是仍未真正的深入的团结了群众，仍然限于一般化的救亡活动，没有与群众切身利益联系起来，群众的组织仍然是很狭小很薄弱，党的青年工作干部仍然是很少很幼稚，没有足够的质量与数量，来坚持与发展今后环境更恶劣的青年工作，这点由于：

(1)党一贯来轻视青年工作轻视知识分子偏向的存在，对于知识分子的革命性估计不足，因此就没有采取必要的办法去培养青年干部，反而随便调动青年干部的工作；因此就没有大胆而精密的吸收大批知识青年入党，而加强对他们的教育；因此就没有注意加强对青年支部的领导，培养必要数量的党内工作的青年干部；因此就没有决心和采取必要的办法去建立健全青委会的领导机构，加强对它的领导以建立党内青年工作的整个系统。

(2)党一贯来没有注意青年群众的切身问题，没有注意改善青年群众生活的工作，以一般的群众救亡工作来代替青年运动，因此就不能真正动员与团结自己本身群

众，不能深入校内厂内组织全校性、全厂性的团体；因此青年团体就不能成为青年群众的核心，成为青年群众的家庭；因此青年干部不熟悉群众生活和要求，不能成为广大群众所拥戴的领袖。

(3) 一贯来忽视青年运动中的宣传教育工作，没有建立青年运动的中心刊物，不去进行经常的教育工作，没有注意建立群众团体的宣传教育系统，把宣传与组织工作分开来，而成为事务主义、手艺主义的领导，因此就不能更广泛的教育与领导群众，发动群众的自动性建立更多的非党的群众团体；因此就不能产生更多的左倾群众团结在我党的周围，使党的更大规模的发展成为可能；因此就不能培养更多的党内党外干部。

(4) 一贯来狭隘的工作作风妨碍了工作更大的开展，唯我独尊，目无余子，没有与朋友和落后分子一道工作，一道前进的精神，因此就使工作走到先锋主义，突出孤立，容易暴露；因此就不能推动朋友的工作的开展与我们的互相配合互相帮助；因此就不能使干部看得更远更广而力求进步。

Ⅲ、对于今后香港青年工作的意见

(1) 党的领导。估计到轻视青年工作、轻视知识分子的偏向今天仍有可能存在，因此：

① 要彻底克服香港党全党轻视青年工作、轻视知识分子的倾向，进行教育全党，动员全党来进行青年工作，使各方面能够互相配合互相发展。

② 要下最大决心建立健全青年工作领导机构。市委要讨论青年工作加强对青委会领导，在不妨碍秘密原则下青委会可以检查各中心青年支部工作，市委要尊重研究青

委会各种建议，以建立整个的党内青年工作的系统。

③党要加强对青年支部的领导，要培养提拔必要数量的青年支部工作干部，加强教育工作特别是阶级与统一战线教育，克服过去的关门狭隘的了解与作风。

(2)群众工作。估计到香港青年生活有可能一天天的恶化，因此：

①开展改善青年生活的工作，由此去团结动员更广大的基本群众，要每个同志都了解群众生活与要求更多的反映到领导机关来，使每个同志都要回到校内厂内去创立工作。

②建立青年运动的中心刊物，建立完整的健全的宣传工作系统，建立这些刊物的发行系统，党要给这些刊物必要的帮助，使它负起教育广大群众的任务，同时也要发生组织的作用，联系着广大的群众，推动群众的组织工作。

③组织工作的中心要放在厂内校内，以支部工作为核心成立各式各样的厂内校内组织，这些组织必须青年化、社会化，注意解决青年的切身问题，使它成为青年的导师，成为青年的家庭。

(3)干部问题。估计到干部问题是目前香港青年工作的一个最中心最严重的问题，特别是党内的更加缺乏，因此解决干部问题是开工作的锁匙，所以：

①必须培养大批的左倾青年，那就必须加强群众中的思想上政治上的教育与完成这个任务。

②大量发展党的组织，吸收大批的知识分子入党，给他们以必要的阶级教育。

③党要相当固定青年干部的工作，不要随便调动青年

干部，如必要时最好能够与青委会讨论然后决定。

④加强对青年干部的教育，特别要注意青年运动的理论有系统的研究，要深入了解讨论群众的切身问题。

这就是几点香港今天青年运动的意见。

(四)三年来香港的文化及文化界工作

香港是一个文化落后的都市，在抗战前特别是在“一二·九”学生运动以前，香港没有一间进步的书店，在所谓书店里连找一本社会科学的书也是很困难的。

香港的文化人里面并没有象上海一样的进步作家，更没有象上海的左联、社联一样的文化人的组织，偶尔有几个进步分子组织个话剧团或已出了一〔些〕贫乏的很少篇幅的文艺刊物，都不为人所注意，上海的进步书报在香港非常困难买到。

“一二·九”运动以后，民族革命国盟在香港开了两间书店（半岛书店和现代书店），经售当时上海生活、新知等书店出版的各种进步书籍刊物，并经售巴黎救国时报及时报社出版的小册子及全民月刊；民族革命国盟的机关报大众报及民族战线（月刊）都登载了一些进步的言论——主要是救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言论；上海生活周刊移香港出版并开办了生活书店，出版了生活日报；到是年年底，陈济棠在广东失败后逃到香港，也投机地出版了个报纸——港报，也主张联合战线了，因此，香港的文化工作就热闹起来了。这一个时期对香港文化界及青年学生中左倾思想的养成是有很大大作用的，加以各地如广州、上海文化人逃亡到香港，因此在文化界里面也有了新的进步的力量，当

时的文化人有邹韬奋、金仲华、柳湜、何思敬、章乃器、陶行知等。

大约是一九三七年初，广西桂系在香港出版了《珠江日报》，也是个比较进步的报纸，这时候生活日报却停办了，然而香港文化界中进步力量却是向前发展扩大的。

一九三六年底，救国会华南区总部在香港出了《转机》、《存亡》等机关报，都是旬刊，约出了三、四个月。香港各界救国会出版了机关报《联合》，只出了两三期，这可以说是香港党自己直接领导的刊物的开始。大约到是年五六月间，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出版了《大路月刊》，作为南委的机关报，月销约一千份——两千份。

抗战以后，香港的文化园地就几乎完全变了：从上海搬来的比较进步的报纸有《立报》、《申报》，广州失守后有余汉谋办的《时事晚报》，《大众报》曾在党的直接领导下出版了半年（有三个同志在内任主要编辑，《申报》里面有同志做编辑），还有胡文虎的《星岛日报》及《珠江日报》（直到我们离港时，仍不失为较进步的报纸），在党领导下的还出了一个小报《实报》，销万份（后被港政府封闭了）。

在刊物的出版方面有茅盾编的《文艺阵地》，有金仲华编的《世界知识》，胡愈之（？）编的《星岛周刊》，都是比较进步的刊物。

在党直接领导之下出版的刊物有《海外青年》、《东江》、《侨胞》、《抗战大学》、《工友》等，及各工会会刊如余闲乐社的《余闲》，印刷工会的《文化劳工》，洋务工会的《香港洋务》，及各一般团体如学赈会的《学

生呼声》，惠阳青年会的《惠阳青年》等等。

在党领导之下曾经翻印过《解放》、《群众》、《中国青年》及《新华日报》社论集，《论新阶段》、《论持久战》、《论政党》、《支部工作纲要》、《论左派幼稚病》、《论共产党与无产阶级的立场》、《当前时局的最大危机》等。

现在在党直接领导下还有两间书店（另有两间倒闭了）都能翻印书籍与出版杂志。侨胞书店出侨胞及工友两杂志，新文化书店（现已收改为弥敦教育用品社）则主要的是翻印书籍。

现在在香港约有二十间较大的经售进步书籍的书店，最主要的是生活书店、梁国英书局、会文堂北新书局、良友书店及我们开的弥敦教育用品社及侨胞书店等。至于各小书摊小书局则是多得胜不胜数了，左派书籍杂志的普遍与触目，超过任何一样出版物，甚至超过了以前香港最流行的享乐主义的读物。

抗战以后，虽然很多文化人就都离了港，我们在广州失守后也动员了中下层文化人的一部分走了，然而目前在香港的还有金仲华、胡愈之、王纪元、刘思慕等外来文人，及从香港本地培养出来的文人如杜埃、黄绳、袁水拍、杨修范等。目前的文化界上的进步的阵营，还是相当强的，最少是比抗战前强的。

香港的样子因文化运动的开展也几乎完全改观了，目前的香港已经不是以前的单纯的商业城市，而已开始成为文化城市了，在广大的青年学生中间，在教职员中间，已经逐渐由于接收了民族革命的思想，而更左倾地开始接受

社会革命的思想，在香港的学生中已经开始了他们的“五·四运动”。

然而香港党对这些工作的领导还是薄弱的，目前文化工作上所显示的进步现象，主要的还是整个政治形势的影响，而不能归功于组织的领导，当然我们曾经进行过一些关于这方面的工作，然而我们自己做的真是很少，而且注意得也很少。

这些缺点表现于：

1. 香港的文化工作，文化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的工作始终是没有做好过，始终是没有组织起来的，大约是一九三七年底，我们曾经企图组织过一个统一战线的组织，起初组织了中华艺术协进会，以后又组织了文化界座谈会，中华艺术协会有大约一百五十——二百人的会员，几乎完全是一些左倾的教师与投稿生活者，曾经吸收了几个电影员参加，然而很快他们就离开了，以后艺协甚至因为付不出房租，连会址也没有了，以后工作就几乎完全停顿。

文化界座谈会大部分仍是艺协的左倾群众，同时也曾经吸收了一两个中学校长和报馆编辑参加，然而这个座谈会实质上还是艺协一样的作风，请了几个中学校长及报馆编辑来，主要的还是想靠他们的掩护来做些工作而已，而且座谈会的工作几乎完全是一般的救亡工作，什么发起募捐、慰劳等等忙过不了，虽然也办了一些左派训练班，派出一些人到各个团体办的训练班去担任讲统一战线、群众工作等课，是对当时的群众——主要的是当时汹涌起来的群众运动的干部起了些教育作用的，然而这个团体实质上

仍只能称为左派文化人的统一战线罢了，过了几个月后，那些校长、编辑们看得不合口味就不来了，座谈会也就瓦解了。

这些事实教训了我们，在香港这样政治关系非常复杂的文化界中，我们的力量如此狭小，进步力量如此没有长久的历史与基础，就企图来建立组织上的统一是不可能的，当前急迫需要的还不是这种组织上的统一，而首先要政治上的统一，言论上的统一，假如我们能够在事实上争取了这些文化人接受了我党的政治主张，推动了香港的文化由落后大踏步向前进步，那就是工作上主要的成功了。当艺协及文座的工作受到失败时（大约是一九三八年七八月间），我们是曾经有过这些概念的，不过没有真正深入的研究过。

然而以后的工作也就放在上述这些政治上的推动工作上，在上层文化人中，由廖承志同志负责一个座谈会来联络，主要的是研究政治形势，不过参加的还只是一些比较左倾的，如金仲华等人。在中下层文化人中，由杜埃同志负责一个不定期的座谈会，这里主要的是个别的联络，然而也只限于一些较左倾的主要的是一些投稿生活者，到一九三九年底仍然是这样。

在香港的文化界中的统一战线工作当然是特别困难的（政治背景的复杂），然而并不是没有这种可能，如反汪的斗争本来是个进行统一的言论行动的很好的机会，但当时我们对反汪的宣传工作做得确实太少了，至于在比较落后的文化人中去联络工作的就更没有了。

目前汪派都非常注意于这些文化人中的工作，如用三

千元收买了香港最有权威的老报《工商日报》的总编辑李建丰（条件是写反苏文章，并不要他反抗战，与明显地反共），又收买了销数最大的《羽公报》、《石山报》（都是邓羽公主编的，约销二万份，是小报），出了《果然》《超然》等小报。

然而我们又非常不注意于这些工作。

在教育界方面，现在国民党掌握了侨教会（约有一百——二百个学校单位参加），他是逐渐能控制香港的教育事业的，这几年来国民党在教育事业的控制上有了一些成绩，许多营业性质的“香港土产”的学校都参加了侨教会了。

我们在教育界方面，就更没有力量了，没有组织一个比较进步的教育界的名流人物，象方与严同志等又是外来的人，在香港起不了什么作用。我们自己开设的只有两间小学——暨南书院（现已停办）及海华小学（海员子弟学校，一九三九年开始曾计划办中学），一九三九年底进行筹办一间中学，未实现。另，方与严同志在一九三八年底以生活教育社名义在港办了中华职业学校，到一九三九年八九月间也停办了。

我们在文化界的力量就只如此孤单。

2. 因此，我们就没有可能去组织文化战线上的大规模的反投降、反分裂、反倒退的斗争与反汉奸托匪的斗争。虽然有时候我们也发动一些围剿某甲或围剿某乙的运动，如对《星岛日报》发表的陈独秀著的《论游击战争》的反八路军言论的批判，如对陈友仁发表主张中国参加帝国主义大战的言论的批判等等，然而这些参加围剿的队伍向来

都是很少的，只是在一些进步的报纸上动员了一下，只在几个进步一点的人中间动员了一下，并没有真的能够把敌人密不通风的围了起来。

当然，每一次政治上的变动我们是没有放松的，是发表了我们的言论的，然而由于人手孤单，力量就薄弱，不能起应有的作用。

在这些斗争中，我们也曾经把汪派樊仲云挤出《星岛日报》，推动了胡文虎聘请胡愈元做编辑，然而这些成功并不完全是我们的文化工作的同志在文化战线上斗争的胜利，而主要的还是我们在群众中的动员，每天都有几十个人打电话给胡好（胡文虎的儿子，星岛报经理），骂他的报纸发表汉奸言论，动员了上中层文化人、投稿生活者不给星岛报写稿子，各救亡社团不给星岛报送新闻，这些工作的结果，星岛报由销三万五千份跃至五千份。胡文虎为了生意经才不能不把樊仲云赶走了，登了反斥陈独秀的文章。

在没有这些下层一般群众配合的情况下，文化界方面工作的同志，就不能做了这样的成绩来了。

3. 目前我们的文化工作是很单纯的政治化的，我们出的刊物就只有纯政治性的刊物，关于文艺、美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历史、地理、教育等出版物及对这一方面的研究与活动，都是没有的，特别是通俗化问题，旧形式的运用问题，广东话文字或广东话新文字的研究、广东戏剧、电影的研究与批判、社会教育、义务教育的研究与推动等等是一向都不注意的，文化工作实质上就只成为经常向群众做政治报告，而不是“文化”工作。

4. 因此，除了一般的鼓动了群众的抗战情绪、民族意识之外，对于群众的民主教育以至阶级教育都进行得很少很少，也没有计划地去向群众〔灌〕输系统的反对奴化教育、封建教育（香港的一般学校都读经，实行打骂制度的）的思想。对于社会现象——社会的黑暗面的批判注意得非常少。所有这些缺点，都是足以使香港的群众的政治水平不能跟着政治形势的需要而进步到需要的程度的。

估计到香港政治形势的必然愈向恶转，文化工作上的困难将特别增加，我以为今后香港的文化工作的方针：

1. 必须把过去那种政治指导员似的工作方法方式改变为各方面、各种部门、各个场合、多样的、掩蔽的推动、贯〔灌〕输，使群众逐渐在无形中进步起来，主要的是要感化群众从无形而不是简单的在群众面前摇着耀眼的旗子。因此就必须：

（1）从各方面各个部门去组织各种不同的文化界群众，而不是企图把群众拦在一堆上大课似的来听我们的说教。

（2）必须从各种科学部门的研究去提高群众的政治的文化水平，在这各种科学的研究上团结了各种群众，并教育了这些群众，克服了过去那种只会用政治口号、标语去教育群众，而不会在各种科学、文艺、美术、历史、地理、自然科学中去教育群众的机械的作法。

（3）必须能够针对着香港的以至广东的，华侨的特殊环境，特殊条件，提出这些地方文化上的特殊问题，如香港的奴化、封建化的教育制度问题，如广东的戏剧音乐问题，如华侨的祖国文化事业等等，只有具体地提出了这

些特殊的问题才能切实地推动文化事业的开展与群众文化程度的提高，才真正的能够使我们的计划建议成为社会注意的问题，成为一种社会风气，成为群众的改革社会的力量。

(4) 必须善于利用各种方法方式去逃避检查官的眼睛(现在香港的检查官已经逐渐技术高明了，以前是低能的)，同时又深入群众的心坎，要出小报，出各种科学小册子，出教育性的杂志，办学校，办职业学校等等。

2. 关于党报党刊小册子，马列主义书籍的出版与翻印(公开的与秘密的印)，仍然是应该坚持的，但这些事业都要和一般的文化工作公开，要有两个管理系统与发行系统，不然就会一碰钉子就什么都糟糕了。

3. 必须大量地吸收文化界的左倾分子入党，和有计划地培养与领导非党的文化工作干部，过去在文化界方面党员的发展是最关门的，现在全港只有二十多个人，是无论如何不能领导这个已经开始成为文化城市的文化工作的。目前香港的左倾分子是日多一日了，只要稍为开门，一年之中吸收一百个进步的知识分子是不成问题的，如果党在文化战线上有了一百个干部，那时候也许能够掌握上述的这些复杂的工作了。

由于香港已经开始成为一个文化城市，由于香港已经逐渐代替广州而成为南方的文化中心，因此各党派在香港文化战线上的斗争也日益尖锐了，特别是国民党、汪派尤为活跃，香港的文化活动已经日益政治化了(以前的文化活动一般是吊儿郎当的东西占多数)，党如不注意这些问题，是将会在这些斗争中失败下来的。

兹将香港三年来的出版物列计于后：

党的出版物：

大路——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机关报，一九三七年五六月间出版，年底或一九三八年初自动停刊。月刊，销一千——二千份。

群众、解放——一九三八年后，每期翻印。

中国青年——一九三九年翻印过一期。

新华日报社论集，翻印至五集。

论持久战、论新阶段、论政党、当前时局最大危机、论民族立场与阶级立场、论左倾幼稚病、支部工作纲要、论青年的培养……翻印数目不详，其中如论新阶段翻印过三次。

党领导的群众的出版物：

侨胞——袁心德同志主编（袁现因投机，党籍在被审查中），半月刊，一九三八年出版到现在，销约五千份。

工友——袁心德主编，工人读物，半月刊，一九三七年底出版，月销约五千份。

东江——梁布克同志主编，月刊（半月刊？），一九三八年出版，原名《惠侨》，销五千份。

抗战大学——一九三九年在港复刊三期，月刊，原在广州出版，销约三千份。

海外青年——一九三九年出版两期，月刊，销约二千份。

学生呼声——香港学联会会报，半月刊，一九三八年出版十期，销三千份，一九三九年九月复刊改为月刊，销一千份。

余闲——海员余闻乐社会刊，月刊，销约五千份。

文化劳工——印刷工会月刊，销约三千份。

学生报——郑之焕同志主编（郑现因投机被开除党籍），一九三八年出版约半年，三日刊，每期一大张，〔每〕期出五千份。

转机——一九三六年救国会南区总部的机关报，旬刊，一小张，只出两三期。

存亡——同上，约出七八期。

联合——一九三六年底港各界救国会机关报，只出两三期。

抗战青年——叶贻彬同志主编，月刊，销约二千份，一九三八年出版，出半年停。

大众报——一九三八年上半年，曾经交由救国会办，陈孚木主编，我们三个同志做编辑，很进步，半年后蔡廷楷把报馆卖给福建省主席陈仪做机关报，我们就被迫离开了。

文艺阵地——楼适夷同志主编，一九三八年出版，半月刊。

世界知识——金仲华主编，一九三八年迁港出版，和我们有密切关系，由廖承志同志负责指导。

实报——陈拉特同志主编，一九三八年出版，三日刊小报，当时党没有注意去密切领导，很左很红，半年后被封。

其他各党派的刊物报纸：

属于汪派的：直属的公开的机关报有南华、天演、自由三报，自由报因一九三九年工人反汪罢工后已不能复

版。南华报有很详细的体育栏，故日销可达五千份，天演千余份，自由几百份。

被收买的有：邓羽公主编《石山》、《羽公》，两日报均附三日刊，小报型的，日销一、二万份。

黄果然主编的《果然》、《超然》两三日刊，小报型，销约五千份或三千份。

还有其他《人间》、《销魂》等下流小报。

这些小报都不公开拥汪，其主要任务是造谣与登载下流的肉欲的作品，销数一般都很广。如邓羽公主编的《石山》《羽公》等报是广州香港有名的小报。此外还收买了香港最著名的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报纸《工商日报》的总编辑李建丰，专写反苏文章。

杂志有《自由》及《现代文选》等。

国民党的：

国民日报——吴铁城机关报，日销约五千份，汪派樊仲云任编辑，和汪南华日报同一办事处，已暗地里实际和汪合流了。

大公报——一九三八年出港版。

立报——成舍我主编，一九三八年由沪迁港，尚进步，但闻是CC的。茅盾及萨空了均曾任副刊编辑。

珠江日报——桂系，销约八千份，曾较进步。

天文台三日刊——桂系，一万五千份，曾较进步。

大众报——陈仪（亲日派），一九三八年下半年起由民族革命同盟蔡廷楷把报馆卖给他，现表面上仍略进步，只是多替福建省府吹嘘。一九三八年下半年陈孚木主编时，是作为救国会派的，我们三个同志做编辑，很进

步。一九三八年前任毕明的主编，是民族革命同盟机关报，亦进步。

星报——孔祥熙机关报。

此外，作为香港政府半官机关报的有华字日报，代表香港买办阶级的有华侨日报、循环日报，代表香港民族资产阶级的有工商日报。以上这四报为香港最老的四大报，都销七八千份以上，工商日报销一万五千份。

胡文虎的机关报星岛日报曾销三万五千份，现销一万五千份，胡愈之编辑，尚进步。

日寇领事馆办的香港日报中文版，不能公开发行（因报贩抵制），完全是赠阅的，不用纳报价，但销数很少。现增设英文版了。

汪派在港开设了蔚蓝书店，不著名，没有什么生意。托派新近开了青年书店，只开办了一两个月，还不大敢把托匪书籍很公开卖，但店中藏有各种宣传品。

似乎是国民党开的有正中书局，但也兼售进步书籍。九龙图书杂志公司等。

在书店的营业上，落后的书店是没有什么生意的，除了汪派的蔚蓝书店外，其他的大约都要摆一两本较进步的书籍做幌子。

托匪在港有印刷所，用东亚图书馆名义出版各种小册子。

至于目前香港的文化团体则有：

新闻记者公会——约五六十人。

青年新闻记者学会香港分会——约五六十人，尚进步。

中华艺术协进会——约百人，进步。

歌咏协会——包括三十余歌咏团体，尚进步。

戏剧界协会——包括十余剧团，尚进步。

书画文学社——旧名士派头的组织，百余人。

中国文化界协会——汪派，杜衡、樊仲云等主持，数十人。

儿童学会——托派，数十人。

华侨教育会——国民党，三四百人，主要的是中学校长教员。（此处原件漏一页，约有四、五百字。——编者）

根据以上的估计，在香港劳动妇女占着一个很巨大的数字，约占全数百分之三十七以上。她们参加劳动的部门是很普遍的，除了产业工人外，她们还分布到建筑、起落货码头等的部门，和男工一样的做着抬石、运木等笨重的工作，然而每天劳动所得仅仅不过是三、四角钱罢了。

给有钱人家做佣工的妇女，在香港也是相当普遍的。她们多是因为农村破产，或家乡沦陷而逃到这里来的妇女。她们的工作时间简直是无法估计的，从天亮到天黑，总不会给你空下一点时间，然而每月的工资不过是两三块钱，还有很多只是食饭而不拿钱的，简直过着古代奴隶式的生活。

至于家庭手工业的妇女那就更是普遍了，特别是做迷信用品的，如元宝、蜡烛、息香之类。她们以很高的利息向人家借了点钱或是“做会”（星期会）弄了点钱做本钱或做抵押，向这些商店接回家里日夜辛劳着，结果除了支付利息以外，余下来的仅仅足以维持最低的生活罢了。

因为体力劳动与生活的关系，香港妇女普遍的是大脚的，有些从农村出来的小脚女人，不久也得放脚，不然的话，她们就没法担负这些劳动而不能生活下去的，因此赤脚妇女在香港也是可以随处看到的。

劳动妇女数字的巨大，一方面由于内地农村破产和战争破坏的影响，迫使到大批的农村妇女不得不跑到这“安乐窝”来找站足的余地，另一方面香港上层的排斥妇女，也有着很重大的意义，我们可以看到香港女子中学生，实在也并不是少数，可是除了一些教员外，在政府机关、大公司、大洋行任职，如书记等，除了一些西洋女子外，中国妇女实在是很难看见的。因此很多初中毕业以后，无力升学的，既不愿过着太太式的生活的——实在做太太的机会也并不多，想在社会上自谋生活的，那么就只得跑到工厂里过着每天三四毛钱的女工生活了。

香港产业女工的生活的痛苦是不可以想象的，工作时间是无限制的延长，每天十四小时至十六小时的工作是司空见惯的。普通的工资大约每天从二毛至四毛，还有些包糖果或做瓶塞的女工每天做足十五小时的工作，而所能够拿得的工资每天只有八个铜板到二毫五分，就是连光是吃饭都不够的，广州失陷以后大批农村妇女涌到香港来，失业人数更加增大了，而且欧战以后各地定货的又大大减少，因此女工的生活更加悲惨了。普遍的每月只能做十五天至二十天的工，每月只能拿到三、五块钱，加以物价飞涨，就以伙食而论，以前每人每月三钱〔块〕半钱的，而现在五块钱也难办到，所以一般的女工是陷于半饥饿状态中。

由于失业工人的增加和妇女参加劳动的机会天天的减少，由于劳动妇女的生活也天天难于维持，那么香港娼妓数目的惊人不是没有原因的。照一九三九年底的统计，全港娼妓已达三万人，比以前增加了三分之一以上，占全港妇女百分之三点八。自一九三八年香港实行禁娼以后，娼妓的数字反而激增，私娼随处皆是，还有很多是晚上当娼，白天还出来做苦力工人或其他工作才能足以糊口，个中〔那种〕生涯的苦况，就可想而知了。

与这些下层妇女生活相映照的还有一些女学生和家庭妇女。女学生占妇女总数约百分之五，大概有四万人，很多读了三两年书的就要出来参加劳动维持生活。一些有机会读中学的都是资产阶级的女儿，她们读书的目的就是增加身价，是很明显的，特别是英文中学是如此。至于那些家庭妇女呢，一般来说除了老人和孩子以外，真正太太式——不做事的是极少数，她们过着寄生虫式的生活，不过无论如何她们还是小数，广大的香港妇女群众还是属于劳动妇女的。

香港妇女总的说起来有以下几个特点：

1. 民族观念相当浓厚。由于广大的妇女群众是劳动妇女，她们很多都是从内地来港的，祖国的存亡和她们有着血肉的关系；由于香港是帝国主义直接统治的殖民地，压迫是直接加诸于每个中国人的身上，特别是妇女，因此香港妇女关怀祖国的情绪是非常高涨的，这个特别表现于每个救国工作的动员上面。每次学生筹赈运动号召同学组织探访队出发募捐时，从来没有组织的女学生好几百的自

动要求告假或者瞒着学校当局抽空出来参加。每年“三·八”妇女节，过万以上的妇女群众出来参加纪念会，包括了女工、学生、教员与家庭妇女。当到小贩义卖送款时，参加巡行的在万多群众中妇女就占八千以上。群众的民族情绪特别表现于工厂女工的自发的反日罢工上面，反对工厂用日本原料而自动罢工脱离工厂，反对工厂利用救国名义克扣工资进行各种斗争等。这些事实都说明了香港妇女由于环境的条件，是有着比较高度的民族热情的，只要能够了解她们这个特点，她们是容易被动员和组织起来的。

2. 是一个未被开垦过的园地。各党各派从来都没有过工作，香港妇女群众的力量，从来未被人正确的估计和重视过，抗战以后在何香凝、宋庆龄的推动之下，虽然组织了四妇女团体及其联合座谈会，但是目的只是捐钱而不是组织群众，工作范围只限于太太们的狭小的圈子里面。只有基督教女青年会，也曾企图过做一些群众工作，开办过好几期女工夜学，可是象潮水一样散了学，什么都跑光了，只在学生里面，组织了华光团和友光团，分布于几个基督教会办的英文学校里，大概有二千人，但是非信仰基督教的学生却不能参加，宗教色彩非常浓厚，因此也没有很大的发展的。所以说除了党的活动外，妇女群众是从来未有什么组织的。这个特点说明了群众是纯洁的，一般的是左倾的，特别是女工，只要我们政治上不犯错误的话，妇女工作，不论是党的和群众的都有着广大的发展和活动的园地。

3. 从来没有组织经验与斗争的传统。抗战以前群众从来没有组织，从来很少经过锻炼与教育，没有产生过自

己的群众领袖。这就是说香港妇女是纯洁的但同时又是幼稚的，没有任何的基础，要经过长期的从上而下的建设工作，从群众到干部的培养都要从头做起，但是另一方面，她们却又富有着更多的朝气的优点，给与动员和组织更大的可能。

4. 思想上的封建落后，迷信影响相当浓厚，相当普遍。除了上层的洋迷信洋封建以外，广大的下层妇女还是普遍的迷信神道，在任何一个家庭中都供奉满了各种各样的菩萨，每天早晚烧香礼拜，初一、十五还要实行斋戒，佛堂古庙遍布全港，与二十世纪的资产阶级文明互相映照，木头硕石，常是香火不绝。就算是在女学生里面，圣经、四书常是她们的主要课程。因此教育工作是香港妇女运动中一个主要的长期而艰苦的工作，动员组织妇女就要从最低级的甚至是原始的组织形式做起。

香港的妇女工作，从一九三六年刚刚开始就是比较着重于女工工作，同时实在又可以说是唯一的工作。在一九三八年中得到比较大的发展，建立了女工工作的基础，到一九三九年暑假，女学生工作也被注意起来，在香港学生赈济会中建立了香港空前的女学生的独立组织——女学团，直到现在女工工作和女学生工作就成为妇女工作的主要内容。而关于这两部分的工作已经在职工运动的女工工作报告和青年运动的学生工作报告中都说过了，所以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对于开展上层的妇女工作，建立妇女工作的上下层的统一战线，在香港这个工作向来就被忽视了的，严格的说

起来，就是简直没有真心的做过。

本来开展这个工作的条件是存在的，而且有着很大的便利的。

抗战以后，先后的成立了几个上层的妇女团体：妇女兵灾会（谭世藩——香港唐元制罐厂的老板——的老婆刘庆萱为首代表着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一些太太集团，在初期的时候，香港买办阶级的太太们大部分都参加的）、妇女新运会（以邹鲁的老婆梁定慧为首代表着过去陈济棠时代的粤系官僚太太的集团）、妇女慰劳会（以宋子文的老婆△△△为首代表着从国内来的英美买办阶级太太的集团）、儿童保育会（香港绅士何东之女何艾龄为主要负责人）。这些团体成立后，进行各种募捐慰劳的工作，香港妇女马上热闹了起来，但是所进行的只是上层的募捐而完全不做下层的群众工作的。再以何香凝的提议成立了妇女兵灾会、妇女新运会、妇女慰劳会、基督教女青年会（但不能决定整个女青年会的工作，以曹善允——所谓香港的华人代表的老婆何玉英和单德馨等为上层负责人）四妇女团体联合座谈会。后来妇女兵灾会内部发生分裂，以罗文锦——香港有名大律师、一个华人绅士——的老婆何锦姿为首的香港买办阶级的太太集团全部退出兵灾会，而另成立中国妇女会，独树一帜进行工作。不过无论如何，这些上层妇女团体的建立，给与我们很大的便利的。每年“三·八”妇女节，通过她们的号召，我们动员了成千过万的群众参加了纪念会，这些纪念会的举行，给予了全港妇女群众非常广泛的影响的，不过我们除了这点和帮助过她们做了一些募捐工作而外，并没有得到其他的东西，稍为仅

仅有点点工作的就算是女青年会。在里面，康若愚（张滂的老婆，同情分子）是女青年会负责人之一，在下层群众中有作用，单德馨也是同情者，我们有一个同志——陈曼云同志在活动，本来和她们的关系弄得比较好的，后来有一次，陈同志带了女青年会的捐册在身边到香港八路军办事处廖承志同志处，恰巧就被警方抓了去，因而女青年会就受到政府的警告，以后陈同志就没法在里面活动了。剩下的还有一个四个人的同情小组，由廖承志亲自领导的。在这样的活动之下，推动了女青年会做过了一些工作，办了好几期女工义学。对于女青年会的就只有这么的一点点工作。

除了这一些以外，还有一个上层的妇女团体——妇女策进会，这个〔团〕体是由一个比较开明的分子——陶秀女子中学的校长苏若蕙领导的，我们有个别的团体和她有些关系，推动了她办过几期的妇女夜学。

整个香港八十万的妇女中，除了党直接领导下的团体外，非党的群众组织就只有这几个，而且都是空头的上层架子，没有任何一点的实际群众的。

现在将我党直接领导下的群众团体，女工的和学生的表列于后。

补补：妇女兵灾会内有陈曼云同志在领导机关做干事，为实际的日常工作的负责人，妇女兵灾会的参加者都是民族资产阶级的太太们，是较为进步、肯做事的。廖梦醒（廖承志同志的姊）则参加妇女慰劳会的活动，但作用没有陈同志在兵灾会大。

四妇女联席会曾在我们推动下办过两期干部训练班（约百余人），由廖承志同志等负责讲课。

香港党直领导下的妇女团体

名称	人数	群众	性质	历史	党的领导
七姐会	800	各种青年女、 嫁女工	封建性的	三七年在 党领导下 建立	有三十个同志在 活动，能掌握
余闲乐社 妇女部	100	洋务女工	俱乐部	三八年在 党领导下 建立	有同志活动，能 掌握
洋务工会 妇女部	800	洋务女工	工会	同上	妇女部长和书记 都是同志，下面 有二个同志活动
印刷工会 妇女部	60	印刷女工	工会	同上	直接在印刷工会 领导下，里面没 有同志活动
晨钟体育 社妇女部	140	纺织厂女工	读书会	同上	上下都能掌握
青年同乐 社妇女部	50	女工及家庭妇 女	读书会	同上	在青同社直接领 导下，里面有两 个同志活动
惠阳青年 会妇女部	80	惠阳青妇，部 分是女工	同乡会	同上	妇女部长是同 志，能掌握
大同读书 会	60	陶化大同工厂 ，厂内女工， 小部分是男工	读书会	三八年建 立	有十二个同志在 活动，能领导全 厂工人

九龙教育 服务团	100	女工，很少的 一部分是知识 妇女	教育团体	三年建立	上下层都能掌握
香港树胶 厂工人互 助社	600	橡胶女工，有 一、二十个男 工	互助社（ 会工性质）	三八年建 立	有二十三个同志 在活动，能领导 全厂的斗争
女工夜学	500	女工	学校		
香港学联 会女学团	240	女学生	学生团体	三九年暑 假建立	完全能把握
梅芳女中 学学生会	400	女学生(中文)	学生会	三九年完 全取得领 导	学生领袖是同志 ，在校内有支部 (四人)
正风女校 学生会	250	女学生(中文)	学生会	三九年取 得领导	学生领袖是同志 ，校内建立了支 部(四人)
陶秀女中 学学生会	300	中文中学女学 生(附有小学)	学生会	三九年初 取得领导	学生会主席是同 志，下面只有一 人活动，比较薄 弱
丽泽女中 学新旧员 生筹赈会	400	中文中学女学 生(附有小学)	筹赈会(三 年等于学生 会)	三八年取 得领导	主席是同志，下 面有一人活动， 能力比较强的

根据以上的统计，在党直接领导下的有十一个女工团体，共有三千二百九十人，学生团体五个，共有一千五百九十人，总共合起来还不够五千人，和八十万妇女的整数比较起来那就差得太远太远了！

妇女工作的还是停留于一个很狭隘的范围，是和忽视上层的统一战线工作有着很大的关系，做成我们的团体和那些上层的妇女团体完全隔绝的现象，没有好好的利用上层的社会地位和财力，争取她们，提高她们对劳动妇女教育工作的注意，以致一切都是“自力更生”，“事倍功半”的不得不从一点一滴的做起。

上层统一战线工作的被忽视和没有得到必要的开展，主要的因为有了这样的几点原因：1. 对统一战线没有彻底深刻的认识，对于上层只是在急来抱佛脚的情况下利用一下，没有真正诚心和人家合作，利用了以后就把人家掉开了。2. 认为上层的妇女工作不是我们的工作范围，而是廖承志同志的工作（陈曼云同志现在是他直接领导的，一九三九年以前是市委妇委的委员），结果，当然是可以不管或不应该管了。3. 缺乏而且没有注意培养专门的做上层工作的干部，比方以前曾经决定一同志做这个工作的，但是她跑到宋子文的婆婆处谈起日本来，就大骂日本财阀，这当然是碰了钉子的，以后就没有再设法培养这些干部了。

三年来工作的结果，妇女工作是有着它本身的特点。这就是从开始到现在，工作的开展都是比较实际和深入，都是从一个一点一滴的、艰艰苦苦的，从下而上的建立发展起

来，因此所有领导下的群众，一般的党都是能够指挥的，党在群众中是有着很好的威信的，党的决议在群众中的执行是比较有保证的；因此在几年中就产生了群众中的有威信的领袖，这些领袖都是从群众生长起来而为群众所真正拥护的；因此所有的几十个妇女党员中，质量都比较好，在党内所提拔起来的干部，都比较好，进步比较快，从来没有一个女干部变坏了而被党开除过的。

然而工作的开展仍然停留于一个很狭隘的局部的范围，除了女工工作比较有点初步的基础外，其他的都正是刚刚开始或还没有开始，这是由于：

1. 在认识上没有把妇女工作的各方面看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互相配合，互相发展。当时着重于开展劳动妇女的工作特别是女工的工作，这个是对的，但是因此就产生了轻视上层工作和知识妇女的工作，没有开展知识妇女的工作和上层工作来配合女工工作的更大的发展，致使女工工作在那边“自力更生”、“舞独脚戏”、“事倍功半”没有得到必要的成绩。

2. 在工作上没有把握紧妇女工作的特点，关心妇女本身的特殊要求，以致工作走向一般化和一般的救亡运动混合起来。就算比较注意的可是不是和工人运动混合起来，就和学生运动混合起来，对妇女工作始终还没有真正的踏上轨道。妇女干部对于妇女运动的理论的研究并未也曾提起注意过，更谈不上有系统的研究了，因此就不能广泛的动员了群众和组织了群众，整天还只是在自己领导下的一些团体兜来兜去，结果还是兜不过这个狭隘的圈子。

3. 一贯的没有正确估计到出刊〔版〕一个中心刊

物，对于开展工作的作用，从来没有“野心地”企图过出版妇运的刊物，直到一九三九年下半年才开始筹备这个工作，而结果也还弄不出来，因此就没有可能更广泛的去教育那些没有组织的群众，推动和激发她们的自动性，组织一些妇女团体和我们工作取得配合与联系，所以没有党员的地方就没有群众团体。

4. 没有认识到妇女群众的纯洁与左倾的特点，大量发展党的组织，特别是向一些进步的知识妇女开门，形成了发展工作中的长期的关门主义。

5. 没有认识到群众领袖对于这些群众的伟大的有决定作用的意义（如女工工作报告所指出的），随便乱调走群众领袖，使工作大伤元气，很久还不能喘过气来。

因此对于今后香港妇女工作的意见：

1. 必须把妇运各方面的工作看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必须克服过去轻视知识妇女的不正确的认识，必须看到今天工作最薄弱的一环就是知识妇女的工作，影响与牵制着其他工作的开展。因此今后要用很大的力量来开展这个工作，在一些现有的知识妇女团体中（如妇女策进会等）建立起工作或重新建立新的组织，加强对学联会女学团的领导，利用这些合法的组织出版妇女刊物和推动进行广泛的妇女教育工作。

2. 女工工作仍然是香港妇运的基本工作。开展女工工作仍然要从教育工作着手，推动上层妇女团体，如女青年会等，开展劳动妇女的教育工作，利用她们的社会地位

形式的。如有些人在国内很顽固，在香港却办个进步的报纸（如桂系及福建的陈仪），有些人失意时候进步一下，得意时就无比的反动，甚至有些汉奸也来办进步的报纸（如陈彬和，主编港报，如托匪王皓明主编珠江日报），在紧急的时候他们也许可以万分需要你，但过不几天就把你丢开了（如在广州失陷后曾经在一天之内有三十多起人来找廖承志同志去办游击队）。在这种复杂的环境下做统一战线工作，稍一不慎就会上当，同时这期间的各种矛盾，如运用得妙，也会收很大的成绩。

（二）国民党在香港不是统治者，在群众中又没有力量，然而共产党也不是统治者。

（三）香港是华侨和祖国的一个主要的联络站，香港本身就有很多华侨资本家及和南洋、美洲的华侨资本家有密切的关系，因此香港在对华侨的统一战线工作上有很大的地位和作用。

（四）因为英帝国主义统治着香港，因此对英帝国主义政府的“外交”工作，特别是对他下面的买办阶级的统一战线工作，对于香港一般工作的配合与开展上有重大意义。

香港地方党对于统一战线的工作是从来没有认真注意过，从来没有做好过的，这由于我们对统一战线工作有了不正确的了解：

我们认为统一战线工作主要的是上层的公开的交际工作，而这个工作已经有八路军办事处廖承志同志他们负担了，我们只管的下层工作，有时候去和他们那些上

层工作配合配合一下。因此市委及海委、特委从来都没有统一战线部，从来没有指定同志专门负担统一战线的工作，偶然在工作中碰到一些统一战线工作的场合时，就随便应付一下，这些统一战线工作的进行，一般的都是急来抱佛脚的，为着某一件实际工作的迫切需要的（如在经济斗争时到处找人调解，利用各种社会关系等）完全没有长期打算的经常性的、有计划的统一战线工作。

(二) 因为国民党在香港没有把握着统治地位，而且在某一方面说（如在群众中的威信）比我们要可怜得多，因此养成了我们轻视国民党的心理：“妈的，在国内你可以作威作福，在这里你可没有那么写意吧？”不要说要奉承他们了，一般的是一碰了头就“斗争”，我们自己领导的团体，多少是有点希望国民党绝迹的心理的。这是由于自己的心里有了一种认识：“要开放民运也不是由你们这些老爷作主，我老子干什么事你都没有办法来干涉我，我抬举你做什么？”因此是主观上不愿意和国民党作统一战线工作的，因此香港国民党领导的学校、报纸团体，没有一个和我们较切实地合作过。本来在这种环境下和国民党作统一战线工作是有特别便利的条件——他们也是被统治的，也是有开放民众运动言论自由的要求的——然而我们却没有抓紧这个特点，没有了解这种特点，因此根本忽略了和国民党做统一战线的工作，甚至主观上不屑把它当作统一战线对象。

(三) 由于对各个统一战线的对象都过分地戒心，因此所有的统一战线工作都是从单纯的利用观点出发的，是拿这些家伙来做敲门砖，或者最多是拿来作护身符，对

各种对象没有应有的区别，没有应有的诚心诚意的态度，完全没有照顾他们的利益、地位、面子等等。因此我们没有和这些统一战线的对象长久好下去的，各个统一战线的工作都是短命的工作。至于在抗战初期时候的一些同志，穿着破衣烂衫周旋于太太小姐之间，在宋子文的妻子的面前大骂其“日本金融寡头、财阀如何玩弄战争”等等，引起了各种不必要的打击，那就更不必说了。

由于我们在认识上有了这些错误，因此统一战线工作就不能不暴露出极大的弱点——完全忽视了，完全是不经常的，非常狭隘的。目前香港党所能够维持着的统一战线关系，只是一些借作“护身符”的工会顾问之类的几个绅士，除此以外就没有了。

今后香港的统一战线工作，必须最少要（一）估计到公开的八路军办事处（廖承志同志等）的活动是更加困难了，因此地方党不但要做下层工作，而且必须做上层工作——放更大的力量去做上层工作，必须利用种种社会关系去做隐秘着的上层工作，分配一些好的干部来负责这些工作，在市委要设专门负责这部分工作的人，要打进国民党、三青团及其各个团体里面去（过去我们是禁止参加国民党与三青团的），要设法去培养我们的同志的社会地位。（二）要加紧对各无党无派的团体组织的上层的、中层的、下层的统一战线工作，纠正过去对他们漠不关心的观念，要帮助他们，健全他们的团体，参加他们的活动，尊重他们的地位，在这些观点上来开展黄色工会的工作，开展基督教青年会、各体育会、各落后的封建的团体的工

作。这个任务要确定地放在全体党员与我们领导的各个团体的工作日程之上。

(三) 利用各种同乡、宗族，以至其他关系，组织华侨的统一战线的团体，不但要注意香港的华侨，而且要组织香港华侨和南洋美洲华侨的联系。

(四) 要在党内进行关于统一战线的理论教育，特别是着重于统一战线的教育，也即是阶级教育的特点，过去我们是认识这种特点的。本加紧正确地进行统一战线工作，对于香港党在今后能否应付更严重与更复杂的政治环境，是有决定的意义的。

五、总 结

三年来，香港党是基本上执行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路线的，香港党是基本上能够把党中央这条总的政治路线具体地在自己的工作环境中群众中执行起来的。无论在宣传工作方面，在组织工作方面，都足以表示香港党坚决执行党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决心。在双十二事变以前，我们是坚决地进行关于团结抗日的宣传工作，双十二事变后坚决地进行巩固和平发动抗战的宣传工作。在抗战以后，我们曾经广泛地组织过各种支持与援助祖国抗战的救亡工作，使香港的群众曾经在抗日战争中显示了他的伟大作用，如关于人力财力物力的动员，如关于义卖运动，如关于反日反汉奸的斗争等等。虽然我们在工作上曾经不断地发生了左的倾向，在群众的组织与斗

争中表现了狭隘的观点，然而我们也曾经从不断的工作中去纠正了自己的错误，使自己的工作更切实于党的正确的方向。今天我们可以说，在香港的广大的群众中间，我们是已经播种了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个革命的救国的方针的广泛的种子了，香港的广大的群众是认识了抗战团结进步的基本原则的，是了解国共合作的意义的，是认识了党在抗日民族战争中的伟大作用的。目前或者今后，谁要在香港企图煽动广大的群众来拥护分裂与投降都是不可能的，香港的广大的群众的政治觉悟是空前提高了，基本上是站在党的路线之上了。不这一方面虽然是由于党的一般的政治影响与香港下层群众的革命传统，然而一方面却也由于香港党这几年来来的宣传与组织工作的作用，没有香港党这几年来坚决地执行着党的政治路线，而要香港的下层群众克服他们那种根深蒂固的左倾关门主义是困难的，要发动过这几年来香港群众中的广大的救亡运动是不可能的。

（三）三年来，本香港党是建立发展与开始巩固了自建的组织的。在三年中，党的组织曾经由仅有的几个人发展到今日的六百余人（如果把已经动员回国去的同志都算在内，就要将达九百人的数字了），由混乱的组织逐渐巩固起来成为今日有比较坚定的阶级立场的，有比较健全的支部组织的，有群众基础的，有忠实可靠的干部的，能坚决执行党的路线与党上级所给予的指示的，总之是开始走向健全的党。三年来，香港党始终是广东党里面比较健全的一个单位，是曾经起过中心作用模范作用的单位，基本上香港党是准备了她的组织基础的，是有了一些基本的战斗力量的，是党的忠实可靠的战斗队伍中的一部分了。虽然

在力量上说，香港党的组织力量还是很薄弱的，然而她究竟是具备了这些性质了。

(三)三年来，香港党曾经组织过两三万群众与领导了两三万群众的经济的与政治的斗争，在这些斗争与组织工作中，加强了党与群众的联系，特别是加强了党与工人阶级的联系。在这些斗争与组织工作里面，我们曾经不断地改进了自己与教育了群众，因此，我们今天能够保证了对二万至三万群众的密切领导，特别是对工人群众的领导，虽然这个数字并不大，然而我们是有了比较切实的群众基础的。

(四)三年来，香港党对于整个广东党的工作的开展与内地武装斗争的支持上是有了她的很大的作用的。三年来我们不断的向内地输送了干部党员与左倾的群众，三年来，我们大约向内地输送了二百五十一至三百个党员，输送了五百至六百个左倾群众，在这一点上香港党是相当尽了她的能力了。

(五)所有这些成绩，基本上是由于：1. 南委——省委对香港工作的领导，基本上是正确的，特别是一九三七年张文彬同志来了以后是完全正确的；2. 香港党是能够和自己的党内错误作斗争的，是能够掌握党内自我批评的武器的，因此她能清除了混进党内来的奸细、自首分子，能够不断地在工作中进步；3. 她是自始至终都保持了和工人阶级比较密切的联系与依靠这些工人群众的，因此，她能及时的反映着正确的工人阶级的意识来锻炼了整个组织的。

(六)然而她一贯地保持着左倾关门主义的作风，她曾经屡次和这种作风斗争过，同时她自己又历次的重复了

这些错误，这些错误使她在党的工作与群众工作上都是被束缚于狭隘的范围，使工作的开展常常是非常迟慢的，或者是扩大一下以后又缩小了，或者是粘滞住了。（这是由于：1. 她继承了香港工人的斗争的传统，可是同时她又反映了他们十余年来地下党秘密工作时的关门主义的遗习，她不能理论地批判这种遗习，而且在各种场合还常常自以为是的保持这种遗习；2. 她的干部是一贯的轻视理论的事务主义或者所谓实际工作者，无论是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至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的理解程度都是很差的，政治水平是比较低的；3. 对香港工作没有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基本认识，因此工作也就没有长期打算与全盘计划，而是存着抓一把的心理——即是把以待时机了解为日本人来时就抓一把向内地走（可是日本人几年也没有来）。因此，香港的工作就不能不在过分警惕的，来眼光狭小的，看三日内京兆的等情况下关门主义起来了。正丁兹

（七）今后香港的工作：

管—1. 要求香港党的组织，广东省委以至中决重视香港的工作，要明确地给香港党以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任务，这些任务必须使香港党的同志了解；（1）长期埋伏是要埋伏到就算日本人占领了香港以后我们也还能最大部分的党员与干部都能埋伏工作；（2）积蓄力量是要加强与加深下层群众工作，加强与加深在落后群众中的工作，加强与加深党的巩固与发展工作，加强与加深统一战线工作，不但使敌人无懈可击，而且是要日积月累的增长新的战斗力量；（3）以待时机要了解为从帝国主义手上夺回香港，是倾覆帝国主义的统治的时机。

2. 要在党内严格地提出理论学习的重要性，在干部与党员中加强教育工作（主要的是自学），必须使目前的所有工人干部与有较强烈的阶级仇恨与阶级意识的干部（这是香港干部的一般的特点）在理论的基础上武装起来。

3. 大胆地深入地开展落后群众，主要的是落后的工人群众中的工作，要达到能够掌握与领导十万——二十万群众的目的。

4. 在市政工业、造船业、纺织业等工人中及知识分子中仍须大量的同时又是巩固的发展党的组织，要计划而又慎重地把党员发展到二千人。

5. 要健全市委及海委的领导机关，宣传部要找称职的人来做，建立青、妇、职各委员会。最好是省委能够派有城市工作经验与有独立工作能力有魄力的同志到港做特派员，目前市委书记虞焕章同志是比较缺乏经验与魄力，怕不能应付更重大更复杂的事变与任务的。

（八）关于以上全部的工作总结，我们在香港时是没有这样详细检查过的，同时在当时我们也未能这样比较深刻的了解，希望中央能够在短时间内检查我们的报告，并希望能够把检查的结果在短时间内传达给广东省委及香港党。

我们过去自己不进步，致令影响到香港的工作，这一年来常常想到自己过去的过失——不知道失掉了多少开展工作的机会，心里很痛苦，觉得很对不起党，现在没有办法了，希望中央能够指出我们的错误，帮助我们纠正错误，我们今后将以更大的精力来弥补过去的缺陷！

我们的报告完了。祝毛泽东同志及中央全体的同志健康！